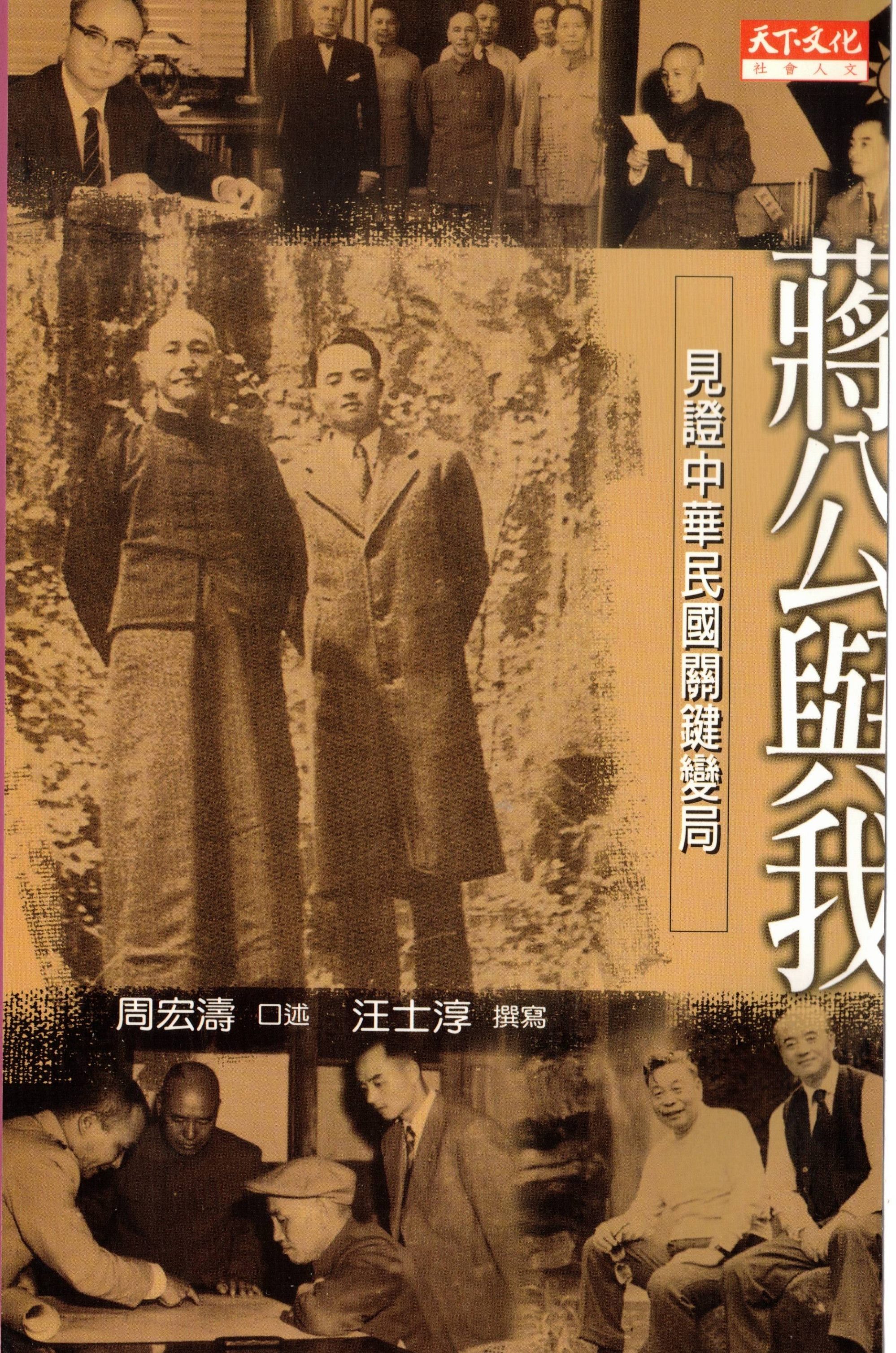


天下文化
社會人文

蔣公與我

見證中華民國關鍵變局

周宏濤 口述　汪士淳 撰寫



汪士淳提供

作者簡介

汪士淳

一九五六年生於台中市，七九年自輔仁大學大衆傳播系畢業，八二年進入《聯合報》從事採訪工作至今。著有《千山獨行——蔣緯國的人生之旅》、《寧靜中的風雨——蔣孝勇的真實聲音》（與王力行合著）、《忠與過——情治首長汪希苓的起落》（以上均由天下文化出版）。

天下文化　與您一起推動

讀一流書．做一流人．建一流社會

題字：名書法家　董陽孜女士



社會人文 192

蔣公與我

——見證中華民國關鍵變局

周宏濤 口述 汪士淳 撰寫

CHENG YU TUNG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130 St. George Street
8th Floor
Toronto, Ontario, Canada M5S 1A5

封面設計／沈月蓮（特約）

LIBRARY
AUG 1 1 2004
UNIVERSITY OF TORONTO

出版者的話

爲歷史留下紀錄

——出版文集、傳記、回憶錄的用心

高希均

一個時代的歷史，是由一些英雄與無數無名英雄，以血、淚、汗所共同塑造的。其中有國家命運的顚簸起伏，有社會結構的解體與重建，有經濟的停滯與飛騰，更有人間的悲歡離合。

近百年來我們中國人的歷史，正就徘徊在絕望與希望之中，毀滅與重生之中，失敗與成功之中。

沒有歷史，哪有家國？只有失敗的歷史，何來家國？

歷史是一本舊帳。但讀史的積極動機，不是在算舊帳，而是在擷取教訓，避免悲劇的重演。

歷史更可以是一本希望之帳，記錄這一代中國人半世紀以來在台灣的奮鬥與成就，鼓舞下一代，以民族自尊與驕傲，在二十一世紀開拓一個中國人的天下！

以傳播進步觀念爲己任的「天下文化」，二十多年來，先後出版了實際參與台灣發展重要人士的相關著作。這些人士都是廣義的英雄，他們或有英雄的抱負，或有英雄的志業，或有英雄的功績。在發表的文集、傳記、回憶錄中，這些黨國元老、軍事將領、政治人物、企業家、專家學者都坦率而又系統地，以歷史見證人的視野，細述他們的經濟軌跡與成敗得失。

就他們所撰述的，我們尊重，但不一定表示認同；如果因此引起的爭論，我們同樣尊重，但也不一定表示認同。我們的態度是：以專業水準出版他們的著述，不以自己的價值判斷來評論對錯。

在翻騰的歷史長河中，蓋棺也已無法論定，誰也難以掌握最後的眞理。我們所希望的是，請每一位人物或自己執筆、或親自口述、或經由第三者的觀察與敘述，寫下他們的歷練與感受，爲歷史留下一頁珍貴的紀錄。

自序

周宏濤

我不曾公開論述過民國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間，前後共十四年，我在蔣公身邊工作的實況，以及曾親身參與影響至深的國家大事。這是因爲侍從室工作人員守分守密的習慣，也因我對蔣公恆久的欽敬和忠忱。

如今蔣公逝世已三十年，經國先生也去世多年了，一些心懷去中國化意識的人士企圖徹底否定蔣公乃至於經國先生耕耘台灣的貢獻，並認爲國民黨是外來政權。但歷史是篡改不了的。當然偏頗的論斷，最終也掩蓋不住眞相的。

在中華民國最爲動盪的時期，就是政府遷台前後，我正好在蔣公身邊工作，追隨他走過那段國家幾乎淪亡的日子，並親眼目睹台灣如何逃過中共血洗的威脅，以及台灣如何篳路藍縷地走向繁榮。

我深深感受到應爲歷史留下見證，希望藉著親身的經歷，讓國人更能了解蔣公的行誼和爲人。

從進入侍從室工作開始，我每年都收到一本日記本，因爲蔣公要求工作人員記日記，並以之作爲日常警惕自反之用。歲月如矢，翻閱幾十年前的日記，更是滋多感慨，史事如鏡，可以鑑今。

我與汪士淳先生一同工作了四年，依據我的日記和資料，以及他的深入訪談並查證下，完成了這本回憶錄。他的文字忠實傳達了我的經歷，以及我對人與事的看法。

這本書的最後，我以加拿大溫哥華市卑詩大學（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頒授我榮譽法學博士學位時，我發表的〈台灣如何面對戰後的貧窮與不安〉一文，來概述蔣公經營台灣的歷程，當然我也曾非常榮幸地參與了。

二〇〇三年九月十五日

蔣公與我

見證中華民國關鍵變局

目錄

出版者的話　為歷史留下紀錄　高希均　一
出版文集、傳記、回憶錄的用心
自序　周宏濤　三
楔子　初會　1
第一章　淵源　5
第二章　侍從室　17
第三章　勝利的陰影　31
第四章　苜蓿園　45
第五章　蔣公的孤單　71
第六章　下野　83
第七章　桂系　109
第八章　掙扎　129
第九章　大陸淪陷　149
第十章　浮動的人心　165
第十一章　棄職與復職　195
第十二章　韓戰開打　215
第十三章　忙碌而黯淡的一天　233
第十四章　中共參戰　239
第十五章　守與攻　249
第十六章　國家的前途　267

第十七章　對日和約　283
第十八章　台灣經濟與美援　297
第十九章　毛邦初事件　313
第二十章　胡適先生　337
第二十一章　國民黨改造　355
第二十二章　黨中央　369
第二十三章　吳國楨　385
第二十四章　孫立人　401
第二十五章　總統連任及接班　411
第二十六章　五二四事件　423
第二十七章　轉戰財經　437
第二十八章　經緯兄弟　459
第二十九章　蔣夫人　469
第三十章　經國時代　481
第三十一章　蔣公與我　495
後記　汪士淳　509
附錄一　台灣如何面對戰後的貧窮與不安　周宏濤　515
所謂台灣經濟經驗的故事與檢討（一九四五至一九七七年）
附錄二　周宏濤大事記　531
附錄三　本書重要人名中文索引　541

楔子 初會

在漫長的歲月裡，我很清楚地記得，關係我一輩子公職生涯的那個日子，所有的細節。

一九四三年初夏的一個下午，二次世界大戰正熾，戰火下的重慶市則是暑氣逼人，我冒著汗走了很長一段路之後，終於抵達曾家岩官邸。我即將成為中國國防最高委員會委員長兼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中正的中文祕書，最後一關是由他親自接見。

曾家岩是重慶上清寺附近的一個住宅區，街道寬闊整齊。有條巷子左右建了三

幢洋樓，中間較高的兩層樓房就是蔣公的官邸，也是他指揮全局的所在地。由於事先經過通報，我一路有人帶路，沒受到盤查或攔阻。

下午四點多，蔣公正在會客，我在他的辦公室外面等著。客人一一告辭後，副官入內通報，接著開了門要我進去。

門喀嗟一聲，輕輕關了。

這辦公室相當大，薄薄的窗簾遮了些光，使得室內有點暗。我一時分辨不出辦公室的主人究竟坐在哪兒，正張望著，聽到右邊熟悉的鄉音和藹地招呼了：「來來，在這邊！」

我這才見到蔣公。他脫了馬褂，仍在藍色長袍外穿了件米色的羊毛背心，坐在書桌後面。我一時覺得他溫和而平易近人。即使如此，在這位大人物面前，我心裡依然相當緊張。

蔣公待我走到面前，開口問：

「你叫什麼名字？」

「周宏濤。」

「哦，好！你來了，好！明天就來上班！」

我深深一鞠躬，退出書房，初次見面就這麼結束。蔣公大我三十歲，那年他五十七歲。他已經事先知道我是他的一個晚輩，所以雖然才見面，就像見著晚輩般地跟我講話，我這一生，就這麼和蔣公牽連上了。

第一章 淵源

蔣公與我是有相當淵源的，我不僅在公職生涯裡直接聽命於他，他也是我的家鄉長輩。

我家源自河南汝南，輾轉遷到浙江省奉化北門定居已有好幾代。奉化並不是個大地方，所以彼此間非親即故，這家那家總會牽上一些關係，蔣公的姑姑嫁給我母親的祖父，所以我家和蔣家也是姻親；不過，蔣公與我家還有更密切的關係，那就是我祖父周駿彥。

前清時我祖父曾任奉化縣龍津學堂學監，教過稚齡的蔣公，所以蔣公以後寫信

給我祖父會尊稱「先生」。清政府舉辦寧波府學試，祖父高中榜首，因此獲得官費赴日本學習警政，後來他自己又兩度到日本轉攻法政，因此有了追隨國父孫中山先生加入革命行列的機會。

辛亥革命之後，由於革命經費十分困難，國父命令黨內同志在上海籌設證券物品交易所，祖父那時和蔣公、陳果夫等人一起開設了第五十四號經紀人號，取名「茂新」，做棉花及證券兩種生意。起初賺了不少錢，後來卻因交易所鬧風潮而把原先賺的都賠了回去。雖然證券買賣並未成功，但因爲志同道合，祖父以後追隨蔣公，長年下來擔任不少職務，最後是當軍政部軍需署長，掌管軍餉、軍糧與被服等等後勤供應工作。

我祖父一生勞碌，先後三次娶妻。元配鄭氏生了我父親時銘，就因肺結核病故了。第二任妻子，也是奉化家鄉人，生了三個叔叔後也過世了。祖父因家有老小，不得已三度娶妻張氏，婚後住在上海，繼祖母又生了兩位姑姑。

我生於一九一六年，下有妹妹濤桂、弟弟宏藩。母親很賢慧，既要侍奉丈夫，也含辛茹苦扶養兒女，備嘗艱辛，家裡上下內外全靠她打點。父親從鄭氏祖母那裡染上肺結核，他在我六歲那年赴日本求診並留學，但沒多久就因肺疾病重返鄉，幾

個月後辭世，得年僅二十六歲。

父親平日為防把疾病傳染給子女，所以他克制親情很少在家，總是住南西塢的醫院療養。偶爾回家也很少與兒女相處，因此除我小時曾有輕微肺病，幾年後就不藥而癒之外，其他家人都很健康。父親的苦，我直到現今才體會出來。

父親去世後，稚齡的濤桂、宏藩及我頓時失怙，家庭重擔由祖父承擔，他的工作極為忙碌，在奉化老家的責任全由母親扛下。

蔣公返鄉

蔣公於一九二七年和宋美齡女士在上海結婚，隨即返鄉祭祖，我也因此初次和蔣公及夫人打了照面。

蔣公夫婦回到家鄉，祖父陪著他們到家裡坐坐，我那時十一歲，就在院子等著看這對名人。祖父因為家裡住不下，剛蓋了三間新平房，那時鄉下的房子是用泥巴牆，沒有天花板，從室內可以直接看到屋瓦，相當簡陋。夫人一進去看了這種情形，就很坦率地問蔣公：「唉，你看這房子會不會倒下來？」

蔣公忙說：「這是新房子，不用擔心。」

其實奉化家鄉一般人家的新房子就是這麼蓋的，她不知道而已。蔣夫人因為生長在上海，沒有接觸過鄉下老百姓的生活。

蔣公夫婦離去時，我母親帶著我在大門口送行。母親推我到蔣公面前說：「叫公公！」論輩分，我母親應叫蔣公「叔叔」。我仰起頭來，看著這位因寧漢分裂才辭革命軍總司令沒多久的家鄉長輩，蔣公笑著摸摸我的頭：「好好好，不要叫公公，叫伯伯！」

我遵命叫了聲「伯伯」。

蔣公接著說：「你將來長大了，到我這邊來做事！」

這是我幼時唯一一次在家鄉見到蔣公，想不到他這個吩咐，十六年之後竟然成真。

我四歲時入縣城培本幼稚園，恰好與同齡的蔣公次子緯國同坐一條板凳，那時他正由養母姚冶誠帶著住在奉化。緯國後來回憶幼時往事，提到我們幼稚園「同學關係」時總會謔稱是「穿開襠褲的朋友」。小學畢業後，我先是在家鄉讀初中，以後轉到寧波四明中學。六年的中學畢業，一九三四年考上蘇州的東吳大學生物系。

我考此系的動機是因父親臥病而起，稚齡時看到父親病勢沈重的痛苦，心想以

後要習醫救父親之病，所以少時就下了如此的決心，而東吳大學生物系是北平協和醫院的預科，讀了生物系以後可以繼續北上習醫。但苦讀了不到一年，我就半途而廢，這是因為我在奉化讀中學時沒有英文師資，以後轉學四明中學，英文由外國傳教士教，我幾乎沒法子聽得懂，英文底子也就沒打好，而生物系用的幾乎都是英文教科書，並以英文教學，我受到很大的挫折，於是轉到政經系重讀一年級。

參與抗日學潮

那段時期，軍政府正在蔣公的領導之下剿共，但日軍的侵略行動卻從東北延伸到華北，且有進窺上海、威脅南京的企圖。全國為之震動，要求抗日的呼聲此起彼落，學生紛紛發起抗日救國請願運動呼籲政府全面抗日，東吳大學當然也不例外，我改讀政經系之後，成為請願運動積極參與者。

一九三五年底，全國學生群起赴南京請願，要求先攘外再安內，東吳學生也加入京滬學生的請願行列。學生是沒什麼錢的，大約數百名男女學生群集到火車站要進京請願，看到火車來了，跳上車就是了，因為學生一般觀念是：我們是愛國運動，當然火車得義務送我們一程。

我們和全國各地請願的學生匯集到南京黃埔軍校，因為蔣公住在那兒，他當時兼任西北剿匪總司令。我們原先以為蔣公不會理會學生的，但出乎意料之外，他穿著戎裝，親自接見我們。學生雖然是來請願的，但是他在我們的心目中還是很有份量，我到現在仍清楚記得，當蔣公一進來，擠滿了人的官校大禮堂立即鴉雀無聲。

「同學們，你們大家辛苦了！」他以問候開頭，然後訓示：「你們的意思和我的意思是一樣的，要抗日、要保衛國家，不過著急不得，要有準備。現在我們國家無論在物質上、人力上都不足。我講的人力，不是人多少，而是兵力多少的問題。所以各位要愛國、要抗日，可以！你們可以讀書，學成後一樣報國；你們要從軍，到軍校來我也歡迎，成為革命軍人來報效國家！」

面對訴求抗日的請願學生，蔣委員長邀請學生們加入軍校。他當場指示，願意加入軍校的學生出列往右邊門出去；不願加入軍校的就向左邊走。那時軍校正在擴大招生，初中以上學歷就可以讀，他化解請願的策略竟然出奇有效，除了少數幾十人之外，大多數學生立時湧出禮堂，我也隨著人潮溜出去了，回到東吳繼續念我的政經系。

幾乎加入共產黨

次年年底，西安事變發生了，不安的情緒迅速延燒到全國。莘莘學子經歷了前所未有的變局，大家都惶惶不安地問怎麼辦？這個國家要怎麼走下去？所幸沒多久蔣公就脫險了，校園裡人人如釋重負，慶幸領袖安然無恙。我那時絕沒想到，以後會如此長時間地追隨這位全國人心之所繫的領袖，當時只覺得鬆了一口氣，深深地爲國家又現新機而欣慰。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深夜，蘆溝橋事變發生了，我在次日清晨從廣播聽到這個消息，內心極爲憤慨。這場事變沒多久就演變成全面的對日抗戰，戰火迅速波及東南各省，東吳大學因此停課，我只得轉到後方湖北省武昌的武漢大學政治系繼續就讀。那時，我幾乎加入共產黨。

中共在延安辦的「中國抗日軍政大學」正在招生，由於標榜抗日，因此吸引了不少青年前往就讀。「抗大」還非人人可去，打算到延安的學子，得經過共產黨派在武漢的代表篩選。不過，武漢大學學生只要亮出身分就可以去了，我和唐振堯、徐振鐸、龐安富等好幾位同學，看到貼在校園裡的抗大招生宣傳海報後頗爲心動，

打算連袂而行。

準備動身的前一天，由於天冷，我擔心到延安後抵受不住，就到武昌街上買了棉大衣，順道向祖父辭行，他留我吃中飯。就在那個時刻，祖父在我的未來人生裡，首次做了關鍵性的影響。

打小時候起，祖父就很少同孫輩談些什麼，他重視的是身教。那天，他知道我打算到延安後，同樣沒有跟我說共產黨有什麼不好，其實祖父對共產黨了解得相當透徹，他和周恩來交情不錯，兩人還是黃埔軍校同事呢。陪他吃了飯後，我在他那裡住一晚，卻沒想到次日一覺醒來，我已經誤掉往延安的車子，就這麼留下來繼續武漢大學的學業。以後我有時回想，如果沒有祖父遲滯我的延安行，可能我就走入另外一種人生了。

投身公職

戰火逼近，武漢大學從武昌遷校到四川省樂山縣，我也隨著到大後方，這段求學時日無論學業或生活都十分艱辛，終於在一九三九年七月畢業。那時祖父因攝護腺病變臥病在床，我取得學位後一個月，他就在軍需署長任內病逝了，享年六十九

歲。

大學畢業之後，我先是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後方勤務部的普通科擔任科員，因爲只有這一科用的是文科的大學畢業生。由於平日工作不忙，我開始準備高考，那是考試院辦的第二屆全國公務員高等文官考試。雖然是戰時，重慶也常遭到轟炸，我們必須經常躲警報，但是仍有一萬多人同時在西南各省參加考試，預定錄取大約一百四十幾人。我準備了四個多月，放榜之後，我也列名榜上，整個普通科只有我一個人錄取。

我隨即到中央政治學校參加公務員訓練部高等科受訓，班主任是國民黨中央政治學校教育長陳果夫先生。受訓即將結束時，陳果夫一一約見學員，他問我：「你以後的志趣怎麼樣？」我簡單地回答：「我希望做個公務員。」以後我就接到考試院通知，被分發到新成立的社會部祕書廳擔任薦任科員。

社會部由谷正綱主持，當時正全面展開勞工就業、職業訓練、社會救濟等工作，我在那裡一待兩年多，累積了相當多的公職經驗。

進入侍從室

一九四三年五月的一天上午，侍從室第二處主任陳布雷打電話來，要我到曾家岩找他，因爲蔣公需要一個新的中文侍從祕書，原先的中文祕書俞國華在蔣公身邊工作多年後，準備出國讀書。

其實，是緯國最先想到要我去侍從室工作的。由於鄉音的關係，擔任祕書必須清楚了解蔣公講話內容，正考慮哪個家鄉子弟可以接任時，緯國就說：「周宏濤啊！他是周駿彥伯伯的孫子，不過宏濤的英文可是不太好的唷。」蔣公笑笑，並沒有講話。緯國所以會有我英文不好這個印象，是因爲那時大學生流行寫英文信，有次他要寫封信給女同學，忘了「展覽會」這個英文字怎麼寫，就過來問我，我的英文那時確實不好，他想不出來，我當然更想不出來。以後他就有個概念，周宏濤連「exhibition」也不知道，英文不好！以後我到侍從室之後努力自修，日後英文聽、說、讀、寫都應用自如，對我的工作幫助很大。

由於緯國提到我，使得蔣公在接替人選方面心裡有個底，雖然沒有馬上就找我，但我通過高考，那是很不容易的考試，這才認爲我的能力夠，也就成爲俞國華

的接棒人。不過，不僅是緯國，俞國華及其他侍從室成員也都提到我，那時奉化家鄉不少人想到侍從室做蔣公的祕書，但高等考試只有我上榜。

在曾家岩，我首次見到文名遠播的陳布雷。我以為他位高權重，應該是滿威風的，見到面之後才感受到他是位溫文儒雅的長者，使我肅然起敬。陳布雷簡單問了我的學經歷及家庭狀況，就要我回去寫中英文自傳各一篇交給他。兩個星期之後，我再接到侍二處的電話通知，蔣公對我的人事已經批可。我向侍從室報到後，以第四組組員身分任用。

那天下午蔣公的簡短召見之後，我就正式展開侍從室的公職生涯，我逐漸上手，也贏得了蔣公的信任。在侍從室一待十四年，我看著蔣公領導國家由盛轉衰，又衝過內外險阻交加的日子，那是一段雖然轉危為安，終是困難重重的艱苦歲月。

封面照片提供／周宏濤、黨史會 封面設計．美術編輯／沈月蓮（特約） 責任編輯／詹小玫、王玉蘭（特約）

第二章 侍從室

戰時的重慶，經過日機多次轟炸，處處可見破瓦殘垣，但因重重天險，日軍始終未能在西南各省得手。

抗戰最初幾年，日機從華中起飛，溯長江而上，然後轟炸重慶。我方在日機一起飛就會得到情報，重慶這邊空襲警報馬上就拉起來。到了一九四三年我被調到侍從室時，轟炸已經很少了，因爲蔣夫人到美國請來志願空軍，也就是陳納德（Chennault, Claire L.）的飛虎隊，取得大後方的制空權。

在侍從室工作，就得住在蔣公的官邸旁。蔣公在重慶官邸有二，除了曾家岩之

外，在南岸黃山也有一處官邸。黃山官邸三面環山，這裡屋宇分散，利於躲避日機空襲，它原是一有錢人家的別墅，沿著山坡而建，最上方是蔣公的住宅及書房，隔了一段距離是經國先生的房子，陳布雷及我們的辦公室兼宿舍在平地上，與蔣公住宅之間隔了多處菊花圃。我擔任蔣公祕書的最初三年，就不斷往來曾家岩及黃山官邸之間。

侍從室綜理軍政，總共分爲三個處。第一處負責軍事，主任是錢大鈞①，下轄一至三組；第二處以處理黨務、政務、交辦事項等業務，主任是陳布雷，下轄四至六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處理政務的第四組，陳方（字芷町）是組長，我就編在這個組裡。陳布雷是浙江人，飽學且有豐富的教育與從政經驗，我每個月到他那裡去報告工作，他總是很細心地指導我該怎麼做。

到侍從室之後，我因有高考資格而派少校階，準備赴美進修的俞國華同我面對面辦公，進行各項業務的銜接。我跟著俞國華一起工作三個月，他把擔任蔣公祕書的工作方式以及必須謙遜、謹慎、守分、保密等守則都傳授給我。他也告訴我，作爲蔣公的侍從祕書，有三個必須把握的重要條件：一是蔣公講話一定要仔細聽清楚；二是不能有外務；三是要勤快。能聽得懂蔣公的寧波鄉音，是爲什麼這個職務

要用小同鄉的基本考慮；至於另外兩個條件，我大致皆能持守。這段時間裡，我深深爲俞國華謹愼細心的工作態度所折服，以後我們成爲私交至深的朋友。他於一九四四年五月離職赴美，侍從祕書工作自此整個交在我的手上。

那時候，經國、緯國兩兄弟常來，除他們兄弟倆之外，就很少有別人會到我的辦公室，更不會找我聊天。我因此在公餘就讀書，尤其注意英文的進修，這是因爲中國戰區成立以後，英文公文增加不少。

為蔣公譯電、擬撰手令

擔任侍從祕書之初，蔣公和我之間的對話是很嚴肅的，他想到什麼就找我去，口述一番；我隨手記下他的任何口頭吩咐，有時是想找什麼資料，有時是想了解什麼人事，但也有時是下達軍政命令。經常過去一趟，蔣公就一口氣下達二、三十道手令，我隨身帶著小本子，筆記之後，回去整理出來。然而整理手令也有不少挑戰，例如蔣公吩咐時，往往僅有寥寥數語，有幾個手令雖然只是簡單吩咐，我卻必須敘述明白，回去整理之後再呈蔣公簽核，他覺得需要補充的，會在手令上批示。

政務文件經各處審核過濾之後會呈給蔣公，有特殊情形我會加注說明，蔣公則

用紅色軟芯鉛筆批示。有那麼幾次，他必須思考重大決策如處理史迪威（Stilwell, Joseph Warren）去留問題（見後文）時，就要我停送一般公文。

蔣公如果找我，就會要副官打電話給我；而我自己也可以去見他，不過得經過副官的通報。副官敲敲門先進去得到允許後，就爲我開門，讓我進去。但是也有少數幾次，蔣公直接到我的房間來，吩咐一些事就離開了。有天下午我正在午睡，且睡得長些，蔣公突然進來，我衣裝不整，覺得非常抱歉。但是事後看來，這些小節倒是沒有影響他對我的信任。

蔣公的修養很好，很難看到他的喜怒形之於色。不過，跟隨他的初期，我還是可以分辨得出他的情緒。舉例來說，我到他的辦公室，他心情好時，會吩咐一句：「公事你拿去。」相反地，情緒不好時，頭都不抬，手一揮就算了。在傳遞公事方面，他多半會要副官拿下來給我。

關於公事方面，侍從室一處、二處、三處會過濾大半，重要的才呈給他看。如屬於二處的公事，布公（陳布雷）會決定何者交到我這裡來呈給蔣公，其餘就逕行決行。蔣公身邊起初沒有機要祕書這種職務，那是政府遷台以後，自然而然叫出來的。曹聖芬、沈昌煥及我，事實上正確的職務就是祕書，後來南京時期是國民政府

祕書，遷台之後是總統府祕書。

剛到侍從室，業務不是擬撰各種手令，就是把國外發來的電文譯成中文。我特別喜歡翻譯電文，因爲這會使我的英文進步。有時爲了譯電，我往往工作到深夜，完成之後才休息。記得一九四四年初，有次爲了審慎翻譯兩通羅斯福（Roosevelt, F.D.）電文，一直譯到隔日清晨四點才完成，晚睡也就晚起，直到早晨八點半才起床。才盥洗沒多久，蔣公竟然親自到我的房間來，爲的是催那兩通譯件。我趕忙交給他，心裡則直喊僥倖，還好都譯出來了，否則前面幾個星期以來的辛勞恐怕都白費了。

我沒多久就了解蔣公的整個作息。在曾家岩，蔣公每天早晨七時左右起床，因他的基督教信仰，早操之後讀《聖經》並唱讚美詩，吃早餐後開始辦公。上午多半是召開各種會議及會客，下午則批覆公文。他非常重視新聞及輿論，尤其喜歡讀《大公報》張季鸞所寫的社評以及其他持論公平的文章。週末蔣公就到對岸的黃山別墅休息，他其實是利用這段時間作爲思考之用。蔣公愛讀書，也喜歡唐詩，在黃山面對青山蒼松心情好時，就會朗誦一番。他也喜歡靜坐聽鳥鳴或散步於林蔭之間，怡然自得。

戰時戀情

對日抗戰使得苦難的中國邁入一個新階段，各省人民打破鄉土觀念而融合，也因此促成了我的姻緣。

我在東吳大學讀書時，因戰亂借讀武漢大學，武大又因日軍逼近而遷校到四川樂山，在這之前由於交通問題，先在成都四川大學借讀，但沒有宿舍。幸而華西大學有個我在四明中學的同學叫張寧生，他看我沒地方住，就邀我住到他的宿舍。那時逃難學生很多，學校對宿舍管理並沒嚴格規定，外來學生也可以勉強住進去。在張寧生的簡陋宿舍裡，我在牆角占了個用木板拼成的鋪，逃難時自己揹來的被褥、鋪蓋等家當鋪在上面，再以硬木箱墳磚當書桌，就這麼住下來。

當時中央大學牙醫學院同樣遷校，並且與華西大學合作。雖然是戰時，學校裡的學生活動仍然不少，既然住在華西大學宿舍，就和借讀在此的中央大學學生有了交往的機會。一次野餐裡，在人群中有位長得秀氣、氣質不凡的上海女生特別引起我的注意。我們簡短地打了個招呼，彼此介紹後，知道她是讀牙醫系二年級的朱光潤，原籍浙江省鎮海縣，她是以第一名的成績考上中央大學第一屆牙醫系。那次交

談機會不多，由於彼此的家鄉口音之故，就更接近了些。我猜想彼此心裡有些什麼特殊的感覺正在發酵。

許多男學生喜歡朱光潤，也有同學正在追她，但那次見面之後，她卻和我走得近起來。由於學校又往西遷，我們見面的機會並不多，但是我們寫信，而且一寫就從求學寫到畢業，又寫到上班工作，幾年下來愛苗在字裡行間滋長。我非常喜歡她的個性，她有堅強的意志和一顆慈蕙的心。她在沙坪壩的牙病防治所執業，離官邸有一段距離，但也不算太遠，我有時得便用官邸送文的吉普車去看她，次數多了還惹了些閒話，我曾一度想改搭公車，後來就利用馬車。

我進入侍從室擔任祕書後，年底就和光潤訂婚了。說來好笑，我和光潤從認識、談戀愛都是在抗戰期間，直到一九四四年初訂婚後才首次一起吃了頓飯。

那時，官邸祕書室工作性質與清代的軍機處內容差不多，平時除處理日常政事文書外，還要撰擬文稿、翻譯及辦理機要文件，另外再加上收發和保管，工作相當忙。元月九日是我和光潤訂婚滿兩週，又是我的二十九歲生日，恰好是星期日，我和光潤約了上午見面，中午一起吃飯。沒想到一大早蔣公就交了一件致羅斯福總統函稿的中譯工作，並要清繕。我心裡暗暗著急，這下子上午就沒法子陪光潤，而且

也來不及事先通知她。上午十點多她已經進城了，而我還在辦公桌伏案和譯稿奮鬥，直到十一點多才完成。光潤打了電話過來，我約她到上清寺吃麵慶生。

這是我們交往六年來第一次共餐，除了麵以外，主菜就是兩條紅燒鯽魚而已，不過我們仍然吃得很愉快。她送了一件上海製的襯衫給我，這正是我需要的，真要感謝她的細心觀察。

一九四四年的大後方生活極度困難，即使在侍從室也是一樣。前方軍事大量消耗之下通貨膨脹避免不了，薪水愈來愈不經用，我被迫把「派力司」質料的中山裝拿到街上委託行出售來貼補用度，這是我最好的一套衣服，其他衣服多多少少嫌舊，沒有一件能夠拿得出手。

我個人的經濟狀況如此，國家經濟更是窘迫，所以蔣公致羅斯福總統函裡也是敘明這年為中國抗戰以來，最為艱難的時刻。從蔣公與羅斯福往來電文看，他對美方所提借款條件很是不悅。蔣公在開羅會議時，曾蒙羅斯福允諾借款十億美元，看來是落空了。

史迪威事件

這年夏天，聯軍登陸法國諾曼地，開闢第二戰場。歐州戰場捷報頻傳，然而中國戰場則面臨嚴峻的考驗。在中國戰區，美國派來的中國戰區參謀長史迪威在緬北密支那取得勝利；但盟軍在大陸的東戰場卻遭敗績，衡陽力守多日後終於陷落。國軍連年作戰，兵源耗損甚巨，要找到新兵補充，卻是難上加難。

戰事失利，蔣公與中國戰區參謀長史迪威之間的爭議逐漸表面化，史迪威認爲自己可以領導中國軍隊，蔣公應該交出軍權，由他以盟軍資格取而代之。史迪威個子短小精悍，我僅在官邸偶爾打過照面，但沒交談過。表面上看來，他頗有修養，但是要想全權指揮中國軍隊可不會像他想像的簡單。

要領導中國軍隊談何容易？即使在抗戰當時，全國部隊還不見得全遵從蔣公的號令。雲南的龍雲、廣西的白崇禧都曾公開反對中央的調度，蔣公面對這些實力派的將領或一方之霸還得客氣些；至於共軍，更是心腹之患，抗戰尚未告一段落，就已經在算計日後要怎麼擴張勢力。史迪威一直以爲蔣公偏私於中央軍，所以他一再想把裝備交給共軍。事實上，從抗戰勝利之後共軍立即開始搶占地盤看來，蔣公可以說早就洞悉共軍的態度了。

九月二十三日，史迪威到黃山官邸，當面遞送羅斯福總統電文給蔣公，電文中要求立刻補充怒江方面的部隊，同時授權史迪威指揮所有中國部隊。

蔣公視此舉爲其「平生最大之恥辱」，決定要求羅斯福撤換史迪威。他親自撰寫致羅斯福與在美的孔祥熙副院長及蔣夫人的電文，交給我發出；二十六日，蔣公又交下兩通親自寫就的電文，分別是給孔祥熙及蔣夫人，文內詳敘史迪威事件始末及致羅斯福私人代表赫爾利（Hurley, Patrick）將軍備忘錄的經過，然後要求孔祥熙及蔣夫人，均須堅持撤換史迪威，任何人來說情都應該嚴正拒絕。二十八日，他又指示孔祥熙不要再向美國要求任何援助。到了十月，羅斯福終於下令解除史迪威職務，令史氏返美，經過雙方協商之後改由魏德邁（Wedemeyer, Albert Coady）將軍接任。史案之後，美方軍援日漸減少，不僅品質不佳，許多彈藥及零件居然和武器尺寸不合，影響戰力很大。這年年底，東戰場國軍作戰繼續敗退。

次年，我整理一九四四年的檔案時，從所有二十餘卷檔案的數量及交涉層級看來，在這一年中以史迪威案最爲重要。至於國內，則以滇桂離心及軍事受挫最令人痛心，蔣公對滇軍龍雲及桂軍白崇禧時有指揮不動之憾，也是造成了軍事上失利的

原因之一。

十萬青年十萬軍

由於兵源缺乏且素質低落，蔣公決定號召知識青年從軍，知識青年從軍會議十月閉幕，決定發起「十萬青年十萬軍」的從軍運動。但是最初各界響應並不熱烈，而我自己每次面對蔣公時總是愧疚難安，覺得他的號召好像就是對著我說的，我卻毫無反應。我辦公室助手孫義宣報到後，在蔣公「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的號召下，我決定報名。雖然想起母親及光潤就不禁心酸，不知日後際遇將如何，但是，個人事小國家事大，國之不存何以家為！那天的日記，我就這麼記下自己的心境。不過，志願從軍一事，沒多久就被蔣公親自打了回票，而青年軍則是引起全國知青熱烈響應，我先前的擔心已成多餘，不過侍從室仍有兩人奉准參加了青年軍。

邁入一九四五年，歐洲戰場作戰已接近尾聲，亞洲戰場則仍緊張。

青年軍訓練相當順利，蔣公搭乘民本輪，溯江赴四川省萬縣視察青年軍第二〇四師。隨行人員把我的艙位安排在蔣公臥室旁邊，我覺得這樣子恐怕事事不便，於是移住到第二層與同事同艙，這還是自抗戰以來我首次搭乘輪船。民本輪順流而下，沿途風景動人，幾乎使我忘了仍在戰時。次日中午抵達萬縣，蔣公校閱在梁山機場旁訓練的青年軍，即搭機返回重慶。蔣公於七點二十分抵達機場，五分鐘之後座機就起飛了，八點五分降落在九龍機場，先前一天的行程，回程僅要四十分鐘。

我到侍從室的第二年，隨蔣公赴雲南昆明時，首次搭乘美齡號專機。此機是運輸機改裝的，外部漆成深褐色，機艙內設了十七個座位，每個座位都有各自的通風口、燈光、氧氣及菸灰缸等設備，另外有兩張床，以那時標準已相當舒適。

飛回重慶這趟行程，我還記得從萬縣到梁山機場的那段路，奉命先行。我們搭卡車在四千呎的巴山山脈中蜿蜒而行，整條路既險又陡，幾個急轉彎讓一行人驚駭不已。傍晚六點半，我們終於抵達正在興築中的梁山機場，那裡正有六萬民工以簡陋的工具全力修建跑道。

六萬人艱苦地工作，為的是讓轟炸機能夠起降去轟炸日本，對日本施以最後一擊，好結束二次世界大戰。他們沒有什麼機械化工具，只靠中國同胞驚人的耐力及勞力，山頭就被剷平，長長的跑道就這麼修築出來了。中國人民密密麻麻地聚在那裡，遠望有如浩蕩的波濤，如此艱苦及偉大的畫面，強烈地衝擊我心，撼動我的思

緒。這個世紀以來，中國人就是如此在內憂外患裡求生存，沒有休養生息的機會，苦難連綿不絕，生命有如螻蟻般被踐踏，不知何時才有翻身的機會。

第二章注釋

①錢大鈞曾於西安事變時受槍傷，抗戰勝利後出任上海市長，大陸淪陷前任西南軍政長官公署副長官。來台後任總統府戰略顧問，曾出任華航董事長，一九八二年病逝，享年九十歲。

第三章

勝利的陰影

重慶的夏季，非常炎熱。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傍晚也是如此，天氣沈悶得令人昏昏欲睡，屋子裡很難待得住。蔣公正以晚宴款待墨西哥大使易斯加蘭特，我吃過晚飯後，外頭忽然人聲嘈雜起來，我正覺得奇怪，想出去看個究竟時，錢大鈞主任興奮地衝進門大聲嚷著：

「日本投降了！」

雖然前些日子對日本投降已有預期，我仍然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這是眞的嗎？我馬上以電話向各機關打聽，消息都是一樣的——日本東京電台在晚上八點鐘

以英文廣播，宣布日皇願意接受「波茨坦宣言」，向盟國無條件投降。

我驚喜交集，第一個念頭就是到光潤那裡去，把這個好消息告訴她，於是馬上乘車前往沙坪壩，她在那裡執業。我把這個盼望多時的好消息告訴了她，光潤聽了比我還興奮。中國人的苦日子終於過去，我們可以返鄉了。

這天晚上，蔣公於晚宴後隨即召集軍事幹部，會商如何因應日本投降。整個晚上，重慶幾成不夜城，巨大的探照燈光束投向夜空，不是爲了尋找敵機，而是慶祝勝利；地面則是人聲沸騰，歡呼聲不絕於耳。我回到住處，興奮之餘也有些不安滲進腦海，對日作戰的外患終於結束了，但是內亂依然存在，河山破碎百廢待舉。不過，我佩服蔣公的堅毅，要不是他領導抗戰，哪有中華民國史上如此光輝榮耀的一頁！

日本正式宣布投降那天早上，我照常把公文拿到蔣公辦公室，面對這位領導中國對日抗戰八年終獲勝利的領袖，內心的崇敬不禁油然而生。要退出辦公室時，我特別向蔣公鞠了三個躬。

蔣公微笑，欠欠身點點頭。他知道我爲什麼會這麼做。他沒講話，我也沒開口，但我們心照不宣，我的心意他知道了。

日本投降了，蔣公巡視各地時，處處都是向他歡呼的人潮。抗戰終於勝利，但蔣公並沒有顯得特別高興，因爲他看得出，中國正面臨其他嚴峻的挑戰。

美軍在日本的廣島及長崎各投一枚原子彈後，蘇聯於日本投降的前一天對日宣戰，隨即派軍入侵東北。而中共的軍事行動則明顯轉向搶占華中地盤，在蘇聯的協助下，大量接收日軍的武器及僞軍，以壯大軍力。國軍與共軍之間的衝突看來難以避免。

僞軍處理，是國民政府的失著。在日本投降之後，東北的僞軍究竟何去何從，當時有兩派意見。何應欽是中國戰區陸軍總司令，他主張把僞軍納編爲地方武力；然而參謀總長兼東北行轅主任陳誠認爲軍費難以負荷，主張就地解散。當時，中國整個收入的九成是用在軍事，蔣公後來採納陳誠的意見，結果這批爲數不少的僞軍，全部成爲共黨部隊。

蔣公當然清楚中共對國家安定的威脅，抗戰勝利之後，他就幾度聯繫毛澤東赴重慶共商國是。八月二十八日，毛澤東、周恩來等共軍領導人在美國大使赫爾利的陪同及保證安全下，終於抵渝（重慶）。當晚蔣公以晚宴招待，我在一旁見到毛澤東，他坐在蔣公身旁，表現得非常謙恭，接下來在四十一天內的九度會談，毛還喊過「中華民國萬歲」、「蔣主席萬歲」等口號，卻在離渝之後，共軍也開始軍事行動。

歷經內憂外患而烽火不止的中國，原本在大戰結束後應療傷止痛，卻因中共在蘇聯的扶植下繼續作戰，使得戰亂持續，無法休養生息。

雅爾達密約

中蘇問題，要從羅斯福總統、英國首相邱吉爾（Churchill, Winston）、蘇聯頭子史達林（Stalin, Joseph）簽下對中國命運影響巨大的「雅爾達密約」說起。雅爾達會議時羅斯福的病情已經很嚴重了，所以也就任由史達林在獲取中國利益方面予取予求；加上開羅會議時蔣公支持印度，得罪了英國，邱吉爾在會議中也就未爲中國的前途多加考慮，因此簽訂了雅爾達密約，埋下蘇聯日後不利中國的種子。

羅斯福總統病重，蔣公很早就知道了，但一九四五年四月間羅斯福逝世的消息在天剛亮時傳到官邸，對蔣公而言仍是個震撼，一直到外交部正式通報，方才確認這是個不容置疑的噩耗。這位可敬的美國領袖雖然從未到過中國，但是過去一年多來我處理他和蔣公之間往來的電文不計其數，字裡行間處處是對我國、對蔣公及國

人的關切及殷盼，我自然而然對他起了好感。這天，蔣公取消當天預定的行程，召集黨政軍要員舉行會報，以因應羅氏逝世後的變局。中國友人羅斯福過世了，現在得重新適應以副總統身分接手領導美國及盟軍的杜魯門（Truman, Harry）總統。杜魯門對中國的態度和羅斯福顯著不同，他對中國的政策也成為中國大陸日後淪陷的遠因之一。

雅爾達密約就是蘇聯參加對日作戰的協議書，為了促請蘇聯參加對日作戰，美英兩國把中國當籌碼，給予蘇聯許多中國領土上的重大特權，包括恢復旅順港的租借、大連商港國際化並保證蘇聯的優勢權利、組織中蘇合辦公司以共同使用中東和南滿鐵路、外蒙獨立，以及千島群島應歸蘇聯等要求。由於事關重大，對蘇交涉成為抗戰勝利前後在外交上最嚴重也最頭疼的問題。

中國與蘇聯的交涉，於雅爾達密約簽定後的六月間就展開了。蔣公擬定關於旅順、大連及中東鐵路等九條交涉原則，我奉召記錄。經國先生曾經長期待在蘇聯，不單通曉俄文，也對俄國及史達林了解甚深，因此參與對俄交涉，成為對俄交涉團的成員之一。但是，對俄交涉非常不順利，史達林的姿態擺得很高，加上日軍於宣布投降之前，攻勢依然猛烈，八月初還攻陷新疆塔城，使得整個北疆陷於危殆，對

於國民政府的談判情勢極為不利。

經國先生於八月五日與行政院長宋子文、外交部長王世杰赴俄。這回合的談判一直到蘇聯對日宣戰並立即侵入東北、日本接著投降之後才結束，中國與蘇聯簽署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中國又被迫喪失了部分主權。

經國先生於二十日從俄國回來，那天深夜十一點，他約我及吳麟生醫官等人喝酒聊天，席間他講到史達林始終沒有忘情中國，想從中國這裡取得更多利益，又要防止美國插手中國事務。他那慷慨悲憤的心情，點燃大家懷憂憤慨的情緒，一直喝到次日凌晨四點，我與吳醫官都酩酊大醉，才回房休息。

經國先生身體健壯，酒量非常好，由這次酒宴即可見得——事後我們才知道，一大早他就到蔣公那裡去報告俄國之行，完全不受通宵飲酒的影響；而我可就慘了，不但下不了床，還鬧胃痛，精神極壞。

那天下午，蔣公照例順著山路散步，他見我沒去辦公，似乎也知道怎麼回事。經過經國先生的家門時，他問正在房外玩耍的長孫孝文：「你們家有沒有客人？」那時年僅十歲的孝文回答：「沒有啊，只有周祕書，還有吳醫官來過。」蔣公點點頭，知道我們喝酒喝了一個晚上，沒說什麼就走了。次日我恢復正常，按例呈送公

文時，蔣公不經意地提起，以後不要喝酒了。我感受到蔣公的關懷，既感激又慚愧。

蘇聯作梗之下，經國先生擔任特派員前往東北接收也不順利。他在東北與俄軍交涉時，我和助手孫義宣利用蔣公以茶會爲朝鮮臨時政府餞行的空檔，到九龍坡拜訪經國嫂方良女士，她端出咖啡及俄式點心待客。她是俄國人，因此我談到東北接收難題時，就覺得辭窮。然而，方良女士很愛中國，很客氣，酒量也是不錯，後來我和光潤常和經國先生夫婦聚會，但從來不和方良女士談起俄國。

完成終身大事

我深深愛著光潤，愛到連她弟弟光煥與她同處都滋生醋意的地步。七月底有天，我漏夜把大批令稿趕完，只爲次日能和她順利晤面；卻沒想到先前一天她參加舞會至深夜方歸，我生氣了，認爲跳舞不是正經娛樂，口角隨之而起。隨後兩人都懊悔了，我們擁吻釋嫌。

光潤和我的感情已經成熟，日本投降之前我倆就在討論怎麼結婚。然而戰時的通貨膨脹使得我一貧如洗，光潤對婚禮甚是期待，希望隆重舉行；我則是比較實際，總覺得量力而爲較安。每次光潤談起婚期我就猶豫，深恐不但結婚得花錢，以後養家的花用更是問題，不過我這樣的態度，光潤很是不悅。在日本宣布投降之前，我終於盡力籌措了一筆錢，作爲結婚之用。

婚前還有一大關——不知蔣公對我的結婚態度如何。幾個月前，有次送光潤回沙坪壩，短短幾十分鐘去來，回到曾家岩才知道錯過一次蔣公召喚，悵然之際，覺得擔任侍從祕書與結婚成家之間有所衝突，讓我陷入兩難。但姻緣已然成熟，我又爲如何向蔣公呈報我的婚事盤算好久，本想利用上午例行呈遞公事時向他報告；但真正站在蔣公面前，話到了嘴邊卻終未出口。

沒想到這個難題竟由經國先生幫我解決了。有天他到我的辦公室聊天，我談起我的婚事，突然想到他也是個理想管道啊！於是請他轉陳。經國先生答應了，而且立即就去。半個小時後，他回來說蔣公已經允諾。我喜出望外，自從有結婚打算之後，一年來我常爲擔任這個職務能否成婚而惴惴不安，如今終於釋懷。

經過半個多月籌備後，十月一日我們在重慶市勝利大廈舉行婚禮，五年多的戀情，終於開花結果，我們從此邁向新的人生。政府旋即還都南京，我們開始覓屋，希望在南京定居。

戴笠墜機

次年三月十七日，軍統局長戴笠（字雨農）在南京附近墜機身亡。他的殉職影響極大，因爲他所主持的軍統局就是中央的耳目，許多重要情報工作都是由他單線連絡，他一身亡就失聯了。以前戴笠到官邸來，通常是直接敲門進入蔣公的辦公室。抗戰時期他最有貢獻的情報工作，就是滲透了南京僞政府，在僞政府高層那裡布下許多很有效的眼線，這些線不單提供了日軍的動態，還保護了我方在南京、上海等地的情報工作人員。不過，抗戰勝利之後，戰時對我方情報蒐集很有貢獻的僞政府官員，在蔣公以民族大義的思考下，依然被以漢奸罪名判處重刑。

我和戴笠見過幾次面，交談機會不多，在一次餐敘時，他送我一把全新的手槍及子彈，說是要交給我防身。這把槍我始終沒有用過，但因爲學校上軍訓課時曾經實彈射擊過，倒也不怕；大陸即將淪陷那陣子緊張時刻，我才把槍帶在身邊，後來我一直留著，直到九〇年代我自行政院退休，才繳給士林官邸侍衛室核銷。

蔣公對戴笠極爲信任，感情深厚，戴笠墜機殉職後，他很傷心。戴笠出事後沒幾天，我在蔣公的辦公室看到他的書架上擺了只宋代的羊脂白玉雙龍杯，杯身有被

火焚過的焦黃。蔣公在玉杯上用毛筆親題「雨農所贈」四字，原來這只玉杯是戴笠帶來打算送給蔣公的，不幸失事後，搜救人員在失事現場找著玉杯，杯雖然沒破，卻被大火波及。玉杯後來輾轉呈給蔣公，蔣公題了字之後就放在辦公桌上，可見他是多麼痛惜。以後國民政府處處被中共滲透，軍情外洩使得國軍連吃敗仗，這與戴笠的死造成我方諜報戰的能力轉弱，有相當大的關係。

隨蔣公首次赴台

一九四六年十月，台灣慶祝光復一週年，我隨蔣公伉儷赴台。這是蔣公首次到台灣，先駐節台北市郊的草山賓館，然後飛台中，住在日月潭的涵碧樓。整體而言，台灣生活水準感覺上要比大陸各省來得安定些，這是由於沒有直接受到地面戰火波及之故。

我記得那時和當地士紳之間的最大困難，就是語言不通，也因此發生了一件滑稽事。在台中，我和同來的英文祕書沈昌煥混在人群裡，因爲語言不通而無人招呼，結果整個車隊啓程準備赴日月潭了，我和昌煥還沒上車。兩個人就以跑百米的速度拚命追，跑了總有一百多碼，好不容易才追上最後一輛車，沒有流落在台中。

這是我首次赴台印象最深的一幕。

雖然語言不通，但我仍可感受得到民衆的熱情。台灣人民雖然受日本統治了半個世紀，但骨子裡還是中國人，很高興回歸祖國懷抱。所以，四個月後不幸發生了二二八事件，就很令我驚訝了。

二二八事件發生之時，中央正處於內憂外患的時刻。行政院長宋子文及中央銀行總裁貝祖詒都於三月一日辭職，蔣公兼任行政院長，隨後又身兼改組完成的全國經濟委員會委員長。由於台灣秩序陷入混亂，並有部分機關受到攻擊，蔣公派第二十一師赴台灣維持秩序，又指示軍政人員不得採取報復行動，否則以抗令論罪。

這次暴動使得台灣人民和中央之間的感情發生裂痕，我後來也了解到一些原因，例如來台部隊素質不好，以及接收工作做得令台灣同胞反感等等。但那時國事如麻，更多嚴重待決的問題在全國各地蜂湧而起，二二八事件後來就沒有受到太多的注意，沒想到以後整個局勢丕變，政府退守台灣，一晃眼就是半世紀，二二八事件的影響力這才逐漸浮現。

國共內戰風雨欲來

抗戰勝利後，除了共黨對抗中央造成戰火延續之外，民生經濟問題更是籠罩全國人心、揮之不去的陰影。戰時，中國就已經民不聊生了，經濟方面的失調延續到戰後更是嚴重，而政府不單政策錯誤，派赴各地接收人員久貧之下操守紀律極壞，凡此種種都造成人民對中央的不信任，更予中共可乘之機。

而我深深覺得，國民政府還有一個政策上的錯誤，那就是我們接收了日本軍政各方面的人力及物資，卻對也是統治半壁江山多年的汪精衛政府沒有妥善的處置，而任令廢除解散，或以漢奸法辦，結果不僅沒有把當時汪精衛政府治理區內穩定的財政維持下去並轉爲己用，也造成人民的嚴重損失，種下日後經濟迅速惡化的敗因。

戰後，國共內戰蓄勢待發，但美國的態度卻有利中共。杜魯門總統先是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五日宣布，如果中國發生內戰，美國將不資助國民黨，堅持政治、軍事統一爲未來美援的前提。次日，他的特使馬歇爾（Marshall, George Catlett）抵華，但馬氏往往相信中共的宣傳，認爲國民政府這邊破壞了和平，最後調停失

敗，雙方全面開戰，杜魯門卻在馬歇爾的建議下，宣布凍結國民政府向美國採購剩餘軍火，使得國軍戰力在得不到供應之下大受影響，反之中共卻得到蘇聯方面源源不絕的支持，兩者之間優劣立判。

馬歇爾對國民政府有先入爲主的惡感，我認爲這與史迪威事件有關。馬歇爾與史迪威頗有私誼，蔣公要求美方調回史迪威時，馬氏曾堅決反對過；其後考慮由誰出任華北美軍司令以率領美軍於日本投降後登陸中國北方沿海時，馬歇爾竟然又推薦當時駐紮琉球擔任第十軍長的史迪威，遭蔣公拒絕。戰後，史迪威想到北京一遊，蔣公也因我軍尚未進駐而婉拒，種種因素都影響馬歇爾對蔣公的觀感。史迪威那時已經病重，隨後於一九四六年在舊金山去世。

中國的戰火綿延不絕，通貨膨脹問題再起，經濟及財政每下愈況，人民生計更是困難，蔣公的施政面臨嚴峻考驗。

第四章 苜蓿園

一九四八年初春，國共戰爭的情勢逐漸嚴峻。但感覺上，東北的戰火離南京很遙遠，勝負沒幾個人曉得，除了節節高升的物價令人憂心外，壓根兒沒深思戰事與自己有什麼關係。中央政府官員幾乎人人想定居下來，好爲下半輩子尋個安定。

我和光潤看上了明孝陵旁一處新開發的社區，名爲「苜蓿園」。一月間，我們在社區裡找到一塊大約三百坪大的土地，這得花筆錢，不過光潤的父親朱鴻南在上海經營紗廠及紙廠，在他的幫忙下，以金條買下這塊地。我們滿心歡喜地僱工整地種樹，卻沒料到樹尚未長成，房子也還沒蓋，大局就迅速逆轉，苜蓿園成爲永遠無

法實現的願望。

一九四八年，對於中華民國國祚而言極爲不順。政治局勢的不穩，從上半年進行的正副總統選舉就可見得。

中華民國首任正副總統選舉

第一屆國民大會於三月二十九日開幕，主要任務除行憲外，就是要選舉總統、副總統。然而，總統、副總統的選舉其實並不順利。以後在台灣，蔣公有次對黨內談話時，曾經親自說明提名的情況：

「民國三十七年國大選舉前一個月時，本黨對總統、副總統候選人問題，尚未有一個良好解決的辦法，我爲此前往廬山做二星期的思考，得到一個結論，就是爲保全國家、爲掩護本黨革命，非推選同情本黨之黨外人士爲總統不可。

「我當時所持的理由爲：一、國際方面，蘇聯固然是反對並打擊本黨的國家，即使英國的政策也是如此。美國的輿論也有同樣的氣氛。二、共匪必利用總統、副總統人選問題，以圖分化本黨。三、當時本黨內部分裂，倘提本黨同志，必互爭提

名，而使內訌，在此種內外情勢之下，非如此不能挽救黨國之危亡，但上居中央委員同志對我的主張多不了解；更有甚者，即在中全會閉幕前一日，廣西方面同志——此人現尚在此——來見，不贊成提黨外人士，同時說，如果我不願擔任總統，則請考慮李宗仁為總統。我深悉李宗仁的能力及為人，因而為責任心的驅策，不得已接受總統參選人的提名。

「至於副總統參選人的問題，我原擬俟總統參選人問題解決後，這個問題就可順利解決，而當時各同志互爭副總統，使中央無法決定由誰代表本黨參選，當時除孫科外，其餘均未向黨請示，我以孫科服從黨紀，所以加以支持，但因其他競選者均為本黨同志，所以沒有積極進行輔選。」①

這段話是一九五四年二月，蔣公在陽明山舉行的一次黨內高層會議裡說的，而他所說的「廣西方面同志」，指的是白崇禧，他當時坐在台下，我不知道蔣公這麼講時他的感受如何。首屆總統選舉，蔣公順利當選中華民國第一任總統，至於副總統方面，由於各方竭力爭取，最後由李宗仁經過兩輪投票後，當選副總統。而李宗仁以後在國家危殆時的表現，實在令人嘆息。

局勢的轉壞，除了政局不穩之外，國民政府那時面臨兩大挑戰，一是軍事方面，一是經濟問題。軍事不單使得國力迅速消耗，而戰略上的失誤更使得龐大的國軍遭共軍蠶食鯨吞；經濟上的匱乏，則使得民心喪失，給予共產黨可趁之機。

戰事節節失利

一九四八年下半年起，由於共諜潛伏，國軍動向屢被偵知，共軍得以獲得先機，導致國軍在幾次戰役中慘敗，部分三軍部隊臨陣叛降，整個戰局有兵敗如山倒之勢。七月間，國軍在各戰場戰敗報告陸續傳來，我雖然沒有參加軍事方面的會議，仍能從經手的情報及各種公文了解大致戰況發展。

十九日，我在辦公室跟參謀周菊村談起戰況，他告訴我，湖北襄樊也已經棄守，康澤被俘，山西戰事接近太原，但閻伯川不肯孤軍出兵救援臨汾，以致臨汾陷入共軍之手。太原因此孤立，四面受敵，空軍也因天候不佳無法救援，現在晉軍太脆弱，太原淪陷只是時間早晚問題，當前剿共的方針如果不改變，那可就前途暗淡了。到了二十日，駐榆砲兵團一部叛變，晉局可能因此不保，各銀行設在太原當地的分行紛紛撤離，人心惶惶。

太原位於呂梁、太行兩山脈之間，汾河之南，自古以來就是軍事重鎮，軍火工業相當發達，而且人文薈萃。二十二日，我隨蔣公飛太原，閻伯川親來迎接，與蔣公同車進城，蔣公並召集重要幹部訓話。

匆忙中，閻伯川曾和我們見面，先是講了幾句客套話，就坦白承認這次太原戰局情勢危急，雖是敵眾我寡，但也全因為戰略指導錯誤。下午四點，總統座機起飛時，自西安調來的第三十師陸續空運抵達。

九月，共軍集中主力七十萬大軍，林彪的東北野戰軍進攻長春、瀋陽，並另外派兵攻錦州，蔣公開始為戰事奔波，我當然隨行。

十月十五日錦州告急。清晨，我到辦公室，才獲悉蔣公夫婦要赴東北督促援軍急進，以解錦州之圍。下午兩點三刻座機起飛，六點三十分降落瀋陽機場。瀋陽看來還算平靜，但市況蕭條，物價高昂，光是高粱米就要十幾金圓才能買到一斤。蔣公立即召開軍事會議，仍未能扭轉戰局，次日錦州失守，蔣公飛往葫蘆島指揮，我則和其他人隨蔣夫人飛往北平。

十七日是蔣公六十二歲農曆生日，一大早起來，北平晴空萬里，我心裡喜悅的感覺油然而生，但壞消息還是來了。午後，東北剿匪總司令衛立煌來電，要派許副廳長專機來北平報告重大軍事機密。許副廳長人還在途中，我在下午四點就已經知道答案。周參謀告訴我，長春守軍叛變了。

晚上七點半，蔣公舉行晚宴，華北剿匪總司令傅作義及行政院副院長張厲生都在座。就在此時，許副廳長終於趕到，報告內容正是駐守長春的六十軍軍長曾澤生[2]叛變。大家都覺得難過，不過蔣公指示如何處理此事之後，態度還是鎮靜的，席間他向傅作義詢問前線軍事情況，直到九點多才散席，生日就這麼過了。

曾澤生的叛變影響很大。次日一早，蔣公就飛瀋陽處理長春之變。由於長春失陷，牽動整個東北的軍情，情勢更形惡化，瀋陽於十一月初陷入敵手。我在日記裡記下十一月一日那天，瀋陽情況不明，守瀋陽的第八兵團司令官周福成還來電說尚在勉力支撐；而趙副參謀長則是來電請處分衛立煌。但是蔣公判斷周福成已經投共，其來電恐怕只是為了拖延，以避免國軍派機去轟炸罷了，至於趙電則是借刀殺人之計了。後來果然證實，周福成的部隊在一日就投降了。雖然蔣公沒有馬上中計處分衛立煌，但後來他仍以衛立煌貽誤戎機為由，下令撤職查辦。

經濟惡化

戰局艱困之時，經濟更是遲滯。總統選舉投票之前，蔣公準備在四月九日對國大做施政報告，我在前一天把講稿讀了幾遍，覺得其中在闡述經濟問題方面，過分重視法幣的準備，卻未能把握物價及經濟問題的重心，於是拿了稿子回辦公室擬了四點修正意見，在晚上七點鐘呈給蔣公。

九日早晨，我到蔣公辦公室呈遞公事時，他要我隨他到國民大會旁聽，可見他採納我的意見了。我隨著蔣公赴國大，他開始訓話，對於政治、經濟、軍事各方面都做了分析，一講就是一個半小時，舉座鼓掌三十多次。我很為蔣公感到欣慰，他依然如此的有領袖魅力。

但是，蠢蠢欲動的經濟危機侵蝕整個中國社會。幣值貶幅驚人，可謂人人受害，連我自己都不能倖免，往往薪水才發下，沒多久就買不到什麼東西了。幸好光潤調度家用有方，月初領到薪水，她就先把錢轉為實物或硬幣，到了月終再用。但即使如此，我家依然感到捉襟見肘。

家庭如此，政府機關的開支更是寅吃卯糧。當時我們的外交很簡單，主要目的

只有兩個，一是借錢，一是軍火。中國財政金融又陷困局，國家因戰爭而支出繁浩，國庫出現巨額虧損，不得不靠發行鈔票來支撐，結果嚴重的通貨膨脹也就無可避免地跟著來了。以我在七月十九日的日記記下的情況為例，晚報報導大鈔以票面一百萬至五百萬元發行，物價飛漲之下，金價為每英兩四億元，美鈔則無交易。政府拋售民生必需品，致使物價略跌。但是政府掌控的物資相當有限，勢必難以持久，全國憂心不已。

這天晚上，沈昌煥來見我，要與經國先生談全國經濟管制問題。政府打算在上海成立全國經濟金融局，進行金融及經濟管制，此一管制的層級很高，計畫由行政院長兼任局長，經國先生任副局長，全權處理局務。

金圓券幣值暴跌

夏季以來戰事節節失利。八月九日，總統夫婦搭乘美齡號飛往牯嶺，在九江上空，我看到水患嚴重，悲憫之心油然而生，苦難中國的天災人禍不斷，下機後沿路的景緻全無心瀏覽了。那陣子我常會做惡夢，夢中淨是危城應戰，大夥慌作一團。

次日，牯嶺大雨傾盆。蔣公要我電請陳布雷約戴季陶、邵元沖、鄒魯等人上

山，並催中央黨部儘速與行政院會辦防制後方共黨份子滲透案。

十五日，孫科及行政院長翁文灝也奉召來山議事，還有美國大使司徒雷登（Stuart, John Leighton）、顧問傅涇波、美國西太平洋海軍司令白吉爾（Badger, Oscar）上將夫婦等人同行，我奉派前往接待。夕陽漸落之際，蔣公及夫人在含鄱口招待野餐，十分熱絡；但是我對交際應酬一向沒興趣，只覺興味索然，這也是因爲受到局勢發展的影響，實在提不起勁。算起來，這是蔣公夫婦在大陸淪陷前，最後一次勉強帶著輕鬆心情到牯嶺避暑。

幣制改革正積極籌畫，翁文灝等上山的目的就是爲此。蔣公夫婦十八日下山，我奉命約翁文灝、行政院副院長張厲生、財政部長王雲五、外交部長王世杰、央行總裁俞鴻鈞，與蔣公會談改革事宜；十九日，政府頒布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實行幣制改革，廢置法幣，發行金圓券，私人不得持有黃金、白銀及外幣。

改革令下達，我爲之一振，覺得這是復員之後，唯一讓我們一新耳目之舉。九日晚上，經國先生過來告訴我，他已奉派到上海督導金融秩序，要搭夜車履新。我對他的工作毅力早有信心，深信他必能穩住經改陣腳。

十月初，正當東北戰況激烈，錦州被圍之際，蔣公親赴葫蘆島督戰，下令瀋陽

國軍出擊後，八日偕夫人赴上海停留一晚，次日召見經國先生後，隨即返回南京。我風聞這天蔣公爲了揚子公司囤積居奇案，在夫人的要求下召見經國先生，垂詢上海金融管制執行情形，經國先生原本要法辦經營揚子公司的負責人孔令侃，因而擱置，僅將貨品充公。

僅僅不過一個月，金融改革各項措施相繼失敗，因限價物品無法補充，最後只好取消，金圓券的幣值有如溜滑梯一般，立即暴跌。我家那時也響應政府措施，母親將家裡所有的幾十兩黃金都拿到奉化當地的銀行兌換爲金圓券，卻沒想到，金圓券僅僅撐了兩個月，就隨著戰事失利及管制失敗而貶得一文不值。這次經改和戰局失利相互影響，結果是老百姓損失慘重，政府失去民心。

局勢危殆

東北告急，但是各報往往報喜不報憂。十月二十三日這天，報紙大篇幅報導國軍平綏大捷，北平這裡卻已人心浮動，我不禁憂心忡忡。在北平沒事，身邊也沒書，晚上我拜訪一位當地情治官員，向他借書看，順便聽聽邯鄲的中共廣播，播出聲音之清晰不亞於中央電台，令我心驚。午夜時分返回住處，就接到外交部劉次長

來電說，美國準備發布撤退平津僑民的聲明。此舉勢將更影響動盪中的政局，心頭的憂慮更爲加深了。

二十四日，翁文灝院長來見蔣公，商談美國撤僑之事。由於茲事體大，會影響民心士氣，蔣公當即要我準備三份電稿，一是致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一是給駐美大使顧維鈞；第三則電稿則是給外交部長王世杰。給司徒大使的內容是我政府會竭力保衛平津的安全，請美方不要宣布撤僑；給顧大使的信則是囑咐他向美國副國務卿洽商，請美方撤消撤僑聲明；至於王外長雖然目前人在法國，還是囑咐他與馬歇爾懇談中美合作之事。

第二天，蔣夫人的祕書來電說，美國撤僑之事已無問題，他們不會公開宣布了。由於早上也接到司徒大使同樣訊息的覆電，我馬上向蔣公報告。

另有消息傳來，一些美國參眾議員在美國力主援華，卻是以各省爲對象逕行援助。這擺明是對我中央政府不信任，如此援助勢必引起各方山頭勢力割據局面，蔣公立即致電顧維鈞，囑咐應設法打消美國這種構想。

氣候嚴寒，室內溫度低到無法做事，然而還比不上心緒的低落。這天在軍事方面傳過來的消息是，廖耀湘③兵團越過新立屯後，深夜十時與共軍在黑山一帶接戰，但被共軍十四個縱隊以上的兵力包圍，兵團的退路被斷，奉命回到瀋陽守備。到了二十八日，廖兵團雖大致完整，但是武器裝備損失殆盡。可以說，自從長春守軍叛變以來，部隊作戰能力大爲降低，可能要全面崩潰。

蔣公在晚上任命白崇禧爲華中剿匪總司令兼領華東徐州軍事，我看到手令很擔心，因爲白崇禧對中央的命令常是陽奉陰違，我就沒有如往常一般立即發出。兩個小時之後，蔣公又召見，他另外有件公事要發。我拿了之後順便詢問：「請問總統，白總司令的人事就這麼發嗎？」

「發啊發啊。」蔣公回答，有些不耐煩。

希望蔣公重新考慮此一命令的努力，就這麼結束了。

攸關全局勝負的徐蚌會戰開打了。十一月八日，黃百韜④兵團在徐州東翼碾莊與共軍接戰，但是第三綏靖區司令兼行政長官馮治安⑤所屬兵團全部叛變，使得黃兵團因此被共軍圍擊。

陳布雷自殺

大局逆轉，憂國憂時的陳布雷終於承受不住。十一月十三日上午十點鐘，我在

辦公室接到布公助手蔣君章打來的電話。他急促地說：「你快來，布公服安眠藥過量了！」我掛了電話，立即趕過去。在路上時我還想著，會不會是布公長年服用安眠藥，因為毒素累積而出了事？快到陳宅時，心裡突然豁然大白——布公可能是自殺了！

車子才停下，我就三步併做兩步往樓上臥室奔去，進了門就看到一切已經太遲了。布公的家人、親友以及醫師圍在床旁飲泣，而老人則已是臉色蒼黃氣息全無，僵直地臥在床上。先到的醫師們原先仍試圖搶救，但布公早已斷氣，醫師還想法子注射強心針，但四肢已僵，根本打不進去。

陳布雷在枕邊留了幾封遺書，其中一封是給蔣公的。我抽出閱讀，只見字裡行間透著慷慨悲壯的情懷，不禁哽咽落淚。

我最初到侍從室，就是由布公接見安排，他也是我的長輩，因為他和祖父是好友。以後我的工作上軌道了，依然保持每個星期到他辦公室一次，報告工作狀況等等。布公是很客氣的，他總是傾聽，很少做什麼指示。我對布公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他非常公正，不單用國家公帑非常節省，如此的公正甚至可以在他為蔣公擬稿工作上也可見得，他總能忠實地把蔣公心中的想法形諸文字，有時他加了些內容，但必然會問過蔣公的意思，蔣公同意後，就加在文章裡面。

我一直沒料到布公會走上自殺之途。回想到十幾天以前去見他時，還很慷慨激昂地跟他談到列強對我國不正確的批評又中傷蔣公，我也對那麼多受到蔣公栽培的將領臨危竟然叛變非常憤慨。布公低頭默然，傾聽著，有時以點頭回應，我感覺到他的無奈及傷心。講完我就告辭了，卻沒想到他隔了沒多久竟然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布公走了，我必須立即面報蔣公。回到官邸，蔣公正好從地圖室出來，我立即迎上前報告：「布公過世了，是自殺的。」接著就把遺書呈給他。我報告時，可以見得蔣公的面容霎時慘白，眉宇間悽愴之情盡現。他肅穆地抽出遺書看了一會兒，一句話沒說，拿著遺書就回辦公室去了。蔣夫人原來預定這天要赴上海，也因為布公的過世作罷。下午，蔣公夫婦親往陳宅弔唁，我則為幾天前才對布公慷慨陳述時局之敗壞而悔恨交加，布公已經六十，我怎能再增加他的心理負擔？我既悔又愧，想著布公平日對我的愛護，終至痛哭不能自己。

多年後，蔣公才親口說出，陳布雷的自殺，是因為外間散布蔣公即將下野的謠言之故。陳布雷當時留下兩封遺書給蔣公，第二封遺書中這麼寫著：「……今我所

聞所見於一般老百姓之中毒素宣傳以散播關於公之謠言誣蔑者，不知凡幾，回憶在渝，當三十二年時，公即命注意敵人之反宣傳，而四、五年來，布雷實毫未盡力以挽回此惡毒之宣傳，即此一端，已萬萬無可自恕自全之理……。」另方面，他也覺得自己已經枯竭，無法再為蔣公効力，終致走上絕路。

十年後，蔣公對黨內的一次講話中提到陳布雷的這番話：「當時余曾決心死守南京漸圖光復，然如三十七年陳布雷同志去世時致余二信，尤以第二封信為最，在其自殺前一星期的政治會議後，在休息室向余報告外間謠言無奇不有，而黨內亦人人如此說，並指明某同志之言論態度，極表憤慨，後果因此以死報國。」⑥蔣公指的是要他下野的事。徐蚌會戰期間，桂系要求蔣公交出領導棒子，陳布雷為此憂憤不已，終於導致他的自殺。

兵敗如山倒

戰事失利，經濟也垮了。楚歌聲中，翁文灝已在十月底請辭行政院長，然而由於繼任人選難產，這項重要人事任命案也就擱置了一個月。十一月下旬，翁文灝聲言他只續任院長職到十二月五日。二十四日，我奉蔣公之命赴翁在五台山的新居轉

達指示，要求他至少要維持到十二月十五日。翁文灝則告訴我，最近美國方面包括蒲立德（Bullitt, William C.）⑦在內，對我政府力量評估甚低。他說：「現在危機當前，行政院長人選久懸不決，以致政務停頓，中央對這個問題也沒有任何宣示，是會動搖民心的，所以我不願拖延時日。」他堅決不願繼續下去。我回到官邸，把翁文灝的態度向蔣公報告，蔣公感到為難，要我轉約李惟果祕書長再去跟翁院長談談，也無法令他回轉心意，蔣公於是提名孫科繼任行政院長。至於翁文灝，在大陸淪陷後次年，他就投共了。

十二月，徐蚌會戰勝負幾已分曉，這場戰役對於國共戰力的消長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八日下午，侍衛長俞濟時告訴我，蔣公已安排經國先生出任福建省政府民政廳長，並要在廈門為蔣公預備居處。兩天後，政府宣布除台灣、新疆外全國戒嚴。

先前共軍持續攻進黃維兵團時，華北方面中央原擬將平津傅作義的龐大部隊撤退到西北，但傅作義希望保住出海口及外援，而力主守住平津。然而十二月後林彪部隊大舉入關，襲斷平綏交通，使得察哈爾及綏遠因此孤懸，平津再度危急。傅作義自己知道戰術錯誤且危機迫在眉睫，十二日來電引咎辭職，但蔣公慰留。十三日這天的情報指出，北平附近地區均已棄守，國軍退守城區，整個大局令人憂惶。

我回想這年三月十日追隨蔣公檢閱快縱部隊及參觀水陸兩用戰車戰技操演，在蔣公面前，部隊的演練令人振奮，但沒想到僅僅幾個月之後這些部隊兵敗如山倒。黃維兵團被圍困後，傳聞突圍成功，後來中共方面的廣播說是全被殲滅，十二月二十日證實黃維[8]被俘。

由於共軍轉而向北包圍杜聿明，蔣公於十八日清晨以飛機投函，懇切地要他速行出擊以期死中求生，但杜聿明的回覆是目前糧彈補給俱缺，對出擊的指示頗有顧忌及猶豫之意。

這天，才就任行政院長一個多月的孫科也忽然請辭。午後蔣公和他長談一個半小時，孫科說他在上海宴請美國經濟合作總署署長霍夫曼（Hoffman, Paul G.）時，霍氏曾推許胡適，稱譽胡氏爲中國一大偉人，孫因此認爲他組閣後，將來恐怕很難獲美方支持，所以有了退卻之意。

美援始終是政府存續的關鍵。蔣公先是在十一月九日致電杜魯門，呼籲美國伸出援手，這是因爲整個戰局已經失控。戰敗之下，國軍部隊不斷叛變，改投敵營，蔣公在信中所期待的美援，除了軍火外，還希望由美軍將領來指揮，以重建國軍官兵的信心。蔣公並且指出中國戰局之所以至此，究其遠因是因爲在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應美國要求之下，中國與蘇聯簽定「中蘇友好條約」所致。五天後，司徒大使轉來覆電，杜魯門拒絕了加強援助中國的請求，日後更以白皮書來撇清美國對中國局勢的責任。

那個時候，我還是對徐蚌戰區有著期待，想著如果勝利的話就把光潤從上海接到南京團聚，其實中原大戰國軍已徹底的輸了。苜蓿園的安定日子，已成泡影。

第四章注釋

①周氏錄於民國四十三年日記。

②曾澤生為滇軍將領，率領第六十軍到東北作戰，駐守長春。投共後，第六十軍改編為共軍第五十軍，仍任軍長，一九四九年十月曾率軍入川作戰，後又參加韓戰。以後曾任人大常委及政協常委、國防委員會委員等。一九七三年於北京病故，年七十三歲。（傳記文學、劉紹唐主編：《民國人物小傳》）

③廖耀湘率第九兵團，兵敗被俘。初囚於撫順集中營後移佳木斯，一九六一年獲釋。以後任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專員，後任政協委員。一九六八年病歿，年六十三歲。（國防部史政編譯局：《中國戰史大辭典——人物之部》）

④黃百韜為第七兵團司令官，於輾莊被圍後，至十一月二十二日所部傷亡殆盡，他見大勢不可為，乃舉槍自戕，壯烈成仁。（國防部史政編譯局：《中國戰史大辭典——人物之部》）

⑤馮治安於一九四九年擔任京滬杭警備副總司令並隨政府來台後，任戰略顧問，於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在台病卒。（國防部史政編譯局：《中國戰史大辭典——人物之部》）

⑥周氏錄於民國四十七年日記。

⑦蒲立德，二次大戰前曾任美國駐蘇、駐法大使，為蔣公少數的外籍友人。（傳記文學，劉

紹唐主編：《民國人物小傳》）

⑧黃維為第十二兵團司令官，被俘後囚於北京功德林戰犯管理處，卻因不屈而至一九七五年才獲中共特赦。以後曾任政協常委等職，一九八九年因心臟病過世，年八十六歲。（傳記文學，劉紹唐主編：《民國人物小傳》）



蔣公與我。



先祖父周駿彥，曾是蔣公的老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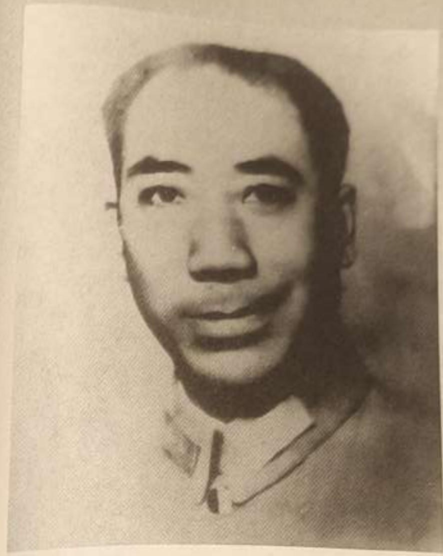
蔣公夫婦（前坐者）於一九四六年七月七日，回奉化祭祖。後排右起：夏功權、曹聖芬、我、石祖德、俞濟時、宋子良、陳希曾、衣復恩、吳麟孫、施覺民、孫義宣、熊丸。



史迪威（右）在抗戰期間任中國戰區參謀長，曾要蔣公交出軍權，令蔣公震怒。（黨史館藏）



重慶會談於一九四五年九月舉行，蔣公與毛澤東（右一）會面。左起為美國大使赫爾利、經國先生。（黨史館藏）



軍統局長戴笠，於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七日於南京墜機身亡，影響我方諜報工作甚巨。（黨史館藏）



陳布雷。我初到侍從室，布公教我許多，他憂國憂民，最終竟以自殺殉國。（黨史館藏）



蔣公、李宗仁（右），於一九四八年當選中華民國行憲後第一任正副總統，掀起中央與桂系內鬥。（黨史館藏）



我與光潤於一九四五年締結連理。



南京全家。（左起）小妹濤桂、大弟宏藩、母親、我與光潤，時為一九四六年。

第五章 蔣公的孤單

整個局勢已然失控之際，蔣夫人突然赴美訪問。

一九四三年，蔣夫人曾因治病而赴美，那次行程風靡了整個美國，在國際視聽上爲中國貢獻良多，而她長久以來實質地在抗日、外交、空軍建軍、婦女組訓方面有著極出色的成績，她的愛國心更是不容置疑的。

蔣夫人有過人的勇氣，這可從西安事變她親入虎穴證明，然而這次赴美備受爭議，實在令人很難理解，她又怎麼會在國家最危難之際滯留在新大陸？我相信她的情緒是複雜的。

蔣夫人突然訪美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日，駐西雅圖領事館轉來一份電文①，電文裡以「美國西北工商界、學術界領袖組成的中國會，鑑於中國局勢嚴重，美對遠東情形隔膜」爲由，邀請蔣夫人訪美。我把這通電文轉呈上去，但沒有下文，少數幾個知道的人都認爲此刻非訪美時機，夫人應不至於動身。然而二十七日清晨，游建文到辦公室來悄聲地告訴我，夫人定今天離開南京赴美，我這才知道夫人要赴美訪問。先前，孔祥熙已離華赴美，恐怕又要遭外界閒話。

我說：「美國官方現在對我們很不友善，這個時候訪美似乎沒有必要嘛！」

游建文回答：「夫人和美國方面通了電話之後，愛國心促使她要排除萬難，才決定訪問美國。」以後我才知道，她打了越洋電話給馬歇爾。她確實希望，能否一如前次訪美般，能夠獲得巨大且能扭轉局勢的外交成果，但眼前情勢看來，那是不可能的。

上午九點半，我到官邸呈送公文，恰好遇上蔣夫人，她正準備出發。夫人囑咐我及站在旁邊的武官與侍從好好侍奉總統，並且詢問我們是否要她帶些什麼東西回

來。我回答謝謝。在大家的恭送下，她接著就上車，由蔣公親自送到機場。夫人離華後，我覺得蔣公好生孤單。

那時白宮爲中國局勢問題會議頻繁，對華外交的走向也進入緊要關頭，我當時的想法是，蔣夫人起初的動機應是爲了扭轉外交局勢而主動向蔣公提議，且經過蔣公同意，所以也默默期待她這一趟赴美，能夠爲國家前途開展一個新的局面。以後，董顯光回憶錄的記載證實我的猜測是對的。

蔣公同意夫人赴美，行前曾決定僅先談援助原則，因爲美國最擔憂的是，繼續援華恐怕會陷入中國的內戰。不過，蔣夫人訪美至少有個正面作用——白宮原先準備在三日發表對華的消極政策以避免捲入戰爭旋渦，由於她抵達美國，馬歇爾特別赴白宮一趟，致使這項聲明得以暫緩。事實上，赴美求援的想法不止呈現在蔣夫人的行動上，在十一月二十一日，天主教樞機主教于斌就請求赴美活動援華，蔣公下午接見後也允其所請。

但是，杜魯門總統的待客之道和羅斯福可是不同。蔣夫人到美國之後，杜魯門很顯然地有意規避與冷落，就在她抵美沒多久，杜魯門五日來個海上休假之旅，等於避免和蔣夫人馬上見面；而與她有私交、成爲她赴美主要交涉對象的馬歇爾，又

正準備於七日住院開刀。

蔣公了解這些情況後，爲了國格尊嚴，於六日晚去電夫人，告訴她如果馬歇爾決定馬上動手術，則顯然是不想和我方談話，應於與杜魯門會面後立即返國。先前，在傅斯年的建議下，國民政府在美國大選時選擇支持杜魯門的共和黨對手杜威（Dewey, John），這顯然是錯誤的選擇，恐怕因而影響到杜魯門的對華政策。

次日清晨六點鐘，我在家裡接到辦公室電話，要我馬上到官邸。蔣公交給我一通致夫人電文，要我立即發出。在這通電文裡，蔣公堅持要夫人在會晤杜魯門之後儘速歸國，不應再提任何要求，只要說明我國戡亂情形即可。在電文最後，蔣公說他要重新訂定新的政策。我從這通電文推測，恐怕是因夫人原打算堅持到有所成就才回中國。

到了晚上，沈昌煥、唐君鉑等幾位年輕侍從室文武同仁聚集到我這邊談整個外交情勢，昌煥認爲應改向英國設法，間接推動美國對我國的支持。我們談到深夜，約定十日晚上續談。最近蔣公及中央方面有不少新措施，顯然受到我們先前上了兩項簽呈影響之故，蔣公能夠採納我們年輕一輩的意見，我們很覺振奮。

情勢愈來愈嚴峻。政府在十二月十日這天宣布全國戒嚴，蔣夫人來電說，美國

政府態度已有轉變，這算是個好消息：不過她的電文裡總是帶著希望，到後來都落空了。杜魯門接見蔣夫人後，我在十二日中午接到夫人來電說，杜魯門對我國頗表關切，她準備等馬歇爾病況稍好時晤談；至於請美方發表支持中國的聲明，目前美方似可考慮。然而蔣夫人顯得樂觀了些，因爲日後發展可以證明，杜魯門僅以社交規格接待了她。蔣公電：「不論交涉有否成功，務望於聖誕節回京，最近軍事尚無變化，惟平津方面，不久或將吃緊，津浦路方面，亦不能過於樂觀，如果軍事不利，則美方交涉，更無希望，且將爲人輕侮，不如速歸。」

夫人十六日回電：「明知事實困難，惟不得不以忍辱負重之決心，爲國爲兄盡最後之心力，故不能輕言即返，須知任何國家改變政策，絕非一二日內所可辦到，故必須得到最後之答覆，方能離美，否則，將惹起美方更深之誤解及我國內重大之恐慌。」

蔣公電覆：「卓見毅力，孤軍奮鬥，忍耐堅定之精神，殊爲感佩。此間軍事形勢，漸處不利，但南京、上海最近決無問題，勿念。」②

蔣夫人企圖憑自己的關係來挽救美國對華政策，這是不容置疑的。她與馬歇爾維持深厚的私人情誼，以爲馬歇爾會在美國對華政策上看彼此的面子幫幫她，其實

這是估算錯了。外界因之也有人認爲她赴美一年多未歸，有躲避戰禍之嫌。

美國特使霍夫曼抵華

蔣夫人離華赴美求援後，蔣公囑咐俞濟時疏散侍從人員眷屬。我非常不安，與光潤商量，決定讓她赴上海候船到台中暫住。十二月初，南京的公務員正式奉命疏散眷屬，交通因此混亂。空軍第一〇一運輸中隊把我在上海的部分行李運到南京，我把隨身暫時不用的物品裝箱，連同家人行李以火車運往廣州，處理完畢後心裡總算踏實了些。

美國經濟合作署署長霍夫曼以美國特使身分在十一日晚抵達上海，他對國民政府的態度相當曖昧。霍氏先是向記者發表談話，說此行係奉杜魯門總統之命，研究美國援華計畫實施情形，不擬訪問中國高級官員。次日上午他與我國美援委員會會談時，我方曾表示，萬一隔年美國議會通過新援華法案較遲，希望另外提撥臨時性援助，以使援華工作不致中斷。霍夫曼殊堪玩味的回答是：「美國幫助願意保持自由的自由人民。」下午，他約談美方駐華官方人士之外，另約美國志願救濟團體代表亨利等人會談。

十三日下午，霍夫曼召開記者會，談話裡暗示我國應成立包括共黨在內的聯合內閣，他又宣稱美國政府的援助以人民爲對象而不以政府爲對象，他並不打算「與中國高級官員晤談」。霍夫曼這些談話，令我覺得美國已有放棄中國政府之意了。

霍氏於十四日晚八時飛抵南京接受蔣公晚宴，但隨後他卻又向記者宣稱，不與中國高級官員晤談，指的是總統而言；之所以會和總統餐敘，是因爲我方在上海周旋的結果。

霍夫曼無禮言辭帶給中國政府的難堪，實在是前所未見，我深以爲恥。霍氏離華後，美國國務院於十四日正式予以否認，並指出霍夫曼的談話事先未獲國務院的准許，僅是他個人的意見。十八日，霍夫曼在韓國發表談話，表示自己對中國「談得太多」以致遭受誤解。他可說是自知失言了。

光榮和平？

十七日，蔣夫人又來電報，在這通電報裡講了對顧維鈞大使的反感。她說，美國代理副國務卿羅維特（Lovett, Robert A.）與她談話時講，顧大使十五日來訪仍是老調重彈，使得羅維特頗表不耐，電報裡也對大使館工作甚爲不滿；至於馬歇爾之病則仍未痊癒，每天必須注射嗎啡針三、四次來止痛，她要再等上一陣子。

蔣公希望夫人儘速回國，因爲他覺得她在美國再待下去也沒用，徒然予美國人話柄，在此之前他已這麼要求夫人了。二十二日，他又要我拍發電報給夫人，表示政局將有變動，囑咐她儘速歸國。

我譯發這通電報時，並不了解蔣公所謂「政局將有變動」之意。下午五點鐘，俞濟時到官邸來，我問他怎麼回事，他回答說，月前湖南省參議長趙恆惕曾倡議和平，並遊說廣西省主席黃旭初③，但未獲採納，現在孫科內閣忽然倡「光榮和平」，他想所謂「政局變動」應該就是指這事了。

這也就是說，政府要和中共談和了？這是我首次聽到我方求和的傾向。但現在共軍已兵臨城下，卻侈言和平，不等於投降？上海那邊已盛傳停戰和談的謠言，甚至有人放鞭炮，可見民心厭戰。然而現在言和固屬不可，言戰也已力有未逮，時局之艱難由此可見。我想起對日抗戰初期，還有德國大使陶德曼與汪精衛的主和，曾經讓日軍觀望若干時日，反而讓我們爭取了時間，使我軍能夠多些準備而有助局勢化兇爲吉，現在「光榮和平」的說法，能否讓政府因禍得福，我卻很悲觀。

二十三日，蔣公又致電夫人，電文裡大致把有意和談的傾向告訴她，並說各方

都在醞釀和平之議，美國大使也是其中之一。中午，蔣公和西北軍政長官張治中談了半個多鐘頭，並且留他共進午餐；下午六點半召見陳立夫，我猜可能都與此有關。張治中一向是主和的，以後甚至投共。

悲哀的時刻

聖誕節前夕，我依據幕僚人員的綜合意見寫了兩千言的書面建議，呈給蔣公。我建議在時局動盪之際，政府應設法在經濟上收拾人心、鼓舞士氣，建立後方復興基地以培植新生力量；復興基地方面，我提議以台灣、海南島及大西南地區爲基地。蔣公次日批閱建言，隔了沒幾天，他就指示陳誠擔任台灣省主席。那天晚上，蔣公邀京滬空軍將領聚餐，也要我作陪。就在如此危難的時刻，蔣公對我倚重起來，大家希望以後許多黨政上的人事問題，蔣公都會問問外間的反應再做決定，而我總能忠實地把這些反應向他報告。

政府及黨的威信愈來愈低。上海是工業中心，經濟改革及戰局先後失敗之後，工廠老闆們先是希望倚仗美國的保護，十二月十一日則是發起了自救救國運動，呼籲「上海國際化」。而美國海軍司令白吉爾將軍則於這天在上海宣布駐艦海軍陸戰隊保護撤僑，上海民眾對美國部隊更是期待。

重慶市長楊森來電，主張政府西遷。這封電文呈上後，蔣公覺得頗有見地，雖批示目前尚不能決定，不過他指示約楊森來南京一晤。到了晚上，蔣公接待他嫂嫂及姪女，經國先生也在。官邸裡放了場國產電影「雞鳴早看天」，內容描述抗戰勝利後，漢奸潛往內地，卻因車子拋錨而投宿在成渝路某地旅館所發生的一些事，編劇及導演都相當不錯。電影是那時的主要娛樂，大多會以時代做背景，這部片子也是一樣，對於此刻看電影，眞有苦中作樂之感，但可暫且把亡國的危機放下。

由於戰事失利，空軍準備對共軍投擲「新武器」，所謂新武器就是化武，過去從未使用過，現在已到逼不得已的時刻了。但幾天來戰區上空一直濃雲密布，直到十三日才放晴，就在準備投彈時，卻因爲國防部長俞大維極度反對而未使用。不過，即使眞的用在前線恐怕也收效不大，徒然遭致國際非難，使政府形象受損。然而，以後中共卻在與杜聿明作戰時使用了化武，造成杜軍慘重的傷亡。

前線杜聿明部隊饑寒交迫，蔣公十分關切，但也只能去電勉勵。這是悲哀的時刻，蔣公不想放棄部隊，形勢卻已大壞。二十四日，立法院選舉正副院長，結果黨提名的李培基④竟然落選，而由童冠賢當選院長。黨的紀律可以說已蕩然無存。

籲請蔣公下野的呼聲四起，面對如此的壓力以及局勢，我實在難以想像有如孤軍奮戰的蔣公，受到的是怎樣的煎熬。

第五章注釋

① 周氏錄於民國三十七年日記。

② 往返三電均見《總統　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七上冊。

③ 黃旭初為桂系將領之一，大陸淪陷後，先後在日本、香港流亡，政府曾聘為國策顧問，一九七五年於香港去世。（傳記文學，劉紹唐主編：《民國人物小傳》）

④ 李培基為軍人出身，一九四八年當選第一屆立法委員後，由中國國民黨規畫與劉健群參選立法院副院長，落選後，滯留北平。其後曾於一九五九年任中共政治協商會議第三屆全國委員會特邀委員；一九六四年任中共政協第四屆全國委員會委員。一九六九年於文化大革命去世，享年八十五歲。（傳記文學，劉紹唐主編：《民國人物小傳》）

第六章 下野

經國先生在南京時，住在黃埔軍校門外的勵志社招待所。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八日清晨七點多，他要我去他那兒。見面後，經國先生緩緩地告訴我：「總統這幾天就要下野了，要你跟著一塊去溪口。」雖然外界一直有此傳言，但這關係時局發展極爲重要的消息，仍使我心頭爲之一震。

我沒有多問，回到住處就立即要勤務兵收拾行李。我的行李不多，除了鋪蓋、換洗衣物之外，就是一尺半高的木櫃子，裡面全是文具以及蔣公待批的公文，由於侍從人員經常追隨蔣公到全國各地，因此並不費事。我收拾了兩只箱子，裡面是書

籍及一些雜物，託人轉運到台中，因爲家已經搬過去了；又把一些欠款還清，接下來，就只有等待。

十九日，總統府祕書長吳忠信約了陳方及陶希聖到總統府，交代兩人分頭寫兩份文件，陳寫蔣公的引退聲明，陶寫李宗仁副總統代理總統職的聲明。

這幾天，蔣公異常沈默。我幾度爲了呈遞公事而進入書房時，他通常是端坐著，頭往後靠著椅背，不發一言。目前的局勢對他的打擊極爲沈重，心頭壓力之大，外人難以體會，他顯然在思索些什麼，我猜想該是回憶國父行誼，想著過去幾年種種是非功過，推斷未來形勢的變化。

他是孤獨的，沒有人可以爲他分憂，他必須承擔一切。

二十一日下午兩點，蔣公召集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臨時會議，正式宣布引退。蔣公做此宣布時，我已先抵達南京大校場，兩架專機等在那裡，一架是蔣公的美齡號座機，另一架則載運侍衛及其他人員。侍衛長俞濟時、新聞祕書曹聖芬、空軍武官夏功權、醫官熊丸和我都在美齡號上，另外還有浙江省主席陳儀，他會陪蔣公這一程，因爲蔣公的去處就是奉化家鄉。隔了沒多久，經國先生也來了，站在機外扶梯旁等候。蔣公於四點十分抵達，肅穆地步入機艙，這回冷冷清清，沒有任

何歡送人群及儀式，兩架專機旋即向東飛去。機艙內沒人說話，大家的心情都很沈重。

引退始末

蔣公的引退，要從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徐蚌會戰失利後，桂系主和開始說起。雖然蔣公認爲與共黨言和無異與虎謀皮，根本解決之道是奮戰到底，但不僅華中軍政長官白崇禧來電倡議和談，桂系甚至包機派遣說客分赴西南各省遊說，河南省主席張軫①、安徽省主席夏威②，甚至蔣公侄婿韋永成③也都附和，政府有分裂之虞。

準備擔任白崇禧副手的宋希濂④來函向蔣公報告，他於十二月二十二日見白崇禧時問，如果共軍以優勢兵力企圖攻武漢的話，要做怎麼樣的處置？白崇禧的答覆是，以保存實力爲上策。宋希濂並說，白崇禧在談話中一再提及擬以「7A」軍集結在長江埠，以剿洪湖之匪爲名進入湖南，另以「46A」軍移駐安慶，以拒中央西指之師。我看了宋的報告後心想，如果這樣的話，不就等於對抗中央嗎？後來蔣公派張群疏導白崇禧，元月初白崇禧雖仍覆電表示擁護中央，實際上他是支持李宗仁取代蔣公的主要人物。

蔣公連日來與各要員頻繁接觸之後，原先在二十七日就已決心下野，並準備於元旦前返鄉，何以延後將近一個月，其間有相當的轉折。

二十八日，閻錫山飛抵南京，經國先生在機場迎接。午後四時閻錫山晉見蔣公，轉告李宗仁主和並要求蔣公下野之意。傍晚五點半，張治中、吳忠信、張群也加入會談，晚上蔣公再約行政院院長孫科、副院長吳鐵城共進晚餐。晚餐前，蔣公把副總統主和條件交給我，囑以普通信紙清繕一份，至於原件則命軍統局長毛人鳳影印。

李宗仁曾在他的回憶錄中聲稱他不願「繼任總統」，是蔣公在一九四九年發表元旦文告之後，多次主動請他接任並且以此身分與中共和談⑤，他才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接此重任。然而這張寫著和談條款的用紙，是以「副總統用箋」繕寫的，實際地說明了李宗仁在促使蔣公下野過程中扮演的積極角色。

和談條款⑥內容如下：

一、蔣先生以俯察輿情、顧全國本不失其歷史立場主動下野。

二、李先生依法繼承大任宣布和平主張。

三、和談以內閣爲主體，由大總統賦以全權。

四、和談事前準備：

甲、改組內閣網羅全國和平民主人士充實和平陣容（陣容人選另案研究）。

乙、發動全國民意一致擁護和平之主張。

丙、運用外交使美蘇英法對中國和平取得諒解。

丁、主動爭取香港方面以前之反政府政治團體勿使爲和平障礙。

五、和平宣布時我方的表示：

甲、撤銷以前頒布之戡亂令停止敵對行動。

乙、部隊主動撤離戰場（平津塘除外）彼此保持若干距離以免衝突（軍事部署另案研究）。

丙、釋放政治犯及戰俘。

六、和談時機宜主動迅速務在平津未失陷蚌埠新攻勢未發動之前。

七、和談地點以上海爲宜並做如左之準備：

甲、宣布上海爲和平都市。

乙、軍事指揮機關及部隊撤離平津市區治安由警察維持。

丙、保證各黨派的政治自由活動。

丁、以和平人士主持市政。

八、和談條款另案研究。

決策階層開始研究如何與中共和談，蔣公下野的局勢已然開展，閻錫山等人直到晚上九點四十分才離開。這天晚上，蔣公致電正在台北修養的陳誠，催令他出任改組後的台灣省主席，或可爲未來復興中華留一條後路。

不過，尚在美國的蔣夫人堅決反對蔣公下野，這顯然對蔣公的影響相當大。二十九日，我收到她發給經國先生的電文，堅持蔣公不宜下野，應該繼續革命工作，如果在南京不能維持政權，則應將政府遷至台灣或廣州，絕對不能交出政權返鄉。

下午兩點，我把夫人的電文呈給蔣公。傍晚五點，蔣公交下致夫人電文要我發出，電文裡說：「刻有無法下野之勢，故決留京不辭。」⑦我看了電文，心中爲之一振。那時，不論局勢如何的糟，包括我在內的侍從室成員，仍認爲唯有蔣公方能領導國家，原先就覺得下野是動搖國本之舉，蔣公說不下野，只覺得中國前途又有希望了。

九年後，蔣公親自說出他當時所以做出暫不下野決定。一九五八年一月十六日，蔣公在一次黨內訓話裡這麼說：「……余守南京之決心首遭張軫要求余下野，繼則華中長官部要求余離南京，但余以前方徐蚌會戰戰士沐血苦戰，及國家財政命脈之庫存黃金尚未運出亦至縈懷，此二事使余未能遽退，直至徐蚌戰事結束，央行黃金運畢，國家之光復有望，才予以引退……。」⑧

一九四九年元月十日，自徐蚌會戰失利之後，杜聿明⑨僅餘的三萬餘部隊也被共軍消滅的消息傳來，蔣公傷痛不已，含淚地接受這個事實，而黃金也已運抵台灣及廈門，他做了若干人與事的部署，然後宣布下野。

下野那天傍晚，兩機降落在杭州筧橋機場，甫接任台灣省主席的陳誠從台北飛來迎接。次日上午我們再次起飛，沒多久就在溪口櫟社機場落地。回到家鄉後，蔣公住在慈庵，經國先生夫婦住豐鎬房，我們侍從室人員則都住在武嶺學校。

蔣夫人對下野之見

外界傳聞，蔣公引退之後情緒不穩，我並未聽到或目擊，一般而言蔣公對武官及軍職人員較爲嚴肅，對文職人員卻非如此。在溪口，蔣公作息大致一如往常，因

爲不便再出面與聞國家大事，對外的公事就以侍從室人員具名發出。

侍從室人員均能臨危不亂，遇事勤奮以對，使蔣公頗感寬慰。二月間有天上午，蔣公召見我，指示研究今後工作環境及應對的工作方針，我感受到他對我的信任又深了一層，我對責任的加重感到惶恐，深怕有負所託。

蔣公下野後，由自美返國的朱世明武官二十七日帶回蔣夫人給蔣公的信，蔣公閱後於二月一日以電文回覆夫人，信裡可以得知蔣夫人對蔣公下野的想法，以及蔣公對下野的實際態度。此電全文如下：

蔣夫人。

沁（按：一月二十七日）電悉，現時切不可在美爲兄宣傳做再起之策畫，如兄謀出山則將來失敗必更大，果爾此次下野乃徒爲多舉耳。兄以爲既已下野，至少應做二三年之休養從事革命基本工作之打算，故切不可在美再有求援或任何運動之言行，今後兄之地位無論對內對外皆無需求人，否則反爲自暴自棄，其地位與名聲更爲人輕侮藐視矣。兄以爲在此二十年之內，無論中國與世界，如要眞正和平，兄實爲不可或缺之一人，故何必急急求人？甚望吾愛早日歸來，至於于主教經費，請由

愛先塾支其一萬美金，容後當照匯償也。上月杪匯游祕書款，未知已否轉到？盼復。在美切勿發表任何反對美政府之演說，否則徒自招損毀耳。

兄 中正[10]

蔣夫人的來信中，顯然有在美國發表支持蔣公、批判美政府等言論的想法，並尋求支援之意。蔣公除了要求夫人在美國不要對他的下野有任何舉措，也請她早日返國。蔣公深知，此時如有這些舉措，徒自招損。此外，從蔣公這件親筆電文來看，他自己也沒有料到局勢在未來一年間，會變化得如此快速。

在溪口，蔣公身邊侍從減少了許多，除了武官夏功權之外，文職方面只剩下我及曹聖芬等少數幾個人，然而他仍是國民黨總裁，許多國家大事少不了他。二月間，蔣公在我的建議下，又把方辭卸新聞局長職的沈昌煥召來溪口。義務隨蔣公返鄉的幕僚，每個人的業務量因人少而大為增加，雖然我們不計薪水，但一應開支加起來還是相當浩大，經國先生負責統籌張羅這些費用，覺得十分頭疼。

下野仍關心國事

駐守北平的傅作義，於蔣公下野次日就變節了。共軍的包圍之下，北平成為孤城，蔣公先前巡視北平時曾經指示傅作義，要盡力保存北平建築，不要使古都受到戰火的波及；就在蔣公引退之後，這位曾獲青天白日勳章的名將，竟把北平拱手讓給共軍。蔣公試圖把傅作義的三十餘萬部隊調離北平，經幾天努力之後仍無法如願，只好退而求其次，把不願附和傅作義投共的將領接運出來。

在溪口這幾個月裡，蔣公依然關心國事，軍政要員也不斷來訪，報告最新狀況並期待在各方面得到指示，使得他實際上仍以國民黨總裁身分繼續參與國家大政。

當初主張蔣公引退以求與共方和談的白崇禧也想到溪口來，白是因為發現與共軍和談的可能性極微之後，自漢口來電尋求蔣公指示。蔣公不打算直接給他回電，於是囑咐以我的名義覆電：「尊致蔣先生真電，以函電恐難詳盡，可否派袁祕書長守謙來奉面談，如何？」[11]事實上，白崇禧日後來電，對於去年底倡導和平之舉頗表遺憾，電文裡這麼說：「職每因黨國艱危間有率直之言，蒙賜涵宥，益深感勉，惟此次因職主和對於黨國所受之精神物質之損失，實非如此輕易可以卸責也。」[12]

對於先前倡和的白崇禧，蔣公的態度顯然是冷淡的。不過，桂系明知與共軍和談無望，對於實權掌控依然有著強烈的企圖，倒蔣之心並未稍懈，李宗仁代總統扶正運動正醞釀著，直到整個局勢不可收拾，李宗仁主動要求還政方止。

赴上海了解央行收兌黃金

由於隨蔣公行動，我有很長一段時間未能見到留在上海的母親及妻子，我們的女兒開紀才生下沒多久，不知健康情形如何，我很擔心。正思念之際，突然有個赴上海的機會。

整個大局逆轉之際，傳言少數財經人員未遵從指示，依然把中央銀行收兌的黃金留在上海，蔣公得到消息後非常關切，因為那是國人的血汗錢，他先前已指示財金部門，把這批黃金運至安全地區，以免落入共軍手中，我奉命前往了解實際狀況。

二月八日準備啓程之前，我奉召至慈庵，蔣公再指示抵達上海見到央行副總裁劉攻芸⑬後，轉達他的命令，也就是清點庫存黃金存量以及移置到台灣及廈門。我一一記錄下來，接著立即自溪口出發到櫟社機場，一架僅有五個座位的雙引擎小飛機已等在那裡，四十五分鐘後就在上海龍華機場落地。

這時正值中午，離預定與劉總裁會晤的時間還有段空檔，我馬上僱車回家探視母親及妻女，大家都喜出望外。

我隨即到設在外灘的央行。劉攻芸告訴我，外頭傳言並不正確，目前全國黃金存量，運到台北二百六十萬兩、廈門九十萬兩，放在美國三十八萬兩，上海目前僅存二十萬兩、承兌支用四十萬兩，以及敵偽珠寶約一千一百條，準備運到香港貯存；此外還有數千萬銀元。我做了通盤了解後，次日轉搭江輪返回奉化向蔣公報告。

陳儀謀反

我報告完畢，一離開蔣公房間，就看到浙江省主席陳儀有意謀反變節降共的情報。這情報來自淞滬警備總司令湯恩伯。依據湯恩伯的呈報，陳儀於一月三十日夜間派他的外甥丁名楠持親筆致湯函到上海見他，密謀京滬地區「局部和平」。陳儀函中列了十三項「局部和平」的作法，另外又介紹共黨份子胡邦憲見湯，並囑他以祕書名義任用丁名楠以便利舉事。湯恩伯於二月三日就把陳儀的親筆函及所附條款

十三項的抄本送到奉化來。

值得留意的是，陳儀於三十日晚上把此函送出，但三十一日他還到溪口和保密局長毛人鳳、黃少谷、林蔚及陳立夫在一起，並與蔣公見面。大家都沒想到，當時他已起異心。

我把陳儀函所附的條款全部內容重點，筆記如下：

一、軍隊宜緊縮。
二、待遇宜提高。
三、駐地宜規定。
四、軍風紀嚴肅。
五、滬防禦工事宜停止，已結集之材料考量歸還。
六、營房宜多建。
七、徵兵宜減少或者停徵。
八、軍事機關宜緊縮，事權須統一。
九、優先釋放政治犯。

十、保護區內武器軍需及重要物資。
十一、約定□地區在區外停止暫不前進。
十二、依民主主義原則於□月內改編原有部隊。
十三、取銷□□□給予相當職位。[14]

蔣公指示曹聖芬，立即搭機前往廣州向行政院傳達陳儀準備謀反的情報，並促行政院改組浙江省政府，推薦湯恩伯部第七十五軍軍長周喦[15]擔任主席。陳儀於十六日被免職，他尚不知已東窗事發，二十一日一抵達上海就被看管。一九五〇年一月三十一日，我奉命把陳儀的謀反信送交監察院參考，陳儀後來被槍決。

國共和談

三月二十六日晚上九點半，我接到俞濟時局長的電話指出，中共已決定於四月一日開始與國民政府展開談判，地點在北平。我方和談代表張治中向李宗仁報告，和談開始進行之前，必須先到溪口一趟，我立即向蔣公轉報。張治中於二十九日上午飛抵溪口，但蔣公並未表示什麼意見，張旋於次日離去。蔣公及經國先生都認

爲，張治中對國民政府的忠誠有問題，經國先生更直指他是投機派。

蔣公早就看出和談必無結果，惟有繼續作戰才是國家存續之途，這個見解在和談展開沒多久就可見其價值。中共在談判桌上向李宗仁提最後通牒，要求國民政府於十二天之內投降，並提出所謂「聯合委員會」的組織，由毛澤東任主席，李宗仁爲副，但李必須到北平，共同管理國共軍隊移交事宜。

我擔心李宗仁惟恐在北京和談失敗會影響他個人地位的心理，會促使他最後完全向中共投降，於是向經國先生建議，廣州的中央黨部在和談失敗後宜立即表態宣布擁護李宗仁，這樣子李宗仁尚有迴旋餘地；而全國也就會了解蔣公的主戰政策是不得已情況下的思考。經國先生也覺得應該這麼做，於是向蔣公建議對李宗仁做精神支持。

和談時，俄國的態度也值得一提。當南京方面接到中共的限期答覆通牒後，李宗仁立即電召甫任行政院長的何應欽來京商議，何應欽那時正在廣州參加國民黨中常會，俄國大使羅申（Roschin, N.Y.）突然主動找他，和他密談很久。

何應欽回到南京後，李宗仁於八日致電毛澤東，提議雙方「隔長江而治」，毛澤東次日就回了電，表示應「根據（共方）所提的八項原則，以求具體實現。」由

於毛看似對和談回應積極，使得緊繃的情勢暫時緩和，我當時認爲，這可能是中共及俄方之間不同調的蛛絲馬跡，中共急欲渡江續戰，而蘇聯則擔心渡江過早，恐怕會引起國際干涉。不過，美國方面顯然未如蘇聯的顧慮般採取軍事干涉。

奉化老百姓是很可憐的，當地幾度出現蔣公即將離去謠言，每次一有如此的耳語，就引起一陣恐慌。這種恐慌不難想像，蔣公如果離開他引退之所，就表示時局已無可挽回，家鄉父老就得面對不可知的未來了。其實，就連我自己也沒想到局勢會發展到如此地步。

自從追隨蔣公到溪口之後，我原本以爲至少可以住上幾年，因此積極在家鄉爲光潤的牙醫執業鋪路，爲她布置牙科診所。我找到房子，僱工修理了地板、裝上電燈，又接洽裝電話，就剩牙科醫療椅還沒有購妥。北京和談展開沒多久，光潤帶著珊兒及女傭滿香到溪口來團聚，結婚三年多來，這是少有的闔家團圓機會，我們都很欣慰。在家鄉，日子過得舒緩，妻女也在身邊，然而如此的好日子沒有維持多久。

解放軍渡江

四月間，和談進行順利與否始終牽動人心，和談一不順利，鄉間的銀元及物價就大漲，生活馬上受到影響。到了中旬，和談代表黃紹竑[16]攜回共軍「和平協定」八條二十四款具體方案，共方並限二十日前答覆，否則就要中止和談。這「和平協定」有如要國民政府無條件投降，和談形同無望。閻錫山及國民黨元老居正[17]先後到溪口見蔣公，各攜來李宗仁兩封親筆信，李在信裡聲言無論和談成敗與否，皆「決心引退」。蔣公一一函覆，勉勵他「萬不可以一時之脅迫，而有所自餒也」。就在情勢愈加緊張之際，蔣公依然沈著，十五日正逢經國先生四十歲生日，他親題「寓理帥氣」期勉，然後又影印多份，分送給隨身侍從人員，我也得到一份。

政府拒絕了共軍的通牒。二十日深夜，共軍第二十四、二十五、二十七三個軍經過猛烈砲擊後從荻港渡江，對江南的國軍展開全面攻擊，江蔭要塞守備司令戴戎光叛變，中共大軍不費一彈就自江蔭攻入江南。

蔣公回想去年底李宗仁、白崇禧等桂系公開呼籲他引退以與共方進行和談就深感痛心，在日記裡如此寫著：「情勢至此，未知李、白能有悔悟否？」

二十二日，我隨著蔣公乘美齡號赴杭州筧橋航空學校，上午十一時許，李宗仁、白崇禧、何應欽、張群等人自南京飛來，蔣公在臨時行邸門首迎接，然後上樓會商未來大計，中午就在樓上用餐，我也參加。蔣公坐主座，李宗仁坐首席、何應欽次席，其餘自由就座。席間，李、白兩人都說，目前已經沒有什麼好談了，只有與共軍作戰到底。餐後再繼續商談到下午四時許，李、白等人才紛紛離杭。蔣公準備返回溪口，卻因爲駕駛衣復恩大隊長進城了，一時找不到，只好在杭州住了一晚。

這是個傷心的時刻，我萬萬沒想到，三個月前才隨蔣公下野，自南京飛抵杭州，現在再來此地，整個情勢卻完全變了。這天政府通電宣布和談決裂，特昭告全世界，「此後將繼續抵抗共產主義侵略，從明日起，政府遷往廣州辦公」。

蔣公在杭州強調再戰的決心，並指示應召回和談代表團，他擔心中共利用張治中去瓦解西北的防備，而以張治中爲首的和談代表團，日後證實全數在中共發動攻擊後投共。一個多月後，和談代表黃紹竑在香港發表致李宗仁公開信，信中向李勸降，「不要替死硬派殉葬」；隨後保密局長毛人鳳呈報發自上海的情報指出，和談代表邵力子及李蒸均抵達淪陷的南京，邵力子常出席中共各種集會並且講話：李宗

仁的私人代表黃啓漢仍滯留在同樣失守的上海，張治中則留在北平。

劉斐共諜之謎

至於曾擔任國防要職的劉斐⑱，則於六月初到了香港。蔣公於十五日接到保密局局長鄭介民的情報指出，劉斐十日在港與國民黨元老吳鐵城見了面，與吳談話時明顯可見已經叛國。鄭介民匯報劉斐談話如下：一、共產黨軍事勝利，今必須徹底清除國民黨，對其他黨派可以安協；二、共產黨政策方面，其新民主政治由幹部會議議決，是由毛澤東裁決，並不獨裁；三、對西北方面不擬用武力，將來可邀吳鐵城參加聯合政府；四、劉斐擬於十五日前來穗（廣州市）。

劉斐以後果眞應李宗仁之邀祕密赴廣州會面，並且住在總統府內。經媒體報導後，引起各方對李宗仁是否投共的關切及疑慮。廣州總統府因此特別發表聲明表示，劉斐南來僅是爲了眷屬的安置問題，李代總統得悉後電召他赴廣州詢問在北平的政府和談代表團近況以及共黨占領區內情況，劉逗留一天就回香港了，他住港住穗有其自由，外傳消息純係無稽。後來侯廳長赴草山晉見蔣公時，攜來一封劉斐的親筆函，函裡說明與李宗仁會面的經過，強調港穗各報的報導係捕風捉影，與事實

不符。

劉斐究竟是不是共諜，以後曾有爭議，前國防部長俞大維認爲不是，白崇禧也持相同看法；不過據我所知，我方情報已經顯示劉斐其實是潛伏的共諜，將國軍動向等軍情洩漏給中共，再加上他企圖勸降吳鐵城，劉的角色無庸置疑。

共軍推進非常快速。四月二十三日早上一起床，我就待命返回溪口，十點鐘美齡號從杭州筧橋機場一起飛，我往外看，就看到駐守在南京的蚊式驅逐機群接著陸續降落，參謀總長顧祝同及國防部長徐永昌⑲隨即自南京撤退，同樣降落在筧橋機場。李宗仁則是在清晨五點多就離開南京飛往廣西桂林，然後滯留在那裡。這天，南京城陷。

離開溪口

上午十一點鐘，美齡號降落在溪口後，蔣公命令衣復恩，美齡號留在機場待命。他沒說什麼，我心裡明白，一個多月來領袖離鄉的傳聞，現在即將成眞，蔣公就要離開溪口，我也將離開我的家鄉。

我回到溪口的家，光潤突然看到我，喜出望外；珊兒也笑臉相迎，我們全家好

好地吃了頓午飯，暫且把整個緊張的局勢放下，窗外陽光普照、鳥兒啁啾，實在難以想像中華民國覆亡的陰影正逐漸擴散。

午後，我到慈庵辦公。蔣公交給我一通致夫人的電文，要我拍發。電文的內容大致是告訴蔣夫人他將於日內離開溪口，但到哪裡去，目的地尚未決定。

蔣公問我：「家眷在哪裡？」

我據實以報：「就在溪口。」

蔣公沒再說什麼，但他顯然對經國先生有所交代。晚上回家後，經國先生突然打電話來，要我十點半和他見面。我準時到豐鎬房赴約，經國先生告訴我，他決定明天一早請陳舜耕護送方良及孝文、孝章到台灣。他問我，光潤願不願意同行？我點頭同意。

回到家時，妻已入睡，我叫醒她，把整個狀況說了，對於馬上要離鄉背井，我倆相對黯然。我們連夜整理行裝，收拾了兩口大箱、一個鋪蓋捲、一只網籃以及一箱奶粉，身邊所有家當就是這些了。午夜之後，我在別愁離恨裡沈沈入睡。

二十四日上午，溪口雨下得不小，飛機不能飛。我在辦公室及住處之間來來回回打聽動靜，心裡頗不安寧。中午雨停，美齡號降落了。我正參加侍從室的會報，商討撤離溪口事宜，得到通知之後就立即離席送妻女啓程。下午兩點，我們同方良女士一起乘車前往機場，珊兒吃了奶後，沿途相當安靜。到了機場，光潤抱著她登機。在圓窗裡，妻頻頻向我揮手道別，又拿著珊兒的小手揮著，我爲之心酸。美齡號隨即在微雨中起飛，下午六時許抵達台中。

二十五日天還沒亮，我就起床了，仔細檢視了行李並且加鎖，五點半離家到辦公室再把書籍等物整理一番。六點鐘，我搭上卡車，帶著行李到奉化西塾，然後步行了四華里到團圓村。此地是象山港裡的一處漁村，當地老百姓驚訝地看到我們一行突然到來，但也只是默然地看著我們登船，隨著帆船離岸，鄉親們逐漸在視線裡消失，他們從此要生活在紅色中國。

帆船把我們接駁到泊在港中的太康軍艦。太康艦昨天駛抵象山港，較原先蔣公的座艦重慶艦小了些。重慶艦是海軍最大的一艘軍艦，但在一個多月前叛變了。

下午四點多，蔣公及經國先生登艦，蔣公直到此時才指示前往上海。

由於晚上霧起，太康艦並未起錨，本來預計二十六日清晨可以抵達上海，延至上午十一點半才進入吳淞口。桂永清總司令率領軍艦來迎，顧總長、國防部次長林蔚及湯恩伯等將領都到艦上並立即舉行會談，我反而沒事，覺得無聊。艦上軍官告

訴我，無錫已經棄守了，浙江省政府移到甬縣。聽到這消息，我悵然若失，自窗口瞭望，眼見大好山河即將變色，心裡爲之感傷不已。

蔣公決定到上海，顯然是要親自督軍，希望能夠在這座工商大城遏阻中共的進襲。

第六章注釋

①張軫於一九四九年五月率部隊投共，並編為共軍，張仍任軍長。其後出任全國人大代表、河南省副省長、第五屆政協副主席等職，一九八一年病故。（國防部史政編譯局：《中國戰史大辭典——人物之部》）

②夏威於大陸淪陷後避居香港，一九七五年因車禍過世。（傳記文學，劉紹唐主編：《民國人物小傳》）

③韋永成為第一屆立法委員。其妻為蔣華秀，蔣華秀的父親是蔣公同父異母的哥哥蔣錫侯。韋永成夫婦於大陸淪陷後來台。（傳記文學，劉紹唐主編：《民國人物小傳》）

④宋希濂於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在四川被俘，其後被囚於北京德勝門外之戰犯管理處，一九五九年獲釋，曾任中共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後赴美於一九九三年在紐約病逝，年八十七歲。（國防部史政編譯局：《中國戰史大辭典——人物之部》）

⑤《李宗仁回憶錄》下冊，頁八八三至八九一。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

⑥周氏錄於民國三十七年日記。

⑦同前注。

⑧周氏錄於民國四十七年日記。

⑨杜聿明兵敗被俘，是被俘最高階的將領。後被囚禁於功德林戰犯管理所，於一九五九年獲釋後擔任多屆人大代表，於一九八一年病逝。（傳記文學，劉紹唐主編：《民國人物小傳》）

⑩周氏錄於民國三十八年日記。

⑪同前注。

⑫同前注。

⑬劉攻芸清廉自持，曾協助運金來台，其後擔任何應欽內閣之財政部長。大陸淪陷後先赴香港，後在新加坡定居，一九七三年病逝。（傳記文學，劉紹唐主編：《民國人物小傳》）

⑭周氏錄於民國三十八年日記。

⑮周碞於大陸淪陷後來台，任總統府戰略顧問，一九五二年退役，次年病逝。（國防部史政編譯局：《中國戰史大辭典——人物之部》）

⑯黃紹竑為桂系軍人，曾任內政部長、廣西省主席、監察院副院長、立法委員，一九四九年由李宗仁任命為國共和談政府代表之一，隨後投共，任人大常委等職，於文化大革命時被鬥而死，終年七十二歲。（國防部史政編譯局：《中國戰史大辭典——人物之部》）

⑰居正為大陸時期的司法院長，大陸淪陷來台後，於一九五一年病逝，享年七十二歲。（傳記文學，劉紹唐主編：《民國人物小傳》）

⑱劉斐曾任國防部參謀次長，主管情報及作戰事務，被指為共諜。他在香港宣布投共，在中共政權擔任水利部長等職，文化大革命時曾遭鬥爭。其後擔任政協副主席、民革中央委員會副主席，一九八三年在北京病故，時年八十六歲。（傳記文學，劉紹唐主編：《民國人物小傳》）

⑲徐永昌於大陸淪陷時率陸軍大學師生抵台，一九五二年任總統府資政，後兼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一九五九年病故。（國防部史政編譯局：《中國戰史大辭典——人物之部》）

閘北已聞砲聲，上海這座大城乍看之下卻沒有戰火臨頭的肅殺氣氛。市面繁榮依舊，大街熱鬧非凡，什麼東西都買得到。不過街市上各種交易只以銀元計價，鈔荒使得各機關行號無法周轉，紙鈔形同廢紙，無人問津。

抵達上海的第二天，原在政府擔任要職的金融專家冀朝鼎，就在北平出任中共的「人民銀行」要職，他的共產黨身分這才浮現。蔣公擔心劉攻芸及國庫局長林崇墉是否也會跟著不穩，因為劉、林兩人與冀的交情深厚。蔣公登岸視察，巡視了上海市區的防衛工事，並指示積極準備上海保衛戰。

我趁著空檔，到上海街頭逛了一陣子，買了些日用品後返艦。蔣公與上海軍政人士的會商尚未結束，當晚他宿於復興島上的濬浦局，次日繼續召見各界人士激勵士氣。但是共軍進逼的消息頻頻傳來，長興、吳興相繼失陷，到了五月四日，杭州也落入共軍手中。五日傍晚，蔣公登上江靜輪準備離開上海，不過原定次日一早開船，卻因為回覆李宗仁的信還沒完成，耽擱到下午才動身。

李宗仁要蔣公出亡

這幾天，滯留在廣西桂林的李宗仁把他的「談話紀錄」交何應欽轉呈蔣公，內容總共有六項要求，作為他赴廣州主持國政的條件。「談話紀錄」對中央政府內部團結影響很大，不過以後李宗仁說，這是勸他赴穗的居正、閻錫山、李文範[1]、行政院副院長朱家驊、海南島軍政長官陳濟棠等五人磋商後擬出來的，除一至五項外，最後一項關於蔣公出國之事，並不是他的意思。[2]

六項條件內容是：一、代總統有絕對調整軍政人事之權；二、所有先前移存台灣之金銀外匯請由政府命令運回；三、所有先前移存台灣之美援軍械，亦請運回大陸；四、所有軍隊一律聽從國防部指揮調遣；五、所有國民黨黨內決定，只作為對

政府之建議；以及第六點請蔣公出國：「前據居覺生（居正）先生由溪口歸來報告，總裁曾表示個人打算以去國愈快、離國愈遠為最好，現時危勢需要外援迫切，擬請總裁招攜憶遠，俾收內外合作之效。」③

蔣公指示陶希聖草擬覆函，除對李氏所提關於總統職權、國庫存金、軍隊調動及軍品使用，以及國民黨非常委員會設置予以交代外，並且對出國及未來行止回應如下：

談話紀錄對於中出處問題提出意見，個人對此本不容心，然若謂中不復職即應出國，殊有重加商榷之必要。為個人打算以去國愈快、離國愈遠為最好，惟中許身革命四十餘年，始終一貫為中國之獨立自由與三民主義實現而奮鬥，只要中國尚有一片自由之領土，保持獨立之主權，不信中竟無立足之地。

在溪口時曾對禮卿（指吳忠信）文白（指張治中）兩兄言『前此他們要我下野我自可以下野；現在若復迫我出國亡命，我不能忍受此悲慘之境遇』。今日所懷，仍復如此。且在過去彼等主和乃指我妨礙和平要求下野，今日和談失敗又責我以牽制政府之罪強我出國並賦我以對外求援之責，如果將來外援不至，中又將負妨害外

交牽制政府之咎。國內既不許立足，國外亦無處容身，中為民主國家之自由國民不意國尚未亡，而置身無所至於此極，且責難之來，竟出自黨中同志，尤非個人想像之所及，我兄明達，必有以解釋之。……

際此五千年歷史最艱難困苦之時期，吾黨同志正須有過相規、有善相勸、親愛團結使互信昭孚而共信確立，一切權謀術數爾虞我詐皆非革命黨人所應為，尤為大敵當前之所最忌。要當心地光明，質諸天地鬼神而無愧怍，則精誠所至決非詆毀之所可侮、失敗之所可怵，最後努力必達於最後之成功。

中自引退以來，政治責任已告解除，革命責任仍自覺其無可逃避。故德鄰（李宗仁）兄凡有垂詢，無不竭誠以答，但絕不敢有任何逾越分際、干涉政治之行動。今日國難益急，而德鄰兄對中隔膜至此，誠非始料之所及，此皆中誠信不足以感人，雖披肺腑剖肝膽亦不能表白衷心於萬一。而過去之協助政府者，已被認為牽制政府，故中從今日起，只有遯世遠引，對於政治一切不復聞問，所望諸同志鑑我赤忱補我缺陷，力求團結為人民、為國家、為革命抗戰之光榮歷史擔責任，協助德鄰同志……④

蔣公這封沈痛萬分的信交由何應欽轉給李宗仁，除宣布以後不問政事之外，也明確地說，只要國尚未亡，他就不會離開中國。

上海防禦

給李宗仁的信發出之後，七日凌晨，我還在睡夢中，感覺到江靜輪的引擎啓動了。清晨起床，果然已經在黃埔江中航行。這十天來在上海見到時局的艱難，心頭極爲鬱悶，航行在江中，把陸上紛擾暫時拋開，反而覺得舒暢。船出吳淞口後，沿岸南駛，我憑欄遠眺，海空之間一望無際，內心裡寧靜多了。

下午五點多，江靜輪抵達舟山群島的定海軍港，這是大陸東南沿海的海軍根據地，港闊水深。空軍正重新整修日據時代的水上機場，以作爲未來海空軍防衛群島之用。江靜輪淀泊在港內，並未靠岸。

五月八日清晨，有多架軍機在定海上空盤旋，其中一架隨即在機場降落，空軍副總司令王叔銘沒多久就到江靜輪晉見蔣公，他報告了當前一般軍事狀況，也提及台中日月潭官邸的準備情形，由此可知蔣公可能會在近日赴台了。整個中國，台灣是唯一沒有被共產黨滲透之處，事實上從去年底戰事逆轉開始，蔣公就已經積極在

台灣做復興基地的準備。

不過，此刻蔣公尚未放棄上海，龐大的防禦工事依然持續施工中。中午，經國先生轉達蔣公的指示，派我赴上海央行找林崇鏞局長接洽，因爲閘北由「陸根記」營造廠承造構築兩處防禦工事共需一百萬銀元，蔣公囑林崇鏞盡可能先支應防禦需要以遏阻敵軍的攻擊。還有一項赴上海的任務，就是了解緯國調往台灣的裝甲兵情況如何。沒多久，我搭乘空軍副總司令王叔銘的專機飛往上海，緯國那時還在上海，晚上我就住在他在高安路的私寓，他的裝甲兵部隊已經奉命撤離上海，上海的防衛靠的是碉堡、壕溝、木城，以及湯恩伯的部隊。

九日，我在江灣指揮所把蔣公的指示告訴湯恩伯，湯總司令對於上海防禦還頗具信心，堅決地說上海絕對不可撤退。我接著到央行會晤林崇鏞，轉達對存金運用及閘北工事的關切，林局長當即筆記。

次日，緯國送我到機場搭機返回定海，但是江靜輪已不在原處了，我爲之焦慮不已。沒多久就有一通電話打來，指示我到舟山島東南端的普陀島待命，海軍隨後以專艦把我送過去，航行了兩個半小時才到。江靜輪隨後駛來，我回到輪上，把上海情況向蔣公做了報告。

蔣公期待東南各省至少以福建及台灣作為未來反攻的腹地，所以希望能夠守得住上海。雖然他回覆李宗仁時表示不過問軍事、人事及存金等事務，但實際上他是因情況需要在幕後過問了。這究竟是對或錯？我可以這麼說，從日後的發展來看，他是對的。以存金為例，如果照李宗仁的計畫，把剩餘的國家存金拿出花用，花光為止，則不僅大陸，連台灣恐怕也早就淪陷了。

蔣李裂痕

當李宗仁以六項條件要求蔣公不再過問國政後，蔣公離開上海，順著東南沿海漸次南下，終於抵達台灣。然而，不論黨政軍高層都不認同李宗仁的訴求，紛紛請蔣公繼續領導國家。

這段時間裡，參謀總長顧祝同三度來函報告政局發展，請求蔣公給予指示並「打銷遁跡遠引之意」，蔣公均未回覆。十七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電請蔣公「俯察群情，積極領導同志削平共亂」，我將此電呈給蔣公，他批了個「閱」字。二十四日，又有國民黨籍立法委員聯名上書蔣公，呼籲他即日到廣州「共赴難鉅」。黨政高層一般認為，李宗仁及蔣公應儘快重新合作，以面對當前險局。

二十四日這天，我分別接到國民黨中央黨部祕書長鄭彥棻、國民大會祕書長洪蘭友來自廣州的電報。鄭的電報是報告李宗仁於二十三日召開中常委、中政委座談會的內容，此會是應李宗仁的要求召開的，會中李宗仁特別談到財政問題。

李宗仁說，目前每月軍費約需三千萬銀元、政費一千一百萬、軍政所需外匯九百萬元，共約五千萬銀元，但收入估計僅一千萬元，財政危機至為嚴重，所以必須改革幣制、確立預算制度、實行精兵簡政、繼續征借征實。他又質疑當前國庫的狀況——據財政部一個月前報告，國庫現存金銀外幣約值美金三億三千萬元；三日前報告僅值美金二億三、四千萬元，但他一星期前赴上海中央銀行查得共值四億美元，另有外匯四千萬元尚未計入。他認為現在軍費需用至急，改革幣制也需要基金，所以他希望推定人員研究方策之後，同謁蔣公請示。其實，李宗仁所說的數字完全不確實。

白崇禧在會中也報告，聯勤總部吳署長日前派員赴廈門領取銀元，卻被當地警備部阻止而未得。一個月來，華中剿匪總部僅自廣州央行借得銀元三十萬元，每個士兵僅三角，如果不解決軍餉問題，就無法作戰。不過，那時許多問題都無從解決，軍餉方面不僅是桂系部隊，也是所有國軍部隊的普遍難題。

白的報告引起若干委員的討論。于右任認爲，無論如何應即提取銀元一兩千萬元應急。李宗仁推于右任、何應欽、閻錫山、居正、朱家驊、吳忠信、陳立夫、吳鐵城、張群成立九人小組研商方策，並與他共同謁見總裁。不過張群提出異議，認爲當前各種問題恐非謁見蔣公就能解決，最重要的是建立制度，他提議設置非常委員會。何應欽則認爲，李、蔣的團結爲當前最重要關鍵。

當天晚上，李宗仁約集九人小組會商後，于右任、閻錫山、吳鐵城、朱家驊、陳立夫二十六日帶著李宗仁致蔣公函飛台北，次日與蔣公在台南會晤，希望扭轉李宗仁先前談話紀錄及蔣公覆函所造成的裂痕，請蔣公到廣州主持大政。

蔣公考慮了兩天，二十九日把覆信交由請辭行政院長獲准的何應欽帶回廣州，信中呼應團結訴求，也贊成成立非常委員會，但未承諾赴廣州。

事實上，蔣公在大陸時期，始終沒有完全掌握所有部隊。不論軍事或政治，桂系都有和蔣公一較長短的意思，從李宗仁競選副總統到白崇禧通電主和，都是如此。即使到大陸撤守之前三個月，政府內部依然不合，李、白自有盤算。

閻錫山組閣

整個局勢惡化的腳步並未停歇，政府內部也是步調不一。先前李宗仁提名居正繼任行政院長，但因居正態度傾向桂系，立法院院會投票僅以一票之差未通過，最後是由閻錫山出任行政院長職。

閻錫山即將組閣之前，先到台灣一趟。他乘夜車南下高雄晉見蔣公，蔣公與他長談，並在軍事、財政、外交、政治等方面做了指示。這個時候，中華民國政府仍然控制的地區在大陸西北、西南及東南沿海，蔣公指示：

軍事方面，東區沿海以舟山、台灣、瓊州、長山四群島爲基地，向沿海各省發展；西區以甘肅、青海、四川、西康、雲南、西藏爲基地，向中原發展。

財政金融分爲三區，以重慶接濟西南、西北各省；以廣州接濟華南各省；以台灣接濟東南各省。外交方面，對美、英特別慎重，各重要使節不宜輕易動。上海、青島等沿海重要港口，對內外正式宣布爲作戰地帶，陸海空交通實施封鎖。政治方面，加重地方政府權責，中央應畫區督導與輔助，不宜集中。非常委員會方面，東

區、西區各設分會，東在台灣、西在重慶。
以及，肅清政府統治區域內黨、政、軍、社各部分共匪之第五縱隊。⑤

由此指示可見，蔣公此刻仍然竭力希望保有大陸部分江山，並非美方部分人士傳言他於下野之前就已打算放棄大陸。以後閻錫山確實遵照指示，全力保衛華南並且下令封鎖淪陷區的港口，空軍在不得已之下轟炸各個港口，多艘不顧禁令停靠的外籍輪船因此受損。桂永清在六月中旬報告，目前有三萬枚美製水雷放置在馬公，但均缺信管而不能使用，這是美國人搞的問題。

蔣公提交非常委員會名單給閻錫山，以李宗仁領銜，總共十五人，蔣公自己未列。不過，這份名單經過多次函電磋商，最後確定為十二人，改以蔣公為首。

此刻，黨政官員上下惶惶不安。宋子文在一月間就辭掉廣東省主席職，轉赴香港。鄭彥棻現在又報告，前行政院長孫科帶著夫人赴港澳之後，就不再回廣州。黨內的高級幹部陸續離城，吳鐵城及陳立夫也都有離穗之意。閻閣成立之後，形勢依然險惡，穗方更期待蔣公赴難，鄭彥棻把閻錫山六月十六日與李宗仁對談的內容呈報過來。

閻錫山以「束手無策、坐以待斃」來形容政府當時的情況，他堅請李宗仁電請蔣公來穗「指示一切」。

「總裁不來又怎麼辦？」李宗仁問。

「如果不來再說。」閻錫山認為，總要積極做些事來促成政治團結。

李宗仁請閻錫山擬致蔣公電稿，然後共同具名發出，請蔣公赴穗。⑥

這回蔣公覆函表示同意。穗方繼續函催，希望蔣公立即赴穗以解決保衛華南及其他政治經濟等問題。但是我們幾位祕書談到當前政情時，認為蔣公赴穗，應該事先詳細衡量得失及有無助益再做決定。次日，廣州綏靖主任余漢謀及廣東省主席薛岳也都認為，如果蔣公對穗方期待解決的問題沒有確切辦法，則與其去而讓人民失望，不如不去。經向蔣公報告，蔣公也同意這個看法，指示由黃少谷等人共同研究，這趟廣州行也就一直延至蔣公訪問菲律賓之後才動身。

平易處下

七、八月間，我先後隨蔣公訪問了菲律賓及南韓。這兩次訪問，其實都是蔣公的意思，因為中國在國際間被孤立了，蔣公為了增加外交上的能見度，所以設法接

治安排以總裁名義出訪。

自菲律賓返台後，蔣公於七月十五日飛抵廣州，和包括李宗仁在內的黨政高層晤談。蔣公說，他贊成政府決心保衛廣州，並以廣州為據點，保衛大廣東。二十一日，蔣公搭乘太康軍艦離開廣州，二十四日途經廈門返台。

自從與共方和談破裂後，桂系軍政指揮系統明顯地自立。我們獲得情報指出，桂系且有意另行組黨，總統府祕書長邱昌渭、內政部長李漢魂於七月初赴湖南長沙，與桂（廣西）省主席黃旭初及白崇禧商討如何加強控制湖南省。與會諸人在討論中就曾談到另組新黨，並且原則上決定以白崇禧為首，組織「中國國民黨重建委員會」，以「青年工作團」的名義在外活動，凡國民黨員除了與陳立夫的CC派有關者外，均可參加，因為桂系認為CC派總是扯後腿。這個計畫以後因局勢轉壞，並未實現。

二十七日，李宗仁飛到台北，蔣公在松山機場迎接他。李宗仁在台灣待了三天，三十日離台返穗。黃少谷後來告訴我，李宗仁來台的主要目的是希望在閩南開闢新戰場，打算調用八十七軍軍長段澐的三個師及孫立人的兩個師在閩北夾擊共軍，以及談國防部改組問題。不過，這些部隊日後並未赴閩參戰。

八月一日，總裁辦公室在台北成立，成為力挽狂瀾的新核心。隔了幾天，北方海軍重要基地長山八島淪陷，這對華北海軍是致命打擊，因為封鎖北方港口已經無法有效實施了。南方，共軍又分由北、東、西三路夾擊福州，此一被視為自台灣反攻的橋頭堡，只支撐一個星期就因守軍傷亡過重而撤守了。

華南保衛戰正式登場。白崇禧自衡陽來電表示兵力不足，蔣公覆電指示，把保衛廣州所需部隊之外的其他兵力加入湖南作戰，但如果此時決戰沒什麼把握，則不如暫不決戰，保持實力待共軍主力深入廣東，再向其側背夾擊似較有利。

情勢愈來愈嚴重，廣州美國總領事館於十八日降旗撤離，白吉爾上將抵達香港辦理撤僑工作。此時在湘西戰場上傳來捷報，白崇禧電告殲滅共軍第五十一軍的一四六師，不過這僅是曇花一現。

八月二十三日清晨，蔣公自台北飛穗視察廣州軍事部署，希望能夠挺住共軍的攻擊。飛機上，經國先生以「平易處下」規勸我，這是因為我感受到近年來機要室基層人員工作情緒低落，因此不避私怨地嚴格督導，卻引起反彈，此刻經國先生提起，我很感激，也甚覺慚愧。

重返抗日名都重慶

蔣公在廣州只停留一晚，召見劉安祺等十餘位將領，研究如何部署防衛廣州後，次日飛重慶，下午二時降落在白市驛機場。蔣公下機時，微笑地和西南軍政長官張群、重慶市長楊森及將領們一一握手，並說：「來到重慶等於回到溪口！」對日抗戰那段日子，重慶幾乎等於他的第二故鄉，但此刻重慶面臨的威脅和抗戰比起來，更爲險峻。蔣公隨即乘車赴林園官邸，這處抗戰期間的指揮中心景物依舊，如今人事已非，一股辛酸自心中升起，我爲之愴然。信步走到曾經住了幾年的房間，已改爲貯藏室，不僅放滿了雜物，更是塵埃處處。

我心裡有個衝動，迫切想看看重慶現在究竟如何。晚上，我駕吉普車進城繞了一圈，讓重慶的景致、人影重新在腦海裡流過。這座山城一別四年之後，人情風貌對我而言依然是熟悉的，重慶市民表面上看來作息正常，沒有多大改變。然而，重慶其實岌岌可危，這也是蔣公所以在此刻重履此地的原因。

蔣公密集接見西南各地軍政首長，希望能夠穩住形勢。八月二十六日，蘭州失守的消息忽然傳來。先前一天陸軍大學校長徐永昌、次長秦德純奉命前往南鄭督促

中央軍胡宗南出擊，以策應西北軍政長官馬步芳[7]，未料才上路，蘭州就失陷了。事後得知，蘭州那邊開戰後，僅支撐了一個星期，馬鴻逵[8]部以缺彈而未赴援，胡宗南部則是以兵力分散爲由也沒動身。臨戰之際將領間未能彼此協力，以致予敵可乘之機，實在是我軍的致命傷。

蘭州迅速被攻占，蔣公爲此神色黯然。在新建制之下，中央與桂系雙頭馬車式各自領導，造成內耗。桂系在未和蔣公商量的情況下就準備空運魯道源部隊入滇改組省府，並以魯爲省主席，這是因爲桂系以兩廣爲前方，就需要以滇爲後方基地。

但中央著眼於建立西南防禦體制，各省均應暫維持現狀以影響全局，尤以四川局勢至爲可慮，所以防止滇省落入桂系的控制。然而四川團結問題愈演愈烈，省主席王陵基、將領王纘緒及劉文輝各自爭權，張群也束手無策。蔣公的西南防禦體制已非其時矣。

九月初，市區兩度遭潛伏的共黨份子縱火，連成一片的木造房屋使得大火延燒迅速，災民多達四、五萬人，光是死者就達千餘人，善後難以收拾。

九月十九日晚上，我們應邀參加張群的晚宴，以酒澆愁之下，餐後眾皆微醺，張群找了總裁辦公室祕書主任黃少谷、負責宣傳的第五組組長陶希聖，我們一起長

談。外間批評蔣公的民主精神不夠，對幹部在政策及作法上都未能建立開明形象。張群言辭懇切地說，其實今日已經到了不能講民主而要與桂系做最後攤牌解決階段，總裁個人也必須檢討出處。他的意思是，蔣公應該毅然復職。

蔣公留在四川將近一個月期間，中共染指西北、進逼東南沿海，而政府卻因不斷內耗加速潰敗。桂系的爭權持續進行，李宗仁逼閻錫山辭國防部長兼職，並且派監察委員鄒魯當面告知。根據報到蔣公這裡來的消息敘述當時的對話如下：

閻錫山回答鄒魯，如果有利團結一切均可從，但如有傷團結，一切都談不到，「本人既因此而任這個職務，如果沒有具體團結辦法而請辭，實在有違初衷。」

鄒魯說：「李代總統的意思是，如果不辭職，就要免職！」

閻錫山回答：「如果免職的話，我不副署！」

府院之間交惡到如此地步，令人慨嘆。⑨

白崇禧要求擔任國防部長

九月二十二日，蔣公派經國先生預先布置安排下，自重慶起飛，在昆明短暫落地並召見盧漢及當地重要將領後，下午飛往廣州。就在這天，新疆方面的噩耗也傳

來了，來自漢中空軍司令徐康良的消息說，河西、川西電訊全部中斷，新疆總司令部有投匪的可能，到了下午就得知整個西北局勢已全部瓦解。

在廣州，與桂系之間的問題接踵而至。桂系醞釀改組國防部及全權處理剩餘金銀的要求，早先就已經得知；蔣公曾因此約集張群、黃少谷、谷正綱等研究如何因應，蔣公的構想是，讓顧祝同辭參謀總長職，改由白崇禧接任，以緩和桂系的要求；至於財政問題，財政部長徐堪堅請辭職，蔣公準備派俞鴻鈞接任。

來穗之後，才知道問題之嚴重。桂系連絡兩廣，準備運用即將開會的立法院倒閣，並對蔣公否決桂系處理昆明事件的方式極表不悅。曹聖芬告訴我，李宗仁對於蔣公最近公開發號施令一事向張群說，他不能同意。

二十六日上午十時，蔣公在廣州市和李宗仁見面，討論一般局勢及國防部改組問題。晚上七點鐘，蔣公接見白崇禧，據在場的侍衛官隨後告訴我，白當面向蔣公說，他要擔任國防部長。

蔣公回答：「這可以考慮，但外間一般均以爲我此次引退，是因爲你所要挾的結果，所以與我有關係的部隊恐怕都會有嫉視的心理，不能上下合作。爲了促成你的構想，我準備先成立非常委員會軍事組，擔任研討戰略計畫方面，你也來參加，

大家商量。」

白崇禧說：「成立軍事組，我不反對，但我任國防部長可以擔保徹底執行。」

蔣公這回就直截了當地說：「你任國防部長，暫時仍不相宜！」

白崇禧無言離去。⑩

次日，蔣公召集軍事及政治幹部，討論他個人出處及桂系要求國防部長職務一事。對於是否應復職，王世杰、陳立夫及蔣公自己都認爲，時機尚未成熟；至於白崇禧接任國防部長，則因蔣公已拒絕在先，所以國防部長一職中央方面絕不放棄。

但是，蔣公並非不重視白崇禧對職務的要求，依然考慮由白出任參謀總長，至於國防部長一職，如不給白崇禧就得內覓人選，但徵詢了張群及吳忠信，兩人均堅決不就。三天後，顧祝同決定辭參謀總長職，由國防部參謀次長蕭毅肅暫代，這是預爲白崇禧的職務做的安排，不過桂系繼續反彈，閻錫山發表由湯恩伯出任閩省主席，卻被李宗仁方面否決，湯爲此倦勤。

中華民國就在最高階層始終未能齊心協力的情況下，終致使整個大陸淪陷。

第七章注釋

①李文範曾任國民政府內政部長、行憲後司法院副院長，來台後聘為總統府資政，一九五三年於台北病逝。（傳記文學，劉紹唐主編：《民國人物小傳》）

②《李宗仁回憶錄》下冊，頁九四七。

③周氏錄於民國三十八年日記。

④同前注。

⑤同前注。

⑥同前注。

⑦馬步芳於大陸陷共後，曾至台北停留月餘，然後離台赴埃及，一九五七年出任我國首任駐沙烏地阿拉伯大使，一九六七年卸職，一九七五年病逝沙國吉達市，年七十三。（國防部史政編譯局：《中國戰史大辭典，人物之部》）

⑧馬鴻逵為寧夏省主席，大陸淪陷後隨政府來台，旋赴美定居以養馬自娛，一九七〇年病故。（傳記文學，劉紹唐主編：《民國人物小傳》）

⑨周氏錄於民國三十八年日記。

⑩同前注。

第八章

掙扎

國勢日下，憂患接踵而至，我內心裡的焦慮難以形容，經常陷入情緒網羅中，難以自拔。

一九四九年五月間，上海的戰事正熾。共軍自十三日起開始進攻，到了十四日，上海已陷入共軍的包圍，戰況極爲慘烈。爲保住這個大都市，連駐溪口的交通警察縱隊都被調去增援，眼見湯恩伯部署的重兵難擋共軍強大的攻勢，在上海存亡關鍵時刻，我卻因爲一件小事而悶悶不樂。

我隨身攜帶的一鐘一錶都壞了，鐘勉強修好，那只錶卻怎麼拆修都沒用。經國

先生奉蔣公之令飛往上海鼓舞士氣，我馬上請他代買一只錶。沈昌煥曉得後說，現在一只錶大約要七、八十塊美金呢。我一想這怎麼成？眞買回來的話，就付不起錢了，趕快去請經國先生不要買。回到艙房，心裡總爲自己話講太快欠考慮，一整天懊惱得很。

江靜輪駛返定海，新任浙江省主席周嵒及段軍長自甬縣乘坐機帆船來見，蔣公對防務方面指示頗多，以求保住浙東。俞濟時告訴我，蔣公準備前往澎湖馬公駐節，我心想馬公不太可能是長駐之地，卻開始擔心衣著了，因爲不斷地移動位置，愈往南行，天氣也愈來愈熱，而我僅有冬衣，眞不知該怎麼辦。

一九四九年那段日子裡，即使是在蔣公身邊，也多少經歷了生活短缺的苦楚，有時甚至連食物都感匱乏。一直隨著裝甲兵部隊行動的緯國打電話來告訴我，他也有用度上的困擾，但絕不放棄自己的責任。而以前管總務的陳希曾更是一例，我們準備離開上海時，他來見蔣公，談到自己甚至可稱爲潦倒的苦況，就聲淚俱下，蔣公當即贈他黃金十兩、銀元五百，並且答應以後會想法子安頓他。陳希曾是革命先烈陳英士的親侄，蔣公下野時，因爲不再是總統，只帶了幾個直接辦事的文武侍從返回溪口，他沒有被點名跟隨，新政府一組成，他就丟了差事而滯留在南京，幾乎

流落街頭。以後陳希曾也來台了，但始終沒有回復公職，只由中央銀行每月支給少額的兼薪而已。

在敗亡的陰影下，我發覺自己的意志逐漸脆弱。

先前在三、四月間，雖然駐日參事宋越倫等友人不是勸我把家眷遷到日本，就是建議我以深造為由出國赴美，但我對這些避禍的建議皆以失敗主義視之，認為不應有此心態。沒多久，這樣的情操隨著局勢轉壞而動搖了。五月初在上海時，由於連日來蔣公的公文不知何故，都交給曹聖芬處理，我因此終日閒著，覺得在侍從室不受尊重，而代上海市長陳良①這時邀沈昌煥擔任祕書長，他雖然沒有意願，卻使得我開始思考日後出路。

我思索著，以後如果離開侍從室的話，第一步是出國深造；第二步就是日後競選立法委員，這樣的話對於寧波方面聯繫就很重要。這些想法縈繞腦海多日，後來我才知道，蔣公不再把公文交給我處理是個誤會，那是副官誤把該給我的公文都拿給沈昌煥了，這說明了不過是一件小事，自己反覺好笑，所以要考慮事情，需要心平氣和才行。

抗命事件

我隨著蔣公離開上海抵達台灣，沒多久，上海就失守了，我的情緒緊繃、頹喪已到極點，也因此出現跟隨蔣公身邊十幾年來，唯一的抗命事件。

我們追隨蔣公自馬公島飛抵高雄後，多次的往南移動使得我感覺在流浪，故國山河破碎、家人離散的感傷在心中逐漸成為巨大的痛楚。光潤正帶著初生女兒開紀滯留在台北，我思念著她，在患難中我渴望見到妻女。

徐蚌會戰失利後，蔣公在對外關係上就形同孤立，令他很難過。他下野後偶爾不經意地把心中的失意透露出來，這樣的心情在他接獲前中國戰區盟軍統帥魏德邁的長函裡可以見得。

魏函於上海失守之前寄到，函中正是勸蔣公不必堅守上海，改在台灣重建防衛體系。魏德邁除認為中美關係應重新考慮之外，也建議不必堅守上海以避免無謂的流血，應在台灣建立防衛體系。

蔣公自下野以來，一直少有外國友人與他連絡，魏德邁的肺腑之言讓他深為感動，當即決定回函致謝，這也是下野半年來，首次給予外籍人士回應。蔣公對致魏

函極為慎重，覆函任務就交給了我。我就在丟掉上海的重大挫敗之後草擬函稿，蔣公親自修改，先是約前外交部長王世杰及前新聞局長董顯光會商，再找英文祕書沈昌煥協同翻譯。

我極想到台北走一趟，致魏函處理得差不多之後，就慎重地寫了書面報告向蔣公請假，他批示致魏函譯發後讓我赴台北。這封覆信於三十日完成，連同給胡適的信及一本密電本都交副官李大為攜往美國，致魏函將由蔣夫人親自轉遞。我心想這件公事已了，於是依准假公文連絡陳舜耕接洽車票，準備在晚間乘車北上，到了台北由蔣堯祥來接我。

這趟行程，有侍從室的同事張廷楨和我同行。奇怪的是，我在高雄火車站候車時，精神一直焦躁不安，總覺得會有什麼事發生。九點半左右，我們上車，已經把行李安頓好了，正準備休息，不料就在列車即將開動時，沈昌煥和武官夏功權居然出現在車旁，把我叫下火車。他倆說，奉蔣公的命令要我暫緩北上，因為接下來這三、五天內恐怕會有要緊的事。

我的心情沈落谷底，再也無法承受。我堅決地說：「家人困頓在台北沒人照應，煩請你們轉報總統給假一天，我去去就來。」但是夏功權和沈昌煥哪有可能答

應？我什麼都不管了，扭頭跳上火車就走。

夜色裡，火車在縱貫線上向北奔馳著，我稍稍開了車窗，讓涼風鑽進車廂。我極度疲累，卻無法闔眼。此行會不會結束我的公職生涯？我覺得有這個可能。激盪的心情從火車駛離高雄車站時，就無法平復，我原先似錦的前程，已因這件事而蒙上陰影，原先我自期年紀輕輕就有如此的機會追隨全國最高領袖為傲，我仍忠心如昔，無悔無怨，但我內心的苦悶，無法讓他了解。

那時從南到北得花十個鐘頭，火車向北行駛，我雖然疲累至極，卻無法成眠，腦子裡想的淨是蔣公會怎麼氣我；以後局勢好轉的話，我一定要如何如何之類的念頭不斷，腦子裡胡思亂想。

我想離開侍從室的心更切。

早上七點半，火車抵達終點站，大雨傾盆。我走出台北火車站，沒看到原先安排好來接我的侍衛官蔣堯祥，心裡曉得是怎麼回事，就打電話請緯國派車來接我。我終於在總督府後面巷子的國防醫學院宿舍見到幾個月沒見的妻女，光潤被安排與另一個醫師合住一間臥室。總督府就是現在的總統府，但當時住進許多從上海撤回來的部隊，秩序相當混亂。我匆匆梳洗一番，也顧不得和光潤談些什麼，就去找緯

國。

緯國說：「總統很憤怒，要你趕快回去！」

我一聽，氣憤及委屈交織之下淚水在眼眶裡打轉，衝動得幾乎要說出：「我要抗命不回去！」但一想到這麼多年來蔣公對我的信賴，還是強忍激動的情緒，馬上安排搭機回高雄。下午一點半，光潤抱著珊兒到機場送行，但飛機因下大雨無法起飛，依然必須搭火車南下，我意外得到幾個小時和妻兒相聚。晚上，珊兒在我的懷裡睡著之後，我與妻子握別，然後坐上火車，疲累及低落的心情讓我睡睡醒醒地在規律的喀喀車聲中過了一夜。

六月一日早晨八點，我提著行李走出高雄火車站，坐上早已等在站外的吉普車，立即返回行館，蔣公已經幾度詢問我回來沒有，看來餘怒未消。我雖然對整件事也很氣憤，但顧慮蔣公的情緒起見，幾乎是毫無耽擱地立即辦公。不過，我所辦的第一件公事就是上自己的報告。

前一天我已擬妥一份陳述整個經過的報告，再略為修改一番就呈給蔣公，自請處分。但蔣公居然就像沒這事一般從此未提，我打算離開侍從室的念頭也就此打消，我繼續留在蔣公身邊，親歷中華民國建國以來最大的變局。

這趟台北行，妻把女兒在上海照的一張照片交給我帶回，我把照片放在桌前，這樣朝夕相見就能稍得安慰。

蔣公致胡適函

魏德邁的來函，對蔣公而言是雪中送炭，因為那時美國大使司徒雷登在南京淪陷後仍然留了下來，與接收南京外交機構的共黨份子黃華兩度接觸，有意承認中共，美國放棄中國的態勢再明顯不過，其他盟國就更不用說了。所以蔣公感謝魏德邁，也慎重地回覆。

覆函中除了感謝魏德邁於公於私的患難與共情誼，也分析剿共失敗的原因在於中國經濟及民心士氣在二次大戰後未能恢復，以及盟邦誤中共產國際惡意宣傳之毒而使得中國在外交上孤立無援；魏函關於台灣當前各項行政軍政設施的建議，已轉告台灣省主席陳誠進行研究。

魏函是經由胡適轉來的。蔣公回信給魏德邁時，也覆函給胡適，信裡提到他在孤立無援之下的心情，及請胡適在外交上配合之處。內容如下[2]：

適之先生

十一日手示誦悉，魏將軍長函亦同時接到。我在此悲慘境地而外國友人猶念舊不忘熱忱愛護，如此更覺慚愧萬分。茲將覆稿便寄先生一閱，可以知鄙見之大概矣。現時對美外交之重點應專從事於其不承認中共政權爲第一要務，至於實際援助則尚其次也。對於進行方法，行政與立法兩途不妨同時並進，但仍以行政爲正途，且應以此爲主。望先生協助少川大使多加工夫爲盼，如其能使對華問題兩黨外交，則立法方面似亦不宜偏廢，要在異途同歸密切配合，亦請少川大使切商之國內政治問題，首在團結一致尤應注重於德鄰兄決心反共之一點，近日有轉機，總望其能終始無間、共同一致到底耳。其他改革正在積極進行，若能假我時日，自信必有成效，惟亦不能求之太速，此時如能有三年計畫之準備，則赤禍不患其不平。惟須阻止美國承認共產政府爲主要條件，務請積極進行是禱。

弟 中正手啓

五月二十八日正午

這是蔣公親筆信。他提到整個中國兵敗如山倒的局勢，對他而言實在是筆墨難

以形容，「悲慘」兩字只能略窺一二罷。函裡特別提到，當前對美外交任務首在於促使美國不要承認中共政權，實際援助反倒其次，可以說蔣公對美國態度如何已心知肚明，美方在年中就已考慮是否承認中共政權，現在只有盡可能的減輕其害，因爲美國一旦承認中共政權，使得中共立於合法地位，中華民國就等於覆滅了。

對華關係白皮書

總裁辦公室八月一日成立，但原定三日啓程的訪韓之行，因邵大使來電轉達韓方準備不及，堅請延遲至少四十八小時後，蔣公決定暫緩。不料次日各報都大幅登載蔣公將要訪韓的消息，蔣公擔心引起誤會及造成安全上的顧慮，於是決定立即先飛定海，晚上宿於普陀島，直到六日方從定海起飛赴韓。

就在蔣公赴韓前一天，國內外各發生一件足以動搖人心的事件。國內是湖南省主席兼長沙綏靖主任程潛在共軍對湘省發動大規模攻擊之際，倡言「局部和平」，中央據報改以陳明仁[3]繼任湖南省主席，但程、陳兩人竟然皆於五日通電投共，湖南遂告不守。國外則是美國發表內容十分冗長的《對華關係白皮書》，總共一千餘頁，嚴重打擊風雨飄搖的中國。

這本白皮書是艾奇遜（Acheson, D.G.）動員了大批國務院人員，在密友前哥倫比亞大學國際法教授傑賽普（Jessup, Philip S.）的領導下，花了六個星期以舊檔案編成，主要目的在於推掉一切責任，把在中國的失敗完全歸咎於中華民國政府及蔣公的肩頭上。蔣公透過管道得知白皮書的大致內容，所以我早在七月底就開始整理舊檔案，準備因應。事實上，白皮書就是艾奇遜打算承認中共政權的先聲，希望藉以卸責，然後和已經壯大的中共建交。

蔣公訪韓歸來後，開始針對白皮書的內容考慮如何因應。但李宗仁先前致函杜魯門總統，竟然聲稱我政府處於今日的窘境，是由於過去行政不良，而非美援不足；如今白皮書把他的信公開，作爲「並非由於美援之不足」的旁證，這使得我方在回應白皮書時，頗感棘手。

王世杰、洪蘭友、葉公超在十四日晚上九點半到草山來見蔣公，談對白皮書的聲明問題。外交部所擬之稿經過非常委員會討論修正，但內容空泛且不切實際，又受困於李宗仁那封自承未妥善運用美援的信，因此在措辭上綁手綁腳。這樣的聲明不僅會被美國國務院輕視，也無法使國人了解白皮書指摘的眞相，經過討論後決定用王世杰所擬的草稿，先發一個簡單的聲明以示抗議，日後再詳細回應。

次日，已卸下上海市長職、轉任顧問的吳國楨也來草山官邸，他同樣贊成王稿，認爲我方的態度不能太決絕，因爲美方援助對中國未來的前途而言仍是不可或缺的。上午十一點鐘，葉公超、黃少谷、沈昌煥、張群及董顯光都來了，和蔣公繼續研商並做文字修正，蔣公再三表示，白皮書有瑕可擊，以後一定要發表一篇詳盡的聲明，現在爲使美國國務院對我方未來回應懷有戒心，所以暫時不做掛一漏萬的全面回應。文字修正完成後，由葉公超及洪蘭友攜回廣州交非常委員會討論，政府隨即發表對白皮書的簡單聲明，表示對白皮書內容有嚴重異議，將於適當時機對中美兩國人民做「詳切之聲明」。

據駐美武官皮宗敢的報告，美方此次發表白皮書，馬歇爾主張最力，所以除非民主黨以多數迫使美國政府援華，否則美國當前不予援助的對華政策仍將不變。然而，國務院打算放棄國民政府的舉措，並未獲得美國國內的完全支持，特別是東京麥帥領導的聯合國遠東盟軍總部。據朱世明自日本的報告指出，麥帥曾請求杜魯門總統及艾卿到遠東巡視，但杜魯門未同意。

白皮書對中國局勢的影響是立即的，不單美國眾議院否決了對華的援助款，美援就此中斷，國內將領固守廣州的決心也爲之動搖。

台灣地位問題

自福州失守後，台灣在軍事上日感威脅，政府對台灣有無確保能力更受到質疑。八月十七日早上，蔣公準備出席東南軍事會議，王世杰正在會客室候見。我和王世杰談了一陣子，得知美國國務院為防台灣落入共產黨之手，擬要求聯合國託管。事實上，早在六月間東京盟總方面就有這種風聲傳出，動機在於不使台灣陷於共產陣營，但是此一構想不但重擊我政府當前低迷的士氣，更嚴重的問題是，台灣和中國分離之下，台灣就不能作為我復興基地，我們連後路都沒了。

十月十六日，民航空運隊負責人陳納德搭乘民航隊專機自香港來台，立即到草山謁見蔣公。陳納德此舉最主要的目的，在於延長民航隊的契約，他並轉達美國民間有捐款接濟白崇禧之事，蔣公當即表示贊同，囑陳納德飛渝，向李、閻面報。隨後又有消息指出，美國將有兩千噸軍火接濟白崇禧，此舉意謂美國公開表態不支持蔣公，我認為這有如助長國內的分裂，其實這也是美國近年來的對華政策，不再援助蔣公，企圖培植第三勢力來對抗中共，除了以桂系為對象之外，同時進行的還有在台灣練兵的孫立人。

十一月，大陸局勢每下愈況，廣州已失。三日下午，蔣公於第一賓館接見美國駐台總領事麥克唐納（Macdonald, J. J.），他奉國務卿艾奇遜的指示，轉達了一份備忘錄，內容是向我國聲明：「美國政府並無使用軍事力量以防衛台灣之意向。惟對台灣局勢表示關懷，並將繼續予以援助。」④這是措辭較為婉轉卻明確表達不打算協防台灣的聲明，當晚蔣公約集高層幕僚研討這份備忘錄的內容，直到深夜。

台灣地位問題引起重視，對台灣將由盟國託管的謠言始終不止。直到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初鄭介民訪美，才得知此謠言源自美國國務院部分人士的構想，提出這種意見的，是美國國務院遠東助理國務卿白德華及代理國務卿魏勃（Webb, James），並非國務院的正式建議。司徒雷登大使認為這種構想難以實現，因為拒絕蘇聯參與恐怕在聯合國通不過，而且將來我政府不能遷台，則蔣公未來去處及反攻軍事基地等實質問題均無法解決。

鄭介民祕密訪美

在大陸淪陷前，軍統局長鄭介民的訪美是個關鍵，因為這次訊息傳遞而做出幾個重要政策。

鄭介民於九月間接到司徒雷登與魏德邁的聯名邀請，希望他以私人名義祕密赴美，因爲美國遠東政策小組將會有個對華的決策出爐。十月下旬，鄭介民向蔣公報告此事，由於事隔月餘，蔣公囑我去電駐華府武官皮宗敢，向司徒大使及他的助手傅涇波詢問是否尚有必要。皮宗敢隨後覆電報告仍應該去，可望有相當效果，因爲美國國務院只對有效的反共計畫才會給予軍援，鄭介民因此成行。

鄭介民赴美後傳回的訊息並不好。他於十一月八日來電⑤：

甲、職今晚與司徒長談據告：

一、司徒雷登前建議國務院遠東司與翟石三人小組起草革新的兩黨共同對華政策，故邀職來美商談。昨日下午，由白德華召集翟石三人小組與司徒等已商決先尋求中美兩國政治合作途徑，囑涇波今日通知職，並由司徒起草備忘錄報陳杜魯門；但今日上午十一時由代理國務卿魏勃召集司徒雷登、白德華等會議，一改昨日決議，提出我國舊人在朝，合作必無結果，因過去援華已經失敗，除非出兵參戰，無法挽救中國爲理由，決對我採放棄政策，即國會通過之七千五百萬美元只有三分之一可用於中國，但只援助中國「對共作戰具有成績之方面」。職忖此必爲昨夜魏勃等請示馬歇爾後而變卦。

二、國務院認爲我必無力保持台灣，建議由我國發動交聯合國託管，保證其不變更，並將軍隊集中海南。職答以此事牽涉太大，託管後我不復能用台島爲反共軍事基地，職無法同意必須請示。

三、國務院報告，美國將於聖誕節後承認中共，英帝國集團及法國必繼之承認屆時美國與加拿大亦不得不對承認問題加以考慮，但國會方面反對者仍多。

四、翟石決於下月來遠東，兩週前仍計畫來中國約司徒同行，但一週前又改變計畫，決定不來華。

乙、白德華約職下週晤見，並或將晤見馬歇爾，但司徒稱美方決策勢難挽回。

丙、前戰略局長登努萬擬召集志願陸軍助我剿匪，司徒雷登與職下週面商，職擬下週回國。

職鄭介民叩　十一月八日

顧維鈞緊接著來電⑥，進一步解釋了艾奇遜先前經由麥克唐納遞交的備忘錄。電文指出，美國主管遠東事務官員提及艾卿的備忘錄時說，美國政府絕不能派遣軍隊助守台灣，美政府認為台灣目前要著全在改善該島政治經濟實況，爭取台民之同情與擁護，並樹立民主政治、增進人民福利以資表率，使得大陸上現受共黨暴政之華民有所仰慕而增強其反共思想，此為上策；且台灣現有之資源物產只需善為運用頗足以自給，若現在勉強駐兵數十萬於該島騷擾民間，生民塗炭，民心既去，必使該島無法固守，將步中國大陸之後塵而淪陷。

顧維鈞的電文也轉述，白吉爾將軍把金門登步島兩役之勝利，歸功於台灣所派的新練軍。白吉爾並說，美國當局近日詳細研究了台灣情況後，對於島上民心不滿的情勢愈覺可慮，國民政府宜竭力設法改善政治、經濟狀況，而「主持省政人選尤屬重要」，宜儘早試行民選。

白吉爾是中華民國政府的友人，他所提的「新練軍」，指的是孫立人的部隊；至於所謂「主持省政人選」，沒多久就浮出檯面。

十二月初，鄭介民返國，馬上把十一月十七日下午在華府和白吉爾談話內容整理出來，可見這是白吉爾基於對中國局勢的關切，和美國國務院方面聯繫後，所提

出的對中國之具體支援及條件。白在談到防禦台灣時率直地說，陳誠在台灣爭取台灣民心方面的行政已告失敗，吳國楨在主持重慶及上海市政的成就甚佳，所以美方認為是主持台政的理想人選，因吳國楨在滬時對於糧食分配、工人就業、工業復興，紀律維持而不用暴力，以及行政效率皆有良好表現。他並強調，如果吳國楨主持台政，就應賦予完全的權力以任用優秀幹部；如果蔣公同意，則美方準備派遣政治、經濟及軍事顧問團來台協助台政，並供應有限的美援。

白吉爾在這次談話裡明白表示，美方屬意支持的在台領導者，軍事方面為孫立人，政治方面是吳國楨。以當前整個大局來看，蔣公在心餘力絀之下，殊難做出完滿的決定。

十二月十五日，行政院宣布台灣省政府改組，任命吳國楨為台灣省政府主席，隨後在二十三日依白吉爾的意見，由顧維鈞正式提交一份請求援華備忘錄給艾奇遜。

但是，連白吉爾如此安排之下的有條件援華，都沒有被杜魯門總統及國務院接受。中華民國，已到危急存亡的關鍵時刻。

第八章注釋

①陳良於原上海市長吳國楨辭職後，奉命兼代；其後隨政府來台，曾短暫出任交通部長及行政院主計長，其後任行政院顧問及央行監事，一九九四年去世，享年九十九歲。（傳記文學，劉紹唐主編：《民國人物小傳》）

②周氏錄於民國三十八年日記。

③陳明仁時任華中軍政總署副長官兼第一兵團司令官，投共後繼續出任共軍軍職至上將階，並任全國人代會代表等，一九七四年病逝，年七十二歲。（傳記文學，劉紹唐主編：《民國人物小傳》）

④周氏錄於民國三十八年日記。

⑤同前注。

⑥同前注。

第九章

大陸淪陷

大陸的命運，已然決定。一九四九年那段最後的日子，蔣公雖然動身赴穗、渝，試圖在險境中穩定大局，頹勢卻已無法挽回。

十月一日，中共在北平宣布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三日，我隨蔣公自穗返台，戰事失利消息繼續傳來。韶關失守，使得白崇禧的部隊全面向廣西撤退，在湘西被圍後折損嚴重；劉安琪部則是後路被襲，無法回頭馳援，以致廣州防務空虛局勢危急，政府十二日宣布遷重慶辦公。

廈門方面，湯恩伯部隊也受到猛攻。共軍自海上分五股登陸被消滅後，繼續一

波波地來襲，十五日深夜，國軍自鼓浪嶼撤守，共軍登陸廈門本島北部，守軍苦戰之後終於撤至金門。廈門的失守，對台灣人心影響極大，陳誠、國防部次長林蔚①及東南長官公署副長官郭懺②，都到官邸與蔣公會商台灣及定海防務；國外則是開始出現美方支持孫立人擔任台灣省主席，以及台灣將被聯合國託管等謠言。

我的情緒極度沮喪，甚至感到絕望。二十六日在台北和光潤一起去看了場電影後，我告訴她，萬一政府整個失敗，我也無顏再留戀人世了。光潤非常擔心，不斷勸說，認爲縱然未來前途渺茫，也該有應變之策，我了解她指的是設法出國避難。不過，就在我愁苦不堪時，當天深夜就傳來金門古寧頭大捷，總算稍感寬慰。

局勢惡化之速令人喘不過氣。情報顯示，中共已經在做進攻台灣的準備，沿海各港都在大量製造機帆船，蔣公因此在二十八日召集非常委員會第二分會會議時，指示加強防衛台灣。他提示，防衛台灣應以消滅敵人之企圖爲上策，如轟炸沿海的機帆船，消滅敵人於海上爲中策，等到敵人登陸再於海灘上予以消滅就是下策了；至於軍事部署，應以情報網的配置及民衆組訓爲先，構築工事次之。這個時候，海南島尚未放棄，他提示海南島的海空軍力量應與台灣一起做通盤籌畫。

這次會議，由於監察院長于右任及何應欽也參加了，蔣公特別報告台灣國庫的

存金目前爲一百五十二萬兩，約等於七千五百萬美元，如果換算爲銀元約爲一億五千萬銀元，如以每月四千五百萬消耗計算，約至次年三月會耗盡；所以對這筆存金應做有計畫的運用，今後財政方面應支持閻錫山的財政政策，使中央與地方平均負擔。

這筆有限的國家財源，在大陸淪陷前的最後時刻，仍然應閻錫山的要求，動用了二十萬兩黃金支應西南軍政之需。這筆黃金分兩批起運，首批十萬兩於十一月二十三日運到成都，改鑄小條，以因應年內急需。第二批準備啓運時，因爲重慶戰事吃緊而未運，中央政府由重慶遷成都後，閻錫山與蔣公商議之下，決定先運五萬兩支應。

李、白二人進退失據

在這個時刻，李、白的態度值得一提。桂系體認情勢的嚴峻，極力促請蔣公赴重慶共赴國難，領導權問題又暫時擺到一邊了。

十一月二日晚上，白崇禧在重慶拜訪張群，鄭彥棻把兩人的談話內容電告經國先生。

張群問：「你現在對國防部長位置的態度怎麼樣？」

「這個時候已經談不到國防部長問題了，」白崇禧回答。

「爲什麼德鄰不時提及請總裁出來負責？」

「德鄰什麼也不知道，代下去也不過和一些立委國代談談而已。」

「在穗時你不是也請總裁出來負責嗎？」

「我的意思是總裁既然引退，應在後台領導，若仍對軍政直接過問，就應該站在前台。總裁引退之後還要德鄰做林主席（林森），這是不對的。」③

白崇禧隨後又跟吳忠信④懇談。他說：「當前情勢已經到了最嚴重的階段，蔣李兩公固然都有責任，我也有小小的責任，務請總裁提早來渝領導，以共挽危局。」他並強調，在廣州時他曾當面誠懇地向蔣公說，李代總統仍然是副總統，請總裁復出以總統身分領導國家。⑤

五日，鄭彥棻來電說，白崇禧再以電話告知吳忠信，他已囑總統府祕書長邱昌渭於當日飛往昆明，把勸蔣公復位的經過向李宗仁報告並徵詢意見；吳忠信爲表慎重，特請交通部長端木傑拜訪邱昌渭，詢問邱此行有無其他任務？邱昌渭證實白崇禧之言。

邱昌渭見了李宗仁，八日中午回渝後即告訴吳忠信，李宗仁對於白崇禧的提議完全同意，並說李宗仁將會飛往貴陽再飛桂林，以處理若干廣西內部事務，但蔣公一旦蒞渝，則他會立即回渝。李宗仁甚至談到一些細節——蔣公復位後，他希望在彼此發布文告時，能夠事先交換互閱。此外，白崇禧也與吳忠信談及，蔣公一旦復位，李宗仁是否出國問題。吳忠信認為這方面不可提出，因為此刻出國並不體面，也會使中外人士誤會蔣李之間不合作，不是說蔣先生逼李先生出國，就是會說李先生仍不免犯幾個月前發生的「桂林談話紀錄」錯誤。

這個時候，李宗仁處事已然混亂。張群說，李宗仁流露出進退維谷的情緒，而且日形憤懣，急於交卸領導國家之職，以求免於西南敗戰淪陷之責。

十一月九日，閻錫山來電促請蔣公赴渝。在此之前，洪蘭友報告，李宗仁三日赴昆明之後轉往桂林而不回重慶，聲言須待總裁到渝後再說；蔣公認為此刻赴渝不妥，但是這個想法沒多久就因貴州、廣西軍情緊急而改變了。

十日這天，壞消息接二連三。先是鄭介民自美來電指出，美方對華的態度依然不佳，要求我方自動訴請聯合國託管台灣，並令國軍退出台灣。晚上消息傳來，中航、央航兩公司總經理帶領十二架客機降落在中共占領區，這個叛離事件使得飛渝

航線為之中斷，重慶人民即使有錢也沒法脫身了。

蔣公決定趕赴重慶，堅守大陸最後一片國土——西南各省。其實，此行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九日在台北草山召開非常委員會第二分會會議時，蔣公就說：「革命者固然是不畏失敗，但目前要挽回西南頹勢，已失之太晚，敵軍已抵達黔（貴州）境鎮遠，貴陽岌岌可危。而貴陽一失，則重慶危矣。」[6]至於復位問題，蔣公認為在李、白實際舉措的誠意上未副其言時，應該從緩。從這番話，可知蔣公此刻赴渝的心境了。

重慶失守

十一月十四日下午，我隨蔣公搭乘中美號專機飛往重慶，然而主張蔣公應該復位以挽回頹勢最力的吳忠信卻僅在機場送行，由此可知其對蔣公復位與否的決定。

蔣公抵渝，李宗仁卻沒有一如先前白崇禧所言，立即前來。相反地，他跑得更遠，自桂林飛到南寧落地，從此未再踏上重慶。這天晚上貴陽失陷，共軍以兩路進擊，北路攻四川，南路方面由於宋希濂部隊撤離彭水退守南川，使得共軍毫不費力渡過烏江之險，羅廣文[7]的第十五兵團奉命增援，希望能夠堵住共軍入侵。

就在戰事逼近重慶之際，突然傳來李宗仁二十日赴港的消息。

李宗仁離開大陸之前，桂系人馬已紛紛棄職，好像一俟蔣公到渝，把爛攤子丟了就跑似的。先是桂省主席黃旭初於十七日通電辭掉省主席、省軍管區司令、保安司令等所有職務，接著內政部長李漢魂竟然於同日自昆明出發，經桂林赴香港後通電辭職。部長擅自出國再來電辭職，也算讓國人開了眼界。

然後就是李宗仁自己稱病赴港，蔣公直到二十日那天下午，才接到李宗仁聲言要離開大陸治病的信。

李宗仁棄職的同時，四川戰局也逐漸緊急。羅廣文兵團放棄南川後，敵軍就分兩路向重慶進犯。二十七日已發現有小股共軍在郊區溫泉山地，雖然被守軍擊退，但是整個重慶陷入恐慌，政府決定緊急疏散，商家多半自動停業，市民紛紛往郊區逃，林園左邊通往成都及白市驛機場的公路徹夜車聲不絕。二十八日戰火更近了，長江南岸激烈地交戰著，入夜後爆炸聲不斷，林園清晰可聞。陳誠自台北來電關切，黃少谷則數次請蔣公離渝，但蔣公認爲，多留一天就有十天的效果，而堅持要在重慶留到最後一刻。我心裡想，國家存亡現在全看蔣公，實在不宜太冒險，但也只能跟著蔣公涉險。

十一月二十九日，我一起床就開始整理行裝，和其他同事一樣，都做好離渝的準備。上午九點，我們聚集在二樓黃少谷的臥室裡等待離渝的命令，大家談著未來，情緒低落。政府撤離重慶的工作已在匆促中勉強完成，我們這群屬於總裁辦公室的成員則是等待蔣公的指示，連經國先生都不知道，他推斷可能會是三十日清晨。

白天就在緊張的等待中度過了，共軍並未猛攻。傍晚時分，卻傳來共軍轉移主力到渝西，這等於襲擊重慶往成都的後路，自前線撤退的部隊一時陷入混亂。經國先生原先要我們早點睡，養好精神準備明天動身的，我才在床上躺下沒多久，就聽到外面槍聲突然大作，然後接到電話說是蔣公已經決定今晚就離渝。我在匆促間再理好行裝，深夜十一時許，冒著寒風離開林園官邸。這個時候，蔣公已經和經國先生先出發了，林園外面的道路上全是胡宗南的部隊，擁擠不堪。後來才知道，蔣公的座車根本動彈不得，最後迫不得已就下車步行，狼狽地走了好一段路之後，再找到吉普車，開赴機場。

總裁辦公室其他成員也是一樣，我們在部隊裡慢慢地逆行，沿途看到的淨是官兵們失落無神的臉龐。我們終於在凌晨零時許走到機場，上了運輸機後就枯坐到天

明。我的內心有如淌血般的痛楚，對於近一年來的種種失利，身心俱疲，甚至覺得已經麻木了。

三十日清晨六時，蔣公搭乘的中美號專機先行，兩個小時後我們的運輸機也起飛了，飛機離地的一刻，已可見得有共軍持槍向我們射擊。沒多久，飛機降落在成都郊區的鳳凰山機場。共軍在下午三時進入重慶城，全城懸掛白旗，這座抗日名城毫無抵抗地就此陷落。

成都陷落

蔣公對重慶城陷，感觸極深。他告訴張群：「大局發展到這種地步，已經很難挽回，必須從頭做起了！」張群事後向我轉述，也提及蔣公嘆惜不已。但蔣公仍冀望堅守雲南、西康，以昆明及西昌爲政府及統帥部的駐地，在大陸保留一線生機並伺機反攻，他對成都寄望不高，知道沒有天險的成都是保不住的。

不論黨內外此刻都紛紛上書籲請蔣公復職重新領導國家，但由於軍事情勢緊張，實際上民間無法反應，蓉城（成都）已頻臨戰爭邊緣，無暇顧及這個問題了。成都街頭冷槍頻傳，秩序開始混亂，各個自衛團隊紛紛出現，有些團隊甚至搶劫空

軍機場倉庫的通訊器材。蔣公約正駐守在南寧的白崇禧來談戰局及復行視事等大計，這通電文於十二月四日發出，但隨後我看了報紙才知道南寧已經撤守，只好在五日重新發到海南島的海口市。五日這天，李宗仁以代總統身分搭乘泛美航空公司專機啓程飛美。

我們焦慮地等候白崇禧的到來，然而情報傳來，桂南正在激戰中，南寧也已失守，白崇禧恐怕是無法自由抽身了。中央黨政機關這兩天也紛紛空運離開成都，經海口轉赴台灣。成都民心渙散，留蓉的兩百餘名國大代表群集在勵志社二樓行政院長辦公室，進行有如現在街頭經常可見的抗爭，不斷地敲打喊叫，不單要閻揆派機把他們疏運到台北去，還要求發放三個月來的生活費。閻錫山最後允諾撥五架次包機，讓這些國代成行，並且每人發給黃金一兩、銀元四十枚作爲生活費。

國代可以走，但絕大多數的老百姓甚至公務員都走不了。我二叔一家都在成都，六日那天他來看我，談了些成都街頭的謠言，有說王陵基⑧主席決定火燒成都，也有傳言宣稱四川省議長向傳義對外說如果政府決定堅守成都，就應該把機場炸毀以示決心，否則就應該儘早撤退以免危及蓉城。二叔是審計部的一個科長，自己知道想走也走不了，已決定留下來「靜觀其變」，這也是我最後一次與他見面。

成都地處平原，易攻難守。共軍進犯的速度很快，白崇禧部隊的第三及第十一兵團都被擊潰，余漢謀的部隊也是一樣，許多將領不是陣亡就是被俘。這是繼徐蚌會戰之後我軍損失最慘重的時刻，我又得開始收拾行李了。

七日晚上，蔣公約請中央及地方軍政人士開會共商大計，但四川軍人鄧錫侯、向傳義及西康省主席兼川康綏靖公署副主任劉文輝[9]，竟然都找藉口不出席，次日才知道這三個人都已離城，成都市的領導體系形同真空。所謂「局部和平」看來又要出現了。

在成都這幾天，政府每天上午十一時舉行政治會報，晚上八點舉行軍事會報。六日的會報裡，蔣公指示把政府遷到四川西南部的西昌，並囑咐陳立夫及朱家驊兩人先行，張群則陪同閻揆去昆明商討遷移問題，再轉西昌。

雲南叛變

雲南，是整個不利局勢裡最後的希望。然而盧漢[10]早已不穩，既不願中央政府遷至昆明，也不肯接受滇黔剿匪總司令的職銜。先前蔣公於九月間與盧漢見面後，他雖然返回昆明就展開清共工作，解散親共的省參議會並逮捕部分人士，但態度消

極，沒有作戰的決心。依據張群於大陸淪陷後寫的〈昆明事變經過〉[11]報告，盧漢早在十月間請辭省主席時，就已經把眷屬送到香港，並且催外交部發放他本人及家屬的出國護照，絕無共赴國難的決心。十一月初，李宗仁赴昆明晤見盧漢時，依當地的請求，同意對被捕的親共附共份子予以從寬對待，盧漢則順勢推舟，乾脆全部釋放。張群說，這批「反動份子」獲釋後，就開始活動，動搖盧漢部屬的心防，盧漢受到這些包圍後，終於決定投共。

十二月七日，張群奉命赴昆明與盧漢會商政府遷移問題，盧漢牢騷滿腹地說，保衛雲南所需的各項請求皆未獲得解決，雲南就無法保衛，只要做向西撤的打算，政府即使遷到昆明也實屬徒勞。張群心知有異，當天傍晚就以電話把盧漢不穩的消息告訴經國先生，經國先生馬上向蔣公報告，蔣公這才做了決定。他指示行政院召開院會，把中央政府遷到台北，並在西昌設大本營。他召見閻錫山，囑咐於一天之內完成準備。

八日，張群奉召自昆明回到成都，偕同李彌、余程萬及龍澤匯三位軍長一起面陳雲南局勢。張群隨即於九日奉命再飛昆明就盧漢所提的難處予以答覆，希望能夠做最後的挽救，沒想到就在這天被盧漢連同三位軍長一併扣留，而成都與昆明之間

的電訊也突然中斷。

十日，我們設法和張群聯繫，但電話始終不通，只好繼續等待。到了上午十點鐘，昆明突然拍發了一通電報，這通電報是盧漢給劉文輝的，然後電台再度關閉。這通電報以「劉主席自乾兄（劉文輝之號）暨四川全體將領」開頭，文中稱「解放大軍」已進入雲南，他已於九日「率領全滇文武官員及全省人民在滇舉行光榮起義，堅決擁護中國共產黨和全國人民偉大領袖毛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並號召劉文輝及將領們即刻扣留蔣公，解交中央人民政府。⑫

盧漢已經叛變。蔣公命令顧祝同總長，以駐滇的三個軍向昆明進軍討伐盧漢，並且決定立即離開成都返回台灣。盧漢旋於數天後陸續釋放張群及三位軍長。

退守台灣

十日下午一點多，我和總裁辦公室的十幾位幕僚先到鳳凰山機場，上了中美號專機等候。沒多久蔣公就在經國先生的陪同下也步入機艙。蔣公在離開大陸的最後一刻，表情是肅穆而哀戚的，他沒有講話，就直接走進專艙。中美號旋起飛，飛了六個多小時，晚上八點半在台北松山機場落地。

離開成都的最後關頭，在戰火逼近、心情紛亂之下，我拿起《羅斯福總統回憶錄》閱讀，那時他已逝世五年，這位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對中國極為友善的前美國總統，在回憶錄裡對蔣公夫婦的評價很差。至於美國白皮書所言，只不過是把這些非正式的批評予以明朗化罷了。

那時局勢極為緊張，甚至連我們這些文職人員都人人發了把槍，好在必要時可以自衛一番。然而當我見著蔣公在最後一刻步上飛機，卻又給了我一種安定信賴的感覺，他是如此的沈著，令我覺得他永遠知道要怎麼領導國家走下去。

大陸就這麼丟了。台灣會不會跟著丟掉，這種恐懼正與日俱增。

第九章注釋

①林蔚曾任委員長侍從室第一處主任，大陸淪陷後來台，任東南長官公署副長官，後改任總統府戰略顧問、國策顧問，四十四年八月病逝台北，享年六十七歲。（傳記文學，劉紹唐主編：《民國人物小傳》）

②郭懺同時兼任舟山指揮部主任，這次談話沒多久，他就因腦溢血而病倒，次年七月在台北過世，享年五十七歲。（傳記文學，劉紹唐主編：《民國人物小傳》）

③周氏錄於民國三十八年日記。

④字禮卿，蔣公下野時的總統府祕書長。來台後任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中央紀律委員會主任委員，一九五九年去世，享年七十六歲。（傳記文學，劉紹唐主編：《民國人物小傳》）

⑤同前注。

⑥周氏錄於民國三十八年日記。

⑦羅廣文兵敗，於十二月率部投共，一九五四年任全國政協委員，次年任山東省林業廳廳長時病逝，年五十一歲。羅為陳誠系重要幹部，曾任該系第十八軍第六任軍長，為該軍軍長中唯一主動投共者。（傳記文學，劉紹唐主編：《民國人物小傳》）

⑧王陵基為軍人，一九四九年擔任四川多項重要職務。十二月下旬川局逆轉，成都將陷後，

他隨第五軍團李文部隊出走，隨後為了方便，乃獨自行動，但於宜賓搭船到重慶時被扣，並遭認出。他隨後被送到功德林戰犯改造所，至一九六四年由中共當局特赦，一九六七年逝於北京。（傳記文學，劉紹唐主編：《民國人物小傳》）

⑨劉文輝與鄧錫侯、熊克武等四川軍人同時投共後，曾任中共林業部長，一九七六年於北京過世，終年八十五歲。（傳記文學，劉紹唐主編：《民國人物小傳》）

⑩盧漢投共後初任「雲南省軍政委員會」主席，歷任人大常委、全國政協常委，並曾獲中共一級「解放勳章」。一九七四年於北京過世，終年八十歲。（傳記文學，劉紹唐主編：《民國人物小傳》）

⑪周氏錄於民國三十九年日記。

⑫周氏錄於民國三十八年日記。

第十章

浮動的人心

重返台北，和母親妻女見面，雖才過了幾天，卻恍若隔世。

遠離了大陸，我在家裡連續休息兩天，終於把心情平復下來。戰爭的威脅暫且擱下，我開始幫光潤籌設牙科診所。來台後，母親和光潤在生活艱苦中能相互勉勵，而珊兒也活潑可愛，丟掉大陸的失落及對未來時局不確定的情緒，回到家來可以稍得舒緩。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底，隨著守軍陸續投共或戰死，中共在蘇聯優勢軍事支持下，使我政府在大陸的軍事力量逐漸瓦解。二十五日，胡宗南駐守成都的二十餘萬

精銳部隊投降的消息傳來，我感到憤慨，這是因爲胡宗南過早離蓉，使得他的部隊不戰而降。西昌是新的大本營，蔣公命令他立即赴西昌領軍。

成都於二十七日失陷，意謂在政治上大陸已經淪陷，只剩下一些部隊仍在偏遠地區掙扎。隔著海峽，僅有三萬六千平方公里土地的台灣，也人心惶惶。

拿到民國三十九年（一九五〇年）的新日記本後，我回顧過去一年來的失落、苦悶以及驚心動魄，想著當下危機四伏、前途茫然，不禁就在扉頁題上「流浪生活中，工作唯一良伴」，並且鄭重地簽了名。眞的，生活的周遭放眼望去，或涉工作機密或是心中許多苦楚煩悶，包括妻子在內竟然沒有一人是可以盡情傾訴的，也只有往這本日記裡吐露了。

友邦相繼離棄

政府遷台後，艾奇遜在十二月十四日會見新聞界時表示，縱然美國人民希望美國出面干預，以免台灣淪落共黨之手，卻仍有實際的困難。媒體以此認爲，美國已經放棄台灣這處戰略要地。

實際也確實如此。一九五〇年一月五日，杜魯門總統正式宣布，美國不會介入

中國內戰，也不會軍援退守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換句話說，如果中共武力犯台，國民政府只有自求多福，美國是不會插手的。如此有如放棄台灣的不利消息傳來，台灣人心動盪，物價為之狂飆。

在杜魯門發表不利於我政府的言論同時，英國及印度就迫不及待承認了中共政權。先前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九日傍晚，駐印大使羅家倫的報告交到蔣公手中。羅家倫指出，由於大英國協準備於次年一月二日集會討論承認中共問題，印度尼赫魯（Nehru, Jawaharial）政府不願落人之後，將於三十日承認中共政權。這是印度外交部次長梅農（Menon, Krishna）基於私誼告訴羅家倫的，他曾是首任駐華大使。梅農說，印度承認中共是因為政權誰屬已經明朗，印度是承認「事實」，且避免中共投向蘇聯的懷抱。羅家倫在電文裡說，梅農談話時表情及言語都極不自然，他當即正色指出中共投到蘇聯懷抱與否，絕非印度承認所能左右，這是印度自視太高的錯誤。

印度與我國邦交甚篤，卻果真於那天承認了中共。至於英國，在一月五日晚上由外交部代部長事先告知我駐英大使鄭天錫①並表達歉意後，於次日中午宣布承認中共。

雖說美國向中共示好，但一月十三日蘇聯駐聯合國代表提案取消中華民國政府代表在安理會席位，不可避免地被以三票對六票遭否決後，中共竟然在次日派員強占美國駐北平領事館，美國國務院遠東助理國務卿白德華為此宣布準備召回所有在大陸的官員。白德華憤怒地告訴匆匆召來的記者們，中共的行動，是史無前例的。有意思的是，中共占據美國駐北平領事館，我卻有種好像是為我們向美國人出氣的感覺，見到美方的反應，一絲快感竟油然而生。

蔣夫人促請蔣公離台?!

那陣子混亂裡，各種影響人心的傳言紛至沓來，包括蔣公準備離台的謠言。就在杜魯門形同放棄台灣的宣布同時，我從黃少谷那邊聽到一個消息說，蔣夫人已遣孔祥熙的女婿陳繼恩自美國經香港抵台來見蔣公，勸蔣公赴瑞士「休養」。這是何應欽夫人在港晤見陳繼恩時，陳自己講的；何夫人把這件事告訴了丈夫，何應欽向黃少谷求證，這才冒出傳言來了。陳繼恩是孔令儀的丈夫，孔令儀後來離婚後，再嫁駐美武官黃雄盛。

這是個很影響人心的傳聞，傳得很快，香港《工商日報》幾天後就報導了，指

稱蔣夫人是爲促請蔣公赴瑞士，才返回台灣。當時蔣夫人留居美國長達一年多後，即將於一月十三日返回台灣，這個消息引起台灣各界一陣子恐慌，沒想到閻錫山接受台北廣播電台記者訪問時又出了紕漏，記者問到蔣夫人是不是爲了促請蔣公出國才回台灣？閻錫山回答，他不知道蔣夫人要回國。這段訪問在十二日晚上七點播出，我擔心更會使已經不穩的民心雪上加霜，立刻把如此的「傳言」向蔣公報告。

我可以感受到，蔣公對這個消息頗爲不悅，但和往常不太一樣的是，他並沒嚴峻地否認此事。照講，如果是毫無根據的謠言，蔣公是會很生氣地駁斥的。

我建議說：「應該在發布夫人即將抵台的消息時，適度地間接否認。」

蔣公回答：「可以同他們去商量商量。」他們，指的是總裁辦公室祕書主任黃少谷等負責幹部。

從蔣公的態度，我推測蔣夫人也許眞有此意，但是從夫人在返台前的對美廣播以及沿途的談話都堅決表達反共救國態度，又眞的難以揣測她內心的想法究竟是如何。

蔣夫人十三日返抵國門，政府要人大多前往接機。中午，我約了夫人祕書游建文在大溪鎭吃午飯。游建文告訴我，美國政府的態度極壞，因爲美國人認爲我政府

的失敗已經無法挽救，所以轉而對中共有所期待，希望和中共改善關係，在艾奇遜的領導下甚至考慮建交，這也是何以杜魯門不肯軍援台灣，對經濟援助也非常消極的主因。

傑賽普大使抵台

風雨中的台灣，內憂外患接踵而至。次日，經國先生告訴蔣夫人，與我國關係密切的菲國總統季里諾（Quirino, Elpidio）在舊金山表示要考慮承認中共。而在蘇聯的提案下，中華民國政府在聯合國安理會的席次有可能被中共取而代之。美國駐聯合國代表聲明，如果安理會有七國多數接受中共取代現有中國代表團，美國也將接受；但現在會對蘇聯提案投反對票。

蔣公那時正在大溪行館，我正爲這個消息焦慮不安，黃少谷打電話過來了，他要報告的是另一個壞消息。黃少谷好像不願太多人知道似的用英文說，吳國楨因爲省府廳長人事問題，繼前次因用人不當遭抗議而請辭省主席後，第二次辭呈又來了，這回還是同樣問題，台籍立監委及國代甚且要求派台灣人出任省主席，要我向蔣公轉達。

蔣公正在行館的陽台坐著。我一五一十地把整個情況向他報告，他只是傾聽，沒有表示任何意見。我可以感受得到，大陸淪陷對蔣公而言，是很大的打擊，他的意志力是堅強的，但他對當前情勢的艱險了然於胸。

這天，爲了接待來訪的美國無任所大使傑賽普，吳國楨應蔣公之約到大溪來，他早到了幾分鐘，就先到我的辦公室坐坐。吳國楨一進門就連聲說：「難辦！難辦！」我知道他指的應是省府人事問題。吳國楨深覺自己進退維谷，處事惟艱。

我的心情非常沈重，因爲全國熱烈希望美援，但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在先一天的演講內容，好像中華民國政府已經不存在似的，對中共獻媚。而最壞的是，我們對國人的宣傳竟然是以「美援將至」作爲打氣的法寶！和吳國楨談起美國態度，他回答：「簡直又上了他們一次當！」

十五日，草擬白皮書的美國無任所大使傑賽普抵台訪問。傑賽普在美國駐台代辦師樞安（Strong, Robert C.）②的陪同下，密集拜訪國民政府高層。我想，他來此的主要目的在於了解台灣現況，能不能撐得下去，以作爲美國進一步措置的參考。

傍晚，傑賽普拜會葉公超。他關切六十多萬名部隊撤退來台後，恐怕會引發本

島嚴重的經濟負擔，而且台灣「島上居民」能否與遷台的國民政府充分合作，也是問題。葉公超回答：「政府對於台灣原有居民絕對沒有歧視壓迫問題，而一般大陸來台人民對於所謂『台灣人』，也沒有社交上的階級區別，『台灣人』的地位，絕不同於黑人在貴國南部的地位。現在台灣農民的收入及待遇，並不會比日據時代低，而且自從三七五減租實行後，大半農民都感受到好處，這點閣下可到鄉下去問問農民便知！」③

葉公超接著說，最近省政府改組，已有台灣人參加，且身居決策要職。至於軍費方面，葉公超承認問題確實很嚴重，政府正在研究嚴格緊縮軍政費方案。

傑賽普與葉公超談了許多實際問題，次日與蔣公見面時，卻是禮貌應對，不著邊際地談了些日本見聞。蔣公問他，對中國時局有何看法？他回答，他不能發表任何意見，而美國的意見在過去幾次宣言都已經談過了。蔣公說，中國問題不僅是中國自身問題，實在也是遠東問題、全世界的問題，假使任共產主義在中國猖獗，必定會蔓延到其他地方，最後會危及世界各國。蔣公希望傑賽普把此意轉達給杜魯門總統，儘速制止共產主義的蔓延，傑賽普回答他會轉達。④

事實上，我對傑賽普大使來台，原本就沒有期待他會爲如此惡劣的局勢帶來什

壓新希望；而且不到半年以前，在他主持下完成的白皮書才給了風雨飄搖中的中國重重一擊。

在屬於美國國務院那邊的中國事務官員眼中，對於蔣公主政下的中華民國政府，他們不單是不願支持，甚且流露出鄙夷的情緒，而有另立政權的想法，從師樞安與外交部陳岱礎司長的談話即可見得。⑤

師樞安 vs. 陳岱礎：台灣自治問題

傑賽普離台後，十九日中午師樞安應召到外交部，外交部北美司長陳岱礎奉部長之命要和他談促李宗仁返國之事，因為李宗仁如繼續滯留在美，則內閣難以改組，兩人隨後談到兩岸的局勢。師樞安解釋，艾奇遜宣稱希望中國有第三方面力量興起的說法時表示，這是一種長遠的看法，因為美國認為中共在大陸無論武力及行政上的控制都已甚為穩定，但人民對共產制度並不滿意，同時非常厭惡國民黨政府再回到大陸；這樣的「第三方面」現在並沒有力量，當然無法推翻共產黨，但是中共政權未來必被推翻，就有如中共推翻國民黨政府一樣，不過恐怕整個過程約需十年至二十年。

「所以，在中共尚未被推翻之前，美國政府認為最重要之事在於了解中共控制下的實際情況，同時要與中共控制地區取得一種關係！」師樞安說。因此他認為美國最後還是會承認中共政權以取得如此的聯繫，而承認中共也是基於反共的長遠觀點。他又說，美國希望我政府自身保衛台灣，但現在政府中多數人士有種反攻大陸的心理，這種心理絕對無濟於事而且很危險，大陸人民並不歡迎國民黨，加上台灣自身安全已是嚴重問題，更不要說反攻大陸。

陳岱礎問，台灣自身安全問題指的是什麼？

師樞安說，是經濟問題。台灣現在養兵六十萬，不單造成嚴重經濟負擔，而防守台灣也絕對不需要如此大軍。他同時指責國軍將領為保持地位往往不願犧牲自己部隊。他說：「在任何近代國家的歷史中，從來沒有在遭受重重失敗後，仍不肯更換人事的！」這位美國代辦點名湯恩伯，說過去已經一再證明湯的無能，但這位將領仍然大肆活動，現在據傳將出任要職。他以此為例認為美國即使派顧問來也沒有用，因為政府若真上軌道，就根本不需要美國顧問。

陳岱礎回答，自從白皮書發表後，美方常指摘我方用人不當，但是指摘容易，要真的實行就很困難，且在國家危難之際，起用新人也得慎重考慮。

師樞安說，過去他曾遇到若干才能之士，卻沒有機會為政府効命，而一般黨政元老的思想已不能迎上新時代，卻仍占據重要地位。他接著提到吳國楨，指吳雖然受命出任台灣省主席，卻沒有獲得實權，在主政時處處受到牽制，他預料吳國楨的執政必然失敗，但絕非吳本人之過。

他又談到中央及台灣省政府之間的問題：「中央與省府機構重疊，省府無權過問中央之事，但龐大軍費卻須由省方負擔，這樣的情況絕非台省人民所願。如果中央與省機構合併，則不但行政可以簡單化，即使台灣人民也可以過問台灣之事。」

接著，師樞安慎重地提出一個問題：「假定台灣自治使中央政權結束，這樣的情形如果發生的話，你們各方會有怎麼樣的反應？」

陳岱礎回答，如果真是這樣，恐怕會更降低淪陷區自由份子的意志，更打擊抗共人士，至於在國際間的反感，師應該很清楚。

師樞安說：「本人以為台灣如能脫離大陸，美國方面一般觀感或將較好。現在中央始終不能脫離大陸觀念，殊不知所謂反攻大陸一辭在國際間的反應甚壞。」他認為，以台灣當前所面臨的情況，我政府應該不要再做什麼計畫，並且要去除反攻心理專心經營台灣，否則台灣恐怕會在六個月之內出現危機。

師樞安早在傑賽普到訪之前，就曾與台籍人士許丙、蔣渭川等人密切聯繫，頗有扶植台灣獨立運動或使台灣脫離國民政府的企圖；而我直到近幾年美國政府相關檔案解密，才知道師樞安等人當年也與孫立人多方接觸，兵變的可能性也不小。

傳言蔣公於日本置產

各種謠言紛飛，被師樞安指為無能的湯恩伯就鬧出一個影響民心的謠言。

二月二日，路透社自東京報導，蔣公「透過一位中國高層官員在日本東京近郊買了棟有二十二間房間的華宅」。這是絕對錯誤的消息，我奉命向東京查究，否認了此報導。駐東京代表團團長朱世明覆電說，確實有個中國外交顧問花了三萬美金買了那棟房子，此人為王文成，是湯恩伯向蔣公介紹派到駐日代表團擔任編制外顧問，王文成已經向朱世明承認，他是代湯恩伯準備的。

湯恩伯在一九四八年底舉報了曾對他有恩的陳儀意圖投共，其後奉命防衛上海、金廈。政府遷台後沒多久，他以召募日籍志願軍為由，沒透過外交部門任何安排，買了機票就企圖赴日，因未獲簽證在機場被攔住。湯恩伯在國家危難之際卻有此舉措，蔣公因而在得知他在日購屋的隔日，就下令管制所有官員出國，這也是政

府嚴厲管制出入國境的開端。至於湯恩伯，蔣公未再用他，後來也僅予戰略顧問虛職。一九五四年，湯恩伯終因胃疾赴日就醫，旋即病故。

關於在日置產的報導是冤枉了蔣公，但是蔣公先前在中共及桂系的壓力之下走投無路，確曾考慮赴日的可能性，不過他的動機並非有如李宗仁或湯恩伯般，想避難國外。

蔣公下野後，一九四九年四月間，我政府派出和談代表團在北京與中共談判時，共方堅決要求蔣公離開中國，而李宗仁這邊也是一樣，認為蔣公若不出國，和談就不能成事。四月十七日上午，蔣公在溪口接見了駐日代表團團長朱世明，朱世明辭出後告訴我，蔣公除了指示接洽聘用日本教官事宜外，也談到自己出國的事，說是打算在適當的時機到日本小住，要他安排一下。

我沒想到蔣公真的有出國考慮，對於蔣公指示朱世明安排赴日，我那時認為蔣公之所以有出國的念頭，可能是想到如果政府萬一和中共和談成功，形同投降，到時他就不便在國內居住了，要不然就可能是蔣公想親到日本共商反共大計，並且親邀日本教官來華協助練兵。

隔了一個多月，朱世明來函除報告了日本教官聘用等問題，也在信中特別提

到，已在箱根為蔣公找了一處宅第，是前閑院宮親王故邸，價格約為一萬五千美金。我對照蔣公回覆李宗仁函的內容後，有這麼的想法——如果中華民國覆亡的話，這該是蔣公最後的退路了。不過，蔣公一直沒有要朱世明買下那棟住宅，以後也誓言大陸未光復前，絕不離開台灣。

代筆批示公文

丟了大陸，蔣公心頭的擔子更為沈重，他連批閱公文都覺得是個負擔。二月間，他指示我，今後把公文唸給他聽，他口述批示內容，然後由我當面批在公文上。也就是說，以後呈給蔣公的公文，公文上的指示文字就是我的筆跡。

此事影響至大，也會使我遭人猜忌，我馬上打電話給經國先生及黃少谷，把蔣公的意思告訴他倆，經過一番研究後，決定召開業務會報進行討論以釋眾疑，會報召開後，由我在公文上批示的作法就此定案，以後還有幾任機要祕書也循例這麼做。

蔣公授命我向他口頭報告，他口述要旨後由我代筆批簽的作法，並不尋常。三月復行視事後，蔣公發布我出任總統府機要室主任，王世杰則接替邱昌渭出任總統

府祕書長。王世杰隨後約我晤談，我把總統府內部的情形告訴他，尤其是處理公文方面，王世杰點頭表示了解。

由於職務關係，我的工作更爲繁忙。政府遷台後，我們祕書群先是隨著蔣公住到草山官邸，以後就住士林官邸。住在草山時，車隊總得半小時才能到總統府；在士林官邸，交通時間可以省了一半。蔣公對車上時間也沒打算浪費，我因此每個星期大約有四天與蔣公同車上下班。蔣公坐在右後主座，我則坐在他的左邊，一上車就向他報告當天的各種重要公事，並記錄口授批答；下班再一起回來。在車上有公事就報告，有時沒公事，蔣公就會跟我聊聊。這種機會很多，他談的話題相當廣泛，不過多半還是內政、外交、匪情及國家局勢等等。蔣公會講些他的見解並問我覺得如何，我則回應我的了解及看法，有時和他的意見並不一致，甚至直諫他有些談話不適宜，蔣公度量很大，通常笑而受之。例如，一九五〇年下半年，有次蔣公在國民大會講話，談到反共問題。

蔣公激動地抨擊外界有話指稱大陸民心已經不反對共產黨之說。他話鋒一轉就這麼說了：「即使你們有不同意見，也不反對共產黨了，我還是要反共到底！」

在返回草山官邸的路上，我在車上直接向蔣公說：「報告總統，您剛才在演講

中提到反共那段話，我覺得不妥！」

蔣公專注地看著我：「哦？」

「現在我們在台灣，大家都是追隨您一起反共的，您只講到自己的決心，對於大家的決心，並沒有提到。您這個『我』字，應是『我們』，不是指總統一個人！」

蔣公微笑地說：「對，你聽懂了！」

從一九四八年整個大局變壞開始，我對於當前的困頓思索了許多，以後在呈送公文時，如果有必要我也會加注些意見，蔣公並不會獨斷獨行，對於好的意見他是聽的，他對我主動提供施政意見相當鼓勵，常常就採納了我的建議。

士林官邸插曲

在那段非常時期裡，蔣公夫婦接受了年輕幹部許多意見。現在已開放民眾參觀的士林官邸，看來樸實無華，在當年有個插曲。蔣公復職次日，官邸就在陳誠的指示下，由省政府負責在現地建成。蔣夫人返台前，蔣夫人在俞濟時陪同下看新居，囑咐應在一個星期內裝潢好。八日，我陪著蔣公處理完公事，返回草山後，順道和

沈昌煥、夏功權等人到士林官邸看看。

官邸幾乎大致就緒，但裝潢工程仍在進行，聽說蔣夫人打算在十二日星期天遷入。我們一致的感覺是，官邸實在太過講究了，以國難當頭，國家局勢如此，蔣公如果還住進這麼一棟華宅，恐怕會引起外間譏評，這不論對蔣公的聲望、對國人心理都會產生負面影響。

我們幾個年輕一輩的幹部回到總統府後商量決定，由曹聖芬、夏功權主動上簽呈勸蔣公夫婦不宜在此刻遷入，俞局長及我都在簽呈上連署。到了晚上，夫人召見俞濟時，表明她要放棄遷入士林官邸。我們聽俞濟時轉告後，對於夫人的從善如流非常高興。不過，這僅延遲遷居兩個星期多，由於實際需要，蔣公夫婦還是於三十一日住進士林官邸了。現在看來，所謂豪華，其實不過是做了木工及掛了中國字畫而已。

美暗示欲承認中共政權

復行視事後，閻錫山內閣總辭，蔣公提名陳誠接任，立法院也在八日投票通過。但吳國楨則堅請辭職，蔣公依然婉言慰留，請他打消辭意。

陳誠組閣，政府內部可謂士氣大振，政局雖有新契機，情勢依然危急，美國在外交上仍未給予中華民國政府正面回應；而將於菲律賓碧瑤召開的太平洋聯盟首長會議，雖以反共爲主題，也未邀請我國出席。碧瑤會議原就是由中、韓、菲三國共同發起，卻因涉及承認問題而把國府排除在外，蔣公對此極爲憤怒。

三月中旬，師樞安以致敬爲由請求晉見蔣公，蔣公於兩天後接見他，他確實表達致敬之意，隨後卻以國務院的立場對我政府做了評述，同時他講了「個人看法」，指稱「中共有成爲狄托（Tito, Boris）的可能」。南斯拉夫的獨裁者狄托，雖然屬於共產陣營，但他並未與蘇聯領導者妥協，還與西方國家聯繫，這使得美國政客們大爲讚揚，南斯拉夫因而獲得美國的經援。先前幾天，艾奇遜兩度就亞洲政策發表演說時，也持這個看法，不僅爲過去他的失敗辯護，同樣宣稱希望中共也一如狄托，能夠和美英等國發展出合作關係。艾卿在演說中還不承認我政府在大陸沿岸港口執行的關閉政策，聲稱美國將繼續與中共通商，並允許美國輪船闖關。我懷疑，艾奇遜如此惡劣的態度，可能就是要承認中共政權的先聲。

共軍對台的軍事威脅依舊，而我軍在大陸的大本營西昌也失守了。三月十八日之後，共軍自北、東、南三路進攻，我軍只剩一萬多人，胡、賀決定改由西南軍政

長官公署參謀長羅列負責指揮；二十五日，胡宗南及賀國光的來電報告西昌情況危急，他倆隨即於次日撤離。西昌是我方在大陸的最後據點，失守後就只剩游擊戰力了，我為之黯然。至於羅列，繼續在大陸打游擊四個月，然後輾轉逃回台灣，獲得蔣公的重用。

中共在華南沿海及上海附近集結了數以萬計的兵力及大批船隻，進攻海南島及舟山群島的意圖十分明顯。四月十七日凌晨二時，共軍開始進攻海南島，這座大島易攻難守，幾天之後薛岳的部隊就被迫撤離海口。海南特區行政長官陳濟棠飛來台北和蔣公會商後，決定撤退。蘇聯空軍此刻悄悄駐紮在徐州，四月二日我空軍空襲上海時，兩架P51野馬式驅逐機因此被擊落，有關單位首長在總統府討論後，決定把蘇聯空軍參戰消息公諸於世。由於蘇俄對中共的援助日益增加，繼噴射戰鬥機出現之後，吳淞口外海也發現潛艇的蹤跡，不單威脅舟山群島，且頗有封鎖台灣之勢。

動盪中迎接新生

中華民國此刻亟亟可危，我的次女開元卻在這個月的二十日報到人間。隔了

一、兩天，在同車前往總統府的路上，蔣公突然問：「你太太又生了？」我回答：「生個女兒。」

「唉——」他長嘆口氣：「這個時代——」他欲言又止。留在口中的話該是「你還有心情生兒育女！」

二十七日清晨六點鐘，我突然接到命令要隨蔣公飛往舟山群島。這趟祕密行程極為危險，有遭中共軍機襲擊的可能。上午十點，蔣公僅偕同美籍顧問柯克（Cooke, Charles）及我飛離台北前往舟山群島。我們先是向南飛，再改北向，中午十二點一刻在定海著陸。下午，在司令官石覺的引導下視察防禦工事，島上的戰車出擊道及公路網已興築了三百多公里，官兵士氣極高。晚上，蔣公駐驛在定海島中間一個小農村的舒姓人家農莊裡，前後左右都是四處走動的警衛人員，蔣公住在樓上，柯克則在蔣公對面房間；我住在蔣公臥室的樓下。柯克在二次大戰期間擔任美國西太平洋艦隊司令，退休後轉入美國國際新聞社工作，他因採訪關係和蔣公見面後，蔣公很欣賞他的軍事素養，以顧問任用。不過，周至柔及陳誠都很不喜歡他。

蔣公連續兩天視察軍事部署後，第三天決定返台。他到城內的空軍招待所接見

當地黨政人員及地方士紳，慰勉辛勞之後，上午十點於微雨中起飛，平安返抵台北。這趟舟山行讓我有返鄉的感覺，回到台北就到醫院探視生下開元沒多久的妻子，她這才知道我曾離開台灣三天。

毛澤東間接勸降蔣公

戰爭即將到來的恐懼在台灣四處蔓延，由於擔心遭到空襲，台北街頭突然增加許多準備用來滅火的沙包，不少市民乾脆遷到郊區甚至鄉下居住。美國記者團來台訪問，但他們訪問蔣公的重點在於如果緊急狀況發生時，我政府會不會協助撤離美僑。

在共軍來襲的陰影裡，中央下令地方及勤務機關調集大量船隻。五月十三日，我才從黃少谷那裡得悉是爲了舟山撤退，這麼一來，對民心影響更巨，未來實在難以逆料，大家爲此感到惶惶不安。

外界不知道的是，毛澤東曾在政府來台之初向蔣公勸降，管道是透過降將張治中。

一九五〇年七月二十七日，韓戰開打一個月，蔣公宴請黨國諸元老，我也作

陪。席間，他突然命何應欽報告張治中於三月十六日寫就、七月十九日才送到的來信，我這才知道有這回事。何應欽說，這封有六、七十頁的信是六月十六日發出，夾在西洋雜誌中，郵寄給參謀總長周至柔轉呈蔣公。周至柔交給何應欽，何在十九日收到當天就面報蔣公，蔣公當時拒絕置理，直到現在才指示何應欽在衆人面前報告信的內容。

何應欽說，張治中的信首述他十幾年來對剿共問題認爲應和平解決的見解，並記述他歷次與總裁談話；接著敘述政府失敗的必然性，斥責當時政治的腐敗。信中接著又做雙方軍事力量的比較，然後說明人民解放軍必將攻台，而台灣則無法持守，屆時所有政府方面人士必死無葬身之地。張治中的信裡又說，如果總裁願和，則他可來香港接洽，最後敘明此信是在毛澤東同意下完稿。

何應欽報告完後，陳誠、張群、吳忠信都認爲這應是共軍攻台前的政治攻勢，居正等人則怒斥無恥，蔣公則以革命叛徒稱張治中，指示應予制裁。我可以想像得到，蔣公爲何不願私下接信，而在公開場合要何應欽報告，這是因爲他要扛起復國重任，不願被懷疑曾向中共接頭過，乃至曾有任何投降的考慮。

海南、舟山相繼棄守

在蔣公決定保存實力之下，外島接連棄守。先是海南島守軍在蔣公離開台北那天開始撤退，原有十二萬人，結果大約撤出七萬餘人。海南島撤離後，舟山群島成爲共軍下一個進攻目標。由於俄國空軍在距離舟山群島僅僅幾千公尺的杭州、寧波等地建立空軍基地，完成後會使舟山群島失掉空軍掩護，蔣公終於決定撤退，經國先生親自代表蔣公接運，又把十五萬部隊連同裝備全部安全撤出。

舟山撤退後，金門及馬祖群島岌岌可危，是守或撤的爭議逐漸浮現。諸多惶恐、不確定感，直到韓戰爆發才逐漸改觀。

在這段晦暗的日子裡，並非沒有振奮人心的事，那就是蔣公的復行視事。

第十章注釋

①鄭天錫於中央斷交後，留居英倫未歸，一九七〇年於倫敦病故，享年八十七歲。（傳記文學，劉紹唐主編：《民國人物小傳》）

②師樞安為Strong自取的中文名字，近年來多譯為史特朗。

③周氏錄於民國三十九年日記。

④同前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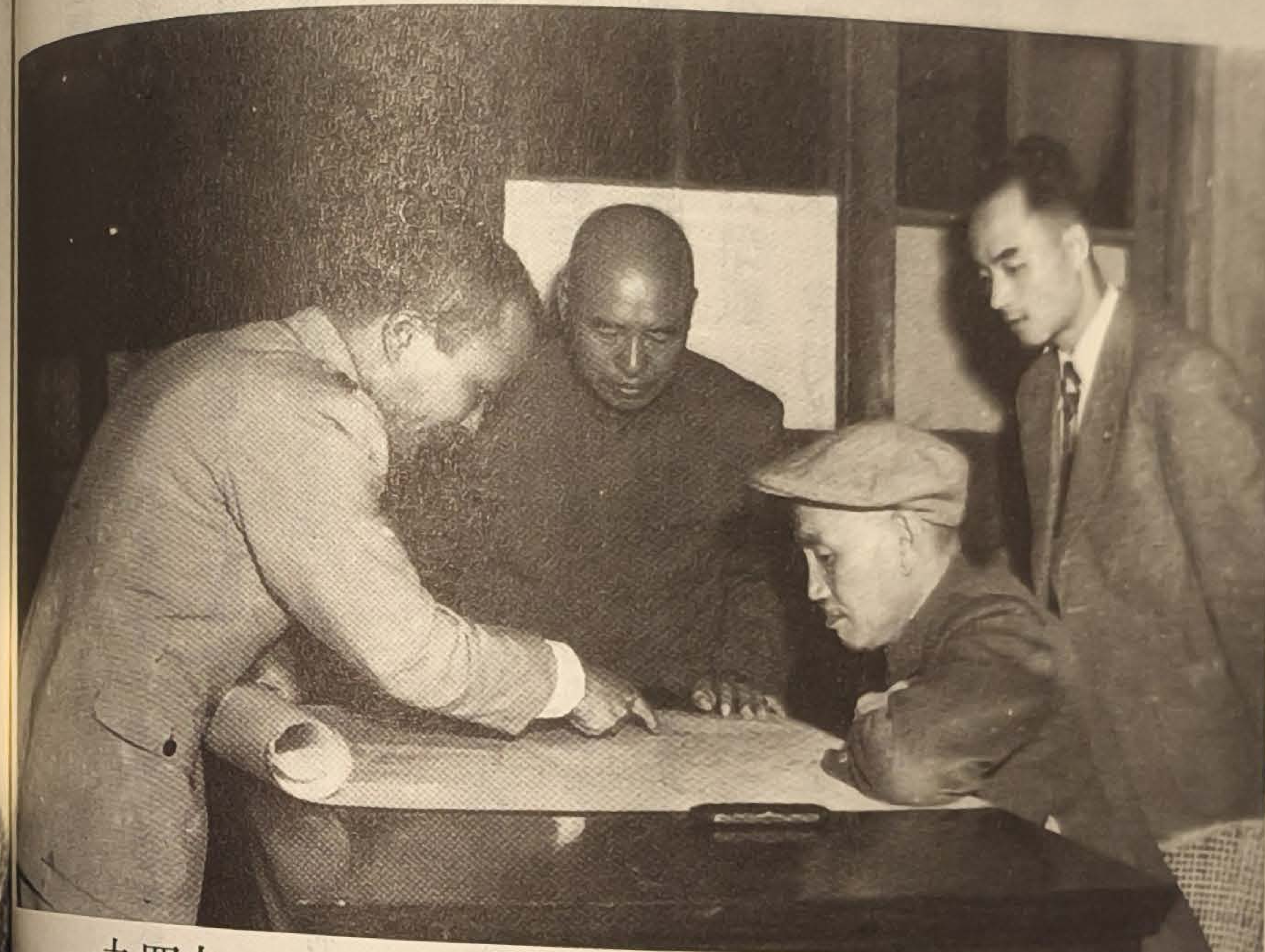
⑤陳岱礎與師樞安的對話，存於周氏民國三十九年日記。這次韓戰前的對話，師樞安可謂清楚表白了美國國務院當時對中華民國情勢的看法及立場。



碧瑤會談。一九四九年七月，我（左三）隨侍蔣公訪問菲律賓，與菲國總統季里諾（左二）等人會面。



蔣公訪韓，會見該國總統李承晚（前排右四），我（最後排左三）亦隨行，時為一九四九年八月。



一九四九年局勢急轉直下，蔣公親自督軍，我（右一）隨蔣公於太康艦上。



湯恩伯。大陸淪陷前，他是東南各省防務的重要將領。（黨史館藏）



白崇禧。從抗戰到剿共，他是桂系核心人物之一。（黨史館藏）



一九四九年我（左一）與經國先生（左二）巡視秦皇島前線，此島隨後失陷。



戰事節節失利，蔣公親赴重慶，於林園官邸接見雲南省主席盧漢（左），張群（右）陪同。（黨史館藏）



首次黨改造會議於一九五〇年七月二十七日召開，蔣公親自主持，經國先生（右二）、張其昀（右三）與會。（黨史館藏）



我駐美大使顧維鈞（左二）於同年八月返國述職，陳誠（左一）、張群（右一）、王世杰（右二）接機。（黨史館藏）



一九五〇年元月十三日，蔣夫人（左，受花者）滯美年餘後返國，蔣公親自接機。（黨史館藏）



舟山群島部隊撤守，經國先生（右）親自登艦迎接。（黨史館藏）

第十一章

棄職與復職

蔣公復行視事，是在幾個主要盟國紛紛放棄中華民國，而中共又積極準備「解放台灣」之際，毅然挺身而出的。然而即使這樣，藉口治病躲到美國的李宗仁，依然只想到自己的名位問題，不斷掣肘。

徐蚌會戰慘敗，要求蔣公下野的呼聲四起，以主和的桂系尤然。桂系的求和思考，固然是因應局勢，另方面也有爭權的暗潮。但在求和失敗後，李宗仁就顯得進退失據。

蔣公於一九四九年十一月應李宗仁及各界呼籲，赴重慶力挽狂瀾。然而，滯留

廣西南寧的李宗仁卻沒有一如自己所言到渝。蔣公先後幾次促李宗仁回渝共赴國難，包括透過白崇禧轉信在內，但他幾度推拖，就是不肯回來。

李宗仁稱病赴港飛美

十一月十九日，香港方面傳出李宗仁赴香港之說，我心想身為代總統，不可能如此，這個消息應該不可靠，然而二十日就接到確切消息。這天下午一點鐘，白崇禧親自到渝晉見蔣公，送達李宗仁函。函中聲稱：

「……幸承電促返，本應即日就道，惟以自海口抵邕，胃疾突發，十二指腸有流血癥象，精神至感疲憊，因決定於本日赴港轉美檢驗，必要時施行手術治療並藉此探詢美方對華之眞實態度，局勢嚴重，不敢自逸，仍當於最短期內歸國，知荷廑念，特請主任鶴齡（李品仙）兄來渝晉謁，面報種切，中樞軍政已函百川，兄請就近請示處理矣。」①

白崇禧告訴蔣公，李宗仁確實有病，但他事先不知道李會這麼做。白崇禧並請

蔣公復位，他堅決反對由閻錫山代行職權，認為閻沒那個能耐。不過，由於李函及後來發表的談話都沒有表示願意退位，白崇禧二十一日返防，臨行前蔣公告訴他，目前不考慮復位。蔣公並說，李宗仁即使要出國，也應該先返渝安排代行職權之事，部署妥當，循外交途徑安排好出國行程才對。

白崇禧提改組行政院的建議。蔣公回答，那也應該請李宗仁返渝從長計議。蔣公對於李宗仁棄國赴港，又稱要到美國就醫極為痛心，覺得有辱國格，深覺當初下野時所托非人。

李宗仁抵達香港之後態度數變，起初解釋到香港的理由是與蔣公之間政見不合及蔣公行將復職；隨後於二十四日再致蔣公一函，函中堅決表明要赴美治療胃疾。二十五日，吳國楨陪著美國共和黨參議員諾蘭（Knowland, William F.）夫婦到重慶謁見蔣公，當晚吳國楨與黃少谷同室，陶希聖、曹聖芬、沈昌煥及我都到他倆的臥室長談。黃少谷說，他從香港帶回李宗仁的意見，這位代總統除了堅持一定要出國外，又明白表示反對閻錫山代理，宣稱情願放棄代總統的地位請蔣公復位。

二十七日下午，重慶中央黨部召開臨時常會，決議以當前國家局勢嚴重、西南戰況危急，中樞不可一日無人主持，因此「切望李代總統宗仁同志迅返中樞力疾視

事，萬一為病勢所不許，再請總裁復行總統職權」，臨時常會並推派朱家驊、洪蘭友前往香港向李宗仁轉達此意。到了晚上，蔣公收到白崇禧的一通電文，轉達李宗仁「決心解除代總統職務」的訊息，內容如下：

> 重慶總裁蔣◯　頃奉代總統函諭十二指腸潰瘍，亟需到美根治，恐需相當時間療養，當此國難空前嚴重，國政須人主持，決心解除代總統職務請鈞座復總統職，振作軍心挽回劫運，並懇鈞座轉外交部，迅速代辦出國手續，俾得早到美國醫治等。因香港情形複雜，代總統不宜久居，望鈞座設法完成其志。……②

李宗仁一到香港就堅持赴美，居正、朱家驊、洪蘭友及鄭彥棻攜蔣公親筆函赴港勸他都沒用。但是李宗仁請外交部協助代辦赴美手續卻碰了釘子，外交部長葉公超說明，元首出國有實際的程序，不能說走就走，在未得各方包括美國同意之前不敢代辦出國手續。李宗仁則強硬回說，他心意已決，任何人不能阻止。葉公超感到為難之下，避而不見。

李宗仁赴港對外宣稱是胃疾，實際上他跟洪蘭友等人談話時，卻對局勢語多憤

慨，聲稱他回渝不僅於事無補，只是徒然礙事；又說這大半年來，國事從來未能眞正負責，人人也不以元首看待他，所以他絕不返渝，葉公超不代辦出國手續，他只好找外國人辦，以私人身分出國也沒什麼不可以。後來他囑咐他的個人代表甘介侯在美國辦理，甘介侯倒是知道元首出國必須依外交途徑，所以請顧維鈞向國務院提出。國務院研究後，遲延了好一陣子才命令中國遠東司長答覆：「此事尚待請示。」

美國冷淡的態度對李宗仁的刺激不小，因爲他到美國就醫的想法，據桂系內部傳出是出於自己的衝動，並沒有和左右商議，而且那是他考慮的唯一出路。外界一度傳言是李漢魂的主張，但李宗仁親自否認說，李漢魂絕對沒有做「如此愚蠢的建議」。後來，李宗仁告訴朱家驊：「健生（白崇禧）不贊成，但我有我的自由！」③

復位與否呈兩派意見

然而，美國終於准許李宗仁赴美，恰好就在蔣公正要決定是否立即復位救亡的關鍵之際。李宗仁先前透過白崇禧表達解除代總統職務、請蔣公復職意願後，第二天得知美國的允准就又變卦了。李宗仁以親筆函致蔣公，函中宣稱，他考慮再三，

決定「毅然」赴美，「在私爲根治舊疾、在公則實欲藉此爭取美援以期能解除今日我財政上之極度困難」。也就是說，他還是要以代總統身分赴美，但多了個堂皇的理由——爭取美援。這封十二月一日寫就的信，次日由朱家驊、洪蘭友帶到成都，此刻重慶已然陷落。

朱家驊、洪蘭友認爲，這是因爲美國國務院准他入境後，使得他的態度再硬了起來，又以自己僅是「短暫出國所以不辭代總統」而推翻前議。朱、洪兩人向蔣公報告，經過南寧時他倆曾經與白崇禧晤面，白崇禧僅表示李宗仁這樣的態度不好而已。

在收到此信之前，蔣公原先是打算順應各方要求復行視事的，因爲不僅是李宗仁，黨內多人反對由閻錫山代行政事，另方面總統缺位也會引起國際間誤認中央政府已經崩潰，而以此作爲承認中共政權的藉口。但是，復出的時機與方式則頗費思量，須待李宗仁的明確表示放棄繼續代理，沒想到李宗仁先是棄國家於不顧，堅決去國之際又抓著名器不放。

晚上，張群、陳立夫及閻錫山在蔣公住處研商此事，三人都主張蔣公應立即復位，不要讓李宗仁以代總統名義赴美招搖。但是經國先生、陶希聖、沈昌煥和我一

起談這個問題時，則是反對蔣公立即復位，我們這些屬於年輕一輩的幹部認為，如果一旦復位的話，則必須為整個變局負責，政府如果遷台，就剛好中了桂系製造蔣公放棄大陸的謠言，要擔負所有大陸失敗淪陷之咎了。雖說如此，以後不論中外，史家仍把丟掉大陸這筆帳算在蔣公的身上。

次日上午九點，蔣公把陶希聖找去，把昨天與張、閻等人的談話結果告訴他，並且囑咐立即準備一份復位文告，明天與閻院長的文告同時公布，宣布復職。陶希聖聽了蔣公之言，沒有像往常一樣二話不說馬上就辦，反而顯得猶豫。蔣公問有什麼意見？陶希聖於是請求同時約見黃少谷，兩人向蔣公共陳即時復職的利害，主張從長計議。蔣公說，當時總理要討伐陳炯明時，就因為諸位幹部遲疑不決以致發生砲擊觀音山之事。但是他仍然接納陶、黃兩人的異議，決定再議。

接著，中央所有首長及幹部齊集官邸討論，大多數的意見仍是蔣公應立即復職，不能讓李宗仁以代總統名義出國，有失我國家民族的體面；經國先生及我們這些總裁辦公室的成員繼續力主應暫緩復職。晚上八點，國民黨召開臨時中常會，常會維持上次會議原議，催李宗仁返國並請蔣公立即準備復位。

出乎意料之外，李宗仁的總統府祕書長邱昌渭也對李的行徑極為憤慨，堅決主

張蔣公應該復位，強調不能以國家名器做任何個人在國外的護身符。

十二月五日，李宗仁搭機前往美國。不論黨國大老、桂系或中央民代，各界幾個月來不斷籲請蔣公復職，此時更切。

政府七日遷台之後，情況又改變了。蔣公當時仍在成都，先前極力主張蔣公復職的洪蘭友來電指出，他與幾位黨政人員討論之後，認為復職時期「似仍俟李代總統抵美後視其動態與表示如何，及美國朝野之反應如何，再做決定較為周妥」。

接著，鄭彥棻也來電轉述司法院長王寵惠所堅持的觀點，是基於洪蘭友前電的理由，總裁此時仍以不行總統職權為宜，以免遭受不可避免的誤會，致自損威信，於第三次世界大戰發生時無人領導中國復興工作；如果必須籲請總統復職，則由互選產生之立、監兩院院長具名較安，至於行政院長及司法院長都以不列名為宜。我把這通電文呈閱之後，蔣公對王寵惠的意見很重視，復職之事也就暫且擱下。

二十日，李宗仁拍發電報給台北，經當時身分仍為總統府祕書長的邱昌渭轉交給蔣公，電報很簡單：他施行手術經過良好。蔣公則是由外交部代為拍發一通「知悉並祝早日康復」的電報，給駐紐約的總領事張平群代轉。

李宗仁滯美不歸

一九五〇年初，台灣深陷在可能遭「解放」的恐慌中，蔣公尚未復職，李宗仁則繼續滯留美國。一月十九日，外交部北美司長陳岱礎奉葉公超之命與美國代辦師樞安談李宗仁回國問題，這也是前面所提的那次晤面。那時，李宗仁因手術復元良好而離院，並且「指示」桂系軍人李品仙④也到美國來。

陳岱礎先敘明請李返國的重要性：「現政府為加強機構、準備改組內閣，但根據憲法規定，行政院長須代總統提名，而李代總統現在美國，以致無從著手改組。希望閣下轉達國務院，設法使李代總統早日回國，促成政府改組，加強國內團結。且李代總統離開醫院以後，倘遲不返國，與美官方人士有所接洽，即使是美國亦有不便之處。」

師樞安回答：「昨日桂宗堯君至本人處，帶來李品仙將軍之護照及信件，請予簽證，本人已電國務院建議暫時勿予簽證，並請國務院探詢李代總統是否擬於短期內回國。如李代總統擬於一、兩星期內回國，自毋需派人去美，因此時派李品仙去美，將引起中國國內騷動，而美國社會印象也將會誤解美國政府故意留李代總統在

美。如李代總統出院後一、兩星期仍不回國，屆時擬再予李品仙先生簽證。」

陳岱礎說：「李代總統出國時，係由葉部長給予自由旅行證件，而由閣下給予簽證，上面曾經載明是出國就醫。政府對李代總統在美不歸極感焦慮，又以李代總統對美國的態度或另有其觀感，而多所滯留；希望美國方面有所表示，以便使他早日回國。」

師樞安說：「本人願坦白相告，李代總統出國時，美國方面並不歡迎，後因他是出國治病，也就未便拒絕。在他留美期間，美國官方絕未予以任何鼓勵，假使李代總統具有智慧，美國對他的態度如此，他應當會體察得到，但他於出院後一再易地休養，美國也無法向他表示應離開美國，究竟他是一國的元首，他的行止得由他自行決定。」

陳岱礎再次促請師樞安了解，當前我政府內部的團結十分重要，請國務院設法請李宗仁返國，師樞安回答，一定照辦。

政府遷台後，監察院從一月起就兩度致電李宗仁，敦促他返國共赴國難，他都回電明確表示不擬返國，理由是：「在此留醫期間，除施行手術之三數日外，對府院各方所來函電、府院命令，均親自批閱，照常公布，並未因病而受絲毫影響。至

於執行部分，係由行政院負責處理，故不特府務無廢弛之虞，政務亦無中斷之虞。」⑤李宗仁甚至宣稱，他留在美國可以爭取美援，所以不回來。

由於李宗仁滯留美國不歸，台灣各界紛紛譴責。二月十七日，李宗仁主動與孔祥熙見面談話後，他的私人代表甘介侯十八日又找上孔祥熙。當天孔祥熙自紐約致電給蔣夫人，把整個情況報告了。

孔祥熙在電文中說，李宗仁近日接到中央非常委員會及監察院等單位的不返國即應辭職電文，而白崇禧等也有同樣目的的電文給李，李宗仁認為必定是有人指示才會如此。甘介侯透過孔祥熙傳話說：「李接任時是代理總統之職，並非代理蔣先生，因蔣先生曾數次明白表示辭職下野即為一普通公民，而在憲法上李已經成為合法的代總統，即使因病辭職，也應由行政院長暫代，三月後再開國民大會重新選舉，故若台灣過於為難，則李將公開發表指摘現在台灣之政府及將成立之軍政府皆不合法，違反憲法。如此必使華府反對援華者多一藉口，對公對私皆不利。若蔣先生欲復職，應停止一切惡意攻擊，而以溫和語氣來商洽，則李願意對外宣稱當時是代理蔣先生職務，今因病不能返國，即請蔣先生復職，李仍任副總統。」⑥

各方籲請蔣公復職

當時台灣已四面楚歌，如何能控制朝野對李宗仁棄國避禍怯懦行徑的不滿？台灣需要一位有擔當的領導者即刻站出來穩定大局，對國際宣示中華民國依然屹立。蔣公當即決定儘速復職。

各方籲請蔣公復職以解決中央無主的困境已沛然成川，二月二十二日，陶希聖及王世杰開始草擬文告，國民黨中常會二十三日通過決議，以局勢益加嚴重，請蔣公儘速復行視事。決議文如下：

「李同志既以健康復不克遽行回國，而總統去年因故不能視事之原因又經消失，允宜本救國救民之夙志，返主中樞共圖安攘，本會認為事機萬急，不容再計，應依照去年十一月廿七日及十二月三日兩項臨時會議之決議，請 總裁復行視事，繼續行使總統職權，以挽此危疑震撼之局面……」⑦

非常委員會隨即致電李宗仁，如他再不返國，就要依中常會於去年底的決議，

請蔣公繼續行使總統職權以維持大局。二十六日，張群、黃少谷、王世杰、洪蘭友等人分別就蔣公復職事與桂系接洽，我聽到回報過來的消息是，李宗仁已不堅持他對孔祥熙談話時的想法，不過他要求護照上的名義及旅費等。然而，蔣公將復行視事的消息見報之後，還是刺激了他。

這天晚上，蔣公夫婦約官邸工作人員及眷屬聚餐，光潤因爲身體不便沒有參加。席間黃少谷報告他與邱昌渭等桂系官員的接洽情形，並且詢問蔣公，復行視事時間是否定爲三月一日？蔣公回答可以。復行視事就此定案，我們都舒了一口氣，覺得在絕望裡又出現了一線曙光。

籌備蔣公復行視事事宜，黨政雙方都很忙碌。在百忙中，我們還是期待著李宗仁表達辭代總統的來電，但始終未得。二十八日上午十時，蔣公邀集張群、陳立夫、陶希聖、谷正綱、黃少谷等討論復職文告的文字及內容，決定三月一日到府視事。下午二時，中常會在台北賓館召開，對復職事做最後討論。

此刻，復行視事這個重責大任，讓蔣公覺得不勝負荷。他在會中感慨地說，過去一年來，他的健康表面上看似一如往昔，但記憶力已大不如前。

眾人發言後，蔣公最後說：「我們必須和衷共濟、精誠團結，才能勉強度過難

關！」

蔣公返回草山官邸，晚上九點我把復行視事文告交給中央日報印刷傳單，準備次日同時向大陸同胞散發。然而半個小時後，卻接到顧大使自美國發來的電報說，李宗仁約晤杜魯門，杜總統預定三月二日中午與他共餐，並由其顧問甘介侯作陪。我當時對杜魯門這個餐敘的解讀是，杜魯門不支持蔣公爲了力挽狂瀾而在台灣復職；但此刻美援早已不繼，杜魯門的態度如何已不在考慮之列了。

不過，由於杜魯門邀約李宗仁共餐，蔣公爲了讓李宗仁不致爲難，在復行視事前幾個小時，也就是一日凌晨三點二十分，特別令我將先前預擬的致李電稿再做修正，賦予李宗仁訪問美國朝野的使命。這份電稿在七小時後，也就是蔣公正式視事之後就拍發出去。電文如下：

李副總統德鄰吾兄勛鑒：

自兄以胃疾出國就醫，瞬已三月，各方佇候言旋，中正企望尤切。而兄以健康未復，歸期難定。乃者史毛盟約宣布，國家危難日深，人民望救益急，中樞軍政不能久失秉承，在此憂危震駭之中，群情更責望於中正之一身。茲爲遵循民意，挽救

危機，乃於三月一日復行視事，繼續行使總統職權。一年以來，我兄代主國政，宵旰辛勞，公私交感，無時或已。今雖養病海外，固知憂國之殷無間遐邇，亟望早告康復，並請代表中正訪問美國朝野後，從速命駕返台，共濟艱危，藉匡不逮，敢佈胸臆，無任神馳。

蔣中正寅東⑧

宣布復行視事

天亮了。三月一日上午十時，蔣公在總統府宣布復行視事，包括白崇禧、李品仙等桂系將領在內，都來參加儀式。國內反應熱烈，美國的態度則在一日之間迅速轉變。

據顧維鈞的報告指出，杜魯門二日接見李宗仁並共進午餐之前，先是於答覆記者詢問時表示，他所以邀「李將軍」午餐，是因爲李是中國總統；到了傍晚這段談話由國務院發言人聲明更正，宣稱國務院已接到正式通知，蔣先生已復總統職，美國政府承認蔣先生爲中華民國政府領袖，至於何人爲總統的問題，應由中國政府決定。白宮發言人說明，杜魯門總統沒有打算在記者會上解決承認誰是中國總統的重

要外交問題，杜魯門總統僅要表明，當初邀李將軍晤面，是因爲他的代總統身分，蔣先生復職尚未成爲問題；且午餐純係交際性質，並沒有談到政治問題。

二日上午，蔣公收到李宗仁自塡於「二月二十八日」自紐約的來電，實際上以他發出電文的時間推算，他應是倒塡時間，希望阻止蔣公復職。電文是這麼寫的：

草山蔣介石先生惠鑒：

弟以胃病嚴重，來美割治而出國。未久即聞不肖之徒慫恿先生乘間奪取總統職權，雖傳者異口同聲，而弟基於法理人情頗難置信。現弟休養期滿準備返國，今日報載忽有先生將於三月一日復任總統之消息。查先生於去年一月二十一日宣布引退，弟即依法執行總統職權。憲法上所謂代理者，係代理總統職權，而非代理個人；先生引退後已爲平民，與總統職權已無關係，有何代理可言？故先生非經國民大會之選舉，決無再任總統之任何法律根據。而弟所代行之總統職權非經國民大會之罷免，根據法律任何個人或機關均無權撤銷。先生此種舉動不惟國憲所不容，且爲世人所不齒。際此國家命脈不絕於縷，先生一念之差，安危所繫，袁世凱破壞約法之殷鑑至可警惕。弟爲維護此艱難締造之根本大法起見，不能不代表全國人民向

先生提出嚴重警告，敬希懸崖勒馬，免爲千古罪人，國家幸甚。

宗仁丑儉（按：二月二十八日）⑨

李宗仁顯然心有未甘。他在十二日接受美聯社訪問時說，中國人民即將起而推翻中共及蔣介石政權，中共獲得政權並非共產主義之功，實因蔣介石政權腐敗至極所致。李宗仁並告訴美聯社，二次大戰把蔣介石自日本人手中救出，目前蔣氏希望美蘇發生第三次世界大戰，以期再得救。他又說，他目前仍有「忠烈的支持者」張發奎將軍，並請張在廣州發動地下工作。二十一日，李宗仁又在紐約聲稱，他將於最短期之內返國，組織第三集團，以反共及「反蔣」；同時他也將在廣西四圍地區，領導五十餘萬桂系游擊部隊，至於先前向共軍投降的二十萬桂系部隊，純粹是因爲對國民黨政府不滿所致。

不過，曾擔任陸軍總司令、滯留香港的張發奎，隨後發表聲明否認此事。李宗仁的行徑連白崇禧都反對，白沒多久就去信規勸，希望他不要再做親者痛、仇者快的事。白崇禧發這封信的同時，也以書面向蔣公報告他的這個動作。

李宗仁終究自取其辱

一九五一年三月四日，我拜訪甫視察美國僑務返國的中央黨部祕書長鄭彥棻。此行他覺得收穫很多，一些過去反政府的旅美人士多已改變態度；而他也談到，他在紐約時曾與李宗仁晤面，當時甘介侯也在座。

李宗仁那時身分還是中國的副總統，首先問候蔣公的健康；爲表達對政府的關切，囑咐鄭彥棻注意美國有人主張台灣獨立接受聯合國托管之議，應設法打消。

接著，就是甘介侯說話了。甘的話裡牢騷很多，說李宗仁所以來美，是爲政府爭取美援，因爲當時美國不願援助蔣公之故。甘介侯說，那時的想法是這樣的，如果李宗仁能夠爭取到美援，蔣公亦蒙其利，如果不能爭取到美援，李宗仁就要邀請蔣先生出來；然而蔣公卻選擇於李宗仁前往會晤杜魯門總統的那天復職。

鄭彥棻說，他那時解釋此乃純屬巧合，因爲決定復職時，還不知道李宗仁要與杜魯門會面的事，而蔣公也很不想復行視事，實乃各方一再敦促之故。李宗仁顯然不能接受如此的解釋，憤慨地說，世上確實有許多巧合的事。由於接近中午，李宗仁留鄭彥棻吃中飯，吃飯時，李夫人郭德潔對政府的不悅顯而易見，很分彼此。

這年下半年，毛邦初案爆發。十一月，李宗仁再次引起媒體注意，因爲他介入毛案，宣稱毛邦初是他任命的，所以聽命於他而非蔣公。然而這等於自取其辱，因爲美國國務院馬上就宣布蔣公才是中華民國總統。

一九五四年，蔣公準備競選連任，李宗仁發表了一封公開信，指摘蔣公違憲。他隨即被國民大會罷免，送監察院彈劾。十年後，李宗仁變節赴大陸，沒多久就遇上文化大革命險些被鬥，後來就病故了。

李宗仁不單在中華民國最危急的時刻走避國外不歸，且在蔣公挺身而出時依舊不忘自己名位，在海外處處掣肘。才遭巨變的中華民國就在如此的混亂及戰爭威脅裡掙扎，直到韓戰爆發，情勢才爲之改觀。

第十一章注釋

①周氏錄於民國三十八年日記。

②同前注。

③同前注。

④李品仙曾任安徽省主席、華中剿匪總司令等多項要職，大陸淪陷前為廣西省主席。以後在台灣於一九五二年退役後，曾任台北市的里長兩年，一九八五年病逝，享年九十六歲。(傳記文學，劉紹唐主編：《民國人物小傳》)

⑤周氏錄於民國三十九年日記。

⑥同前注。

⑦同前注。

⑧同前注。

⑨同前注。

第十二章

韓戰開打

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六日星期一清晨，我照常從家中信箱裡拿出當天的《台灣新生報》，還沒把報紙翻開，一版頭條就立刻讓我完全清醒——北韓部隊在星期日入侵南韓，蔣公已透過外交部向南韓總統李承晚表達關切。這是件大事，我看了報才知道，馬上趕到辦公室。

上午九點，蔣公按既定行程赴革命實踐研究院主持第六期學員畢業典禮後，立即召集陳誠等官員開會，商討韓戰因應措施。蔣公在會議中分析指出，這是蘇聯試圖取得南韓的戰略地帶，以確保其在亞洲大陸的安全；而這也可能是日後一連串侵

略行動的開始。晚上，蔣公在官邸召集軍政重要官員開會，柯克建議派一師志願軍參戰，但因與會其他人的意見很多而無結果。

南韓一向與中華民國維持密切的關係。早在抗戰時期，韓國流亡的臨時政府就在重慶運作；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南北韓隔著三十八度線分治，南韓依然期待中國的支援，即使在一九四九年我政府頹勢已現之際，也是如此。李承晚總統數度派遣密使與已經下野的蔣公聯繫，希望能夠獲得武器方面的支援，但蔣公已是自顧不暇。

駐韓大使邵毓麟於二十六日下午拍發的電報，二十七日清晨收到了。他在電文裡說，美國準備供給南韓十架P-51戰鬥機，但是韓國軍方無人能夠駕駛，而期待我政府派空軍飛行員前往支援。雖然這通電報的內容只是根據情報而非韓國政府的正式請求，蔣公看過這通電報後，就決定支援。他指示我把韓政府缺乏空軍飛行員問題轉達給周至柔總長，並且要我立即把他的意思覆信給邵大使。不過，這時才早上九點多，我們要和韓國方面聯繫，因為必須透過美國電訊系統，至少得等到十一點才行，而依據外國通訊社的報導，韓國首都漢城於清晨五點鐘被北韓部隊攻入，李承晚總統已經撤離漢城，不知是否還連絡得上。十點五十分，漢城與舊金山之間

的連絡中斷，蔣公的電報也就無法發出了。

駐東京軍事代表團團長那時已更換爲何世禮。中午，葉公超向蔣公報告，何世禮來電說，麥帥總部的空軍部門非正式地向我代表團表達，希望調用我空軍驅逐機前往韓國助戰，蔣公馬上同意。韓國的戰況一直很糟，大家心裡都很焦急，直到晚上七點才有些好消息出現。副總長王叔銘來報，美國空軍已經參戰，並在漢城上空擊落敵機四架。

韓戰的爆發，終於點醒美國——共產勢力的擴張及侵略性，可不是「狄托」幻夢就能粉飾的，中國赤化其實是個難以吞嚥的苦果，現在他們要亡羊補牢。

八點鐘，駐台代辦師樞安送來美國政府致蔣公之備忘錄，杜魯門總統改變年初的對華態度，決定派遣第七艦隊巡弋台灣海峽了。這是必須立即回應的事，半個小時後，蔣公邀集高層商討對策，不過那時我已經回家了。

第七艦隊協防台灣

二十八日清晨，我才起床就急著拿報紙。一眼就看到《台灣新生報》一版頭條是：「美國開始行動了！杜魯門昨斷然下令第七艦隊保衛台灣，海空軍支持韓國作

戰，世界大局急轉直下」

我叫醒光潤，把這個好消息告訴她，她睡意全消。我們非常興奮，因爲這意謂今後我國就不再孤立。我急切地往下唸，杜魯門提出的備忘錄全文如下：

> 美國政府對於北韓軍隊進攻大韓共和國所引起之太平洋區域安全問題，其本身在日本之責任及其對於該區和平之一般注意不能予以漠視，因此美國第七艦隊已奉令阻止來自中國大陸以台灣爲目標之攻擊，並已完成必要之部署。
>
> 閣下當能了解，倘閣下所指揮之海空軍事行動，無論其對象爲中國大陸或中國領水中或公海上之航運，仍復繼續進行，則對於第七艦隊所承擔之上項任務自不相容。美國政府因此相信閣下必能頒布中止上項軍事行動之必要命令，藉予美國以充分之合作，美國海軍已奉令執行上項任務一如中國政府業已頒布命令者然。
>
> 美國政府之動機，不但出於其於太平洋區域之和平及安全之深切關懷，並基於其對於中國及台灣人民之未來自由與幸福之深切關懷，此點當在閣下洞察之中。

杜魯門的聲明中，要求我政府海空軍停止對大陸作戰。我不禁感到迷惑，這不

就意謂我們要眞的失去大陸了？還有，台灣的地位又該怎麼辦？不論如何，今天可要忙了，我急忙到總統府。

上午，蔣公召集陳誠、張群、王世杰，繼續商議如何回應美國的聲明及備忘錄，大家都認爲必須在答覆中申述，我們對美國派遣第七艦隊到台灣海峽表達願意合作的態度，但不希望此舉限制我政府一貫的反共政策，同時台灣地位問題仍盼望美國不因前述聲明而有所改變。

蔣公當即指示由外交部起草覆函，表達決定接受美方請求暫停軍事行動，但美方對沿海各離島的防守問題態度如何，仍應澄清。備忘錄由葉部長具名，於二十九日晚面交師樞安。那時除了澎湖、金門、馬祖之外，廣州附近的伶仃及擔杆島、浙江省附近的大陳，都有國軍駐守。

二十九日清晨八點半，突然有大約二十架不明戰鬥機編隊飛臨台灣上空，防空警報爲之大作，我空軍戰機紛紛升空攔截準備應戰，後來才知道那是從第七艦隊航空母艦上起飛的美國海軍戰鬥機，解除警報隨後響起。蔣公抵達總統府，聽取有關部門的報告後，指示向美國提出抗議，以維護我領空權的完整。不過這也告訴台灣上下，第七艦隊已在海峽就位了。

金馬守撤問題

韓戰爆發，美國聲明派第七艦隊赴台海巡弋後，共軍就大量向閩廈地區集中，當時研判可能會進攻金門。金門、馬祖這些大陸沿岸的離島，對台灣而言實在是易攻難防，是否要耗費大量軍力守島，也就成爲難題。美國方面，不論國務院或來訪的第七艦隊司令史樞波（Struble, Arthur），都已明確表示第七艦隊協防範圍只在台澎，金馬等離島不在其範圍內。

金門要守還是撤？如今金門還在中華民國的手中，外界始終以爲這是一九五〇年七月，政府面對此一決策問題時，蔣公堅持把金馬當做反攻大陸跳板，因而幾十年來派駐重軍守住這兩個小群島。事實上，恰好相反。

七月中旬，由於美國明確宣稱第七艦隊不會協防金門，而共軍又在金門對岸加強軍備而有進攻的態勢，這個問題就成爲參謀本部研究的焦點。金門究竟應該挺下去，還是如同舟山群島般立即撤出駐守的精銳部隊？參謀本部十八日召開的會議裡，陳誠、王世杰以及柯克都主張暫緩把部隊撤離，但蔣公堅持應該撤回駐軍，以保全實力。

蔣公以在大陸失敗的經驗，認爲在當前我方攻勢不能執行時，金門孤懸在外，不論增援或運補都很困難；而廈門及福州中共空軍的威脅日增，如果現在不把部隊撤出，以後想撤都來不及了。周至柔也支持蔣公這個見解，所持理由是台灣全島的總預備隊兵力彈藥算起來只有七個師，必須調回金門的精銳部隊，才能對今後戰事有把握。蔣公最後裁示應把部隊撤離，不過要先知會麥帥，聽聽他的意見。這項指示，隨後在以參謀總長名義致麥帥的備忘錄裡帶入，何世禮把備忘錄遞交麥帥。

很奇怪的是，國軍準備自金門撤退這個極機密的消息，美國代辦師樞安沒多久就知道了。師樞安二十二日與我外交部北美司長陳岱礎談話時，就說他已經獲得消息指出，我方將於十天之內自金門撤退。陳岱礎的回應是，不知道有此決策。

二十三日，師樞安奉國務院的指示向葉公超部長做口頭聲明，如果中共向「台、澎以外的島嶼」進攻，美國將不參加其防衛，但美國政府絕不妨礙中國在各島上或由各該島出發的防衛作戰行動；至於轟炸大陸方面，則是另一回事，美國不支持。他說，第七艦隊受命執行協防台灣的條件之一是，中華民國政府必須停止向大陸攻擊的海空軍事行動，且中國也已接受這個條件，如果再有轟炸大陸情事，就是不履行對美國的諾言。

葉公超回答，目前共軍在金門對岸沿海大量集結中小型登陸艇及武裝機帆船總數約在一千三百艘以上，第七艦隊既不參與金門防衛，則中國政府自當採取有效的自衛措施；但如果未來守軍被逼撤出該島時，則海空軍的掩護撤運是必須的。

不過，金門的命運，卻因麥帥的意見而改變。

麥帥訪台

七月三十一日，麥克阿瑟元帥來台訪問。對退守台灣的國民政府而言，他的來訪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

聯合國祕書長賴伊（Lie, Trygve）當時依安理會決議籲請會員國援助南韓，我國起而響應，韓方很是歡迎，但因美國國務院的反對，麥帥也因而未能表示贊同。何世禮於七月四日在東京與麥帥晤談後轉述，麥帥認爲這次杜魯門總統的宣言，是蔣公及他自己的一次大勝利，因爲麥帥一向主張應確保台灣不致落入共黨之手；至於中國主權問題他絕不會干犯，請蔣公放心。麥帥並首次提及有意訪台，但行程可能會延後。

蔣公回應很積極，他親筆擬王世杰致何世禮電，對麥帥有意來台至表歡迎，然

而擔心現時軍事形勢嚴重，麥帥不宜離日來台，在考慮原先就有意訪問韓國之下，是否於途經日本東京時與麥帥晤面，或者另擇會面地點。這是爲麥帥不克離日下所做的考慮，但此一意願透過我駐日代表團傳達後，何世禮五日來電說，麥帥的參謀魏勞柏表示，目前麥帥軍務繁忙，未便與蔣公晤面，即使蔣公赴韓訪李承晚，美方也有「無法保護之感」。

蔣公看了電文之後頗感不悅。但隔了一天何世禮又致電王世杰，這通要求王世杰親譯的電文寫得非常神祕：

> 某君赴台事極度機密，其意不止於晤談。禮前日謁，深表其一切計畫及決心與現在所處環境隻電未能詳盡，以事關最機密，不便以函達奉報，尤其華府某方問題仍極嚴重，似暫不宜加重彼之困難。禮定明日飛台面陳一切，如有必要當可即時返日再度商洽。
>
> 何世禮①

這個「某君」，就是麥帥。何世禮七日回到台北，和蔣公密商麥帥訪台之事，

我是後來詢問王世杰，才知道麥帥準備來台，但尚未確定是哪一天。王世杰囑咐，此事要保持祕密。

麥帥要來台灣，絕對是機密的事，因爲他的到訪，杜魯門恐怕不會贊同，所以這事連美國國務院都應該瞞住。

何世禮爲麥帥來台的聯繫及安排忙了好一陣子。到了二十八日清晨，我在睡夢中被電話驚醒，沒多久機要室同仁就送來何世禮拍發的兩通極機密電報，電文中指出，麥帥將於三十一日率領高級參謀來台訪問二十四小時。電文明白表示，麥帥要求不舉行任何儀式及宴會招待，一下機就與蔣公開會討論台灣防務問題。何世禮解釋，麥帥個性率直豪爽且性子最急，所以我方宜尊重他的意思，簡化招待，不要浪費時間。

亞洲兩大反共領袖終於要會晤了，我感到振奮。早上八點，蔣公在草山官邸看到這兩份電報，十點鐘他抵達總統府與王世杰商量後，指示我草擬行程。下午我找黃仁霖商量及做必要的安排，在忙碌中過了一天。次日是星期天，一大早蔣公與王世杰晤面，我在旁記錄。經討論後，決定致電麥帥表示歡迎。

這是麥帥訪台的前一天。我到現在還記得，上午十點多鐘我離開官邸回到家，

隨即在宏藩弟的幫忙下在屋後蓋了間廚房，全家一起忙到下午四點才完工。我再赴草山繼續籌辦次日麥帥到訪事宜。那段緊張的日子，國事與家事就交織在生活裡，這一刻專心地把幾枚釘子釘進木板裡，下一刻就回到總統府辦理國家大事，處理來自東京的密電。

麥帥訪台會議內容

三十一日一大早，天空烏雲密布，接著就下起滂沱大雨。我開始焦慮，擔心這種惡劣天氣會不會影響麥帥的行程。中午，蔣公夫婦前往機場迎接，大多數政府高級首長都是在麥帥座機抵達台北上空時，才接到電話通知得知此事，紛紛趕到機場。其實我的擔心差點成為真的——和麥帥同機來台的何世禮後來告訴我，由於天氣極為惡劣，座機抵達上空後一時無法下降，駕駛員開始考慮是否返航，而麥帥在機上也是徘徊躊躇非常焦慮。

然而，座機還是平安落地了。下午四點，麥帥與蔣公在國防部兵棋室舉行第一次會議，第二天上午九點在第一賓館舉行第二次會議，確實充分利用時間。

這兩次會議，我方出席會議者為蔣公、行政院長陳誠、參謀總長周至柔、副總

長郭寄嶠、次長蕭毅肅、海軍總司令桂永清、陸軍總司令孫立人、空軍總司令黃鎮球、廳長侯騰，以及王世杰、沈昌煥、何世禮、顧問柯克；盟軍總部出席的幕僚包括參謀長亞爾門將軍（Almond, Edward M.）、美遠東空軍總司令史崔特梅爾將軍（Stratemeyer, George E.）、遠東艦隊總司令裘愛將軍（Joy, Charles Turner）、第七艦隊司令史樞波將軍等十六人。

我把第二次會議的紀錄，整個記在日記裡：

會議一開始，蔣公沒有致詞，直接宣布開會，請麥帥開始討論。

麥帥說，自昨天與蔣總統及中國參謀總部討論之後，已經獲得下列結論：

——東京將派遣一個小型的連絡組來台。該連絡組將包括各專業技術人員，給予台灣一切可能及必須之協助。

——該組組員與政治完全無關，將協助軍火及防禦事項，連絡組將向東京總部與台灣蔣總統的總部負責。為增強東京與台灣的合作及聯繫起見，東京將派遣美國人員來台設立軍事通訊站，該站同時將協助增強台灣本地之通訊網。

——為迅速執行台灣防務起見，史樞波將軍與桂總司令將擬訂海軍之防衛計畫，東京總部賦予史樞波將軍與中國當局做任何決定之全權。史特拉將軍將與中國

空軍擬訂計畫，並研究中國空軍之潛力，必要時美國飛機將派遣來此。東京總部與台灣總部相關的聯繫工作，將由何世禮將軍處理。

關於指揮機構，兩國完整之指揮機構仍將予以保持，中國之各種軍力仍由中國指揮，美國之各種軍力仍由美國指揮。雙方將盡一切可能之努力，向美國獲得必要之配備，以供應台灣國軍之需。

麥帥最後指出：「以上各點，已經經過我與蔣總統互相討論，而且雙方也已同意，此後美方人員將陸續來台，我們計畫使美國飛機及船艦來台做友好的飛行及航行，在實施時將會有充分的聯繫及如同同盟國家一般辦理相關手續。」

蔣公回應：「麥帥所提各點，我政府完全同意。對於自東京派遣連絡組這點，更是滿意。至於詳細辦法，可俟連絡組到達後，根據協議原則辦理。麥帥及幕僚對我國的友情，與對我國目標的熱忱，我極爲感謝。」

周至柔接著在會議中提到金門要守或撤的問題。

依據紀錄，周至柔問：「金門防務可稱堅強，士氣亦高；我們已準備作戰，惟最近共匪的行動如沿海集中船隻、飛機場之修理與擴充及軍隊與砲兵之集中，均表示其全力攻打金門之企圖與決心。在目前情形下，我不知是否應不顧一切堅持到

底，抑或作其他的考慮？」

我方先前經由何世禮在東京遞送一份備忘錄給麥帥時，已因金門防守不易而暗示撤退之意。

韓戰發生以來，美國國務院方面對金門等離島始終消極地聲言不在協防範圍之列，麥帥的觀點卻是從軍人本色出發：「金門的部署情形我知之不詳，故不能表示任何建議；然而照軍人之本能而言，則是『絲毫也不放棄』。我相信周將軍早就下了決心，決策就是戰鬥到底！如果將軍有撤退之意，則早已爲之了。

「我以爲周將軍所問的，乃在於美國是否協助金門的防衛及美國是否將干預國軍之行動，倘若如此，則我會表示我的意見，否則就實在沒有討論此事的必要。」

周至柔追問：「我們當然希望永遠保持金門，因爲金門是我來日反攻大陸的跳板，欲達到這個目的，我們必須轟炸福州與廈門的共匪機場、攻擊敵人在廈門及其他砲兵集中地點與軍隊的調動等，如果我們不能這麼做而等待敵人來攻，則我方會蒙受極大的犧牲。」

麥帥回答：「周將軍之言甚爲明顯，且爲充分之眞理。此一問題目前華盛頓正

在討論，而且也非祕密之事，東京態度對你們甚爲同情，我相信美國在短期內將對六月二十七日的聲明予以澄清，其結果或將如閣下所願。」

麥帥結束訪台行程返回東京之後，堅守金馬等外島就成爲政策，沒有人再提要放棄金馬。

麥帥此行具體安排了盟軍總部與台灣之間的軍事聯繫，同時穩定了動盪不安的台灣人心。會中所提的「連絡組」，隨後擴大成爲派遣「遠東盟軍總部軍事調查團」來台，主要任務在於了解台灣防衛情況及軍備供應等。

麥帥跳過美國國務院展現對台灣的直接善意及實質幫助，很顯然地令國務院不悅，甚至引起共產集團在聯合國的攻擊。師樞安更是不滿，透過杭立武向外交部反應說，這次麥帥訪台，事先並未獲得華府同意，希望我政府不要輕慢國務院。不過，由於師樞安擔任這個職務以來，一直以高傲的態度對待我政府，其至晉見蔣公時也是如此，不久他就被調走了，改由藍欽（Rankin, Karl）接任。

然而，麥帥的訪台舉措，卻也使得杜魯門設法加強對東京盟總的控制，那就是任命馬歇爾爲國防部長。

絕處逢生

韓戰影響了整個世界局勢，包括在崩潰邊緣掙扎的中華民國政府。英國哲學家羅素（Russell, Bertrand）接受《雪梨太陽報》（*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訪問時預言，蘇聯將會加入這場戰爭，所以第三次世界大戰實際已經發動，而且至少持續十年。蔣公的確曾希望能藉第三次世界大戰可能開打的契機，一舉收復大陸失土，但羅素的預言並未成眞，以美國爲首的國際社會卻也認清了赤色勢力的危機，使退守台灣的政府終因韓戰而重獲生機。

我可以感受得到，蔣公歷經大陸淪陷、困守最後一片國土的煎熬後，緊繃的心緒終於舒緩。

十月二十四日上午，蔣公在官邸爲台灣光復節演講辭錄音後，到中央黨部召開一般會談，他告訴與會首長，準備到郊外休息幾天，下月初回台北。大家都知道他的生日快到了，於是祝他生日快樂。下午一點半，我隨侍蔣公動身前往桃園角板山，那時角板山的交通可眞不怎麼便利，我們先乘汽車到大溪，接著步行到角板鄉，最後乘台車循小鐵軌上山，全程總共花了四個小時，傍晚五點半才抵達。那是

一棟年久失修的日式房子，在大溪之南二十五公里，日皇曾在此小住，環境清幽，蔣公決定在此住上幾天。

我就隨著蔣公夫婦過了幾天不看公文、不看報，白天與蔣夫人打橋牌、晚上看電影的日子，直到十一月一日下山，重新回到忙碌緊張的公務中。

第十二章注釋

①周氏錄於民國三十九年日記。

第十三章

忙碌而黯淡的一天

一九五〇年九月二日，是個緊張裡的尋常日子。

然而在這天裡，我的心緒起伏特別大。因爲那天除了從早忙到晚之外，我還從董顯光那裡了解一些特別的訊息，國際局勢、台灣未來走向、國內政局的發展，具體而微地在心裡交織著。我在日記上詳細地記下了這一天。

美國「侵略」台灣？

二日上午十點，我隨同蔣公前往總統府。在車上，我把駐聯合國代表蔣廷黻報

告中共控告美國「侵略」台灣的議案、一份關於美國在聯合國態度的電報唸給蔣公聽，美國方面主張派遣調查代表團赴台調查，以證明美國的行動是維護和平而非侵略。蔣公聽了，極爲憤慨。

先前一天，杜魯門又發表談話了。我深深覺得美國政策的舉棋不定，實在難以捉摸。第七艦隊駐防後的幾個月來，固然台灣能夠喘口氣，但也讓中共在沿海完成廈門、福州等幾個重要機場，並且在沿海一帶屯備了大量武器糧食及其他攻台的人力物力，現在中美關係又面臨新的情勢，台灣的前途實在難以逆料。

到了總統府之後，祕書長王世杰針對我國是否要使用否決權，以中止安理會準備派調查團來台調查美國「侵略台灣」這項無理的議案，做了詳盡分析。如果使用否決權的話，比較值得憂慮的是蘇聯會不會再度提出中共代表權議案，以此拒絕我國合法地位，其中得失實值考慮。

十一點多，杜魯門的爐邊談話稿到達中央社，幾分鐘後蔣公就看到了。杜魯門這次談話要比前一次對記者發言的內容要穩重得多，他宣稱只要其他共黨國家不派軍參加韓戰，那麼韓戰就不會擴大成爲世界大戰。杜魯門明白表示，希望中共不要強迫中國人民參加韓戰，協助北韓對抗聯合國部隊及美國人民；第七艦隊的任務是

使台灣站在世界衝突的範圍之外，美國的目的是和平而非征服。

下午五點半，蔣公約集陳誠、葉公超、張群、周至柔、王世杰及沈昌煥，開了兩個小時的會，最後決定要使用否決權以阻止調查團到台灣來。蔣公說，我們不能把共產黨的匪諜放進來窺探虛實，葉公超奉命於會後把這個決定告訴蔣代表，要他先知會美國。

美欲以吳國楨取代蔣公

我和沈昌煥離開總統府時，心情異常沈重。我到沈昌煥的家裡吃晚飯，繼續討論今後局勢的可能變化。晚上九點多鐘，董顯光也來了，他打算和沈昌煥商量整頓中央社的問題。這兩年來，董顯光成爲蔣公私人外交代表，經常奉命出國往來歐美及日本之間，沈昌煥則受蔣公指派成爲他的助手，我們三人就在飯桌上又談了一個多鐘頭。

董顯光說，他判斷美國不願看到台灣落入共產黨的手裡，但又不願介入我們的漩渦，因此希望能使台灣脫離大陸而成爲由聯合國保證的獨立國家，這在政治上是近乎托管方式，美國國務院顧問杜勒斯（Dulles, John Foster）、艾森豪等都有如此明白的表示，而杜魯門宣布由第七艦隊維護台灣的中立，正是此一計畫的演出。

這個時候電話響了，沈昌煥去接聽。董顯光顯然有些事不想講給他聽，趁著沈昌煥不在時才說：「在這個構想之下，我們從大陸遷台的政府當然就要取消，但正如艾帥所言，總裁必然不贊成。不過，如果情勢照著美國人的安排發展下去，依美國人的看法，K.C.最得他們的信任，會出來組織政府！」K.C.是吳國楨的縮寫，董顯光這麼說的時候，表情是非常痛苦的，因爲復國的希望會受到最嚴重的打擊。

吳國楨不論治國經驗或資歷都不夠，不可能領導國家。我說：「美國人可以信任K.C.，我們不能信任K.C.！他沒這個能力，是無法領導國家的。」我想起美國如有這樣打算的話，另外一個問題馬上浮現：「不過，美國人如果真的這麼做，最困難的恐怕是GM的地位，要怎麼安排呢？」

GM是委員長（Generalissimo）的簡稱。談到如此敏感的問題，不論董顯光還是我，都不願直接提及蔣公。

蔣夫人洩密?!

董顯光回答：「夫人告訴我，馬歇爾答應她，在最危險的時候到美國去！」他

講了這句話之後，我們黯然地靜默好一陣子。

董顯光接著又講：「我聽說夫人已經把麥帥訪台的詳情用二十頁的信紙告訴了馬歇爾，她等於替總裁的最大政敵做情報。我們內在的矛盾與弱點，實在是今後最可怕的敵人！」談到這裡，我才知道為何董顯光不願讓沈昌煥聽到這些內容，因為沈昌煥和夫人之間聯繫很好。

沈昌煥再回來時，我們都不願再談下去了，向沈昌煥告辭後，我就送董顯光回去。董顯光的話未免重了些，但我深深感受，像他這樣忠心耿耿的人才，在國內已不多見了。這位在蔣公身邊二十多年的老幹部，看到現在這個局面，實在太傷心。我也是一樣，回到家裡竟然一夜無眠，讓黑暗與失望籠罩一切。

不過如今回想當年這段對話，我卻是覺得，蔣夫人把麥帥來台的情況透露給馬歇爾，應該有她的考慮。至於她告訴董顯光，馬歇爾答應她在「最危險的時刻」可以讓蔣公到美國去一事，我想應是指連台灣皆已不守的時刻。

蔣夫人在西安事變奮不顧身地冒險赴難，此刻是整個中華民國可能覆滅之時，她卻有這樣的想法，我覺得當是與她受美國教育的背景有關，至於蔣公會不會依照她的想法去做，因台灣的局勢逐漸穩定，這樣的考驗也就沒有發生。以蔣公的持守及我對他的了解，我認為他是把自己與中國的命脈連結在一起的。

長夜漫漫

美國人試圖以吳國楨取代蔣公來領導國家的傳言，我分別跟經國先生及張群說了，我認為內在的矛盾不能小覷，高層必須設法以坦誠態度來防杜，使之消弭於無形。經國先生認為吳國楨無此能耐，但他沒有多說；而張群則認為，如果他是吳國楨，就會做明確表態。

不過，這個話題之後，蔣公在吳國楨主持省政三年之間，依然秉持信任並且重用他。

韓戰發生之後的這一天，一如許多交替的晨昏般，國家從風雨飄搖到曙光乍現，也將隨時面臨未來的挑戰。身處台灣的中華民國，依然是漫漫長夜，還有一段很艱辛的路要走。

第十四章 中共參戰

中共派兵參加韓戰，不論對世界局勢、對中華民國、對中共本身，都產生巨大而震撼的影響。

十月初，我方得到情報顯示，東南沿海的中共部隊大量北調。十月五日，董顯光偕同何世禮在東京拜會麥克阿瑟時，麥帥並不相信中共會參戰。他認為中共會因為擔心遭轟炸，參戰的可能性不大，即使眞的參戰，盟軍也不難將之擊潰；麥帥樂觀地提出他對韓戰的看法——整個戰事大約再一個月即可結束。

但蔣公的見解不同。十九日，他主持革命實踐研究院第八期畢業典禮時分析，

最近共軍大量北調，廈門附近的禾山與馬巷機場停修，廈門船工亦有一部分被共軍遣散，粵省物資也大量疏運到江北，足以證明中共已轉移其最大軍事目標到韓戰，而認為台灣是次要目標了。我可以感受得到，蔣公緊繃的心情終於輕鬆了些，如果中共參加韓戰，勢必會影響美國對華政策，我方將獲得更多支持。

然而就在這個時刻，美國又出現變局。

馬歇爾接任美國國防部長

先前在九月十三日上午，蔣公自士林官邸前往總統府辦公時，在車上忽然問我：「你對馬歇爾接任美國國防部長有沒有什麼看法？」

這天清晨，王世杰打電話報告蔣公，美國國防部長詹森（Johnson, Louis）已經辭職，遺缺由馬歇爾接任；但我是直到蔣公問時，才知道這個消息。一時之間，去年美國國務院對我國打擊極大的白皮書，以及馬歇爾過去種種不友善、固執的印象，全在腦海裡打轉，我無言以對。

蔣公看我沒接腔，又有些遲疑地說：「大概不會對我們更壞吧。」我又默默地想了片刻，還是未能回應，接著蔣公就要我照常報告公文。

到了總統府，蔣公和王世杰針對馬歇爾的新職務談了許久。馬歇爾對我政府的傷害實在太深了，蔣公難免會憂心忡忡，如今美國是否會重新援助中華民國，馬歇爾又是個關鍵。不過，董顯光隨後到我的辦公室聊聊，他告訴我，據他所知馬歇爾到醫院拜訪臥病中的司徒雷登大使時，曾經這麼問司徒：「中國之事，你我都曾經仔細思考過再做決策，我們預期發生的情況，怎麼都不應驗呢？」董顯光認為，馬歇爾這番話似乎暗示過去對中國事務的處理有不當之處，所以今後可能改變態度。

第二天，蔣公在宴請中央評議委員時表示，美國的外交政策已經定下來了，馬歇爾應不致再做變更。吳國楨說，美國助理國務卿魯斯克（Rusk, David Dean）所謂予台灣有限的軍事及軍事援助，已較先前斷絕援助要改善許多。眾人皆請蔣公以私人名義電賀馬歇爾的就職，蔣公從善如流，馬歇爾不久也覆電答謝。

馬歇爾的上台，韓戰應是近因，背後必有其他積極考慮。十五日這天，美軍在韓國仁川登陸，威脅北韓部隊的補給線。蔣公經過幾天的思考，評論馬歇爾出任新職的意義說，馬歇爾出任國防部長，無疑會加強美國的備戰工作，而且會使美蘇間的軍備競爭更為激烈，即使韓戰以後結束了，也很難停止。

蔣公說：「備戰時間愈長對美國愈有利，不過蘇聯對這種淺顯的道理必然也已

洞燭而有所因應，美英兩國要想讓中共不介入韓戰，以使美國不致於歐亞兩面作戰，這就不單只是鬥力同時也是鬥智了。」①

蔣公隨後在總理紀念週時訓示漢奸必敗，並且把「共匪」改以「朱毛匪幫」稱之，這是諭示為歷史上的匪類長毛、紅毛、白毛之後，喻其為不可理喻之匪徒。

中共參戰明朗化後，董顯光告訴我，馬歇爾對蔣公的態度已有轉變，談及中國問題時，話中必以蔣公為對象，不再有如一九四九年發表的白皮書裡，好像蔣公不存在似的。

不過，馬歇爾出任國防部長，以後可以見得重要因素之一，就是為了節制麥帥，因麥帥的對華政策均與國務院不同。沒多久，美方就傳出杜魯門與馬歇爾密商，要調動麥帥。

顧維鈞於十一月初來電報告，美國國防部已於二日晚上開會決定，趕運軍援物資至台灣及越南，運台方面主要是各項軍用零件及火箭砲等。顧維鈞的情報也顯示，中共正設法運輸軍火接濟緬共，亞洲烽火看來有燎原之勢，但這也是風雨飄搖的中華民國，重新成為美國整體戰略一環的契機。後來陳誠在一次黨內會議裡，對一九五〇年的中美關係曾有個貼切比方，他說美國對台灣的關係在這年分三個階

段：先是「人地不認」，然後是「只認地不認人」；韓戰發生後才演變成「既認地又認人」。

蔣公研判韓戰軍情

蔣公對軍事形勢的觀察是正確的——台灣的軍事威脅減輕，意謂中共將參與韓戰。

三日，我駐韓大使邵毓麟大使來電說，韓國總參謀長丁一權告訴他，林彪的三十九軍、四十軍、四十二軍約十萬人，自十月上旬起就開始陸續渡過鴨綠江，進入北韓參戰。六日，麥帥總部終於承認中共參加韓戰的事實，發表了聲明，證實聯軍在北韓遭遇強大之「外國共產黨」軍隊侵入，並已向聯合國報告。

這是一個重大的發展。何世禮團長奉命返台述職，回到東京之後與麥帥會晤，麥帥除了就台灣作戰問題與他交換意見外，對於中共可能扮演「狄托」角色，還存著期盼。麥帥認為，這次中共介入韓戰並未與蘇聯同軌，理由是此次中共參加韓戰，蘇聯並無動靜；而聯合國聽取他的報告後，要求中共撤兵，蘇聯提出應讓中共列席之議，中共卻拒絕了。麥帥因此研判，由此可見中共並不是在與蘇聯密謀之下，秉承老大哥的意旨出兵的。不過對於中共參戰的目的，麥帥尚無明確判斷，因為他認為出兵對中共毫無利益可言。②

蔣公對我談起麥帥的談話紀錄時，觀點和麥帥相反。蔣公認為中共在對本身無利益可言的情況下出兵，正可證明中共此舉是蘇聯在幕後主使。事實上，沒多久蘇聯及中共就簽署了『中』蘇互助條約」，使得北韓局勢愈見複雜。次年邵毓麟把一名戰俘的供述報到台北，證實蘇聯確實自韓戰初期就參與其間。

這名於一九五一年二月被俘的中共第五十軍四四九團某迫砲連的副連長說，該團軍官十二人被派到瀋陽學習空軍戰車砲兵聯合戰術，兩個月結訓再回本團傳授營連官長，在瀋陽的教官全是蘇聯人；另有一名戰俘則說，目前共軍為休整期，蘇聯將於春天以飛機戰車助戰，再發動攻勢。這些情報都顯示從韓戰裡可以見得蘇聯的擴張企圖。

盟軍在麥帥的親自督陣下，於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在韓國戰場上發動「回家過聖誕節」總攻擊，以推進至鴨綠江為目標；卻在二十八日突然遭到二十幾萬中共部隊全力反擊，全線有崩潰之勢。

戰火炙烈，第三次世界大戰會不會因此爆發已成為關切話題，不僅台灣這麼

想，中共那邊也是如此。二十七日，沈昌煥奉指示把一件來自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情報譯為英文以轉交美方研究，該文件顯示中共高層指示以一九五二年冬為預設世界大戰爆發之期，應做先期準備。

由於中共空軍近日來曾數度做長距離轟炸飛行演練，蔣公因此研判共軍可能以轟炸台灣來牽制我方軍事行動，緊張情勢逐漸升溫，我感到戰事又近了。

麥帥去職

韓戰初期，北韓進攻迅速，美軍因此直接參戰，由於作戰並不順利，盟軍總部還計畫徵集日軍投入戰場，但對於蔣公表態要投入一個軍約三萬人的陸軍部隊參戰，美國國務院反對了。不論是國務院發出的回覆備忘錄或是麥帥當面告知何世禮，理由都是中共正打算攻打台灣，如果我國再派軍援韓，將削弱台灣防務兵力。

我政府一直表達願意出兵援韓，不過顧維鈞大使與魯斯克晤談後，來電表示關於我方願意協助韓戰方面，美方希望我國暫時保持緘默，以待局勢的澄清。

雖然美國國務院及英國都不同意使用我政府部隊，但麥帥的想法不同。韓戰呈拉鋸之勢延續到次年後，王世杰向蔣公報告，依來自東京的消息，麥帥有準備使用

六萬國軍部隊的計畫。蔣公指示我向正在日本的董顯光詢問詳細情形，董顯光隨即回覆，麥帥曾向美國國防部提議使用六萬國軍，但因未奉批准而作罷。但是，盟軍總部仍有訊息傳來，要求我方預做廣州登陸戰的準備。

我個人認為，中美關係不應太側重東京盟總，因為美國政策還是掌握在華府。一九五一年二月十四日，蔣公赴總統府辦公途中，我向蔣公報告，先前一天看過何世禮於二月七日與杜勒斯的談話紀錄後，建議更動何的職務，改以有政治頭腦者來擔任，原因是這次何世禮與杜勒斯的談話理應十分重要，而其主題無非是對日和約問題，但何世禮竟然沒有和杜勒斯深談就輕易放過機會，所談內容和上次與美國情報局長史密斯談的差不多，事先又不向中央請示，可知他的政治修養實在不足。我又向蔣公建言，當前中美關係的重心在華府而非東京，今後駐東京代表團的使命應在對日朝野聯繫而非僅著眼於盟總。蔣公聽了，點頭表示同意。

事實證明，這樣的研判是對的。四月初，美國參議員馬丁（Martin, Joseph Jr.）把麥帥寫給他的信公開，麥帥在信中表示贊成馬丁關於利用國軍反攻大陸、開闢第二戰場的建議。麥帥對韓戰的傾向曝光後，隨即引起軒然大波。另方面，我駐韓武官裏作人也來電報告，韓國盛傳蘇軍及中共混合部隊六十萬及飛機三千餘架結集在

北韓後方，麥帥已授權轟炸東北，但這個擴大戰爭範圍及規模的戰略思考，顯然與杜魯門相左。

十一日，麥帥遭到免職。中央社傳來這個消息後，我立即向蔣公報告，他十分震驚，因為此刻正值對日和約問題及韓戰有可能走向妥協的時刻，麥帥的去職對我國而言影響實在太大了。蔣公另外也接到沈昌煥的電話報告說，美國已派第八軍軍長李奇威（Ridgway, Matthew B.）上將接替麥帥。

黨國元老吳稚暉聽到麥帥被黜，憂慮之下遂致發病，於一九五三年辭世。

麥帥始終是蔣公乃至於中華民國的忠實友人，他在蔣公最艱困之際給予支持，連中國政策方面都與蔣公不謀而合，他突然去職，蔣公首先的反應就是想邀他來台一行。

傍晚六點，蔣公約集王世杰、張群、陳誠、董顯光開會討論，與會首長及幕僚卻有不同看法。他們認為最好慎重其事，因為這涉及今後美國政府援助我國問題，我國的反應一定會受到美方重視，必須面對現實。蔣公思考後，決定派董顯光赴日，傳達對麥帥的深切感謝之意，因為他在我國存亡最關鍵時刻伸出援手。

後來麥帥在美國國會演說時，正式把他的主張公諸於世，包括轟炸東北、以海軍封鎖中共的海岸、准許沿海巡邏飛行，以及准許國軍反攻大陸。我認為，麥帥是以軍事觀點出發看中共參與韓戰所引發的問題，而政治上的考慮似不是他的目的。

李奇威接替麥克阿瑟成為第二任聯軍統帥，對韓戰的策略立即有顯著的不同，儘速結束韓戰成了新的思考。

中共參加韓戰，不單造成大規模的生命及經濟、財政損失，在外交上也因此遭到西方國家排斥，進而走進長達二十年的竹幕鎖國時期，美國為此支持我在聯合國的席次，並且促成了日本以我中華民國為對象，簽定兩國和平條約。

第十四章注釋

①周氏錄於民國三十九年日記。

②同前注。

第十五章

守與攻

大陸淪陷之後，反攻復國一直是蔣公領導下的中華民國最終目標。然而，遷台之初蔣公就深切了解，單憑我們自己的軍事及經濟實力，不可能辦得到；除了必須依賴外援之外，還得看時機。

對中華民國而言，最好的時機就是：民主陣營與共產國家意識型態強烈對立之下，促使第三次世界大戰發生，中華民國重新與盟軍併肩作戰，一舉收復失土。

蔣公對反攻大陸的規畫一直是積極的，但他從國際局勢及軍事上的觀察，也很清楚以台灣的軍事力量，人力物力實在都力不從心。這從韓戰發生半年後，蔣公在

一次軍事會議內容中，論述韓戰在局勢發展的關鍵地位，即可了解他當時對大陸的軍事部署整個構想。

一九五一年元月十七日中午，蔣公在國防部第三廳兵棋室舉行軍事會談，蔣公擔任主席，出席者爲陳誠、周至柔、郭寄嶠、林蔚、三軍總司令及柯克等軍事高層。

蔣公在會中訓示反攻作戰之方針，指出如果韓戰結束，聯合國部隊撤離韓境，則中共自韓國戰場調回的兵力，必使用於攻擊台灣，因此台灣必須積極備戰。他說，反攻以前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先做好防衛台澎金馬；其次才是就時空及敵情研究反攻方略，決定反攻各種計畫。

蔣公說，反攻行動包括臨時突擊、占領灘頭陣地；進入大陸後就要爭取人力、徵集壯丁，以求消耗敵人壯大自己；最後才是大規模正規行動。一切準備完畢，正式進攻，此時我們已有充足力量，其計畫當易於研究。但與匪正規作戰時，勢必占領重要城市，則國軍兵力也須與匪一個野戰軍的兵力相等，如不及此，非在適當有利的時間實施，就非常危險，例如匪第四野戰軍林彪部，現有二十一個軍，姑以二十個軍計算，我們必須也有二十個軍方可開始反攻。凡此，可先爲策定計畫。

蔣公認爲依目前情形，只可占領灘頭陣地，以徵集壯丁，培養游擊力量，如實行臨時突擊，在部隊撤回後，即以受過訓練的游擊部隊散布深入作爲潛伏，如我們不能支持時，即行撤回。

在現有兵力未擴充以前，國軍要採用精兵主義。實施精兵主義，先須擬定訓練計畫，務使每一士兵不僅要信仰主義，貫徹反共抗俄決心，且能自動自發、犧牲奮鬥，養成各自爲戰之性能，果如斯，不論局勢如何變化，絕無任何問題。

蔣公在會中講了許多具體細節，包括軍力運用及登陸地點等等。他的結論是，大規模的正規反攻，至少要準備到本年年底，並要求美援。在本年度內，只能實行臨時突擊與占領灘頭陣地二種行動，目前應即先擬定這二項計畫。

在蔣公的戰略指導下，台灣開始徵兵，然而美方態度逐漸改變，若干計畫日後還受到美軍顧問團的堅決反對。不過這是後話，在韓戰期間並非如此。

美國爲了結束韓戰，在和談膠著期間，對中華民國牽制中共的能力做了許多盤算，提議中甚至包括以南韓「傭兵」協助反攻大陸。這年三月二日，何應欽自東京來電說，據可能出任美國駐台軍事代表團團長的麥克魯將軍密告，南韓有百萬堪充兵役的青年，我政府可以向華府提議，由南韓選派幾十萬青年至台灣接受訓練以協

助反攻大陸；至於裝備及經費可由美方負擔。

麥克魯當時在東京盟總任職，他這個提議當然沒有實現，而麥克魯以後也以不善訓練工作爲由，推辭在台工作，後來美國軍事顧問團團長由蔡斯少將（Chase, William C.）出任。

西方企業公司及游擊戰

反攻大陸茲事體大，而且公開動用國軍會引起外交方面的問題，游擊戰就成爲主要的考慮。先是中共介入韓戰獲得證實後，美國中央情報局（ＣＩＡ）派在遠東工作的莊士敦（Johnston, C.S.）於一九五〇年十一月抵達台北，我方由軍統局長鄭介民負責接待。莊士敦的主要任務爲取得我方在大陸游擊部隊的具體狀況，包括數量及連絡情形等等。他告訴鄭介民，美國願支持游擊作戰，並且由雙方合組一個機構擇定大陸沿海一個島嶼，作爲連絡補給根據地。這就是以後ＣＩＡ在台機構「西方企業公司」（Western Enterprise）的由來，莊士敦就是中情局台北站第一任站長。

蔣公於二十三日接見莊士敦，和他談了四十分鐘。二十八日，蔣公核定以鄭介

民爲大陸游擊工作負責人，並決定近期內發展游擊戰爲今後對大陸的軍事中心工作。中美雙方完成游擊工作的初步協議後，莊士敦隨即返美。

游擊戰的執行，大致是以內陸、東南沿海諸島，以及撤至大陸西南方及中緬未定界的李彌部隊等爲主。一九五一年一月初，李彌報告說，他與當地情報人員會商美方接濟游擊作戰。沒多久，經國先生告訴我，美國已正式電告，將供應游擊部隊十萬人的裝備，遠遠超過我方最初向莊士敦要求的一千人裝備。

這些裝備約在二月就可以運抵台灣，並指定陳納德爲駐台代表。二月十五日，莊士敦以西方公司名義把軍品運送來台，詳細軍品清單則由陳納德向蔣夫人報告。

西方公司積極參與沿海島嶼的游擊戰，他們的意見可以直達蔣公，受到重視。然而，中美之間對游擊隊事務方面的聯繫，美方卻邀請蔣夫人擔任美方駐台人員會議主席，理由是蔣夫人可以直接擔任蔣公的代表。王世杰告訴我，這項邀請惹得軍方高層甚爲不快，我曾向蔣公報告此事。

五月五日，蔣公在總統府約見葉公超，詢問他於幾天前與藍欽公使的談話，因爲藍欽提及由蔣夫人擔任游擊隊的委員會主席，以及經國先生在政治部工作方式兩件事。蔣公堅決表示，夫人擔任游擊隊方面的職務，是美方在台政策；至於經國先生所領導的國軍政治部工作一事，則屬我國內政問題。經國先生後來曾親自向蔡斯解釋政治部的任務及現況等。

我方游擊隊在美方支援下，分別在滇南及東南沿海活動，蔣公打算以小規模的突擊大陸，以收牽制中共在韓軍事行動之效。胡宗南在四月被任命爲浙江省主席兼游擊總指揮，駐軍大陳以經營東南游擊活動，七、八月間東南沿海的游擊隊曾先後自浙南及閩南進入大陸。滇邊游擊司令李彌曾率軍打回大陸，深入達一百公里，他保持了大約一萬五千餘名官兵的實力，但在韓戰結束後，他們就失去美國奧援，最後只好撤回台灣。

至於政治部方面，這是因爲大陸淪陷，中華民國僅剩台澎，蔣公深知共產黨的狠毒，決定以堅壁清野方式拒絕共產勢力滲入台灣，除了要清掃潛伏在台灣的共黨組織之外，也在思想上做徹底的節制，特別是三軍部隊。所有的防堵作爲，就交由曾在蘇聯待過，深知俄共如何布建、控制的經國先生。

情治單位在經國先生領導之下，確實破獲不少共黨組織，如潛伏在國防部的高階將領吳石被查獲就是一例。但是嚴厲的查核、思想管制，乃至於以此來打擊異己，卻也造成怨尤。

反攻大陸的契機

由於韓戰和談並不順利，美方加強了對中共的牽制動作。蔣公因應可能出現的反攻大陸契機，成立了反攻大陸軍事研究機構，由陸軍總司令孫立人負責，並且訂定了突擊計畫，以作為大規模反攻作戰的先聲。據我所知，在這個計畫裡，有幾個軍要加緊兩棲作戰訓練；而兩廣的游擊隊指揮也已經由國防部正式任命，空軍這時恢復對大陸的偵察。我深深感受到部隊的旺盛士氣，但還必須有個必要條件——充分的軍援。

然而，美國國務院和他們的情報單位分別運作之下，有些看似矛盾，實際上卻出現相當複雜的訊息。美國軍事顧問團成立之後，蔡斯一開始就從台灣經濟支持力為著眼，強烈建議我方縮減編制上的軍力達十個師；但CIA的作法又是另一回事。

一九五二年三月二十二日，李彌將軍返台，他曾先繞道東京，會晤摩利爾將軍（Merrill）。此人曾任史迪威的參謀長，最近參加里斯本北大西洋公約國會議後，轉道舊金山到東京，當時應該屬於美國中央情報局負責在遠東的情報工作。李彌和

他晤談，摩利爾允許恢復每月對李部七萬五千美元的補助，並允諾儘快先給予裝備。先前，這筆錢因受到美國國內的質疑而停發。

摩利爾的祕書奚爾斯上校（Theis）與李彌同機來台北。李彌指出，美國遠東情報局克萊克將軍（Clerek）與摩利爾在東京會商後，擬建議於六個星期內，著手封鎖中國大陸全部海岸，並利用我國部隊占領海南島，以牽制匪軍進出東南亞及北韓。摩利爾將於二十五日來台北，晉謁蔣公，以徵求我政府對此腹案的同意。

二十七日，摩利爾將軍和蔣公見面後，提出一份上面注明「最高機密」的文件給蔣公。這份文件應是美國軍事最高階層透過CIA與我方在軍事、政治、情報等各方面策略性的計畫，蔣公交給我譯出。摩利爾這份文件裡所提的美方基本立場假定為：

一、盟國各種部隊，將不用來對大陸作戰，即使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亦然；當前可以推知的是，乃在於任何情況下，海空軍及物資的援助將屬可能。

二、如韓境和談破裂，則將盡可能協助國民政府（Nationalist Government）收復大陸。①

這兩個前提可見美方的基本態度。這份向中華民國徵求意見的文件，是以韓戰

和談未來發展做策略性的沙盤推演，如果和談不成功，韓戰必須持續下去的話，美方會考慮如何運用我方的軍事實力及支援；反之和談如果成功，這一切就都不會發生。另方面，美方顯然對中共感到陌生，所以也詢問不少關於中共的問題。

這份最高機密的內容，涉及中華民國政府今後前途、中國少數民族問題、華僑問題、對大陸突擊、攻擊海南島問題、中美或聯合國軍事合作，以及中日菲三國反共組織等，主要在於具體地徵求我方的合作意願及配合程度。

由於是極機密，除了蔣公自己之外，只有王世杰和我參與處理。早晨，先由王世杰擬具答案若干，經蔣公親自加以修正，然後於晚間再約摩利爾會談，當天晚上摩利爾就離台了。

這次極機密的軍事最高階層的意見交換，是反映美國政府政策而爲。在韓戰和談觸礁之際，美國就想到以中華民國的反攻作爲對中共的牽制，但又非支持我方全面反攻大陸。CIA在此扮演穿針引線的角色，把蔣公的態度具體反映給美國當局。

兩個月後，來訪的美國將領曾向我國索取反攻大陸的軍需計畫，由於韓戰和談的僵持以及英國放棄對大陸商務，我們感受到那時美方有支持反攻大陸的表態，但也僅是在韓戰談判中逼迫中共就範而已。

這年十月十六日，美國太平洋艦隊總司令雷德福上將（Radford, Arthur）偕夫人來訪，他就是因爲蔣公與摩利爾交換意見之下所做的選擇。雷德福的角色是美國總統的私人軍事顧問，可直通杜魯門。

蔣公在士林官邸設宴招待雷德福，隨即密談。曾任行政院新聞局長的沈錡擔任翻譯，後來他告訴我，雷德福要求我方派遠征軍兩個師參加韓戰，蔣公只答應派一個師。我認爲這是我外交的一個轉捩點，爲了對抗共產主義的擴張，終使中華民國重回民主陣營。雷德福旋即出任美國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

年底，爲反攻大陸而設的浙江省政府及福建省政府分別成立，這兩個省政府實際只轄幾座小島，但政府視此兩省政府的成立爲反攻大陸準備開始，未來部隊登陸時，省政府將隨陸軍登陸，作爲其他省分的示範。

一九五三年一月二十日，美國新總統艾森豪（Eisenhower, D.D.）就職，由杜勒斯出任國務卿，並提名藍欽出任美駐中華民國大使。二十六日，赴美出席聯合國大會返國的葉公超在中央黨部報告時指出，美方提議本屆會期暫不討論中國地位問題，態度極爲曖昧。今共和黨執政，自艾森豪親訪韓國戰場後，一般認爲必將於三

個月內採取行動，以解決韓戰。他說，美國軍方判斷，將來美軍如為韓戰而轟炸東北，應不致招致蘇聯應戰，就不會引起世界大戰；美方一般相信美蘇戰爭勢不能免，蘇聯何時出戰有其計畫，不可能因轟炸東北即發動戰爭。

二月二日，艾森豪向國會提國情咨文，宣布解除台灣中立化，第七艦隊不再被用來「保障共黨中國」。此舉意謂中華民國對中國大陸作戰限制解除，當天蔣公在石牌動員訓練班中闡述美國解除台灣中立化的意義時說，台灣中立化一方面是防衛台灣，同時也是掩護反攻大陸的措施；現在美國的政策是解除後者，防衛台灣方面仍將執行。

蔣公說：「此事在余本人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喜在於我可從此反攻大陸，但懼則是我內部力量不足，不能配合國際局勢之要求。我們對匪的力量是以仁對暴，以精神道德力量去脅制敵人，號召人民。希望全國精誠團結，以民族正氣克服當前困難，達成任務！」②

其實美國此舉，一如支持游擊隊的動機，主要目的在於牽制中共，因為韓戰和談進展依然膠著。

韓戰談判卡在戰俘問題，後來終於達成共識。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三日，一萬

四千餘名中共志願軍裡的反共戰俘移交給中華民國政府，遣送來台。

中美共同防禦條約

然而韓戰結束後，海峽的軍情反而吃緊，不僅大陳島經常遭共軍轟炸，海空作戰更是頻頻發生，雙方互有傷亡。這年八月，中共揚言解放台灣，杜勒斯聲明第七艦隊也要防衛台灣周圍的島嶼。

九月三日，中共大規模砲擊金門。年底，中華民國與美國就「中美共同防禦條約」達成協議。

一九五五年一月中旬，立法院通過「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中共隨即於十八日以進攻浙江省東邊沿海的一江山島回應。一江山有兩個島，位於大陳島的西北方，共有千餘守軍駐防。十八日下午兩點，慘烈的戰鬥開始了。

從總統府收到的守軍電訊得知，中共出動五千餘名步兵、一百餘艘艦艇攻島，先以海空狂炸兩島，然後展開登陸，但我軍奮勇抵抗，直到二十日晚上九點十二分，電訊才告中斷，一千多名守軍壯烈成仁。

一江山被攻占後，東南游擊基地大陳立即置於中共的威脅之下。二十一日，蔣

公召集陳誠、俞鴻鈞、張群、黃少谷會商，均認為美方如不協防大陳，則該地勢必難以固守，但大陳撤退在政治上影響極大，所以不能輕易放棄。

討論後，蔣公決定根據此一觀點，指示目前正在華府的葉公超部長與美方協調，如大陳撤退，則美方須協防金門、馬祖，以屏障台灣安全。這是在中美共同防禦條約談判時，美方不肯承諾之事；蔣公同時指示葉公超向美方說明大陳戰略地位的重要性，若撤退後，勢將影響今後太平洋的局勢，且對千餘萬華僑心理影響很大，故盼美方立即促使國會通過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並宣布協防金馬，以平衡因大陳撤退所發生的影響。至於停火建議及兩個中國之議，我方必將堅決反對。

隨後，美國總統艾森豪同意我方要求，並於二十四日向國會提出遠東政策咨文。

艾森豪總統的咨文指出，一江山戰役使得美國體認到這是對美國及整個太平洋區域安全，乃至於世界和平的一項嚴重危機，由於十分危急，使得他不能等待聯合國的行動，必須先要求國會授權使用美國武裝部隊以確保台灣及澎湖的安全，同時提供空中保護，協助中華民國撤退部分分散於大陸沿海較小島嶼的部隊。

二十六日的中常會，由蔣公親自主持，行政院長俞鴻鈞、外交部次長沈昌煥報

告外交情勢時特別提到一江山戰役，指出守軍堅強英勇的奮戰精神博得中外讚揚，美軍顧問表示難得一見，與大陸時期的士氣已大不相同。

沈昌煥說，來自美軍顧問團的訊息指出，一江山因為距台灣太遠，得不到空軍掩護，海軍也就無法作戰，以致遭攻占。美方軍事部門及國家安全委員會已決定，由艾森豪總統說明：一、美方不能協防大陳；二、大陳無重大戰略價值，並建議我方撤退大陳守軍，美方可使用海空軍予以掩護。另據國務卿杜勒斯面告葉部長說，美方絕不贊成「兩個中國」之議；至於由聯合國討論停火提議方面，中美雙方迄未獲得協議。

蔣公隨即裁示：「大陳撤退，如各位無異議，可以通過由政府執行，但此舉須俟美方發表協防金門馬祖之後才可決定。大陳的軍事價值在於對沖繩而非在台灣，因此美國應該在意。此次美國總統的咨文，事先曾經葉外長等閱過修改，可見美方並沒有在兩個中國方面有所妥協。但英方的態度依然，去年羅勃遜副國務卿來華，就曾提及紐西蘭將向聯大提停火案，當時還談不到中美應先訂共同防禦條約，所以目前仍以促成美國國會正式批准中美防約為要著，俟此約批准後，則我方就在停火談判方面，要求美方向英方詢明其有無向聯合國提起託管台灣及兩個中國之陰謀，

然後我方始可與美方討論停火問題。

「但我國的態度須視共匪之態度爲斷，於敵有利即與我有害，故我方絕不能與敵人採取同樣態度，此次一江山之戰，實爲逼使美方採取堅強態度之原因。」③

這是因爲中共攻一江山對美國威信是一大打擊，不過蔣公並未明說。

大陳撤退

隨後幾天，中共繼續轟炸大陳，而聯合國也決定討論停戰問題，但海峽兩岸都拒絕此議。中美雙方終於對防衛金馬獲致協議，我政府隨即於二月六日發表聲明，將在美國的協助及掩護下，轉移及重新部署大陳地區兵力。

蔣公於七日上午在陽明山紀念週闡述大陳撤退的三個原則：「一、台灣之人力、物力有限，必須做最經濟有效的使用，不能在大陸做消耗戰；二、要確保台灣根據地之鞏固；三、要了解敵人的國際性，故我方必須與國際反共國家合作。根據以上三大原則，中美合作撤退大陳部隊，並重新部署，以期達成將來反攻復國之使命。」④

大陳共有部隊一萬五千人、平民一萬七千人，均將在美國第七艦隊的掩護之下

撤退來台。紀念週結束後，我順道到陽明山公園散步，看著盛開的桃花及待放的杜鵑，默思著蔣公的訓辭，這次一江山的失陷，換來美國協防金馬，也算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了。

二月九日，美國國會終於通過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經國先生親自赴大陳指揮撤退。十日起，自大陳撤退的國軍先遣人員開始自基隆上岸，而美國海軍爆破小組爆破了島上的一切軍事設備，大陳島成爲火海。

如今看來，以軍事反攻大陸，韓戰期間是最有可能的時機，韓戰之後機會就愈來愈渺茫，日後就改以「三分軍事、七分政治」作爲重返大陸的考量，必須待大陸自亂陣腳，台灣才有機會。

第十五章注釋

①周氏錄於民國四十年日記。
②周氏錄於民國四十二年日記。
③周氏錄於民國四十四年日記。
④同前注。

第十六章 國家的前途

在大陸即將淪陷之前，台灣地位就成爲美國內部討論的話題，這是因爲世界兩大陣營那時已壁壘分明。

美國內部意見大致分爲兩派，以國務卿艾奇遜爲主的一派，認爲應該視同中國大陸處置；但是以東京盟總麥帥爲主的另一派，則基於整體防共圈的思考，主張台灣戰略地位重要，至少設法把台灣留在民主陣營。他們開始考慮如何不讓台灣淪入共產陣營手中，台灣自治、獨立或交聯合國託管等都在思考之列。

前駐日軍事代表團團長朱世明早在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二日來電，把聯合國盟軍

總部關切中國局勢及台灣地位的情況向國內報告，這通電文經外交部長葉公超轉台灣省主席陳誠，再交蔣公過目：

（朱世明）據密報有關台灣問題如下：盟軍總部對我最高統帥部遷台之說甚表憂慮，一旦美承認中共，勢將影響美在遠東戰略防線。美方現對台灣獨立運動鼓動之意，其目的顯在爲達成移歸聯合國託管做一次伏案。又盟軍總部人士在私人談話間曾非正式提及，爲免中共進踞我國政府，是否可以考慮在和約簽訂前移由盟國暫管云，特電參考並請轉陳總裁等語。

葉公超在同一電文建議我國的立場：

除以台灣爲中國領土，美國如在遠東戰略防線上包括台灣，將台灣列入共同防共圈內，我國自表同情，但任何國家如正式承認中共政府，而台灣政府與人民亦必堅決反共到底復知外，此時如何促使盟總及早注意，使台灣成爲共同反共基地，務乞密商朱團長加緊進行爲感。①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蔣公的立場是一貫的，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不可能獨立或交給聯合國託管，而他也絕未承認自己已經失敗，即使只剩彈丸之地，對他而言仍有反攻的希望。蔣公給朱世明的覆電於二十日發出：

接外交部轉來兄電，藉悉盟總對於台灣軍事之顧慮，並有將台灣由我移交盟國或聯合國暫管之擬議，茲請兄就此事謀與麥帥做一次密談，鄭重申說中正本人之態度與對麥帥之期望，並告以此即中國政府之態度與期望。談話要旨如下：

一、台灣移歸盟軍或聯合國暫管之擬議，實際上為中國政府絕對無法接受之辦法，因為此種辦法違反中國國民心理，尤與中正本人自開羅會議爭回台、滿之一貫努力與立場根本相反。

二、中國政府無將都城或最高軍事統帥部（國防部）遷至台灣之意。

三、台灣很可能在短時期內成為中國反共力量之新的政治希望，因為台灣迄無共黨力量之滲入，而且其地理的位置使今後「政治防疫」工作亦較易徹底成功。

四、美國政府即今單從實際的利害上考慮，亦絕不能承認中共政權，因為承認中共絕不能化中共為狄托，亦不能範圍中共的行動。美國於一九四五年曾經拋棄在倫敦之波蘭合法政府，承認蘇聯所製造控制之波蘭政府，其結果只鞏固了波共政權，毀滅了波蘭反共力量，此事可為殷鑑。至於中國政府無論在大陸與海島皆有其廣大根據地，必與中共持久作戰到底，絕不會成為類似在倫敦之波蘭流亡政府，余敢斷言。

五、基於以上考慮，余及中國政府深盼麥帥本其在東亞盟國統帥之立場，以及其對於赤禍與東亞前途之關係，極力主張兩事：

甲、美國政府絕不可考慮承認中共政權，並應本其領導國際之地位與力量，防阻他國承認。

乙、美國政府應採積極態度協助中國反共力量，並應協助我政府確保台灣使成為一種新的政治希望。

倘美國願以任何方式為此協助，余願保證其百分之百的實行。又如麥帥欲明悉我方保衛中國大陸特定地區以及台灣舟山群島與海南島等地之計畫，我可密派高級人員詳告。以上談話要旨如有必要，似可先製成備忘錄，於談畢留交。請查辦電覆

爲盼。

蔣中正②

這段時間裡，西方國家並不看好中華民國政府能夠將局勢逆轉。《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甚至建議，在對日和約未簽定之前，台灣仍交還日本，「以免蔣介石及國民黨用做內戰基地」。

不過，麥帥對台灣的戰略地位考量是很明確的，他認爲中國應確保台灣，並同意我政府將海空軍主力集中到台灣。七月中旬，蔣公以總裁身分訪菲歸來，旋即接到朱世明七月八日發出的與麥帥面談報告：

根據巳號（按：六月二十日）機電指示五點，於昨日與麥帥面談結果如左

一、對中國政府首都及最高軍事統帥部遷台灣之表示

麥帥表示中國政府絕不可放棄中國大陸，並須確保台灣。中國應與共黨奮鬥到底，對於我政府海空軍集中台灣表示同意，對於封鎖共區港口亦表贊同。

二、關於美國承認中共政權問題

麥帥認爲美國不會承認中共政權，可惜英國對中國態度不佳，致影響國務院政策，但仍不致承認。

三、對美國企圖製造中共爲狄托之觀察

麥帥判定製造狄托一事絕不可能，渠對華府之遠東政策深表不滿。

四、關於台灣主權問題

台灣之屬於中國已無問題，渠本人亦主張如此，以前所發生諸問題，全爲少數人爲共黨利用所致。

五、對希望美國政府協助中國反共及麥帥本人對中國反共態度

由現在起，美國情形正轉變中，將來美國援助僅屬時間問題，俟美國人士對中共認識比較清楚，如上海商人本僅圖私利，但最近態度亦有改變。彼個人因地位關係不能公開對中國問題多發表意見，但如有機會如去年美國會令其發表意見時，彼必極力主張積極圓滑。

六、對密派高級人員來日告知台灣防守計畫

麥帥表示前次孫立人已來，目前暫可不必，以免外間注意。

七、對吳鐵城先生之來日

麥帥深表歡迎，希望到後即行通知，俾便接待。③

政府遷台後，寄望美國伸出援手，但美國並未支持。一九五〇年初，國民政府在形同沒有外援的情況下，美國方面似準備承認中共政權並讓台灣自生自滅；然而東京盟總另有見解。

太平洋戰略

一九五〇年二月上旬，東京盟總召開了參謀首長會議，研商太平洋西岸的整體戰略計畫。事後朱世明於二月十日把會議決議祕密回報如下：

一、菲律賓爲美軍必守之地，而以琉球爲前進根據地；

二、台灣介於菲律賓、琉球之間，故應使不入敵手，但如因政治關係不得不放棄，則應於戰事開始時集中陸海空軍力量一鼓而奪取之；

三、南韓及日本爲掩蔽地帶（delaying action area），平時應極力以政治方法收攬人心，使爲我用；必要時予以相當數量之武裝，戰事開始時則儘量阻止敵人前進，但最後仍將放棄。

再本日報載布來德雷在檀香山談話，謂亞洲政策最後決定權在杜魯門，又謂政治觀點有時影響軍事觀點（Political considerations may overrule military considerations.），均可資參考。④

盟總的這項戰略政策，可見在麥帥主導下的太平洋西岸戰略部署，台灣戰略地位在他心目中的重要性。韓戰發生，整個台灣岌岌可危的局勢才出現轉機，然而台灣要如何定位，仍是個難題。

我駐美大使顧維鈞在杜魯門宣布協防台灣後，來電分析美國此舉的心態，指出雖然該聲明改變了美方於一月四日宣布的對華政策，使得美政府、參眾議員及社會各方友人紛來電稱慶，但細查宣言措辭卻有「台灣將來地位須待日後決定」之意。顧維鈞因此建議，我方對美宣言的態度，「目前不宜予美以刺激，亦不必過爲頌揚」。

美國駐華代辦師樞安，於七月三日奉命向葉部長進一步解釋六月二十六日的杜魯門聲明，從他的談話可以了解美國國務院從年初到韓戰發生後，對華政策的改變與持守。

師樞安申述：「一、美國政府無任何改變其對華關係之意圖；二、美國政府所採取有關台灣之緊急措施，並不危及任何涉及台灣之政治問題或其他問題；三、美國對台灣既無領土野心復無片面權利，其採取是項措施之首要目的，乃在保證台灣未來地位應以和平方式解決。」⑤

他接著解釋，美國先前對台灣未來地位的態度是，若中共有力量威脅乃至於攻占，那就當受中共的威脅或由中共「解決」；然而現在因為韓國受到共黨襲擊，在遭受積極的侵略下，整個局勢已然變遷，美國未對台灣問題做任何決定，討論台灣問題之門仍然大開，美國並願台灣在中華民國政府統治之下，其安全有保障，待台灣之威脅解除後，台灣問題當可就形勢需要予以解決。

麥帥vs.國務院

但是，當時麥帥以戰後盟軍統帥地位，觀察太平洋局勢後卻未與國務院同調。他先是在未經知會國務院的情況下訪問台灣，接著八月二十八日又致電「退伍軍人協會」，以「不沈的航空母艦」強調台灣在戰略上的重要性——他認為太平洋各島組成一條「自然」防線，如能控制這條防線，則空軍就能控制自海參威至新加坡間

所有的亞洲港口；而台灣在這條防線中為主要據點之一，過去戰爭中常被用為南進基地，如果淪入敵手，將被敵方利用以進襲自由國家。

麥帥說，他所以發表此論，是因為目前尚有若干人士對太平洋防線有錯誤觀念，其實從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果，已使戰略邊境包括全部太平洋了。他並說，目前在台灣的海空軍潛在力量較自黃海至麻六甲海峽的亞洲大陸任何地區都要強，若被敵方利用，則對美國防線的中部及南部影響至大。

軍事和政治觀點及操作是截然不同的。麥帥把台灣對美國的重要性闡述得淋漓盡致，不過這個極易落入共黨國家的口實、只能做不能說的觀點，馬上就被杜魯門下令收回，但已被通訊社報導出來。三天後，杜魯門連續公開發表談話，宣稱台灣地位問題，必須由過去參加對日戰爭、目前有占領軍在日本的各盟國所締結的對日和約來決定；至於巡弋台海的第七艦隊，主要目的在於掩護聯合國在韓部隊的側翼，一旦韓戰結束，美國就不需再派第七艦隊到台灣海峽。關於麥帥的聲明，杜魯門說「此事業已成為過去」。

麥帥在退伍軍人協會的聲明，導至盟總所派的「駐台調查團」可能被撤銷。消息傳來，蔣公十分關切，但這個消息層級很高，連駐日代表團團長何世禮都不知此

事。然而，負面影響接踵而至，中共在聯合國控告美國侵略台灣，要求列入安理會議程。

葉公超抗命

台灣前途問題，也在此刻初步顯現。

未來的中國，在聯合國裡應該是一個還是兩個？在聯合國擬派代表團赴台調查美國侵台案一事，可以見得葉公超的想法與蔣公不同，他有依美國的台灣中立化傾向，使台灣脫離大陸的想法。

聯合國派調查團來台，中央雖然已有不准來台甚至不惜使用否決權的強硬決議，但接下來的星期一在總統府舉行一般會談時，才發現葉公超竟然沒有依決議去做。葉公超報告說，他在上星期六與蔣廷黻代表通電話時說，部裡擬了一個方案，這個方案要求「未來聯合國派代表團來調查美國侵台案時，摒除美蘇雙方代表」，但因爲蔣廷黻甚覺不妥而未談。

蔣公責問，爲何不把使用否決權的決議告訴蔣代表，卻擅自另外訂定方案？

葉公超無語。

蔣公繼續說：「聯合國派代表團來調查，即使沒有蘇聯代表，印度、挪威、南斯拉夫諸國代表，與蘇聯爲中共代表一樣，我們豈可接受？這個問題不能讓聯合國處理。第七艦隊即使撤離尚不重要，此一失著會導致國際干涉，我們自己走上聯合國託治，這麼一來勢將束手待斃，而導致國家滅亡！」

蔣公很憤慨，嚴厲指責外交部如此不遵命令，做出這種可謂亡國的政策來。

舉座都同意蔣公的看法，葉公超直到散會都一直沒再說話。

九月四日出版的《時代》（*Time*）雜誌，詳細報導了麥帥對退伍軍人協會的演講辭，以及艾奇遜要求杜魯門下令麥帥撤回的經過，其中並有國務院推動台灣中立化的報導。國務院對台灣的政策已十分明顯，所以葉公超招致蔣公嚴厲斥責實在是咎由自取。但據我所知，陳誠也不贊成我國在聯合國動用否決權，葉公超這麼做，很有可能受到陳誠的支持。

葉公超正準備赴美出席聯合國大會，他的出國馬上就成爲府院間的難題，因爲他事先未請示蔣公，使得府院頗不愉快。事後王世杰承認知道此事，是他的處理不周；現在又得擔心葉公超會不會在出國期間突然宣布辭職，這樣的話影響層面就大了。

至於現階段國際所謂「台灣問題」，蔣公令我詢問葉公超，以通盤了解整個內涵。葉公超告訴我，目前所謂台灣問題有三個層面：一為蘇聯控訴美侵台案，此事蘇聯分向安理會及聯大雙方面進行，今後可能由安理會轉聯大併案討論；二為中共取代我方的中國代表權問題，目前此事已被聯大否決；三為艾奇遜所提的台灣問題，現尚未列入議程。他說，以上一、三兩項均可能派代表團來台調查，但不致很快成行。

蔣公兩度召見葉公超之後，親自指示在美國被控侵台案明朗後再成行。但蔣公後來因為蔣廷黻、顧維鈞來電不贊同提否決案，以免美國允許中共列席後，也改變自己的態度。結果，由於我方的堅持及斡旋，美國終於打消前議，不再提案要求聯合國安理會派遣調查團來台。

十月二十六日，顧維鈞來電，轉達美國國務院顧問杜勒斯解釋當前美方何以對台灣問題採中立化。杜勒斯說，凍結台灣地位問題就是維持我國民政府的地位，然而美國欲達此目的，必須有所依據，所以雖然開羅會議時已決定在波茨坦會議中追認日本放棄台灣，但因和約尚未完成，所以也未完全成為我國土，仍須由和約正式規定。他解釋，美國惟有採此立場，才能貫徹保台宗旨，而維持我政府地位；否則

中共堅持台灣為中國領土而視美對台措施為干涉內政，按照聯合國憲章第二款規定，美國就難以辯護了。

杜勒斯建議我國不要堅持反對美國的立場，而損害到中美雙方的共同利益，致使我政府的國際地位動搖，處境更加艱危。他也強調，目前中美之間最重要的兩個目標是：一、保我政府的聯大代表權；二、保障台灣的安全，以待世界局勢演變。不過，杜勒斯尋求我國支持台灣地位未定的立場，並未獲得同意。

事實上，蔣公與葉公超之間在政策上的差異，牽涉到中華民國未來整個前途。葉公超的想法是，未來台海兩岸成為兩個中國並無不可，至少台灣能夠不被赤化，留在民主陣營裡；而蔣公卻是一直尋求及等待光復大陸的契機，台灣則是我中國的復興基地，大陸雖一時淪陷，但是中華民國擁有對大陸領土與人民的主張必須存續。

可以這麼說，蔣公的一個中國政策考慮的是未來整個國家民族問題，但對現實的問題無解；葉公超的主張是基於現實的考慮，卻沒有解決未來所必須面臨的國家定位等問題。而且，即使台灣自一九五〇年起就主張與大陸脫鉤，會不會使中共改變其建國以來持續至今的一個中國政策，使台灣增加外交空間，甚至共同成為聯合

國的會員國，恐怕很難說。

葉公超後來轉任駐美大使，復因爲在美國發言詆毀政府而解職返國，從此未再離開國門。

台灣的地位問題，直到簽訂中日和約時，才告底定。

第十六章注釋

①周氏錄於民國三十八年日記。

②同前注。

③同前注。

④周氏錄於民國三十九年日記。

⑤同前注。

第十七章

對日和約

韓戰爆發，美國體認共產集團擴張政策的威脅性，終於改採防堵政策，決定沿著太平洋西邊建立一條防線，不單試圖以台灣地位未定爲由，把台灣納入防線；而且對延宕多時的對日和約問題轉趨積極，希望藉達成和約使日本恢復爲主權國家，進而把日本納入反共及防共陣營。

對中華民國而言，締結對日和約是必要且急切的。丟掉大陸之後，爲避免國際地位遭中共政權取代，也必須藉由締約使台灣及澎湖的地位明確。

蔣公對台灣地位的態度

韓戰發生後兩個多月，美國宣布將締結對日和約，事先透過美國駐台代辦藍欽和外交部交換意見。八月十九日上午，蔣公在總統辦公室約集陳誠、張群、葉公超、黃少谷、王世杰，商討對日和約問題，我也參與。怎麼簽訂和約，對台灣而言是個關鍵，因爲這會決定台灣的法律地位。

葉公超報告，他和藍欽公使晤談所獲得的印象是，美國將不會棄台灣於不顧，因應的辦法是，準備由聯合國來處理這個棘手問題，處理目的在於凍結台灣問題，惟有如此，法律上、事實上才能達其不致讓台灣淪入共產陣營之手的目的。

張群則說，美國在新聞上暗示，將來對日和約單是程序上就很困難，恐非短期內能完成，似乎美國此時只是做個姿態，其內心未必如此。

蔣公指示，由於美國眞實態度究竟如何混沌未明，我們當前的作法，先從於我最有利的辦法來準備促成。從這個角度來看，似以中日兩國直接訂約，由我政府收回台灣爲最佳；其次是順應美國凍結台灣法律地位的辦法來籌議；再次之則是我暫不締結正式和約，以俟後續情勢開展。但蔣公也提示：「我們決策可以如此，輿論

上仍以堅持開羅會議之決定，台灣地位不允有所改變，以堅定人民情緒為妥。」

張群建議，日本國內目前急切期待簽訂和約，我方宜重申寬大意願。蔣公同意這個方向，並指示王世杰及葉公超再對和約加以研究。

日本方面的反應也很重要，政府高層都頗擔心日本不願以我方為簽署合約對象，蔣公於是決定派張群赴日交涉，但張群相當猶豫。

直到一九五一年三月間，美國受指派為對日和約專使的國務院顧問杜勒斯，都還和顧維鈞大使就中日和約問題保持密切聯繫，杜氏與顧大使交換意見時也透露了尚有亟待克服的「難題」。四月七日，媒體刊出美國所提對日和約草案全文，這個草案已送交實際參加太平洋戰爭各國，但台北並未收到。外交部事後分析，當前對日和約如採全面多邊方式，於我顯然不利，因為參加和會的遠東委員會各國，已有英、蘇、印、緬、荷及巴基斯坦承認中共政權，勢將反對我在和會中的代表權；而除我國之外的其他六國，澳、紐兩國已向杜勒斯做不利我國的表示，而法、加兩國對我態度也未盡可靠，因此中華民國在多邊和會中的地位，殊難樂觀。十七日，外交部提交一份「對日和約之方針」草案。

十九日，蔣公約集陳誠、葉公超、王寵惠、王世杰、張群、黃少谷、吳國楨，

商討對日和約問題。對日和會可能把我方排除在外，使得蔣公精神上頗覺難堪。

對日和會排除中華民國

五月十六日，日外務省條約司長西村熊雄，在日本議會答詢時談到中國代表權問題，他說遠東委員會中承認與不承認中華民國政府之數相等，而日本的政策是盡可能與五十三個盟國締結和約，但目前的情勢顯示若干國家將會「遺漏」。獲知西村的談話後，蔣公召集對日和約小組集會討論這個新發展，他懷疑這可能出於美國之意，應予注意。張群持相同看法，認為美國可能希望以此來換取結束韓戰，而最近杜勒斯奉派赴英，或許與我政府與日本簽約問題有關。王世杰、葉公超及我的看法是一致的，都認為美國態度應不致有大變化，也不會讓中共成為與日本簽約對象，因為中共參與韓戰已遭聯合國宣布為侵略者，且對民主陣營有敵意；另方面，中華民國目前仍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和絕大多數的國家有邦交。

整個情勢逐漸明朗，我國將被排除在對日和會之外。五月二十六日，倫敦傳出消息說，英國、印度等國反對我國參與簽署對日和約，也同意不允中共參加。接著，顧維鈞的電報就傳到台北，他甫於二十九日與杜勒斯晤談，杜勒斯提出種種理

由解釋讓國民政府參加和會可能遭致的困難，顯示美方的態度已經動搖。

六月起，蔣公夫婦赴桃園角板山住半個月。才回到士林官邸，我就接到顧維鈞的來電指出，美、英在對日和約方面協議做多邊協約，而我政府及中共均暫不參加，俟日後由日本決定簽訂和約對象。蔣公至為憤怒，隨即發表聲明反對此議，並譴責美、英兩國，然而美國媒體反應冷淡，更沒有評論。蔣公在相關公文上批示：「存。可知美國輿論是沒有公理與正義的。」①

七月七日上午，張群資政請見蔣公。日本的態度已很明顯，張群建議蔣公調動何世禮，改派何應欽赴日。這個建議和我先前的看法是一致的。何世禮雖然和麥帥聯繫極佳，但政治素養不足，在日本政界的心目中並非適當人選；而曾代表我政府在中國戰區接受日本投降的何應欽，身分地位都高，近年來也常與日本高層往來。不過，在蔣公的心目中，張群自己才是和日本打交道的最適當人選，因為日本政界對他非常敬重。只不過當前在台灣能夠直接向蔣公進言者極少，張群是其中之一，所以我建議他以不離開台灣為宜，張群亦有同感。

對日和約的發展，讓蔣公很憤慨。十日上午，蔣公在總統府聽取陳誠、葉公超報告對日和約問題，兩位首長指出，中日之間締約問題現已由談判簽字轉至和約效

力問題，美方認為我參加多邊和約已不可能，而訂立雙邊和約也考慮到和約效力不及於大陸問題，所以是否可由我方聲明以現在政府轄區為限；言下之意，似有連訂定雙邊協約也不可能。

蔣公聽後情緒激昂起來，他很不能接受美國態度的轉變。外交部先前一天就已經研究因應對策，準備向美方提出抗議並說明我方立場，蔣公囑咐對日小組再加討論。葉公超報告，美方定十二日發表和約內容，應儘速決定我方因應態度。

次日，蔣公連續召葉公超及張群磋商後，決定命葉部長約見藍欽公使，表達我政府希望於多邊和約稿上增訂關於中日特殊關係的條文，如果我方不能參加多邊條約的簽署，則應與日本同時簽訂雙邊條約，並要求中美雙方對此應發表聯合聲明，否則我政府寧可不簽。

十二日早上八點半，我才到草山官邸，蔣公囑我向葉公超詢問與藍欽洽商情形。葉部長回覆，藍欽已允將我方立場向華府報告，但也表示我方與日本的雙邊條約與各國的多邊條約同時簽訂，恐怕是不可能的事，至於我方必須發表抗議聲明，藍欽表示理解與同意。

上午十點，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召開常會，陳誠及葉公超向中改會報告整個

交涉經過，並已備妥聲明，等候蔣公的批准。蔣公因心情不佳原來不準備出席，但經過考慮，仍然到黨部主持。十一點，蔣公抵達中央黨部即先接見葉公超，他對外交部聲明柔弱無力表示不以爲然，但因時間倉促無法仔細修改，因此半小時後予以批准，並且決定下午三點前發表。然後蔣公回到會議室主持開會，與會委員對當前發展都覺得十分沈痛。

十三日清晨，美國的對日和約內容及我方的抗議同時見報。我深感這是一個極爲恥辱的日子，當然了，這也是因爲我們在大陸失敗的結果。來台後，蔣公常剴切告誡說，我們是已亡了國，必須發奮圖強；現在更深深感受這話裡面的意義。這天，我也接到顧大使十一日與杜勒斯的談話紀錄，對於中日締結雙邊和約這點，杜勒斯主張我們應就台澎現有地位與日本締約，而且締約地點準備在東京舉行。這不是等於向日本求和？我心裡想著，痛恨美國這樣的提議。

陳誠院長因爲對日和約交涉失敗而引咎辭職，但蔣公在辭職信上批示慰留，勉勵他要不折不撓、努力奮鬥。我了解蔣公的思考，當前無論誰領導行政院，都無法挽救國際現勢所帶來的結果。

美施壓促日與我談判

八月六日，東京方面消息傳來，外務省次官井口貞夫宣布日本將在台北及西德建立海外連絡機構。這種連絡機構已在美、加、英、印等國成立，顯見在美國的壓力下，有與我進行談判的意味。

三十一日，蔣公邀陳誠、張群、葉公超、黃少谷及沈昌煥共進午餐，並討論對日和約問題。蔣公指示，我國參加對日多邊條約已經失敗，原來沒有再簽雙邊條約的必要，現在因顧慮美方的困難，勉強簽訂雙邊協約，不過此約不能附有任何如效力範圍等有損我主權的條件。這裡的關鍵在於，如果日本切斷過去侵略中國的歷史，只就台澎領域與我方訂定所謂「友好」條約，則中華民國就形同領域只在台澎，無法再主張對大陸的主權。

九月四日，舊金山對日和會開始，我國未被邀請。然而，《工商日報》在前一天就報導我國將派董顯光率代表團赴日談判中日雙邊和約的消息，早上八點半我奉蔣公召見，要我轉達行政院，目前暫不宜發表董顯光的人事命令，應俟中日和約有具體結果時再定，我立即以電話轉達行政院祕書長黃少谷。

日本在舊金山和會中與其他各國迅速完成締約，但條約中也預以第二十六條爲中日雙邊和約談判留了伏筆。八日，美英等各國在舊金山簽約，接下來的是，要由日本來選擇究竟和哪個中國締結和約。十四日，我接到來自東京的消息指出，杜勒斯已正式通知日本外務省，應與中華民國政府締約，否則美國將不批准舊金山和約。而葉公超部長在接受《紐約時報》記者訪問時也說，日本不能與中共締約，否則日本申請進入聯合國時，我政府可能會動用否決權，予以否決。

一九五二年一月十六日，我出席中央改造委員會。會中曾虛白報告，日本首相吉田茂發表他於去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致杜勒斯信函，裡面說明了當前日本對華政策，表達願意與我政府簽訂雙邊和約。

十八日早上十點半，蔣公在總統府召集對日和約小組，會中葉公超部長報告吉田公布此函，是因爲美國施壓所致；而依據何世禮的來電，日本外務部祕書長島準告訴何世禮，英美對中日雙邊和約已有一致的見解，和約實施範圍問題，日方已在函內表示接受我方的意見了。蔣公隨即決定：一、和約應即開始商談，希望在多邊和約生效前簽訂草案，一俟日本恢復主權，即正式簽訂；二、我方爲促使日本派遣高級人員，可先透露指派張群爲代表。蔣公以此人選問題詢問陳誠院長時，陳誠支

吾未答，蔣公指示朝這個方向進行。

張群不就全權代表職風波

當時張群已內定爲我對日和約全權代表。到了晚上，我接到葉公超的電話說，張群對王世杰祕書長不滿，不願出任全權代表，還有一英文消息交給英文的《中國新聞》發表。葉公超擔心，如果張群不就任代表，會不會使日方猜想我內部有不一致的情況發生？他又解釋，張群之所以會對王世杰不滿，主要是因爲王祕書長沒有將中日和約的有關電訊交給他之故。沒多久，魏景蒙來電問我要怎麼處理張群的英文消息？我回答暫時不要發出，先前葉公超也是這個意思。我說，我會和葉部長一起負責再勸說岳軍（張群）先生打消此意。半小時後，我與張群通了電話，在電話裡談了許久，他終於不再堅辭。

次日上午，我隨蔣公赴總統府。準備出席一般會談的張群資政，順道先到我辦公室裡打聽有無新發展。他說，日前王世杰懷疑他接觸日方人士時，對中日和約有鬆口之意，他氣的是這個，不是氣機要室不抄送有關電訊給他——其實，抄送相關文件給誰，是上面有指示，但我沒明說。他言下之意是願意負責折衝中日和約，但

不必居於全權代表之名。隨後蔣公召開一般會談，張群在會中也是這麼說了。蔣公責成對日和約小組應負起談判責任，另外指責何世禮事先未請示就逕行與美國東京盟總外交組長席波（Sebald）會談，並說明我政府的立場，以致日方知曉我方態度，殊為不當。

二月五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將與中華民國政府簽訂雙邊條約，以結束戰爭狀態並建立正常關係，前大藏大臣河田烈為赴台談判全權代表。

蔣公對雅爾達密約的沈痛回憶

日本全權代表河田烈來華談判後，蔣公把他於去年六月十八日清晨，因為美國排除中國參與對日多邊和約而親擬的聲明草稿交給我，其中有段至為沈痛的話：

「往日雅爾達密約，英美以祕密地假俄國之手毀滅中華民國之大陸，今日倫敦協議，英美乃公開的假其投降的敵人日本之手以取消中華民國，國際正義之毀滅、人類悲劇之創造，果如此乎？

「絕不向敵人求和，訂立任何侮辱國格之條約」。②

蔣公並未要我發表，但他追憶過去雅爾達密約對中國造成多大影響，如今我國命運再次受到他國左右，他內心裡的衝擊及憤慨可以想見，他對日本也就不假辭色。

中日和約談判極為艱辛，經過雙方折衝，在蔣公堅決的意旨之下，終於衝破難關。

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七日，中日和會正式會議召開，雙方全權代表僅僅經過一小時的討論，就把僵持的問題全部解決。中日和約正文，除前言外，共十四條條文；議定書分兩部分，一部分說明賠償，中華民國除保留處分在中國之日本及其國民財產外，放棄勞役賠償要求；另一部分則載明現今雙方通商貿易規則，雙方均予對方以最惠國待遇。換文共兩件，其一說明和約適用範圍達於現今及將來控制下之全部領土；另一則載明雙方現今對於民航之規定。同意紀錄中明訂日本同意自偽滿洲國、汪精衛偽政權、偽蒙疆政府的一切在日本之財產，歸還中華民國政府接收。

中日和約談判歷經兩個月又七天，如果自醞釀日起算，已超過一年半了。最後談判完成那天是星期日，我的心情平靜下來，當晚帶著全家看費雯麗及克拉克．蓋博主演的電影「亂世佳人」（Gone with the Wind），這部片子長達四個小時，不過

訂定中日和約過程之曲折及戲劇化，恐怕遠超過這部奪得多項奧斯卡金像獎的巨片。

二十八日上午八點，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召開臨時會議，由行政院長陳誠及葉公超列席報告中日和約的議定。

葉公超做了整個和約得失的檢討。他說，除了我方自動放棄以及雙方同意刪除者外，此次約稿與金山和約相同。他說明，本約第十一條內已做概括性引用金山和約的內容，此在我方乃為澄清六十年來的中日關係；台澎居民問題及偽組織財產接收問題二項，且超逾金山和約之上。條約實施範圍及放棄勞役補償，均為此時此地不得已之舉，尤其後者更為不得已而做自動的表示，但在時間上遠在美國批准和約之前，可作為對日本寬大的表示。

他也不諱言，條約實施範圍方面，雖然頗為難堪，但反過來說，這也是日方唯一可以承認我主權的方式，且對條約上我方所負的義務也為適合事實需要。

中改會對整個和約略做討論之後，就全體舉手一致贊成通過。

下午三點十分，中華民國及日本雙方全權代表葉公超、河田烈率代表團及工作人員，在總統府對面的台北賓館簽訂中日雙邊和平條約，此約的架構具有終結甲午

戰爭迄今五十七年來中日兩國間不正常關係，兩國邦誼經澄清後，就此重新開始。

中日雙邊和約簽訂後，金山和約也隨即在七小時之後生效，日本正式獲得許可，重返國際社會。盟國的舊金山和約及中日雙邊和約都放棄索賠，盟國著眼於未來的和平，因此不對山窮水盡的日本要求賠償，這也使得日本後來成為經濟強權。至於中華民國，則因簽約而維繫了我在海峽兩岸政權裡的正統地位，也帶來台灣以後幾十年的安定與繁榮。

第十七章注釋

① 周氏錄於民國四十年日記。

② 周氏錄於民國四十一年日記。

第十八章

台灣經濟與美援

政府遷台初期，雖然有自大陸運來的黃金作爲一時支撐，但因美援斷絕，加上六十萬大軍的龐大開支，讓原已捉襟見肘的國庫存金迅速消耗。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吳國楨雖然再三宣告絕不增加新台幣發行，一九五〇年二月間仍悄悄增發了一千四百餘萬元。這些財務措施都對政府財政形成非常沈重的壓力。

黃金消耗速度非常快。長久以來，國內外以爲政府攜來台灣的黃金數量龐大到花用不盡，可爲台灣未來發展「奠基」，其實不然。

依當時央行總裁於一九五〇年六月七日呈總統的報告①指出，一九四九年以來

運至台灣的純金來源及數量如下：除了自上海分三批運台數量最大，共二百七十五萬餘兩之外，另從美國、日本運回再加上原先置於廈門的純金，全部共有三百七十五萬五千五百四十餘兩。但這些純金自政府遷台後至五月底止，連同撥付台銀的台幣發行準備金八十萬兩在內，總共耗掉三百二十一萬二千五百四十兩，僅剩五十四萬兩千九百一十兩多。

消耗純金最大宗爲軍費，平均每個月必須撥付近十八萬兩純金。依這樣的速度，幾個月下來就要花掉二百一十五萬餘兩，運台純金僅夠再支撐三個多月。另外，海南及舟山的撤退，影響台灣人心甚巨，連日來向台灣銀行兌換黃金的老百姓大爲增加，甚至一天之內就兌出達萬兩。

情況如此嚴重，使得蔣公在六月十日召開的財經臨時會談裡指示，設法維持黃金庫存，非不得已不再動用；至於龐大軍費支出問題，則應另籌自給自足之戰時經濟體制，生活必需品方面必須實施全面配給實物制度。由於美援不可恃，在韓戰尚未發生之前，政府的一些財務措施都以自力更生爲原則，對於美援方面也就很少再談了。

國庫危殆

韓戰發生後，台灣財政持續惡化。我在七月五日舉行的財經會談中得知情形更形窘迫，央行存金不及五十萬兩，而台銀黃金也只剩三十八萬兩左右，國庫危殆。台銀為了應付開支，數度悄悄增加紙鈔發行。如一九五一年六月十日，台銀在端午節之後就因庫存空虛而周轉不靈，王世杰打電話告訴我，因為還有農貸馬上要發放，所以台銀準備以外匯物資為抵押，增加發行五千萬元，要我請示蔣公。

由於這是半年來第二次增加發行，對物價影響很大。那時美國已同意恢復經援，王世杰認為月中美援可能會到，可把外匯頭寸放鬆，這樣就可收通貨回籠之效。我隨後向蔣公報告時，建議先准台銀在兩、三千萬元的額度之內運用。蔣公同意後，我就轉知王世杰及政府有關部門辦理。

那個時候，物價不斷上漲，而且自從實施自由外匯以來，資金外流情形日趨嚴重。十一月十日，蔣公接見省財政廳長任顯群，垂詢台灣經濟情形。任顯群說，自從他接掌財政廳十個月以來，物價大約上漲百分之三十，但這並非全然國內因素，國際市場也有相當影響；至於自由外匯的維持，純粹是為了維持幣信之故。蔣公說，他懷疑政府有實施自由外匯的能力，另外台銀也應把民間的美元收兌進來，以維持台幣幣值。

十五日中午，我應任顯群之約，偕同國民黨中央財委會副主委陳漢平到任宅吃中飯。任顯群談了他的財政政策，我勸他做決策時，應與財政部及央行先商量，這樣政府內部的步調方能一致。下午，蔣公在總統府召集財經會報，做如下決定：一、停止自由外匯政策；二、台銀對台幣的準備金必須維持在黃金六十萬兩；三、實施兵工政策，如此軍方每月可有六百萬元台幣收入。

自由外匯於十二月十八日宣布停止，改採審查結匯辦法，結果引起嚴重擠兌。

台灣財政問題，美國經合署代表穆懿爾（Moyer, Raymond T.）向蔣公告知，一九五一年美方將以九千萬美元援助我政府時所提的報告②，值得參考。他在報告中不客氣地指出，台灣地區目前面臨嚴重的經濟困難，分析主要原因如下：

——軍事需要甚大，經濟負擔過重，超過台灣地區的能力範圍，且政府文職人員較實際需要者為多。

——政府過去使用黃金彌補預算之不足，目前存金已大部分耗用。

——今年可出口之蔗糖產量減低甚多。

穆懿爾進一步指出，他觀察到的現象如下：

——政府目前每月支出，超過政府所有收入及經援物品之售價款，約在新台幣三千至四千萬元。

——若干稅收可能增加，但如比較言之，僅以此項增加款項意圖彌補預算不足，而不降低人民生活水準，希望甚微。

——蔣總統已核准之出售黃金以彌補預算不足，在根本措施未能採取以前，僅可暫時緩和困難情勢，惟因數量有限，當非永久之解決辦法。

——台灣銀行地位脆弱，其負債超出可靠的、足以變成現金之資產達新台幣四億元。

穆懿爾在報告中認爲，由於中華民國的努力，以及美國經濟援助配合，已經防止嚴重性的經濟崩潰，但我政府仍須坦白面對現實，即根本經濟問題還是很嚴重，通貨膨脹失控的危險依然存在，必須採取斷然積極的行動。

六十萬大軍拖累財政

台灣的財政吃緊，主要是爲了維持六十三萬部隊所致。美國軍事顧問團於一九

五一年正式在台灣運作後，就不斷地要求我方裁減兵力，以改善台灣整體經濟狀況。七月十日，陳誠與蔣公商量美軍顧問團所提訓練計畫，這個計畫要求我方裁遣十個師，以充實其他師的人員，陳誠建議蔣公同意其請。陳誠辭出後，周至柔告訴我，美方對這方面很堅持，否則軍事及經濟援助都會有停止的可能。所以當蔣公爲了反攻大陸而決定在台灣徵兵時，藍欽公使就提出反對意見了。他先是於七月二十日奉國務院之命向外交部提出備忘錄指出，美國政府目前正在研究有關經濟、軍事方面援助台灣及遠東其他區域計畫，但美國政府認爲在未獲得我政府決定與美方切實合作，將台灣軍事及民政開支納入計畫管制之內的保證以前，「對於援助計畫之有效實施，自感難於著手」。

藍欽在三十一日再度來函，重提徵兵一事，堅持我政府應無限期延緩實施。蔣公則認爲制度上我政府不能接受，他隨後召見黃少谷，埋怨美國上述意見有干涉我國主權之嫌。中午，蔣公繼續召集陳誠、周至柔、黃少谷、嚴家淦、葉公超、吳國楨及張群討論如何回應。張群說，應該與美方全面商量中美合作事宜，以避免日後再有枝節問題發生，至於當前處理，宜向美方委婉說明我方立場。陳誠建議，徵兵兵額或許可以減少。

蔣公不得已，只能俯就現實。他回答，兵額的減少及分期入營措施，為我方內部之事，應由自己決定；但現在徵兵令下達，已不能改變。晚上，我打電話給葉公超，探詢他再度與藍欽的談話情形，葉公超告訴我，美方有轉圜的可能，我立即以電話向蔣公報告。不過，經周至柔、葉公超、財政部長嚴家淦共商如何裁減軍政費用、研究收支平衡辦法後，建議將陸軍總部的台籍軍士教導團及教導總隊共四千五百餘人裁撤並辦理軍士退伍，同時新兵減徵三千人，蔣公考慮後，終於同意。

一九五二年八月，美軍顧問團又提希望台灣的財政收支能夠做到平衡，所以主張後備兵應該緩辦，現階段僅可充實現有部隊的員額。九月一日下午，蔣公召開財政會談，商討下半年度預算以及後備兵役制度的實施。蔣公聽取王世杰及周至柔的意見後，決定採納美方的建議，在平衡預算原則下，實施後備兵制度，也就是把現有部隊員額移作訓練後備兵之用，缺額方面由於士兵有疾病及逃亡者約五千餘人，退役者有一萬餘人，如果使在台所徵士兵提早退役，每期訓練三萬名後備兵、以四個月為一期，則年訓十二萬後備兵的目標也可達到。

由於部隊縮編，將官員額也就過多。九月十七日上午，蔣公在總統府召見將領何健等二十三人，曉以建軍救國之大義，勉勵他們接受政府命令，辦理退役。這些

已經無兵可帶的將官，很勉強地表示接受。

這是建軍以來，一件很重要的工作。二十日，蔣公對上將及中將的退役問題，再做修正性的指示，要求除何應欽之外，總統府戰略顧問林蔚、國防部戰略計畫研究會主委劉士毅、總統府第二局局長俞濟時應辦退役，改聘為國策顧問。

雖說如此，在反攻大陸的國策下，六十萬大軍依然維持了許多年。後來國家財政改善後，財政部曾設法把當初為了發餉而撥用的純金自士官兵手中買回，還給國庫。

日本教官的去留

美軍顧問團也影響到蔣公幾年來對日本教官聘用問題。

日本教官來台協助軍事訓練，要追溯到剿共戰事吃緊之際。一九四八年底徐蚌會戰接近尾聲，駐日大使館參事宋越倫於十二月十二日自日本來信，建議運用日本反共軍人協助對中共作戰。這是由日本友人山田純三郎發動、前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呼應的提案，當時經國先生及俞濟時均表贊同，但向蔣公報告此案時，蔣公卻未首肯。我於是回信給宋越倫說，此舉可能影響民心士氣，需等到國

共戰爭明朗化之後，才可以加以利用。

岡村寧次原本被列爲第七批日本戰犯，但陳誠於一九四六年間擔任參謀總長時就已替他緩頰。他於那年七月九日曾上簽呈：「岡村寧次於日本投降期間，辦理投降繳械事宜，頗著成績，請准予從寬審處。」蔣公即予批准。岡村寧次於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一日經國防部軍事法庭檢察官提起公訴，二十三日在上海舉行公審，審判歷經五個多月，終於終結。湯恩伯於一九四九年一月三日呈報：「岡村寧次於日本投降時，遵從命令，完成投降任務，且在我國作戰期間，並無顯著暴行，擬請准將岡村寧次宣告無罪，遣放回國。」③蔣公於六日批覆許可。那時國共戰役大勢已去，蔣公也即將下野，雖無助於整個大局，卻是預爲日後整軍所埋下的伏筆。被任命爲京滬杭警備總司令的湯恩伯，隨即保薦親信王文成、龍佐良爲駐日軍事代表團顧問，以後卻成爲湯自己的後路。

一九四九年九月，東京代表團來電報告，已由岡村寧次負責招募日籍軍官組成日本軍事顧問團來協助訓練，未來這些日籍軍官將集中在廈門運用，廈門港口爲此暫時關閉，不過爲了避免引起非議，行政院對外一律否認。

蔣公隨後令俞濟時致電廈門的湯恩伯，約「特別客人」來重慶一晤。兩位日籍

顧問於九月一日抵渝和蔣公見面，其中一人就是後來化名「白鴻亮」的富田直亮，他原是日本侵華部隊華南派遣軍參謀長，後來成爲祕密來台的日本軍事顧問團團長。

根木博等日本將官十一月初已自廈門來台，蔣公命彭孟緝負責聯繫運用，隨後成立圓山軍官訓練團，爲中上級軍官做短期的戰術訓練。不過也有軍政高層對運用日本顧問一事頗爲反感，經國先生告訴我，陳誠及周至柔都反對。

其實如以過去發動戰爭的仇恨，而反對運用日本軍人及軍事理論與實務，我認爲是昧於當前國家困局之下的反應。

蔣公指示成立的圓山軍官訓練團，確實有相當成效，日籍退役軍官的誠懇相授，很得好評。蔣公因此決定於四十年度擴展圓山訓練工作的規模，準備增聘日本教官五十人，另外建立一支名爲中山師的半機械化模範部隊，另聘日本教官四十六人，人事費用年需二十六萬美金，這支模範部隊後來編爲三十二師。

出身保密局的蔡孟堅奉蔣公之命，以商人身分前往日本進行祕密任務。他除了與日本政界往來之外，聘僱日本教官也是透過他及東京代表團的武官曹士澂執行。

一九五一年六月十二日，周至柔報告，蔡斯將軍對於訓練我方陸軍有整體計

畫，曾對余伯泉說，國軍運用日本教官與顧問擔任訓練工作，很讓他感到「為難」。這個問題隨即由陳誠、黃少谷、王世杰和周至柔一起會商，初步的結論是建議停止聘用日本教官並予資遣。

周至柔要我向蔣公請示。我覺得這是意料中的事，但蔣公恐怕不會同意，因為日本教官的指導正合蔣公的心意，化名白鴻亮的富田直亮向軍官團講述戰爭哲學及登陸作戰等實務時，蔣公還會親自到場旁聽。

二十八日，蔣公在中央黨部接見王世杰、周至柔及沈昌煥，討論日本教官問題，最後決定答覆美方：一、日本教官受聘為其個人的志願行為；二、日本教官的應聘在美軍顧問團之先，當時不知顧問團要來；三、日本教官將來可調往行政部門工作，絕不影響軍隊的訓練；四、俟其明年合約到期，即予遣返。

「白團」在第二年就開始縮小規模，並沒有馬上完全撤出，依然有幾位核心人物在台灣作戰略上的協助，直到六〇年代才結束。

政治部及保安司令部

美國以軍事及經濟兩方面援助中華民國，卻也做了不少干涉。美方並對於政府

遷台初期嚴密防堵共產勢力滲透，以不符合民主精神為由，做了相當的批評及干預；而蔣公對美方的訴求，總會予以適度的回應。

由於大陸時期國軍內部遭到共諜滲透，蔣公因此決定在軍中成立政治部，由經國先生擔任總政治部主任。政治部門初時頗與軍令系統發生磨擦，但蔣公的態度堅定，海軍部隊與政工出現意氣之爭後，蔣公憤怒地召見總司令桂永清嚴予告誡不得再有此事。蔣公說：「軍人必須服從文官的指導，軍中的政治工作就是這個思維的開端！」

一九五二年九月十七日，蔣公接見美國代辦鍾華德及美軍顧問團團長蔡斯。蔡斯嚴辭批評國防部集中人事權以及政治部的職權，蔣公曾即席做了說明，我那時很擔心這會影響中美關係。

在吳國楨的影響下，美軍顧問團也特別留意保安司令部的任務，提出派員進駐的要求。吳國楨任省主席時，兼任保安司令部司令，副司令是彭孟緝。保安司令部負責台灣內部的安全，自然與經國先生關係密切，美軍顧問團在告知我方打算派顧問小組至保安司令部，顯有監控的意味。

蔡斯在六月二十七日及七月十日兩度致函周總長，擬派顧問小組至保安司令

部。鍾華德與葉外長談話時，也提到此事，表示應該設法減少外間的這種議論。

蔣公不同意美國派顧問小組至保安司令部，理由是保安司令部是內政機關，而且目前並未作戰，也沒接受美援，因此請美方暫緩派顧問，美方如果想了解什麼事，我政府會儘量告知。葉公超與美國代辦鍾華德會晤時，美方曾提及蔡斯派顧問小組至保安司令部一事，葉部長沒有具體回應。

由於蔣公堅決的態度，使得王世杰頗爲焦慮，召集外交、國防兩位部長討論。王世杰要我向蔣公請示的腹案爲：一、保安司令部爲內政機關，美方不應派遣顧問；二、美軍顧問團與保安司令部之間，可以研究加強聯繫的辦法，如派遣連絡員之類。經報請蔣公同意，我以電話回覆王世杰。

經過交涉後，鍾華德致函葉公超，解釋無意干涉我政府內政，但因爲保安司令部也負有重要軍事性責任，而且依我國防部所訂動員計畫，可以執行各種軍事任務，足使保安司令部成爲蔡斯將軍任務範圍以內的事，所以蔡才有意在保安司令部設置顧問小組。如果我方對此一動作的動機有所誤會，則蔡斯及他願意撤銷設置顧問小組原議，改派連絡官與彭孟緝連絡。蔣公不反對此議，指示周至柔予以同意。

蔣公經營台灣

美方提供美援之際，以西方式的民主來要求正面臨艱難挑戰的中華民國，顯然與深受共產黨之害的蔣公在認知上有落差。蔣公堅持嚴密防共，美方卻不認同；另方面，蔣公以田單復國的精神，試圖以小搏大，以台灣爲復興基地收復大陸，也與美方的援台規畫有異。不過，美援在政府來台初期發揮了穩定作用，終使得中華民國的經濟情勢穩定下來。

蔣公經營台灣，在貨幣改革方面，以十足準備的新台幣收回舊幣，再長期積極整頓財政收支，促進貿易、加速經濟發展。一九四九年貨幣改革實施次年，物價就顯著穩定下來，躉售物價年平均上漲率從三位數降爲兩位數，最後到個位數；至一九五四年，年平均上漲率降爲百分之二，嚴重的通貨膨脹終被抑止。

土地改革方面，也是蔣公施政的重點。台灣光復初期，台灣農家人口約占總人口數的百分之七十，且因承襲日治時代採墾戶制度，土地集中在少數人之手，致有百分之七十的農家皆爲佃農或半佃農。佃租又高達全年正產物百分之五十至七十。佃農生活困苦，加以中共在大陸各地煽動貧富階級鬥爭，號召農民翻身，沒收土

地，這類消息逐漸傳入台灣，台灣本地的共黨份子也乘機蠢動，曾造成社會不安。政府乃毅然推動土地改革，推行耕者有其田政策，建立優良的土地制度。

整個政策自一九四九年一月起，先是由陳誠實施「三七五減租」政策，規定佃租不得高於正產物收穫量的千分之三七五，並取消押金及其他一切不合理的負擔；其次是低價出售公地給佃農；然後在一九五三年推行耕者有其田政策，規定私人擁有耕地，只能保留水田三公頃或旱田六公頃，超額部分統由政府收購，照原價轉售佃農。

實施耕者有其田政策的主要財源有三：一是政府出售公地所得的全部價款；二是出售公營事業台泥、工礦、紙業、農林等四大公司全部股權；三是發行糧食債券，分十年償還地主。所謂糧食債權，係按收購土地時之地價折成實物（米）分十年還清，地主收到的糧食債券也可在市場上出售，以獲得資金投資於工商業，台灣的民營工商業就此興起。佃農自政府手中購耕地，可用糧食債券折價償還政府，分十年還清，因此政府也可以自農民償還的糧食債券轉償地主。這個措施使絕大多數的佃農都變爲自耕農，佃農與地主對立的情勢不復存在，並大大提高農民增產意願，農村欣欣向榮。

在經濟發展方面，以僅有三萬六千平方公里的台灣，要如何保持六十萬播遷來台的大軍，又要養活百萬難民，確實是個難題。各項措施因此紛紛出籠，不僅創辦愛國獎券、鼓勵儲蓄，台灣於一九四九年即成立生產管理委員會，優先修復電力供應及交通運輸各項措施，有效運用美援，發展肥料與紡織等輕工業，以及調節國內重要物資供需，藉以安定民生；至一九五三年，政府將生產管理委員會擴大爲行政院經濟安定委員會，也就是現在的經濟建設委員會前身，一期期地推行中程經濟發展計畫，在有計畫的引導下，全國資源獲得合理的運用，經濟成長也就一期期地提高，奠定了台灣今日的繁榮基礎。

第十八章注釋

① 周氏錄於民國三十九年日記。

② 周氏錄於民國四十年日記。

③ 周氏錄於民國三十七年日記。

第十九章

毛邦初事件

播遷來台初期，不僅與日本簽約煞費苦心，其間還有件事帶給蔣公極大的痛苦，那就是毛邦初事件。我當時在蔣公身邊，眼看著此事逐漸不可收拾，終於奉蔣公之命，代表他親自到美國處理此事。

原先，毛邦初奉派赴美擔任採購多年，隨後在中華民國危急之際，蔣公指示把一千萬美元外匯交給他保管作爲空軍購料款，以避免該款遭美方凍結進而落入中共之手。但他長久以來在美國挪用公款、生活靡爛，台灣這邊卻並不清楚，直到他和參謀總長周至柔交惡，企圖打擊周不成，開始抗命不歸，引發中外矚目的事端後，

政府委任律師清查毛邦初的財務，這才了解毛擔心自己貪瀆內情爆發，又正值政府內憂外患交加，因此企圖抹黑政府以混水摸魚。

毛邦初不可恕之處在於，正當我國最需要美援之時惡人先告狀，差一點使得美援不至，中華民國喪失大陸之後辛苦重建的形象，也幾乎被他破壞殆盡。

毛邦初與周至柔交惡

起初毛邦初是深受信任的。他是經國先生生母毛夫人的親侄子，身爲空軍副總司令兼空軍駐美辦事處主任，在空軍頗有成績，抗戰時就因爲蔣公的信任而奉派赴美擔任採購，以後就一直沒有調回國任職。一九四八年底徐蚌會戰失利，蔣公於次年初下野之前，命令將採購武器的公帑一千萬美元轉入毛邦初的私人戶頭，以避免遭美國凍結。這筆錢原先設定是必須由俞國華及毛邦初聯名方能動支，但是緊急狀況不在此限；日後證實，這筆錢對毛邦初而言是個很大的誘惑。大陸淪陷之後，想混水摸魚的政府官員大有人在，毛曾經挪用這筆錢做了私人投資，這也是他出事的遠因。

政府遷台後，毛邦初和參謀總長兼空軍總司令周至柔之間的不合，逐漸浮現。

周至柔是陸軍出身，和同樣是陸軍背景的桂永清出任海軍總司令一樣，出任空軍總司令。蔣公如此安排，在一九四九年將領紛紛叛變的情況下有効忠方面的考量，我可以感受得到，總是居副的毛邦初很難接受如此的人事安排。

一九五〇年初，美援尚未恢復。空軍司令部在柯克上將的協助下成立「中國國際商業公司」（C.I.C.），建立了一條新的航空採購管道，專爲政府採購軍用物資。沒想到引起了毛邦初和他的副手向惟萱上校反彈，甚至向美方檢舉C.I.C.有採購弊端。當時政府是禁不起任何風吹草動的，如此的檢舉當然造成困擾。

在那個時候，一些採購作爲確實有問題，這牽涉到蔣夫人的弟弟宋子良。

韓戰發生後，諾蘭參議員向蔣公反映，年初有中國官員透過舊金山一家雜貨店採購了三百萬加侖航空用油，中間人獲得佣金十萬美元；另外一事是我政府向美國採購了二十五架P-51型戰鬥機，每架價格爲三萬六千美元，而美國的價格每架僅爲一萬六千美元。諾蘭認爲，這些事必須予以澄清，否則會使中華民國政府名譽受損，並使援華出現困難。

諾蘭的訊息，其實和毛邦初及向惟萱有關，就是他倆釋放的，其目的在於打擊周至柔。購油案方面，早在五月間，毛邦初就透過駐美大使顧維鈞向蔣公檢舉，他以空軍駐華府辦事處名義電告周至柔，建議取消此一合同，因爲該合同每加侖的價格比華府市價高出三美分，也比空軍辦事處在華府購進的另外三百萬加侖同品質的汽油，總價要多十萬元；但周至柔在覆電中卻堅持此一購油案已經成交，要他不必再多考慮。

至於P-51機方面，事實上並無不法，空軍的估價包括裝運外加無線電設備及武器等費用，光是無線電及武器就共值一萬四千美元。以毛邦初對P-51的報價不包括無線電及武器費用爲三萬三千美元，單價還要比空軍總部高些。

毛邦初以後卻檢舉，周至柔虛報購買無線電及武器等配備的價格。

蔣夫人之弟宋子良涉案

由於毛邦初的檢舉，蔣公決定召他返國述職。蔣公在士林官邸接見毛邦初並共進早餐，垂詢在美工作情形，又命我就毛所報告的空軍在美購料實況進行審查然後向他回報。毛當時職務是空軍副總司令，派駐在美國負責採購空軍各項物料。

接下來兩天，我與毛邦初詳談空軍各購料案，毛邦初講了不少，主要是指控周至柔涉及不法。他說，他查明購油案的合同是經周至柔的首肯下，由宋子良經營的

「中福行」進出口公司設在台北簽約，而由該公司設在舊金山的代理機構華南企業公司向美國一家石油公司購進的，華南企業公司成立的資本僅有二千五百美金，在舊金山只有一間小小的辦公室而已，目前這批汽油尚未運交。他又說，在蔣公引退前後，空總簽支遷建等各筆款項最爲可慮，其中不僅僅是周至柔把四十幾萬美元公款自美匯到香港私人戶頭，還發生以公款匯交聯勤總司令郭悔吾的妻子之事。

毛邦初對購油案的檢舉應是不錯，確實是宋子良經營油料生意。次日我把中福行購油案向蔣公詳細報告後，蔣夫人也很氣憤地告訴我，宋子良曾假藉她的名義向毛邦初疏通過。以後，此一購油案的合同就取消了。

但是P-51機方面沒有什麼問題，只不過採購管道經由中國商業公司，所以令毛、向兩人不滿罷了。

這趟返台，毛邦初奉命調任中國派駐聯合國軍事代表團代理團長，至於他在美所主持的空軍辦事處，蔣公命令撤銷。也就是說，日後有關空軍採購方面不再由他負責，他必須把業務及所保管的款項交出。此外，蔣公指示把向惟萱調回台灣，也讓毛邦初心裡很不舒服。由於諾蘭參議員夫婦於十七日早晨六點多抵達台灣訪問，蔣公不希望毛邦初在台北和諾蘭打照面，命令他當晚就返美，我安慰他後道別。

毛邦初離台才隔兩天，蔣公接見諾蘭夫婦並共進早餐後，傍晚召見我，交下眾議員周以德（Judd, Walter）的來函，內容陳述去年十月空軍駐美人員將一筆巨額外匯匯到香港的私人戶頭，請蔣公徹查。蔣公要我審核，我細閱內容，與日前毛邦初和我見面時告訴我的差不多，連口氣都類似，講的就是日前他聲稱的周至柔下令匯款事。此案絕非外人所能獲悉，顯然毛邦初利用外人作爲政爭工具了，心裡不由起了厭惡之心。而這筆巨款究竟是怎麼回事當然不能輕易放過，經向蔣公報告後，蔣公指示對此案展開徹查。

祕密調查

次日我約聯勤總司令部財務署署長吳嵩慶來官邸商量，討論後決定在不知會周至柔的情況下進行調查，吳嵩慶知道茲事體大，他必須瞞著頂頭上司周至柔，因此請蔣公頒發手令。我立即向蔣公請示，蔣公當即書就，並親自交給吳嵩慶，調查自此展開。

諾蘭夫婦在台期間，蔣公夫婦邀宴三次，最後一次除了交換今後中美關係方面的意見外，蔣公並把一封回覆周以德的信交給諾蘭帶回，這封信由蔣夫人代覆，內

容是答覆周以德信中所述的空軍去年十月之美金匯款案，我方已展開調查，一俟調查告一段落後，就會另行函覆。

那個時候，政府經費相當拮据，卻依然有浪費。一九四七年起即居住在紐約的孔祥熙即是一例，他原先是中國銀行董事長，一九四八年一月辭掉董事長職後，每月仍自中國銀行支用達數千美元，這在當時是筆極大的數目。接任董事長的徐柏園爲了縮減紐約中銀開支而向蔣公報告該行精簡案時，提及孔祥熙用錢的事。蔣公指示，這是中國銀行職權範圍之內的事，應由中銀自行糾正，以後不必請示。有蔣公這樣的指示，我認爲以後再有這類情事出現，就是管理不力了。

一九五一年一月二十四日，蔣公交下柯克顧問控訴向惟萱阻擾中國商業公司承購雷達案。柯克在信中除指控向惟萱活動促使國務院取消了雷達出口許可證，並檢舉向惟萱在美國涉及貪污與親共。

我正在研究柯克的來函時，顧維鈞二十日的電報剛好送到我的手上。顧在電報中表示，雷達出口證經向國務院交涉未成，但國務院准由我政府自購並建議以後不必再由中國商業公司承購軍品。後來我才知道，向惟萱是向美國聯邦調查局（ＦＢＩ）宣稱，中國商業公司採購的這批雷達，可能會轉運到中共涉及資匪，這才使得

出口證的核發出了問題。其實，隨後ＦＢＩ就查明向的指控毫無根據，而且中國商業公司的報價也是最低的，百分之一的佣金利潤絕對合理。

我馬上向蔣公報告，蔣公指示雷達交易案應即依顧大使的建議，逕由大使館申請，由陳納德協助技術方面的工作。蔣夫人也說，空軍要加強防禦戰力，非藉助雷達不可，否則有飛機而無雷達，就等於沒有眼睛一樣，會遭到無謂的損失。

毛、向兩人的阻撓已毋庸置疑，我把意見簽在報告中，次日呈給蔣公，建議應成立軍事聯合採購團來取代當前的各軍種在美辦事處，至於採購團團長，軍方建議由正在美國養病、有意辭國防部長職的俞大維出任。

周至柔憤而請辭

三月九日中午，經國先生打電話來說有要事商量，請我到他家去一趟。離開官邸，照例我會先向蔣公報告；但才走到蔣公辦公室外，就聽到蔣公正和王世杰談話，聲音頗大像在指責什麼人，這樣我就不好進去了，於是留個字條就到經國先生那裡去。

經國先生告訴我，周至柔於上午十一點遞了辭呈給王世杰，辭職理由是蔣公不

信任他的操守。他要我立刻向蔣公報告。

我回到官邸見了蔣公，這才知道王世杰來，爲的也是此事。因爲王世杰奉命主持調查毛邦初指控周至柔貪污案，是在未知會周至柔之下進行，周得知後感到受辱，憤而請辭。經國先生建議蔣公慰留周至柔，如此一來就要把查案之事當面告知周總長，並且說明這麼做乃是爲了維持空軍總部的信譽，如果能在一般項目之下發現相關帳目，則整個事就可以清清楚楚了。

次日，王世杰約我共同接見空軍政治部主任徐煥昇以聽取報告。徐煥昇檢附卷宗爲證並報告說，空軍於一九四六年以後，就有個對外不公開、但對內公開的「財務公開監察委員會」，這個委員會是行政系統外設立的，目的是爲了保管自航委會時期開始的歷年結餘經費，總共有美金近七十三萬元、黃金十萬零一千多兩、港幣七十四萬餘元、銀元三十五萬五千餘元以及台幣五百七十五萬餘元之巨。其中存放在香港的財物有美金四十五萬餘元、港幣八十一萬餘元、英鎊一萬一千餘元，周以德所指的四十五萬美元，正是其中一筆，並沒有拿出來用過，有案可稽。

這樁疑案自此可謂大白，周至柔並沒有把錢放在自己口袋裡，不過所有公款都存放在前廣東空軍司令黃光銳①設在廣東信託公司的戶頭，仍令人費解。到了晚上九點，蔣公接見王世杰了解整個案情之後，指示既然是結餘公款，爲何要成立一個編制外的委員會？又豈能如此使用？他命令空軍總部，迅速把這些存款調回來，改存央行。

蔣公下令徹查毛邦初

十一日是星期日，蔣公交下致毛邦初的電稿，內容是召毛、向返國述職，並囑咐不要與即將返國的聯合國代表蔣廷黻同行，因爲他擔心蔣廷黻受到毛邦初的影響。可以見得，蔣公決定要徹底解決此事了，不論周至柔或毛邦初，他誰都不偏袒。

十二日下午，蔣公先回官邸，我留在總統府與王世杰、周至柔商量毛邦初人事問題，我建議先取消毛邦初的空軍辦事處主任職務，但維持其在軍參團職務，周、王兩人都同意，周至柔隨即擬了電稿，交給我轉呈蔣公。十六日，蔣公指示我擬致毛邦初及皮宗敢電文，告知自五月一日起空軍駐美辦事處結束，毛邦初專任軍參團團長，皮宗敢則接辦採購業務。

沒多久，毛邦初開始把事態擴大。六日深夜，皮宗敢在越洋電話中告訴我，毛

邦初打算召開記者會「揭露周總長的罪惡」。我心想，此事愈來愈棘手了，立即把整個狀況告訴周至柔。

七日早上八點半，我向蔣公及王世杰報告最新發展，蔣公因為要主持會議，命我去與周至柔及王世杰商討此事。王世杰於十時約集陳誠、周至柔、葉公超及我，在總統府祕書長辦公室開會，陳誠及葉公超至此才正式接觸此事，眾皆認為蔣公應明白表示處理此事的決心究竟為何。陳誠問，毛邦初是否會把總統與夫人牽扯進來？我回答，總統與夫人從來沒有使用空軍款項，不會被牽涉到，陳誠這才不談。

我們談到將毛邦初、向惟萱自美國引渡回台的可能性。以後證實，毛邦初先前在美國的生活非常奢靡，開始抗拒蔣公命令不回國後，他更是陸續挪用公款，把幾筆加起來達數百萬美元之巨的公款存到瑞士私人銀行戶頭，另外買了兩百萬美國不記名的國庫券，這些國庫券可以兌成現款。而蔣公對毛邦初的所作所為深惡痛絕，指示追究到底。

毛邦初拒辦移交直接影響到軍事。五月下旬，共軍連續小規模攻擊我浙閩沿海小島，我方游擊隊暫處劣勢，但美國各項軍援未到，尤其是空軍油料因購買不順，一直處於匱乏狀況，使得空軍無法經常起飛支援。

毛邦初以空軍總司令部貪污為由拒絕辦理移交，其實他控告周至柔把四十五萬美金公款自美國轉存香港一事，經查證，在周提款的第二個月就已經列入空總財務監督委員會的帳上，當時雖然沒有向上報告，但是要誣指周私吞該款就不應該了。我草擬了要求顧大使以明確態度處理毛案的訓令稿，呈給蔣公簽發，訓令裡也提及對毛所指控各節的調查情形，蔣公於六月九日核定訓令。

董顯光於七月八日返台，我於次日去拜訪。他告訴我，毛邦初的態度很壞，堅持不辦移交，我駐遠東委員會代表李惟果及俞國華都曾和他研商，考慮到毛邦初可能對外宣洩其不滿而受到反我政府者的利用，因此都主張從緩處理。董顯光也談到毛邦初堅持不移交的理由是，孔令傑到美國後告訴毛，蔣公認為周至柔在手續上有問題將來要予以處理，毛邦初宣稱既然有問題，現在既不處理反而加以袒護，他怎麼相信？六月致顧維鈞電文就可以證明。

我沒想到孔令傑這趟原來是為勸毛邦初返國，結果目的不但沒達成，反成了毛的藉口。而董顯光也認為，派與周至柔關係不錯的皮宗敢接辦業務，令毛邦初憤慨不已，在人事布置上更欠考慮。

十二日，我接到空軍周鳴湘主任的電話，得知毛邦初已於十日把中福購油案交

給《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皮爾遜發表，以破壞美國援華法案，其用心可謂毒辣。將近一年來，政府一直因擔心破壞形象而低調處理，先前努力至此已經失敗，蔣公正式下令予毛邦初停職處分並限令回國聽候查辦。

政府全面動員

毛案果然引起美國朝野的注意，也造成政府的困擾，因爲此刻正值美國參議院討論軍援我國之時。顧大使於二十三日來電說，周以德對我方對毛案的措置仍然持疑慮，希望我國能自行解決，不要求美政府引渡毛、向兩人回台法辦，否則他及其他衆議員將會「有所主張」。

九月五日，王世杰祕書長在總統府和我談毛案的處理問題。他因病請假多日，四日才開始上班。王世杰非常擔心此案拖得太久會影響軍援，他主張應設置調查委員會，在美進行初步調查。

八日，黃少谷祕書長在外交部長辦公室召集毛案會議，出席者有葉公超、董顯光、周至柔、蕭自誠、時昭瀛、沈昌煥、袁守謙、陶希聖、周鳴湘以及我。葉公超報告七日他與藍欽談話時，藍欽催詢毛案我方進行情形，並且建議應採取緊急措

施，促毛將公款帳冊及檔案交出，如毛拒交，可徵詢律師意見，並由律師展開訴訟程序，不過這必須取消毛邦初的外交官身分；另外即使美方給予政治庇護，也難避開他的法律責任。藍欽也說，國務院將與我方合作，因國務院不願在國會那邊產生足以妨礙援華計畫的障礙。

十一日早上，我把最近毛邦初在美發布的新聞彙集起來，向蔣公做簡報。我指出，藍欽公使七日與葉部長談話時，對我方長期緘默表示關懷，以爲我尚有不可告人的把柄落入毛邦初的手中，毛案現已成爲國際事件，對政府的打擊極大，昨天顧維鈞回覆王世杰電，主張成立調查委員會，希望藉各委員個人公正的聲譽，挽回美國朝野對我的視聽，然後才能進行有效的司法或其他途徑。

上午九點半，黃少谷以此爲中心召開小組會議，討論了三個多小時才結束。經請示蔣公，決定設置調查委員會，內定司法院長王寵惠擔任主委，邀請中外委員參加。然而，周至柔獲知後堅決反對，不惜辭職以示決心。小組於是在下午五點再度在國防部集會，重新研討後，保留成立調查委員會，改循司法途徑進行。

這個時候，王祕書長堅決主張由我赴華府處理毛案，因爲整個案子我最清楚。對於赴華府，我卻是有些心怯，因爲不知道此類司法案件能否處理得當，而且蔣公

身邊的工作尚無適當人選可以接替。不過十五日中午我隨蔣公同車返回草山時，蔣公命令我準備赴美，代表他把整個事情弄清楚並公開處理，我只有說是。

台灣這邊，希望毛邦初能夠懸崖勒馬，趕快辦理移交。然而，希望毛案善了以挽回政府的信譽的努力很快就成泡影。九月十九日上午，我接到俞國華的覆電說，鑑於毛邦初、向惟萱近日來的態度，恐怕政府同意成立調查委員會的意願，反而會成為授以他倆惡意宣傳的資料，所以暫停進行。我心知，調停之計已經難以進行，只有循司法途徑解決一途了。

蔣公於二十一日親自召開毛案會議，與會的府院高層及周至柔討論毛案進行程序後決定：一、辯正毛、向誣蠛之言論；二、進行司法動作迫毛、向移交；三、同時進行調查委員會以正視聽。會議結束後，政府的公開聲明稿交由黃少谷起草。至於前往華府這趟，則儘速啓程，藍欽公使已經了解整個情況，並且把實情告訴國務院。

赴美興訟

二十八日，我隨同查良鑑、夏功權一行五人帶了大批相關文件飛往美國，對毛邦初提起民事訴訟已勢在必行。我也負有蔣公親自交付的使命，了解整個事件的經過，以及傳達他依法對毛邦初追訴到底的決心。十月二日我們抵達華府，皮宗敢、俞國華、陳之邁公使及譚紹華公使到機場迎接，在車上和俞國華談了才知道毛邦初已經把公款轉到其他處所，根本不打算移交。和李惟果交談時，我也嚴厲抨擊毛邦初，並且強調不和他見面。

處理毛案，面臨究竟調查委員會的動作先行，還是訟訴先行的考慮。十一月初經過討論後，決定先組成調查委員會，這個委員會聘請了中外公正人士組成。董顯光認為，委員會一旦成立，整個事件可望迎刃而解；我和俞國華都不這麼樂觀，最後乾脆各下注十元美金打賭，結果當然是董顯光輸了。毛邦初非但沒有接受，反而變本加厲，連蔣公都一併攻擊。

毛邦初對外是以愛國者自居，打著制止政府貪污腐化的旗號，來合理化他拒絕辦理移交及不交出所保管的公款，實際上他自己絕非清白。查良鑑對中國銀行查帳發現，毛邦初於戰後在美國任職六年期間，不單在維持辦事處、買汽車、交際各方面大肆揮霍，奢侈地花光五百八十萬美元辦公費，甚至還超支三十八萬美元；後來在清查他的私人帳目時，又發現果然帳目不清。毛邦初挪用公款和一個中國古董商

合夥在芝加哥開設一家商店，另外還在美國西岸開了一家商行做生意！也難怪他想盡各種方法拒絕移交了。

十一月十四日下午二時，我方律師向華盛頓地方法院遞狀，對毛邦初、向惟萱起訴，要求法院下達禁制令，禁止兩被告在十天內動用或貸出款項和轉移文件，以及判決將全部公款和文件交還國民政府。法院於兩小時後即發出命令，並通知毛、向兩人於下星期一（即十九日）至我方律師處接受初步調查。然而這兩份通知書皆未能送達，因為他倆都已避居紐約以免接到法院命令了。

而毛邦初到紐約還有另一個目的：找李宗仁為他撐腰。

毛、李合流

十九日，毛邦初透過律師發表了一項聲明說，蔣公已不是中華民國的總統，而是篡位者（usurper），李宗仁才是合法總統，所以華盛頓聯邦法院依據蔣公所代表政府提出的訴狀而採取法律行動是不合法的，該法院沒有管轄權。十一月二十四日，美國各報均登載李宗仁於十一月九日致函法院宣稱他是總統，毛邦初及向惟萱的職務是由他任命的，蔣政府所提訴訟無效。

二十六日，我與俞大維見面，他說他在紐約曾與一名以電話訪談李宗仁的記者晤面，那位記者告訴他，李宗仁確實有庇護毛、向之事，李宗仁並曾召一直為其處理涉美事務的甘介侯以及前內政部長李漢魂來談，但李漢魂談到一半就退出了，由此可知李宗仁背後並無任何有利支持。晚上，經律師研究後，決定三項措施：

一、由大使館通知國務院否認李宗仁所聲稱的地位，並由國院通知法庭；

二、由大使館通知國務院，毛、向之職位已經撤消，不能代表中國政府處理任何公務；

三、通知國務院轉知法院，我方律師為巴德森（Patterson, Han Robert P.）及李海（Leahy, William E.）

巴德森律師亦堅決主張，應查封空軍辦事處。

二十七日，我接到蔣公的來電，指示調查委員會應繼續積極籌備成立後，我再回國。我想我會遵照蔣公指示辦理，不過毛邦初已經公開否認政府地位，調查委員會似已沒有必要成立了。事實上，自從毛邦初拒絕接受法庭通知並否認政府之後，一般美國人民及媒體多已改變態度不再同情他了，華僑尤然，華文各報開始報導毛邦初是貪官。

二十九日，聯邦法院開庭，毛的律師並未出庭，我方律師請求法庭駁斥毛所提的答辯狀，並且封閉空軍辦事處，由法庭派員接管，以及延長禁止毛動用公款的抑制令（Restraining order）；同時請法庭宣讀國務院於二十七日的覆書，承認中華民國政府的總統爲蔣委員長。開庭僅二十分鐘就結束了，我方的請求完全獲准，退庭後就立即前往封閉空軍辦事處。空軍辦事處裡的十五名成員有九人是我國軍官，雖然會要求他們向新的採購單位報到，但是他們支持毛邦初，全部辭職。

毛邦初繼續有大動作。十二月四日，他突然接受華府地院傳票，上午出庭時突然以迅雷不及掩耳方式向法院提請將包括我在內的五人小組交給他的律師調查。我方律師迅速趕到，向法官指出訴訟的主體是國民政府而非我們五人，法庭最後拒絕對方律師的請求。

初見甘介侯

六日開庭。早上我看《紐約時報》見李宗仁告訴記者，他是中華民國總統，將會返台主政，我爲之心痛，覺得此人恬不知恥。上午十點半開庭，先由毛邦初的律師辯稱中華民國的總統是李宗仁，並引述甘介侯對合法總統的解釋。律師說，甘介

侯現在就在法庭內。

法官並沒有要毛邦初的律師指出誰是甘介侯，我倒是起了好奇心，因爲從來沒見過他。大使館參事王守競悄悄地說，就坐在我後面一排。毛的律師說，中國合法總統是李宗仁，李並未命令毛邦初移交空軍辦事處，所以請求法庭將整個案子撤消；其次，法院監管（Court custody）妨礙了空軍辦事處的採購業務，務請立即中止。下午，換我方律師李海辯論，他駁斥說：「毛邦初在九月間還有電報向蔣總統自稱『職毛邦初』，以此爲名義提出報告，現在政府命令對他不利，就轉而認李宗仁爲總統了。」李海繼續指出，國務院已經通知中華民國政府，現在在台北的蔣委員長爲該政府的總統，蔣總統於去年三月一日復職以後，李宗仁就不是代理總統了，以十月九日杜魯門總統致蔣總統的國慶賀電可以例證。

下午開庭時，甘介侯坐在我的前面，我實在很想狠狠揍他一頓。不過我沒有眞的這麼做，只是在李海痛斥李宗仁絕非代總統時，堆起笑容拍拍甘介侯的背說：「這個律師說得很對！」甘唯唯諾諾，馬上換了座位。四點四十分，法官宣布，對於管轄權方面，將於十日提出書面裁定；至於法院監管，則仍維持現狀。這是我方的勝利。

事情到此已大致明朗，我把準備回國的意思向顧維鈞報告，顧維鈞同意，並肯定我這趟來美所做策畫連絡的成效。十日，法官宣布他的裁定：「一、中國政府因其官吏違抗命令，要求美國法院予以審理，訴訟自應成立；二、對毛、向二員手中所持公款，應執行假處分，兩人不得使用；三、法庭接管空軍辦事處之措施繼續有效，除本案有關文件之外，房屋、器具統交大使館接收，所有文件准雙方律師調閱。」

我們初步打贏了官司，大家在旁聽席都很欣慰。

向惟萱追撞我車

我打算於十二月十八日搭機離美。就在收拾好行李準備動身之際，又橫生枝節。

十五日，皮宗敢駕車送我去拜訪俞大維並順道送傅參事回大使館時，一輛轎車突然擋住我們的去路，向惟萱在車子裡。我們的車子無法動彈，只好下車。

向惟萱在車裡說，他要找我談話。傅參事說：「現在我們有其他約會，恐怕沒時間。」我說：「你可以到我們車上談談。」向惟萱聽了，就把車子駛到一旁，皮宗敢馬上開車，向惟萱見我們車子走了，又倒車過來想撞我們，但沒撞著。皮宗敢很火大，認為他根本沒有意願來談話，我們繼續開到俞大維的住宅前，向惟萱的車子又來了，頂住我們的車。皮宗敢這回沒下車，趁機脫困離開。

十六日，我奉命與俞國華一起飛往紐約賀胡適的六十歲生日。傍晚飛返華府，王守競告訴我，毛邦初及向惟萱知道我準備返國，正守候在我下榻的旅館大廳，準備送法院傳票給我，傳我出庭作證。此舉將破壞我整個行程，我已經離台將近三個月，這讓我有些擔心，大家商量之下，認為提前返台也可以，於是由大使館祕書顧毓瑞幫我聯繫機位，王守競幫我到旅館拿我的皮包等私人物品。四十五分鐘之後，王守競打電話告訴我，毛邦初正派人守候，並且盯牢他的車，想來毛必然也派了人在機場及車站守候，以防我離開華府。這個時候已是午夜二時，最後大使館顧祕書乾脆安排王姓親戚開車帶我從大使館的後門離開，一路開上公路，兩個半小時後抵達費城，然後買了火車票前往芝加哥，再搭機前往聖保羅，繞了一大圈，終於在大使館的協助下安然搭機離美，結束了這趟任務。

毛邦初在中華民國局勢艱難、最需美國朝野支持之際，做出嚴重破壞政府形象的事。但蔣公終究尊嚴地撐過去了，被毛指控貪污的周至柔，經過仔細查訪並無其

事，反倒是經過法律行動之後，毛自己被查出奢靡濫權，甚且數度挪用公款做私人投資。他眼見美國法院不可能支持他，在法院尚未審理終結前就於二月間攜款逃亡到墨西哥，這總算讓美國人了解究竟是誰出了問題。不過那時政府正忙著對日和約簽訂問題，蔣公也不想再對毛案傷腦筋，一切循法律途徑解決。

毛邦初何以如此膽大妄爲，在於他深知政府亟需美援，誤以爲政府不敢正面迎戰此事。美國法院最後在一九五四年六月判決，中華民國政府有權向毛邦初索還六百三十六萬餘美元，終於讓世人知道眞正的貪瀆者是誰。

第十九章注釋

① 黃光銳於一九四六年即退役，隨即以軍隊代表身分出席制憲國民大會，旋赴香港經營銀行業，其後赴美定居，一九八六年在美病逝，享年八十九歲。（《中國戰史大辭典——人物之部》，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出版）

第二十章 胡適先生

蔣公和胡適彼此之間情誼深厚，胡適的學識、正直無私，都是蔣公覺得可貴之處。他對胡先生的評價非常高，一九四八年準備選舉中華民國首任總統時，就曾考慮由胡適取代自己，以無黨籍身分競選總統，實現文人領導國家的理想。

那年三月底，蔣公有意推胡適爲總統候選人，並請外交部長王世杰徵詢胡適的意見，得到他的同意。蔣公希望由文人來出任總統，是希望軍人不要再膺任國家領導人，以免重蹈民國初年軍人把持政治的覆轍，他不僅希望自己退出選舉，也期待對副總統躍躍欲試的李宗仁、程潛等人同樣棄選，但均未說動。

蔣公邀請胡適競選總統，我們直到國民黨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會臨全會開議，討論總統、副總統提名問題時，才知道這個謙讓決定。大家內心是興奮的，因爲只有這樣才能解決憲法上的難題。蔣公當時在會中宣布自己決定不參加總統選舉，改由國民黨提出一位黨外人士爲總統候選人，他特別提出此一候選人應該具備的條件是：甲、富有民主精神及民主思想；乙、對中國歷史文化有深切的了解；丙、對憲法能全力擁護，並忠心實行；丁、對國際問題、國際局勢，有深切之了解及研究；戊、忠於國家，富於民族思想。

這就是蔣公對擔任總統候選人的看法以及對胡適的評價。不過，雖然蔣公真心期望胡適能夠順利成爲總統候選人，但國民黨中常會卻依然推舉蔣公爲第一屆總統候選人。蔣公得知已無可挽回後，於是約見王世杰，囑以實情轉告胡適，並在日記寫下感受：「此心歉惶，不知所止，此爲余一生中對人最抱歉之一事也。」

胡適的國是觀點

胡適始終沒有加入任何政黨，但在國家最艱難的時期，蔣公曾勸他組黨，以達成他對兩黨政治的期望。

政府遷台前後，胡適期待中國實行西方的兩黨政治，不止一次主張國民黨應分化爲兩、三個政黨，彼此競爭。一九五一年七月三十日，蔣公把胡適於五月三十一日的來函①交下。胡適在長函中率直建議，先是談到中華民國於大陸失敗後，自己所做的反思，以及爲求知己知彼讀了共產黨方面的文獻及書籍；接著談到播遷來台之後，政府所面臨的兩個問題及他的觀點如下：

……

一是今日宜由立法院與監察院聯合妥商一個憲法上規定的總統副總統選舉方法的緊急補救條款。今日不宜有所忌諱，宜切實承認兩個可能的緊急狀態：

一、總統副總統六年任期已滿一半了，一轉眼就要滿任了。

二、在三年之中，總統副總統萬一有意外變故如病廢死亡之類。

憲法所定總統副總統選舉法在眼前無法實行，故必須有一個緊急補救的方式，備而不用。不然，將來必要大懊悔之一日，已來不及了，其方式如何，我手頭並無選舉法規全文，不便亂說，但我想最容易的方式似可從研究總統副總統選舉法規入手。亮疇（王寵惠）先生與雪艇（王世杰）兄不可不早日想想這個問題。

一是今日似可提倡實行多黨的民主憲政，其下手方法，似可由國民黨自由分派，分成三、四個同源而獨立的政黨，略如近年立法院內的派系分野。此是最有效的改革國民黨的方法。近一年內所談黨的改革，似不脫「黨八股」的窠臼。鄙意今日急需的改革有這些：

一、蔣公辭去國民黨總裁的職務；

二、由蔣公老實承認黨內的各派系的存在，並勸告各派系各就歷史與人事的傾向或分或合，成立獨立的政黨。

新成立的各政黨應各自立政綱，各自選舉領袖，各自籌黨費。

三、新成立的各政黨，此後以政綱及人選爭取人民的支持。

四、立法院必須修改議事規則，對議事表決，原則上均須採唱名投票制以明責任，（今日立法院表決不記名乃是一大錯誤，故國民黨有百分之九十立法委員，而無力控制黨員！）

我研究這二十多年的歷史，深感覺中國所以弄到這步田地，其最大關鍵有二：

一、中山先生的「聯俄容共」政策乃是引虎入室，使共產國際的陰謀得在中國做大規模的試驗，使中國共產黨自始即擁有一部分兵力，爲後來一九二七年八月以

後獨立「紅軍」的基礎。倘使當日若非蔣公清黨反共，則東亞早已成爲紅色地區了。

二、「清共」之後，國民黨仍保持「聯俄容共」時期的「一黨專政」的制度——抹煞事實，高談「黨內無黨，黨內無派」。這是第二大錯，就使「清共」、「反共」都不徹底。後來領袖者雖誠心想用種種法子補救（容納無黨派份子入政府，延致黨外人士入黨；辦三青團；設參政會；制憲；行憲……），但根本上因黨政軍大權集於一人，一切補救方法都不能打破這「一黨專政」的局面，也都不能使國民黨本身發生眞正有效的改革。故今日要改革國民黨，必須從蔣公辭去總裁一事入手。今日要倡多黨的民主政治，也必須從蔣公辭去國民黨總裁一事入手。今日的小黨派都不夠做國民黨的反對黨。最有效的民治途徑是直爽地承認黨內幾個大派系對立（而且敵對仇視）的事實，使他們各自單獨成爲新政黨。這些派系本是同根同源，但因爲不許公開的競爭，所以都走上暗鬥傾軋的路上去。其暗鬥之烈，傾軋之可怕，蔣公豈不知之？

如欲免除此種傾軋的暗鬥，只有讓他們各自成爲獨立政黨，使他們公開的作合法的政爭。（公開的政爭是免除黨內暗鬥的唯一途徑）……

我看了胡適的信，覺得非常欽佩，但是他並不了解政府當前所面臨的挑戰，中華民國的整個情勢尚未穩定，內憂外患交加，把國民黨分裂成多黨，如何能推行三民主義呢？

蔣公親筆函覆胡適

蔣公對於胡適所提的第一個問題，立即做了回應。在中央改造委員會中，張祕書長提名王寵惠、王世杰等組織研究小組加以研究，但不宜廣泛討論，以免外間有所誤會。

不過，他對胡適的第二點意見，顯然持保留態度。

那個時候，毛邦初事件嚴重影響我國及蔣公形象，我奉命赴美處理。啓程之前，蔣公親筆回覆胡適於五月三十一日的信，交給我帶到美國，要我到紐約祝賀胡適生日時代他送到，以示愼重。先前，蔣公已經數次和我談起當前情勢之下，胡適所主張的國民黨分裂，現在尚不可行；臨行前又指示我，如果胡適問起黨派問題，就代表他把他的想法告知。

我到美國後，特地赴紐約一趟，將蔣公的親筆信面交胡適。

蔣公給胡適的信②，內容如下：

適之先生通鑒

一別將近三載，甚望能於本年底歸來面敘衷曲，藉此親祝　先生六十壽誕，聊慰平生企慕之忱。五月三十一日尊承立武兄上月間回台始得拜讀，益感綣懷舊誼關心興慶，究共匪詭譎欺世之深，謀今後補救復興之道，語重心長，銘感無已，前讀大作〈在史大林戰略裡的中國〉譯文，中以年來揭發蘇俄對華陰謀第一篇之文章，有助於全世界人士對我國之認識非鮮，豈啻敘史翔實嚴而已。本黨文獻浩繁，缺乏整理工作，其弊確如　先生之所言，去年特囑張曉峰兄著手編纂黨史，所據資料除黨部案卷外頗有向未發表之史料在內，全書計分四冊，現已完成其半，祕可稱為信史，已囑曉峰寄奉請教，書中所記共匪禍國各節亦較歷來公私著述為詳，或有可供參考採釋之處也。尊函所言憲法問題、黨派問題以及研究匪情了解敵人等問題，均為目前急務，然非面談不能盡道其詳，故望駕回之心更切也。未盡之意，特囑周祕書代表一切，並望隨時垂詢指教一切為荷。　順頌

道安

弟 中正手啓　九月二十三日

雖然蔣公在信裡告訴胡適，如果想要了解他對憲法及黨派問題的意思的話，可以與我一談，但胡適觀信之後，隨即把信收起，沒談這些話題。我告訴胡適，政府已經組成一個委員會，研究國民大會改選總統辦法，委員會裡有王寵惠、王世杰、張其昀等人。

《自由中國》抗議事件

胡適的民主化思想，在台灣起了作用，那就是《自由中國》半月刊。我赴美國之前，胡適在《自由中國》發表「致本社的一封信」，內容是要求辭去該刊發行人之職，以抗議《自由中國》四卷十一期社論「政府不可誘民入罪」發表後，遭受「軍事機關」干涉。由於這是出自胡適之筆，黨部認為非同小可。

我在九月一日接到黨部第四組的電話說，《自由中國》當天出刊的那期中，有發行人胡適對軍事機關干涉言論自由的抗議，請我向總統報告。我回答，此事無論是否要處理，必須要有辦法才可報告，在未有定見之前，不宜報告。

剛掛了電話，我又接到總統府祕書蕭自誠打來的電話說，已囑保安司令部派員收購，並去電命令《香港時報》暫緩在港發行。我說，收購辦法恐怕得考慮。但蕭自誠說，他已同黃少谷商量過，若不這麼做，恐怕會引起不良後果。

次日，中央改造委員會通過組織小組來調查此事，胡適這篇文章的抨擊內容，主要是指彭孟緝有任意逮捕民眾之故。

九月四日中午，我參加了審查《自由中國》刊載胡適抗議案小組，與會者認為主其事的雷震有十八世紀的自由觀念，但其實他對自由的觀念是模糊的；而副保安司令彭孟緝，則是陳舊的統治觀念，因此雙方想法相差極遠，都缺乏法治基礎。不過這次雷震的抗議，與會者都認為損害了政府威信。

六日，蔣公主持中央改造委員會時，垂詢《自由中國》案，對雷震此舉甚表痛絕；隔了一星期後，蔣公同意寬大處置。但我也覺得保安司令部處理經濟犯的辦法，實在值得研究改進，否則日久將積成民怨。胡適以後辭掉了《自由中國》發行人之職，而由雷震全權負責這份刊物，終在一九六〇年因雷震打算籌組反對黨而出事，就此停刊。

國民黨的評友

胡適的民主自由思想，在戒嚴時期雖然難以實現，但是蔣公並未因此疏遠他；而胡適雖是無黨籍身分，又遠在美國講學，但他的一舉一動始終以政府領導為依歸。一九五二年九月十日，王世杰打電話到高雄告訴我，胡適自美國寫信給葉公超部長說，英國牛津大學打算邀他擔任遠東哲學講座，想請示政府能否允准。王世杰認為中英之間現在並無邦交，所以他不贊成。我隨後向蔣公報告公文時，蔣公對於胡適赴英講學也不同意。後來，胡適並沒應聘到英國去。

一九五四年，辭去省主席赴美的吳國楨在美國攻擊蔣公及中華民國。胡適於三月返台，因為國民大會正準備改選總統及副總統，而他是國民大會主席團主席之一。對於吳國楨的指摘，胡適認為吳國楨做錯了事，不應躲在美國攻擊政府，但吳抨擊內容有些是對的。

蔣公當選第二任總統後，三月二十三日國民大會即將投票選副總統前一晚，陳誠約中央有關人員與胡適及天主教樞機主教于斌談話。于斌談的是中美外交狀況，他有事早走；胡適遲至九點半才到。很顯然，胡適的談話內容和吳國楨有關，吳的

一些觀點基本上他亦有同感，且早就提過。

胡適說，軍隊設置政工值得商榷，第二次世界大戰時，蘇聯於列寧格勒保衛戰中，撤走了軍隊政工，進而穩定軍心及局面，所以他懷疑政工制度是否爲適當的軍事制度。胡適講了他構想中的把國民黨一分爲二的兩黨政治，並對國民黨在地方選舉中的提名以及特務的作爲等多有批評，一直到十二點半才散會。國民大會會期結束後，他回到美國，曾經與吳國楨會晤，也做了斡旋。

我和胡適很少往來，但一直很尊重他。我深深覺得，胡適爲人誠懇，實在是那時國民黨唯一的諍友。他會顧全大局，實際地把缺失講出來希望國民黨政府改進，但又不致影響視聽，因那時政府的處境艱難，禁不起任何風吹草動。他特別期待改造國民黨，讓國民黨成爲眞正的民主政黨，進而把中華民國造就成民主化的兩黨政治，可惜在特殊的兩岸情勢之下，始終未達成這樣的目標。

以後，胡適返回台灣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長。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四日，他在歡迎新院士酒會結束時，因心臟病猝發去世，中華民國從此失去了一位愛國的學者。

第二十章注釋

①周氏錄於民國四十年日記。

②同前注。



堅守金馬政策在麥帥訪台後確立。圖為一九五〇年蔣公與參謀總長兼空軍總司令周至柔（左三）等將領研究金門防務。（黨史館藏）



孫立人（左一）企圖接受美方扶持兵變，近年來美國國家檔案公開證實此事。（黨史館藏）



麥克阿瑟（中、抽煙斗者）於一九五〇年八月祕密訪台，蔣公夫婦於官邸接見，沈昌煥（右四、戴眼鏡者）陪同。（黨史館藏）



一九五四年初，國民黨第七屆中央委員臨時全體會議舉行，蔣公親臨主持，我（右一）時任黨副祕書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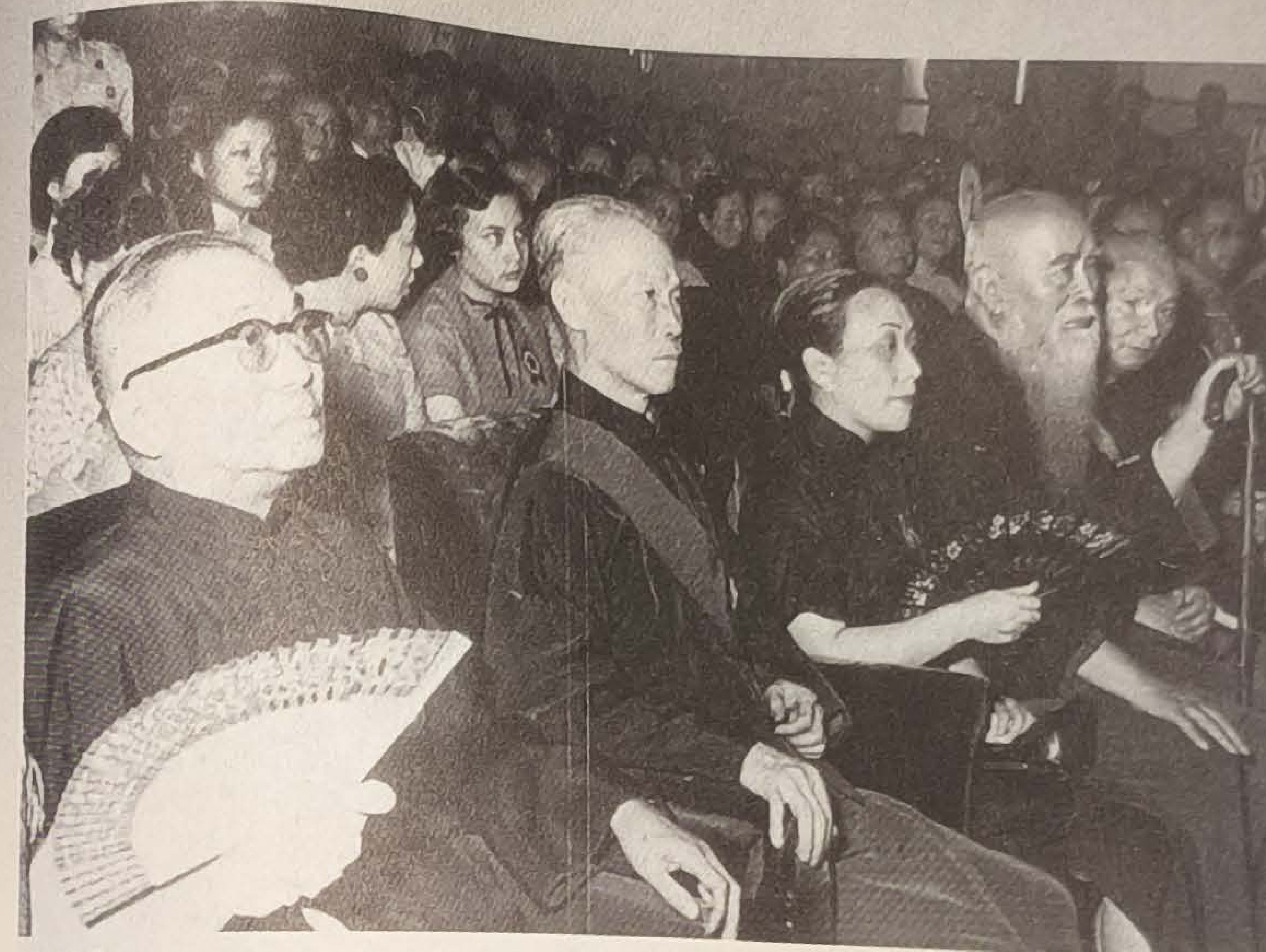
同年我（右一）奉派赴法國考察，公使陳雄飛（左二）、大使段茂瀾（左三）與僑界舉行歡迎會。



美國駐華大使藍欽（右）於一九五三年到任，向蔣公呈遞國書。（黨史館藏）



胡適（左），國民黨的諍友。圖為一九五八年蔣公參加中研院院士會議，與胡院長談話。（黨史館藏）



陳誠（左二）於一九五四年獲蔣公提名為副總統候選人，蔣公似有意培植他承擔領導國家重任。（黨史館藏）



一九五五年，蔣公接見美國務卿杜勒斯（右一），外交部長葉公超（左二，坐者）陪同。（黨史館藏）

第二十一章

國民黨改造

蔣公以無比堅毅的精神面對逆境，他檢討失敗，確認要力挽狂瀾，非整頓改造國民黨不可。

國民黨改造的遠因是抗戰勝利前後，不但黨外有「黨」、黨內有派，甚至影響到整體施政。蔣公從下野起就痛定思痛，認爲國民黨是組織方面出了問題，應重整黨務並進行改造。然而來台後改造剛開始，長期以來負責組訓的陳立夫就被罷黜，導火線在於大陸淪陷後的立法院長童冠賢請辭案。

對日抗戰勝利後，蔣公雖是全國領導人，但是黨政關係幾度失控，使得重要施

政及人事布局受挫，而不聽命黨中央領導的立法委員，以陳立夫領導的CC系①尤然。自一九二七年起，兩陳所領導的CC系就掌控了黨務組織、人事、經費，甚至特務機關，起初贏得蔣公的信賴，但抗戰勝利後卻因爲黨內派系的互鬥而失控。

一九四八年五月，蔣公成爲行憲後第一任總統，原打算由張群繼任行政院長職務，未料CC系立委從中作梗，在中央黨部舉行黨團假投票，結果張群未獲支持，沒有被規畫的何應欽反而被推舉爲行政院長候選人，但因有軍務重責而不能擔任。這對蔣公而言是嚴重挫敗，蔣公乾脆捨張群、何應欽，另提名翁文灝出任。雖然還有李宗仁當選副總統令蔣公不悅，但蔣公對CC系的厭惡，及認爲黨內有派、無法配合施政的印象，主因還是起自張群未能續任行政院長事件。

日月潭會議

黨政之間困窘失調之下，國民黨陷入危機。國共戰爭的失利，使得蔣公深覺中國國民黨必須改造，且愈來愈迫切。一九四九年一月，蔣公下野返回溪口家鄉後，立即指示研究如何進行黨的改革；大陸淪陷，國民黨中央於十二月十一日起在台北辦公，黨改造之議開始具體討論。

年底，蔣公在日月潭涵碧樓召集黨中央核心幹部，舉行「黨的徹底改造問題」座談會。這個座談會開了四天，頭兩天由蔣公主持，後兩天則是陳立夫，我並未隨行。一九五〇年元月四日中午，蔣公離開日月潭搭火車北返，我到辦公室為他整理公文時，與參加座談會的張其昀談了許久，這才知道會中研議黨改造時，蔣公主張徹底改組，甚至考慮連黨的名稱也要換掉，以示決心；而陳立夫則在會中批評，本黨過去是以「蘇聯式的組織、中國式的頭腦、美國式的方法」來做事，因之處處遭遇矛盾及困難。

會議結束後，蔣公指示在五中全會召開之前，應召集設計委員、中央黨部主管及相關委員切實檢討，擬定方案報核。於是自元月八日起到三月二日之間，黨中央密集召開會議，研商各項重要原則並進行初步起草工作，整理完成黨的改造方案，再經全體會議通過後，送呈蔣公核定。方案擬出，思想路線卻意見分歧；接著，黨改造就停擺了半年多，其間發生了極大的變化。

年初的日月潭會議，陳立夫原本是僅次於蔣公的黨改造領導人，包括陳立夫在內共有三十三人參加研議會議，CC系仍居多數；直到五月底，陳立夫仍參與黨務最高層的決策。

蔣公於三月一日復職後，接下來就是改組內閣。雖然已內定提名陳誠出任行政院長，但是各方在支持上尚有疑慮，後來出任行政院祕書長的黃少谷告訴蔣公，CC系諸立委頗不合作。為使陳誠能夠在立法院裡獲得絕大多數委員支持通過，蔣公在四日下午邀集黨中元老及幹部交換意見，以凝聚共識。八日，立法院通過陳誠組閣。

童冠賢請辭案

五月二十九日星期一，在例行的政務會談中，陳立夫報告滯留在香港的童冠賢[2]請辭立法院長案。他認為，如果准童辭職，則立法委員互選院長就必須迅速進行；他擔心立法院的局面會因此重趨紊亂，主張拖延不提。

但蔣公不這麼想。他說：「如果童冠賢仍有立法院長身分，則可能在任何時地均可以召開立法院會，這會給國際不好的印象，所以此事不宜拖延，應儘早解決。」如果准童辭職，則將由軍人出身的黃埔系副院長劉健群代理院務，劉健群是黃埔系，和陳誠走得近，CC系可能不會喜歡。

蔣公的觀點，陳立夫、鄭彥棻及谷正綱諸人都有難色，紛紛再三表達不可，因

爲那時立法院已經失控，黨籍立法委員不見得會聽中央的。最後，決定再召集黨內人士商議。

頗多同志認爲陳立夫、谷正綱都有個人的私心。散會後，我向蔣公報告當前立法院內部派系問題情形，指出今日本黨對立法院失去控制，實在是因爲各派系紛紛自立門戶、各自爲政，而中央不予置理、任其發展之故。我建議除聯繫黨內各領導人士之外，也召集各小派系的領袖人物會商。蔣公首肯後，我約張光濤及吳延環兩委員到總統府商議，決定由陳誠、陳立夫及王世杰聯名宴請全體立委疏通。

次日中午，全體黨籍立委在三人的邀約下餐敘，並推王世杰說明目的。王世杰報告說：「童冠賢院長已經請辭，所以立法院院長的職務要怎麼安排必須有所決定；現在因爲第五會期已經屆滿，所以院長選舉應到下次會期再行改選，在改選之前，中央的構想是由副院長劉健群代理。」

王世杰報告完畢，全體委員鼓掌，一時看來相當和諧，我本來以爲已經沒事了，沒想到CC系的陳博生委員突然起立發言反對劉健群代理，他坐下後，雖然仍有人支持王世杰，但CC系的邵華、江一平等人紛紛要求維持原狀。鄭彥棻也發言了，他贊同王世杰的意見，但認爲童冠賢絕不會利用院長名義召開院會。這等於爲童冠賢辯護，席間秩序開始混亂。陳誠最後起立說，他會把各位的意見轉達給總裁，由總裁來做最後決定。

散席後，陳誠馬上赴士林官邸，蔣公聽後極爲憤怒，什麼話也沒說，逕自上樓去了。

下午，陳立夫、陳誠及王世杰再度會商，終因陳立夫認爲進行此案已經沒有把握，決定放棄。我向蔣公呈報他們的決定時，已經是晚上九點半了，蔣公沈痛地說：「國民黨同志昧於國家的重要決策，只在私人利害關係上打轉，可謂黨魂已失，無可挽救了！」

這是蔣公在台灣復行視事以來一次重大的政治挫敗。蔣公回想過去慘痛經驗，認爲現在國難當頭，CC系仍不顧大體，這是陳立夫的領導有問題。如此思考之下，終於導至陳立夫的去職及全面壓制CC系的勢力。

拔除陳立夫

童案失敗後，次日我又從鄭彥棻口中得悉，立法院休會期中承襲上一會期決議的請求授權案也遭否決，使得今後三個月台海情勢最緊張之際，政府形同縛手般面

對對岸的威脅。立法委員毫無政治責任感，實在令人感嘆。我研究立法院當前情勢，其實中央只要爭取到兩百票的多數就可以掌控立法院了，當前內外交迫的情勢可頓時改觀。我開始思考，如何向蔣公建議做有效的黨政聯繫。

立法院的黨籍立委未能支持中央，已非首次。現在童案又未能在立法院通過，狀況百出之下，蔣公下定決心，他指示不准陳立夫再參加總統府一般會談。

事後陳誠也公開抨擊童案，陳立夫曾兩度想晉見蔣公，蔣公都沒置理，陳立夫又親書致歉函並請求晤面，蔣公也沒回信。六月八日，陳立夫到家裡來拜訪我，解釋童案的經過。他說，在立法院想要以感情領導，實在很難控制這麼多的黨籍立委。他又指責蔣公的兩面控制手法，也是造成童案未通過的原因之一。

我回答：「這是因為過去黨的領導幹部未能盡責建立黨的運作制度，總裁才不得不考慮黨內與黨外安置及搜羅人才辦法，現在黨內的分歧局面，您也難辭其咎。」

陳立夫和我從晚上談到凌晨，我覺得他確是忠於蔣公，於是把準備要在立法院成立黨團組織以穩定立法院的動員等計畫告訴他。陳立夫最後留下一封解釋童案經過的信給蔣公之後辭去。

然而，蔣公依然沒有原諒陳立夫。九日上午，蔣公交下中央銀行改組的理監事名單，陳立夫原來在監事名單之內，卻被蔣公親筆畫掉。我建議蔣公，事之曲直尚未判明之際，不宜過於責之。蔣公考慮一陣子，改把陳果夫列為監事，以示對兩陳依然關懷。陳果夫後因肺結核病況加重，於次年八月病逝。

具體的黨改造在韓戰爆發後展開，由於改造方案中要停止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及中央監察委員會的職權，改由總裁重新遴選成立的中央改造委員會行使的規畫，部分同志堅決反對；七月二十一日晚上，蔣公召集全體中常委到草山舉行談話會，為次日中召開的第六屆中常委臨時會準備討論黨改造案，做最後溝通。

會中依然有幾個委員如陳肇英、李宗黃等表示異議，蔣公嚴厲地說：「黨的改造不容再緩，否則我不能再以總裁地位領導這個黨。如果同志不信賴，只有退出本黨！」

他對與會委員下最後通牒：「贊成者站攏來，反對者請出去！」

如此決絕的表態下，中常委的意見就趨於一致了，第二天上午的中常委順利通過授權蔣公實行徹底改造。

蔣公的處置，讓陳立夫絕望了。八月四日，他以參加世界道德重整會議名義出

國，舉家離開台灣。九日，我隨蔣公同車返回草山官邸，向蔣公做了例行報告之後，談到陳立夫的出國。蔣公說：「立夫之短，在於統馭無術，致使今日黨內綱紀毫無！」

這就是陳立夫被拔除黨內領導地位的經過。不過，蔣公是念舊的，以後陳立夫在美國以養雞維生，生活及事業發生困難時，蔣公仍在財務上予以支助；後來立法院仍有派系領導上的問題，也考慮是否請陳立夫返國領導。蔣公並且多次邀他返國服務公職，他最後於一九七〇年回國，擔任文復會副會長。

國民黨七全大會

黨改造正式展開，蔣公宣示國民黨改造為「革命民主政黨」，政治主張方面則是提出現階段反共抗俄最根本工作為建設台灣。黨改造最實質的作用就是排除黨政體系裡難以統御的CC系勢力，以凝聚全黨力量，並且大幅度地調整組織。由於蔣公先抓住黨權的強勢領導，立法院黨部順利組成，立法院改選院長及副院長終於不再混亂，劉健群當選了院長，黃國書為副院長。

國民黨進行改造後，引起軍事及公職人員爭相入黨的風潮，甚至各地黨部對入

黨的標準寬嚴不一，都會引起批評。我曾看過軍中的反應，其中有位高階軍官不平地說，部隊裡政工入黨易，部隊長卻限制很多。

一九五二年十月十日舉行的七全大會，是中央改造委員會成為核心組織之後，首次召開的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國民黨改造完成，不論黨政權力分配及政治目標均具有標竿作用。國民黨要從這次全會出發，研討本黨總章、政綱、中心理論及工作綱要等重要議題。

八月二十日，祕書丁憲薰和我商量七全會總統府代表人選，那時俞濟時已經表明要出馬競選。我認為應由王世杰擔任，但丁憲薰說雪公（王世杰）絕不競選也不應選，因此盼我能出來競選。我改建議張群，丁憲薰也不贊成。

我與經國先生通了電話問他意見，經國先生說，資料組有一百五十票支持我出馬競選。我擔心引起不必要的困擾，不願與俞局長競選。次日我再與經國先生討論七全會總統府區黨部代表事，我還是表達不願與俞競選之意，但他說會向俞說明，並支持我競選，我這才知道要我當總統府的黨代表應該是經國先生的意思。

二十三日一大早，我赴草山途中，順道拜訪俞濟時，告知接到經國先生電話囑我競選，特來奉商，他當即表示支持。九點半隨蔣公赴總統府辦公後，我就正式把

將競選七全會代表一事，向各單位主管及同事說明並請他們支持，一般反應良好。

然而，整件事還是有變化。晚上十點多，經國先生來電說，他在晚餐時與蔣公談及總統府二區黨部選舉七全會代表人選，蔣公說六屆選舉時曾命俞濟時退讓，所以此次選舉希望俞能夠當選。我當即表明退出競選，以成蔣公的意願。此事似爲我幾天來的預測，因爲我常感覺不宜以代表身分出席七全會，至此果然應驗，我爲之釋然。

九月二日起，蔣公親自草擬國民黨中心理論稿。本來預定這天前往谷關天冷水力發電廠休息，因擬稿之故而未動身，直到次日才成行。次日下午，我先到松山機場等候，蔣公三點抵達，飛機立即起飛。四十分鐘後飛到中部山地海拔一千呎的新社機場，然後改乘汽車循大甲溪東行一小時四十分後抵達天冷電廠招待所。蔣公繼續草擬中心理論稿，七日才把初稿修正完畢。

七全會受到國際關切。第四組主任沈昌煥於九月十八日報告，國際上認爲與即將舉行的日本大選同爲十月遠東政局的兩件大事。十月二日，蔣公主持中央改造委員會，聽取修改總章及工作綱領等報告及發言後，做如下之指示：

「本黨性質定爲革命民主政黨，乃針對共黨；今日非以革命決心不足反共，故須規定黨員守祕密力行，此乃必要之措施，此種時代精神應明白昭告中外黨員，失敗至今日地步，應重新開始，故本黨是否變更名稱以示更始之意，亦應加以研究，以待七全會之決定。黨的組織不可太呆板，海外黨部可適應情勢作切適之規定，將來地方黨部亦然。凡有重大黨紀之審議事項，可作爲評議委員之職權，希修改訂入黨章。關於黨員總檢查一點，爲黨保持純潔性之重要辦法，應每年舉辦一次，可加研究。因黨必須保持純潔性，方能維持革命性及承繼革命之歷史。七全會應以整頓黨的內部以備與共匪鬥爭爲主要目標。」③

十月十日，七全會開幕，蔣公主持，我被派爲大會副祕書長，這也是我首次參加本黨的最高會議，坐在主席台上面對五百餘出席與列席代表及委員們，其間有不少是黨內的前輩，使我有些惶恐。

在開會中，蔣公在政治報告中除分析敵我情勢外，也報告了整肅案，全場慷慨激昂，海外代表蔣永福等五十餘人醞釀開除李宗仁黨籍。整肅的概念源自蘇聯，那時在黨內也用上了。

七全會的重要任務之一爲選舉委員。蔣公於十月十九日下午四時交下中央委員提名名單，由機要辦公室付印。六點選舉，代表們開始投票，前後時間長達五小時之久，我在全部代表投票完畢後才離開，連晚餐都沒吃。次日起床，中委選舉結果已經揭曉，當選名單大致一如預期，陳誠及經國先生皆獲最高的一百七十五票，只有俞鴻鈞沒有當選委員，正在滇緬邊界艱苦作戰的李彌也以三票之差未能列入候補較爲意外。蔣公指示對李彌予以補救，最後是由陶希聖先生把候補名額讓給同樣也沒列名的俞濟時，再由俞讓給李彌。

七全大會是國民黨改造的里程碑，國民黨歷經劫難，終於以全新之姿重新面對國人。而我，則面臨新的任務。

第二十一章注釋

①CC之名，有兩種說法：一說是一九二七年蔣公下野，南京中央被桂系軍閥把持，陳果夫為反桂擁蔣，以留在上海的部分黨政幹部組成「中央俱樂部」(Central Club)，而簡稱CC；另一說則是指陳果夫、陳立夫兄弟為首的黨內派系，稱為CC。

②童冠賢在對日抗戰前原為北京大學等校教授，大陸淪陷後避居香港，任教於崇基學院，退休後由兒女接到美國奉養，一九八一年於加拿大去世，享年八十八歲。（傳記文學，劉紹唐主編：《民國人物小傳》）

③周氏錄於民國四十一年日記。

第二十二章 黨中央

國民黨改造醞釀期間，有天我隨蔣公同車返回草山，途中蔣公指示，也要我參與黨改造，主要任務則在於黨政聯繫方面。這是自重慶追隨蔣公以來，蔣公首次跟我談我個人出處問題。我感到振奮，但這麼一來就要離開蔣公，也有些不捨，我說：「這裡的工作很繁重，恐怕很難離開。」

蔣公肅然指示：「黨改造工作更重要！」他囑咐我物色新的侍從祕書人選。這是蔣公提攜之意，進入黨中央，也意謂我的公職生涯開始走向決策核心，那時我才三十四歲。

出任國民黨副祕書長

那天下午，我找經國先生商量。他告訴我，蔣公打算要我擔任改造委員會第五組組長。這個組的主要業務在於管理民意機關與政府黨員的組織與政治活動，我知道這是蔣公對我的器重，非常感激；但覺得這個職務實在過於艱難，因為我以前一直從事的是文書工作，雖然屢向蔣公提出各種建言都得到他的肯定，對於這個要與各方好漢周旋的工作，以我率直拘謹個性，要來周旋在年長的民意代表及黨政高層之間，自覺有所不宜。

第二天，我找了機會向蔣公多方剖析，試著請他收回成命，但蔣公沒有被我說動。晚上，蔣公再約集改造委員會商，終於確定為國民黨中央黨部為幕僚長制，以張其昀為祕書長。

次日，蔣公再約張其昀、陶希聖及黃少谷到官邸談黨內人事，在談第五組組長人選時，由於我的意願不高，起初一度改列崔書琴，但又因外界對崔書琴的學養作風頗有疑慮，所以又討論由我出掌的可行性，後來張其昀認為蔣公還是要我兼做總統府機要工作，現階段尚不可更動。蔣公於是決定由我出任副祕書長來協助張其

昀，他在談第五組人選時，多次讚揚我的爲人及能力，使得我愈覺慚愧。

蔣公要我參加改造委員會，有他的考慮。一方面，我可以把他的意志傳達給改造委員會；另方面，我也可以把改造委員會的整個情況，直接反映給他。但眞正說來，這是張其昀向蔣公提議的，張其昀的理由是，我最清楚蔣公的思想及作法，調到黨部任職，可以活絡上下溝通管道。蔣公同意他的看法。

第五組最後決定交給袁守謙，但蔣公也說，以後仍可能由我來擔任。果然，兩年後這項工作又提起來了。

一九五二年十月二十二日，我自張其昀那裡得知，蔣公又有命我掌管黨政關係之意，我還是感到爲難，深覺自己的個性不適宜做這樣的工作。經國先生恰好來談，我告訴他，我因工作關係實在很難做好這樣的任務，但我願同意盡力從旁協助張其昀。

十一月五日，蔣公邀張其昀和我共進晚餐，蔣公懇切指示我全力參與黨務組訓工作，至於侍從祕書工作可另物色人選。蔣公的心意令我十分感動，決心不再推辭。次日我和俞濟時商量機要室及侍從祕書繼任人選，初步擬提孫義宣及沈錡兩人爲祕書，陳宗熙爲機要室主任。後來，侍從祕書職務交給沈錡。

在定案之前，有個插曲。俞濟時認爲，我此次外調，如不兼總統府的職務，離開蔣公身邊後，對政治情況就難以眞正了解，恐怕難達成蔣公的期望與使命，所以他建議機要室主任爲實職可以不兼；但如果有個總統府副祕書長之職，則是個閒差即可以兼下。

我覺得俞濟時的考量有其道理，於是向蔣公面陳俞濟時的建議。蔣公考慮後，同意陳宗熙、孫義宣人事案，但不同意我以兼職方式繼續保有總統府職務。

我回到宿舍再仔細考慮，覺得黨與政必須聯繫，俞濟時所提的辦法在當前是有必要的，但向蔣公要求總統府副祕書長一事，卻有獵官之嫌。未來職務如何都不重要，我擔心蔣公爲此懷疑我的動機，那就非始料所及了。我連夜寫了簽呈①：

> 職此次奉　命前往黨部工作，蒙　鈞座提攜獎掖之厚意，銘感五中，惟有加倍努力以圖報效於萬一。職自思才器平庸、學植淺薄，全賴平日隨侍左右，於直接間接之間明悉　鈞意乃能了解全局，復本此進而研究問題。倘　鈞座有時認爲職尚偶有所見，此實非職所敢自居。
>
> 揆諸當前時局演進之速、變化之多，固應得失之間出入至大，以　鈞座高瞻遠

矚、睿智敏斷，如職不能兼機要室原職亦不兼府中其他職務，不能獲悉　鈞座對軍政大計之處理方鍼及對黨政之各種指示，則碩劣如職者，必一如他人未及一年半載其了解即未必眞切，而再不堪供　鈞座之驅策矣。

昨日所陳者爲此其目的實爲對事。退而後思，似有戀棧獵官之嫌，夜來爲此慚汗不眠，敬祈　鈞座諒其忠忱恕其率直，乃所企禱。一切仍當遵照　鈞座日前所示辦理，並乞　鈞察　　謹呈

總統

職　周宏濤　十一月七日

把簽呈呈給蔣公後，心裡稍安，我知道蔣公會理解的。

由於奉調中央黨部專任副祕書長，我兩度與經國先生交換意見。十一日，經國先生晚上北返時告訴我，他和蔣公晚餐時獲知蔣公此次派我到中央黨部主管綜核組織部分工作的意旨極爲堅定，並且命他向張其昀祕書長說明，希望今後中央祕書處眞正成爲中央黨部的重心。這使我愈感責任之沈重。

事實上，我在蔣公身邊工作，就等於在黨內工作。而我的工作除了軍事及經濟之外，對於其他各部門幾乎都有所接觸，以後依然如此。

整理大溪檔案

我到台灣之後，馬上接下一個特殊任務，就是負責整理大溪檔案。

一九四八年冬天政府戡亂失利，蔣公於次年下野後，隨即指示將與他私人有關的檔案隨中央銀行的資財同艦運到台灣。檔案運抵台灣，原先暫存高雄，隨即轉至大溪頭寮賓館，並成立大溪檔案室存藏。蔣公很有歷史觀念，對於史料的保存一向重視，我很清楚，所以一向愼重其事。

大溪檔案整理得差不多之後，一九五四年四月間我向蔣公報告，擬將民國十五年至二十六年的大溪文件攝影底片，交俞國華帶到美國放在保險庫裡，以防萬一，蔣公同意了。所以在大溪檔案尚是絕對機密時，已有一份完整的內容存在美國，直到台灣局勢安定後，才由俞國華運回。

在黨中央，各級選舉的運作也十分重要。韓戰發生那年，台灣即將舉行遷台後首次地方選舉，九月十二日我隨蔣公返回官邸途中，建議蔣公到全省各地巡視，以號召人民支持政府。蔣公覺得這個構想很好，馬上首肯。

在選舉期間，有個報告指出，省民政廳長楊肇嘉在台中、台南抨擊政府貪污無能，並稱之為「豬」。蔣公聽了很憤怒，因為目前正值選舉之時，而且又是國際局勢動盪之秋，楊肇嘉居然以此來挑撥地方與中央的感情，於是指示我轉飭吳國楨徹查。我以電話聯繫吳國楨，把整個情況告訴他。不過在吳國楨的維護下，楊肇嘉沒事，依然續任廳長，直到吳國楨離開省政府。

穩定民心的政策

如何化解來台大陸人士與台籍士紳之間的隔閡，蔣公早已注意到。他在中央黨部召開黨務工作檢討會時指示，各地方黨部在組織訓練時，應協調大陸來台同志與台灣同志之間加強感情上的聯繫，並應由「內地同志」作表率；蔣公也鼓勵本省同志入黨，為黨工作。基於同樣的考慮，改造委員會把台灣省執行委員會改組為台灣省改造委員會，由倪文亞擔任主任委員，十一位委員中，有七位是本省籍，謝東閔、李友邦、林挺生等都在列。

對於地方自治，蔣公先於行政院長陳誠及省主席吳國楨，很早就有這方面的考慮，他於十月下旬指示黨部，地方選舉在即，應儘速做好人選的規畫。地方自治開始實施後，台籍人士不斷地以地方觀念來訴諸選民，以示對外省人的區隔。此刻，我可以感受得到「二二八」陰影的存在。

許多重要的施政，都是透過黨務系統過濾後，向蔣公報告再決定的。如一九五二年六月，我向蔣公轉述台大訓導長傅啟學的報告說，一般學生反對中學畢業生未受軍訓就出國之舉，蔣公立即指示，應取消中學生留學。從此之後，學生必須在服完兵役之後，才能出國。

又如教會學校的設置，也在黨內先行討論。一九五二年，美國紐約「中國基督教大學聯合董事會」（The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 UBCCC）準備在台設置大學。七月十日在中央黨部召開中常會時，教育部長程天放為此向蔣公請示，陳雪屏委員主張不同意設置，理由是當前台灣高中以上學生升學問題並不嚴重，今年高中畢業生有五千九百人，而現有大學及專科名額為二千二百人、軍校為一千九百六十人，相距不遠。陳雪屏、谷正綱及羅家倫都認為，當前教會傳教方式與國家形勢頗難配合，所以不贊成設置教會大學。不過，沈昌煥、張其昀都主張准予有條件設立，著眼點在於顯示政府對於宗教的自由及教育的開放。

蔣公聽完委員的意見之後指出，目前國家形勢非常艱危，不能不仰仗外力，如

果不准教會設置大學，則在國際上將予人以口實，應准予依大學法辦理。蔣公裁示之後，東海大學於次年美國副總統尼克森訪華時，在台中大度山破土興建。

耕者有其田條例，也是蔣公穩定台灣民心的重要施政，同樣是先在黨內討論，整個細節由黨中央確定後，再交由行政及立法部門通過施行。如立法院方面曾對名稱問題有過異議，於審查會時改為「扶植自耕農條例」；在黨內交換意見時，行政院祕書長黃少谷代陳誠轉達希望能夠恢復原來的名稱以利號召，張其昀認為蔣公雖然沒有明確指示，但也有這種意見，囑我設法連絡立法院方面的黨籍立委設法推動。經立法院黨團大會決議請蔣公決定，蔣公指示應維持原來的名稱。立法院隨即通過條例，並正式開始實施。

蔣公公開答覆言論自由問題

黨中央的宣傳工作是很重要的，當時許多政府的立場都是透過《中央日報》的社論發表，主要執筆者是陶希聖。另方面，在胡適的倡導下，台灣出現了民主自由的籲求，但是那時台灣依然處於內憂外患，中共的滲透積極，一些言論就令蔣公擔心有重蹈大陸覆轍、影響內部團結之虞，而這些文章大多刊載在《自由中國》及《自由人》。

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五日，我接到總統府祕書長張群的電話說，蔣公指示，黨中央對《自由人》的補助應立即停止，因為該刊物惡意批評政府，不值得補助。下午，新上任的黨祕書長張厲生也接到同樣的電話，準備禁止《自由人》在台發行。但我建議，禁止在台發行應該作為視這份刊物態度有無轉變的第一步驟。

《自由人》遭蔣公下令制裁，是因為其社長兼總編輯成舍我，也具有立法委員身分，在三月初的立法院會以「人權保障與言論自由」為題，向行政院長俞鴻鈞提出質詢，抨擊國大代表龔德柏及立法委員馬乘風「失蹤案」，以及新辦報紙雜誌何以不許登記等。

蔣公後來在四月六日的總統府國父紀念月會中，針對成舍我的言論公開做了答覆。他闡述當前出入境管制的考慮是為鞏固反共抗俄基地的安全，「我們可以平心靜想，幾年以來，台灣假定沒有管制出入境的辦法，奸匪出入自由，潛伏滲透，任所欲為，試問今日的台灣，將成為何種景象？」

報紙雜誌限制問題，蔣公說，台灣雖在戰時，而報紙雜誌所發表的文字，並不需事先經過審查，「無論對於政府有何意見、有何批評，甚至攻擊，均可連篇累

牘，皇皇刊載，難道這還不夠作爲言論自由的眞憑實據嗎？是不是要可以對反共抗俄之國策，做相反之主張，對奸匪謬論做有利之宣傳，才算是言論自由呢。」

至於立法委員馬乘風及國大代表龔德柏「下落不明」，蔣公也解釋，馬乘風是因包庇匪諜趙守志入境，並介紹工作爲之掩護，而且在大陸時，馬乘風曾赴蕪湖，煽惑當地駐軍劉汝明率部投匪不成，曾經首都衛戍總部緝捕有案②；而龔德柏則是一九四九年來台後，又赴香港與叛逆程潛勾結，九月再度來台就到處對軍民做反動宣傳，「尤其在陸軍大學演講，公開毀謗政府，並指對日抗戰，是我政府首先發動，是最高當局爲顧全個人名利所決定，並指責政府未提前與議和爲失策，尤其認爲剿匪是政府犯了重大錯誤，其他各種謬論，不僅動搖人心，而且爲共匪張目，如任其流播，實足顚覆政府，動搖國本！」

龔當時是被交付感化處分，沒多久就獲釋了。③

這事以後，《自由人》的台北發起人一度打算停刊，但因香港方面的發起人不同意，又繼續營運了四年。

蔣公用人哲學

我擔任中央黨部副祕書長，深深感覺和過去在總統府服務有很大的不同。機要室主任是對內的，不大需要與外界接觸；而出任副祕書長職以負責黨政關係，則必須經常與政界連絡。我與各方接觸多了，應付的事務也繁雜起來。

我正式出任黨職後，蔣公經常親自對我做了指導。如有次中常會時，我對一個議題發言，結束後蔣公召見，當面告訴我：「你年紀輕，做事應特別愼重！」我謹記在心。

我接任黨職，主要在於黨政之間的聯繫，我的聯繫工作對象被稱爲「新中央」系，立法委員成員以武誓澎爲首，另外有潘衍興、黃強、王大任及段焯等委員，好支持蔣公的施政構想。由於我們聯繫得相當好，在黨內曾受到CC系抨擊。有次黨團會議，立法委員谷正鼎就公開指責我在立法院搞小組織，但是蔣公馬上回應支持我，他說：「你們不肯聽黨組織的人，都在搞小組織了，那他身爲管組織的幹部，能不搞組織嗎？」當時，我正在巴黎，視察國民黨法國總支部的工作。

中央對立、監兩院及國民大會的黨紀要求是嚴格的，所發展出來的黨政關係也

很受蔣公肯定。蔣公後來對於一些重要的人事安排，總會問我外間的看法，而我回應的建議，蔣公往往採行。不過，講起來我很守分，甚少發言。

我和一般幹部較爲不同的是，面對蔣公，我不是唯唯諾諾之輩，往往直言無隱，使蔣公能夠聽到眞實的意見，而他也相信我遇事能客觀處理。

其實，蔣公用人哲學就是用人唯才，各種職務總要找到適當人才發揮所長，遷台之後他因爲這樣的用人原則，也就更能掌控全局。

王世杰免職案

曾任外交部長等多項要職的王世杰一直深受蔣公倚重，來台之後更是如此。然而，他處理中航飛機案的措施失當，因而在一九五四年被免職。這件事，蔣公也指示由我來查明處理。

民運航空隊是陳納德經營，在一九四九年大陸淪陷之際，政府爲了避免國營的中國航空公司七十二架飛機落入中共之手，於是把飛機飛到香港啓德機場暫放，以後又爲避免英國把飛機交給中共，而以象徵性的代價售予陳納德臨時組成的民航空運隊ＣＡＴＩ。由於英國政府仍然不讓ＣＡＴＩ取得飛機，只好提起訴訟，並繳了

保證金達一百多萬美元。後來官司贏了，保證金卻已被ＣＡＴＩ暗中提出花用掉了，飛機也無法取回。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蔣公與王世杰談到這件案子時，質問王世杰處理不當。蔣公提到ＣＡＴＩ的法律顧問端木愷，王世杰情緒激動地聲辯，他和端木哪有什麼關係。蔣公氣憤之下，決定以「矇混舞弊」爲由把王世杰免職。

我那時才到中央黨部上班幾個月。王世杰免職之後，先是由副祕書長許靜芝代理。十一月十九日，蔣公在士林官邸召見我，他首先詢問外界對王免職事的反應，然後指示我回總統府處理這件案子，並協助許靜芝以及一般的重要文案。

一九五四年一月底，陳誠、王寵惠、張群、吳忠信、謝冠生、許靜芝、張其昀討論王案，由我記錄。會中首先研究王世杰的處分問題，衆人考慮兩航事件後，都認爲蔣公處置正確，王世杰處理該案時確有「矇混」情事，但非貪污。王寵惠認爲免職的行政處分已經足夠，大家也都贊成。至於端木愷，後來被中央黨部開除黨籍。

王世杰的免職，原和吳國楨赴美沒有任何關係。王世杰出事後，蔣公曾指示蔣夫人去函邀吳國楨回國，以接任總統府祕書長，但爲他婉拒。到了年底，卻有一家

香港媒體繪聲繪影地宣稱來自總統府的消息說，王世杰之所以被免職，一方面由於民航空運隊之故，另方面則是因爲他簽字給吳國楨巨額外匯，讓吳在美國過著奢華的生活。如此的不實報導，又成爲吳國楨攻擊政府的導火線。

第二十二章注釋

①周氏錄於民國四十一年日記。

②馬乘風於一九五七年被依叛亂罪判處無期徒刑，於蔣中正總統連任時獲得特赦出獄。

③龔德柏獲釋後，於一九五七年遞補為湖南省瀘溪縣國民大會代表，一九八〇年逝於台北內湖家中，享年九十歲。（《聯合報》一九八〇年六月十六日三版報導）

第二十三章 吳國楨

吳國楨是留美的，和美國方面走得很近，擔任省主席是因爲美方的推薦。他及孫立人在政府遷台之初獲得重用，當時確實是有牽就美方要求的考慮；但蔣公對他仍是很器重。吳國楨的民主思維，在五〇年代的台灣算是很先進的，然而他也有個性上的盲點。

吳國楨主持省政，一開始就很不順利。他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就職後，馬上就因爲改組省府人事問題而鬧得滿城風雨，爲此兩度向蔣公請辭。

> 當時，保密局長毛人鳳密訪相關台籍人士後報告：起因是吳國楨在不明白整個

> 情況之下，聽信部分台省人士推薦，用了蔣渭川及彭德分掌民政及建設兩廳。①而蔣、彭兩人均與二二八事變有些牽連，所以任命一發表，一些台籍高層人士特別是省參議員方面就起了反彈。毛人鳳另外也報告，「查此次省議會之反對省府新人選，係李友邦、游彌堅、黃朝琴等一群光復後躍登政治舞台之『舊人』所策動，其反對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此次省府改組，陳長官原提名李友邦爲省委兼民政廳長、黃聯登（參議員，爲李友邦最得力之助手）內定爲高雄縣長，其他數人也已內定爲各縣市長，惟結果均告落空，故大爲憤怒；二、此批『舊人』原有掌握台省金融經濟之野心，甚多且係光復後的新興『財閥』，惟近來本省金融商業方面已漸爲江浙人所把持，深恐吳氏上台後，因其曾掌滬市之關係，將處處予彼等以便利，而不利於本省新興之『財閥』，故於此時先下手爲強，予吳氏以打擊。②」

台籍的李友邦是黃埔軍校二期，曾是陳誠時代的省黨部副主委，後來因共黨組織台灣省工委蔡孝乾被捕之後的供辭，認定李友邦「包庇窩藏匪諜」並加入中共組織，依叛亂論罪，於一九四二年被判處死刑。蔣公以李案顯示國民黨改造後「黨內仍有匪諜滲入」而震怒，他立即命我轉知張祕書長，改組台灣省黨部。

中央vs.省府

政府遷台之初，台北、高雄兩市當時都是省轄市，主要財經命脈因而在於省方，中央有如架空，行政院施政端賴省府配合。吳國楨在三年多的任期裡，在力求遏止赤字、整頓稅收、尋求財源上都有其貢獻，院府之間的協調卻很有問題，吳國楨做的決定，常常未讓陳誠知曉；有時蔣公爲求效率，也直接指示省府行事。出任省主席那幾年，吳國楨由於財經主導權問題，與行政院長陳誠之間幾乎已到水火不容的地步。

一九五一年二月，由於吳國楨和陳誠的衝突已經表面化，蔣公分別約見兩人溝通。十四日，兩位首長各寫了密函，未經過我就直接呈給蔣公，內容該是和衝突有關，蔣公費神設法彌補兩人之間的嫌隙。

三月一日，我隨節在高雄，有個機會和央行總裁俞鴻鈞談到陳吳起衝突的事。俞鴻鈞說他倆的問題在於，美方先前爲整頓台灣經濟現況而建議成立的財政小組，由於行政院以財政部長嚴家淦爲小組召集人，吳國楨就不肯加入，這對政府造成難題，因爲美國人信任吳國楨，認爲吳國楨如不加入，執行上就會有問題。俞鴻鈞擔

心，省府如果在事前事後都不肯盡力合作，則這個機構的成立恐怕就會有困難，目前還在僵持中。

回到台北後，五日晚上蔣公把陳誠的簽呈交給我，簽呈裡指控台銀未經行政院同意就祕密發行台幣，蔣公囑咐我祕抄一份。由於行政院的檢舉，導致吳國楨也上了簽呈，又把陳誠任內舊台幣超額發行問題拿出來，兩人之爭明朗化，使得中央與省政府都很不安。接連兩天，蔣公兩度召見省府財政廳長任顯群，第二次召見時，我奉命陪見，這才知道吳國楨已經請辭，而台銀祕密發行台幣被行政院拿來做文章，是吳請辭的主因。

台幣祕密發行，蔣公是曉得的，因爲政府遷台初期財政極度困難，省方不得已數度增加發行額度以爲支應。這件事情如果鬧開，不僅打擊新台幣的幣信，也會影響民心。

任顯群當時身兼台銀董事長，蔣公詢問任顯群，另派他人擔任董事長以回應行政院檢舉祕密發行台幣一事有無困難？任顯群回答，台銀改組不成問題，可以照總統的意思辦理；至於挽留吳國楨方面，請總統向吳主席表達慰勉支持就可以了。他並建議，請張岳軍先生勸吳主席，要較由他代爲轉達有效得多。

蔣公採納任顯群的意見，派我到張群住宅轉達兩點指示：一、如吳國楨辭職，則省府必須改組，台銀祕密增發台幣之事就沒辦法隱藏了，就只能交監察院或依司法程序處理；二、此舉並非蔣公所願，但吳國楨如果能夠不辭，則調動任顯群改組台銀爲唯一的辦法；三、希望吳國楨能夠服從蔣公的命令，爲國繼續效勞。

張群那時正因重傷風而臥病在床，我在他的床旁告知蔣公的指示。張群說，他已經了解整件事的來龍去脈，早晨也曾與吳國楨詳談過，並且建議三點解決辦法：一、台銀改組，人選由中央決定，任顯群的財政廳長職務暫不調動，予以申誡處分；二、財經平衡委員會召集人除嚴家淦之外，另增加吳國楨爲召集人，這是因爲吳當初任省主席，爲的是要爭取美援，現在卻不獲參加機會，對吳的心理影響至大，原本蔣公亦有此意，希望維持此案；三、由蔣公對吳國楨面加勸慰。

中午，我返回總統府向蔣公報告，蔣公於是召集王世杰、黃少谷兩位祕書長商討，他倆都同意此議。蔣公囑咐黃少谷向陳誠說明，希望一個月來的吳陳之爭能就此告一段落。至於任顯群所提的財經政策，蔣公依然支持，但台銀董事長將改由徐柏園接任，總經理則是王鍾。而行政院財經平衡委員會，則以吳國楨爲第二召集人。

隔了幾天，是行政院成立一週年紀念，蔣公中午宴請行政院及省府委員。蔣公特地囑咐我，把吳國楨的席次提高，置於他的左手第二位，僅次於院長、副院長，與總統府祕書長王世杰平。席間，蔣公對一年來中央與地方施政頗多嘉勉，同時訓勉各政府人員，看到什麼缺失就應在內部檢討改進，不能在外自己攻擊政府。蔣公這番話指的是少數台籍省府委員如民政廳長楊肇嘉於選舉期間的言行，他曾經公開抨擊政府，甚至以豬比擬。這使得楊肇嘉爲之面紅耳赤感到惶恐，散席時，蔣公經過楊肇嘉的身邊時，楊還深深地鞠了一躬。

因財政問題交惡

中央與省之間的問題，主要在於吳國楨對省的施政主管觀念很深，所以對行政院在財政方面的指示難以配合。這年八月五日，蔣公垂詢行政院辦理財政收支平衡情形，我約略陳述後，蔣公指示，由張群、俞鴻鈞及我所組成的動員小組就原則性進行研究。我針對財政統一收支辦法擬了四條意見，並且先和黃少谷討論經同意後，交給張群。這些意見如下：

──爲使中央與省之收支達到統一之目的，於行政院設財政審核小組，該小組

可由軍政費審核小組改組，但增加省財政廳長爲委員；

——國庫與省庫收支數額應隨時報告財政審核小組登記；

——中央與省之預算以外，支出及追加預算支出均應事前提出財政審核小組通過；

——台銀對於財政性質資金之保管及運用，應由財政部及省財政廳提報財政審核小組審核。

財政統一收支辦法經張群及俞總裁增修完成，送還給我轉呈蔣公，蔣公隨即核定。

蔣公對吳國楨的施政非常支持，並無成見。以這個月二十四日討論行政院成立動員局一事爲例，蔣公以目前這個單位只有交給省方或交行政院二途，不過去年省的理財成績較今年的行政院爲佳，所以宜交給吳國楨主持。蔣公並且指示，陳誠在這個時刻必須有政治家的風度，能放能收、光明磊落，只求有利於事、不計個人好惡。他囑黃少谷將他的意思婉轉向陳誠轉達。

爭相求去

然而，陳誠也因爲與省方和軍方都覺得難以融洽，因此在九月十七日遞出辭呈。王世杰請見蔣公，當面把陳誠的簽呈呈上，但建議蔣公慰留，蔣公隨即親自挽留陳誠，並勉以行政全面革新，又把他的辭呈交王世杰退還。

一九五二年一月二日，行政院召集中央與省府舉行財政會談後，吳國楨又遞上辭呈了。黃少谷告訴我，吳國楨請辭原因，還是因爲與行政院之間的配合問題，特別是在財政規畫方面。吳認爲中央四十一年度總預算歲入門至少有五項合計三億餘元不可靠，因爲稅捐收入有季節性，而且一至三月是淡季還得支應開支，就更感困難。吳國楨也認爲現在實施的經濟金融政策根本是錯誤的，以致工商業不景氣、社會購買力薄弱，影響稅源。

吳國楨指責，欲求收支平衡不外加稅與要求增加美援，但是加稅非當前台灣經濟狀況所能負擔，而增加美援則猶待努力，行政院拖延至今都沒有拿出辦法來，尤其是公債一億元，財政部始終沒有擬出辦法；行政院飭令省府按月包繳三千六百萬元再加對等基金一千五百萬元，省府總共要負擔五千一百萬元，其中尙包括還沒有

確定的公債八百三十餘萬元在內，這樣的作法顯屬不當，中央既然要實行財政收支畫分辦法，則省府應該沒有包繳的義務。

院省之間的財政問題繼續延燒，吳國楨十六日在台灣省臨時參議會中甚至當著嚴家淦的面抨擊陳誠，當場表示要請假南下，從此「擺脫」省主席職務。以過去他辭上海市長職務的情況來看，是很有可能。

十七日下午，蔣公聽我報告吳國楨準備到南部「休息」一事，指示我轉達要他暫緩啓行。我在傍晚五點拜會吳國楨，但他很堅持，且說留也無益，如果以後行政院對院省之間的分權沒有制定什麼辦法出來，他就不準備回到任所，這在先前已經向蔣公報告了。我向蔣公回報，但蔣公依然堅持吳國楨應該緩行，因爲年關將近，大小事情忙碌得很，這個時候離開台北，徒然貽人話柄。

我於是打電話給張群，把整個經過向他說了，請他去勸勸吳國楨。第二天，我又安排張群見蔣公爲吳國楨緩頰，避免鬧僵。張群隨後告訴我，蔣公對吳國楨的態度大爲震怒，斥爲不識人情。

吳國楨的請假函呈上，蔣公當即親批不准。我建議由王世杰約省府祕書長浦薛鳳來面告請假不准事，然後由浦轉告吳國楨，免得吳國楨不遵命令仍到日月潭休息。經過王世杰、黃少谷兩祕書長探視後，吳國楨說改到二月一日再請假，但口風仍緊。

一月二十二日，蔣公接見任顯群，指示他設法以公有地或收購方式，準備十二萬畝的農田以安失業軍官及退役的老弱軍人。任顯群答應遵辦，並報告自三月開始就會以每月安置一千戶的方式，考量農田的等級發給每戶五畝至七畝。蔣公又問到吳主席的態度，明確表示慰留，指示我與任顯群談談省方的困難問題。

蔣公夫婦出面慰留

蔣公決定要慰留吳國楨後，我前往吳的辦公室談了許久，他仍然堅持要辭職，理由是他個人政策與陳誠完全不合，心理上對陳誠也懷著恐懼。吳國楨又說，台灣同胞懼怕政府而不敢言，實在可慮。我回總統府，把吳國楨堅請辭職的談話向蔣公報告了。

二月一日，吳國楨真的請假赴日月潭休息兩個星期，我向蔣公報告此事。蔣公本來批准十天，我向蔣公建議，還是兩個星期爲宜，蔣公首肯。這也是蔣公禮賢下士，並尊重吳國楨的意願，有助於紓解他的情緒。十六日，蔣夫人去電邀吳國楨夫

婦到高雄小住，並且加以勸解後，吳國楨終於打消辭意。

但吳國楨的問題依然沒有解決。隔了一年之後，他還是遞了辭呈，並且開始休假。我奉蔣公指示去探視他並致慰留之意，吳國楨告訴我，即使假期屆滿，他也不打算返回任所。再拖了一個月，蔣公終於准他辭職。四月十日下午，國民黨召開臨時中常會，蔣公親臨主持，陳誠推薦俞鴻鈞繼任省主席，常會無異議通過。

五月下旬，吳國楨以赴美接受母校贈予榮譽學位名義偕妻離台，離台前全體中常委及各單位首長歡送，他在宴席上顯得很高興。

我對吳國楨與陳誠之間的衝突相當了解，但對他日後所言經國先生曾企圖加害他，以及他提及的特務等問題則是完全沒聽過。吳國楨未辭職之前，和經國先生時有餐敘往還，兩邊無論誰作東，總是拉我作陪；我那時爲了健康的考慮，已儘量少飲酒，但每當參加吳國楨與經國先生的餐敘，卻經常喝得多了。

在美抨擊政府

吳國楨赴美之後，卻因王世杰事件擦槍走火，激烈地抨擊起政府。港報牽扯到吳國楨，這裡面實際情形我並不清楚；不過，沒多久蔣公又准王世杰參加國民大會了。陳誠在立法院答詢時曾鄭重聲明，王世杰案沒有套匯情事，自然吳國楨也就根本沒有套匯情事。

那時吳國楨在美國已經對新聞界公開抨擊蔣公，幾至不可收拾。當時蔣公的總統任期將屆準備競選連任，也正面臨李宗仁隔海放話之際，吳國楨嚴厲指責中華民國政府不民主、不自由，影響國家及蔣公形象甚巨。

吳國楨甚至致函國民大會，持續他的猛烈砲火，指責政府有一黨專政、軍隊有黨組織及政治部、特務橫行、人權無保障、言論不自由及思想控制等六大缺失，他另提解決之道爲，組織委員會徹查國民黨經費來源、撤銷軍中的黨組織及政治部、限制特務機關的權力、保障言論自由以及撤銷青年團。

吳國楨並限期要求政府把這封信的內容公開，否則他要在美國公開。

由於胡適的建議，蔣公決定把吳國楨致國大函全文發布，發布的同時，也要由立法院長張道藩以立法委員身分向行政院以質詢的方式展開反擊。一九五四年三月五日，張道藩召開記者會，公開抨擊吳國楨。

十一日，蔣公先是召見保密局長毛人鳳之後，接著召見我，指示我與中六組主任張炎元協助張道藩處理吳國楨案。傍晚，張炎元與我面見張道藩，談了張道藩就

吳案向行政院提書面質詢的內容，然後在晚上晉見蔣公，報告談話情形。次日，張道藩就以書面質詢列舉十三項對吳國楨的質疑，向行政院提出。這天上午監察委員趙光宸來訪，他說是監察院派他調查吳國楨案，並詢問中央對此案的態度。當時正好行政院祕書長黃少谷通知我，要在晚上九點討論如何處理吳國楨事件，我於是回答，等定案再行奉告。

晚上在黃少谷的寓所，謝冠生、彭孟緝、毛人鳳、張炎元、徐柏園、嚴家淦及我都到了，黃少谷拿出蔣公的條子，指示成立第二研究小組，蒐集吳國楨枉法瀆職案件以便在立法院答覆張道藩的質詢，一直到午夜大家才散。

不過，張道藩因壓力太大之故，進了醫院。十五日清晨，蔣公打電話給我，囑我去探視張道藩，要他好好休息。隨後蔣公又召見我，諭示國民大會對吳在外揑造事實詆毀政府而主張法辦的提案，可與洪蘭友祕書長商量如何提審查會討論通過後，正式送大會討論，以使政府能夠依法處理。過去，吳國楨曾向國民大會提公開信，但國民大會並未受理，所以也沒有討論。

十七日上午，中常會開會決議開除吳國楨的黨籍。

吳國楨事件對蔣公而言是極沈痛的，他曾那樣信任吳國楨，而吳所造成的傷害比李宗仁及毛邦初還要嚴重。蔣公在中常會裡的一番話③可以見得他對此一事件的態度：「吳國楨怎麼會這樣子，實在出乎意料，這使我有知人不明、任人不當之咎，這是我應向常會引咎者。今日吾人已由於吳國楨陰謀之暴露，而除去一黨國之禍患，否則可能貽今後更大的後患。李案、毛案雖予國家以嚴重之打擊，但均因知過改進而結果反於我有利；而吳國楨所指責各端，已久爲匪幫所宣傳，但出諸於吳國楨之口，則其影響更大耳！」

不過，蔣公依然認爲吳國楨的批評，值得參考。他說：「吾人不應以人廢言，對其指責各點徹底檢討以謀改進，庶可因禍得福，並希望中央諸同志研究，最好能在國大閉幕時由政府宣示，俾示人以光明正大之政治風度！」

任顯群與顧正秋結婚

吳國楨所任用的財政廳長任顯群，在吳國楨獲准辭職後，也跟著辭去所有公職。他辭職之後就和國劇名伶顧正秋結婚了，這在當時是頗遭非議的，因爲任顯群已婚，元配也在。吳國楨事件發生後次年，任顯群、顧正秋在一個喜宴場合公開露面，次日任顯群就依知匪不報罪被逮捕，外間覺得這可能是政府對於任顯群那名不

正言不順的婚姻，認爲帶壞了公務員的風氣。

遷台以來，蔣公一直很欣賞任顯群的才幹，任顯群卻坐牢了。後來有一天，蔣公突然問：「任顯群這個人怎麼樣？」

我回答：「我跟他很熟，但不深知。」

蔣公有些感嘆：「可惜啊，浮而不實。」

任顯群在財經方面很有才華也有擔當，在政府遷台的最初幾年在財經方面貢獻不小，也備受蔣公肯定；然而先是因爲吳國楨的離職而去職，後來因社會上論斷他的私德而影響了前程。

至於吳國楨，他在美國抨擊政府及蔣公時，刻意營造他所以辭省主席職，是因爲政治歧見而求去；另外也有種說法是因爲台灣已經穩定下來，蔣公不再需要親美的他及孫立人，因而促使兩人去職，但依我所理解，這兩種說法都不是眞的。

那年六月二日，當吳國楨事件逐漸平息後，蔣公接到顧維鈞電④，顧在電文中報告與衆議員周以德談話的內容。周以德說，他最近接見吳國楨時，曾勸以民主精神展現在與國人合作上，即使意見不同，也不應在海外公開抨擊政府；周又說，吳國楨近來精神衰弱，見人便哭，似因其美國友人的同情援助不若其所期望之深，而

感到懊惱。

吳國楨後來長居美國教書，一九八四年前過世。

第二十三章注釋

① 此一人事風波，後來由行政院通過撤換蔣、彭兩人，改任楊肇嘉為民政廳長、陳尚文為建設廳長，方告平息。（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 卷九》）

② 周氏錄於民國三十八年日記。

③ 周氏錄於民國四十三年日記。

④ 同前注。

第二十四章 孫立人

吳國楨事件發生後的第二年，總統府參軍長孫立人因部屬涉及匪諜案而辭職，以後他被指曾有兵變意圖，在台中被軍方察考監管多年。對於孫立人案，據查他確曾有意在美方的支援下，有爭取軍事領導權的野心；但如今看一九五五年的郭廷亮匪諜案，卻是冤枉他了。

近幾年來，美國政府的史料顯示，美方在韓戰發生之前爲求避免台灣也落入共產政權之手，部分人士又對蔣公存有偏見，而產生以孫立人取而代之的企望。

美方策畫兵變?!

我在韓戰爆發之前的日記上，記下了兩件關於孫立人的事。

美國策畫由孫立人發動兵變接管政權的謠言，在一九四九年間就開始了，蔣公亦有耳聞，孫立人在一九五〇年一月初曾經向蔣公否認過。①隨後，美國無任所大使傑賽普訪台，與外交部長葉公超交談時，陪同他的代辦師樞安卻意外露了口風。這次談話紀錄如下。

傑：……據我所知，此島上現須維持六十餘萬部隊的軍費，而多半的生產均仍未及抗戰勝利前平均量。這個嚴重的經濟問題，不知貴國政府打算如何解決？而原有島上居民對於中央及省政府是否能充分合作，本人對這類問題願知各方面的觀察與見解。

葉：關於台灣中國人民對於中央政府的態度，有一種觀察是絕對缺乏之事實根據，即近日貴國人士傳言台灣居民將有推翻政府的企圖。

師樞安：部長所謂「美國人士傳說」，是否指美國官方？

葉：我並不是指華盛頓，而是最近曾由幾位美國駐此的記者談話中得到這種印象。②

這段談話裡，師樞安對於葉公超所提「美國人士傳言」台灣居民要推翻政府的言論特別敏感，實際上他對聯繫及鼓勵孫立人計畫發動兵變之事也是關切。

由於孫立人所練新軍在金門古寧頭戰役中表現優異，再加上美方對孫立人的好感，蔣公於一九五〇年三月一日復職之後，調升他為陸軍總司令，另兼陸軍訓練司令、第四軍官班班主任及台灣省防衛司令。這個命令於三月十七日發布，當時美援不來，又處於中共攻台的威脅之下，任用表現優異的孫立人，有多層面的考慮；四月間，蔣公又令他兼掌由台灣省防衛司令部改組而成的台灣防衛總司令部。

孫立人雖然受到蔣公的拔擢，依美國政府解密的史料顯示，顯然他仍有其他想法。孫立人在三月初蔣公剛復職之時，就向美方駐台人員轉達有意推翻政府，並徵詢美國國務院是否支持的訊息，但美方沒有積極回應。③

鳳山陸軍訓練部改制

美國遠東事務助理國務卿魯斯克以後證稱，六月初他突然收到孫立人託人帶來的一紙信息，表示願意領導兵變以除蔣，要求美國支持他或者至少默許。孫立人如確實在六月初又有如此舉措，我認為應和鳳山陸軍訓練部的改制有關。

孫立人從一九四九年起就擔任陸軍副總司令並在台灣鳳山練兵，自兼鳳山第四軍官訓練班班主任。一九五〇年三月之後，孫立人身兼陸軍總司令及台灣防衛總司令，責任較以往重得多，另外他還有陸軍訓練司令及第四軍官班班主任兩兼職。蔣公在這個時候考慮台灣建軍工作，決定把第四軍官班所在地鳳山陸軍訓練部改組為陸軍軍官學校，另外任命校長，但是孫立人有意見。

孫立人要求兼任校長，他所持的理由是，部隊的作戰與訓練不可分，所以如果鳳山陸訓部要改組成陸軍官校，則他要兼任該校校長。孫立人有此構想，與蔣公看法不同。蔣公認為孫立人的原職繁重，以不兼為宜。

就在鳳山陸訓部即將改制前，參謀總長周至柔向蔣公寫了報告指出，孫立人一定要兼軍校校長，態度堅決。蔣公得悉孫立人的想法後，決定暫緩成立陸軍軍官學

校。這份公文於五月三日批下，我在那天的日記記下這件事，並寫下當時的感覺，認為「孫立人有把持陸軍的想法，這是很不智的」。

孫立人為何堅持要兼任軍校校長，當然很有可能是基於我在日記上記下來的正當理由：「孫立人以為部隊作戰與訓練不能分，故欲兼該校校長」；但孫立人似有把持之意──從先前他和美方的祕密聯繫來看，他的堅持一來不尊重蔣公，再者也有厚植自己在軍方人脈及影響力的意圖。

蔣公暫緩陸軍官校在鳳山復校，孫立人的反應如何我當時並不清楚，但魯斯克日後於做口述歷史時卻告訴兒子理察．魯斯克，孫立人在六月初透過美國駐台官員表示，他打算發動兵變，並尋求美方的支持。蔣公不想讓孫立人兼軍校校長，可能恰好又使他起了兵變的想法，不過美方卻因為南韓局勢緊張也沒有同意他在台灣舉事。

以後，顧維鈞在他的回憶錄裡，也提到有兩位美國國務院官員在韓戰發生後提及「中國部隊忠貞問題」的警訊，這兩位官員一位就是魯斯克，另一位是國務院顧問的參議員杜勒斯。

顧維鈞即將返台述職之前，七月二十五日與魯斯克見面，魯斯克談到台灣的情

況時說，幾個月來美國政府已接到台灣局勢改善的喜訊，但是最近幾週來的報告卻令人難以心安。顧維鈞回憶錄裡記載，魯斯克說，他認為萬一台灣遭到入侵，「島上武裝部隊的忠心並非毫無問題」。

結束與魯斯克的談話後，顧維鈞即往訪杜勒斯，杜勒斯也提到這個警訊：「第七艦隊的實力並非十分強大，一旦共產黨發動入侵台灣有了初步跡象，島上的中國部隊將會起來叛變，反對國民政府，第七艦隊將無能為力給予有效的幫助。」④

兩位美國官員分別跟顧維鈞談起此事時，從時間上的巧合，顯然指的是孫立人的圖謀，但沒有明白告訴顧維鈞；而顧則不知內情。美國官員把有部隊可能叛變的消息透露給顧維鈞，明白顯示美國政府已不支持孫立人的舉措，警告政府要小心。

鳳山訓練基地改制為陸軍官校問題，蔣公後來未事先知會孫立人，即於同年八月八日任命羅友倫中將為陸軍官校在台首任校長，並於十月一日正式復校。

在美國一些對我友好人士傳達訊息之下，蔣公重用在美國深造、態度也親美的吳國楨與孫立人。孫立人對金馬防務和蔣公意見相左，蔣公在韓戰發生前的態度是不願放棄金馬，孫則主張不值得在金馬駐守那麼多的軍隊，而應把部隊集中用來防衛台灣。蔣公認為孫立人傲慢自大、陽奉陰違，並且把軍方高層事務透露給美國在

台官員，導致美國官員干涉我國內政。

孫在軍中發展受限

孫立人雖然善戰，但是蔣公認爲他對國家的忠誠有問題，精神品格與思想都令人擔憂，這就限制了孫立人在軍中的發展。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六日，美軍駐台軍事代表團團長蔡斯即將來台之前，周至柔總長準備派余伯泉[5]擔任蔡斯的連絡官，但蔣公覺得余伯泉不是美國軍校出身，認爲並非妥適，囑咐我把這個意見告訴總長。次日，王世杰來電話告訴我，關於蔡斯的連絡官，目前除了余伯泉之外，沒有別的適當人選。其實蔣公擔心的是余伯泉也會是孫立人的同路人，經常在外國人面前推崇孫立人；不過，蔣公並沒有堅持一定不要余伯泉出任此職。

一九五二年，蔣公決定建立軍事首長任期制，海軍總司令桂永清因而調任總統府參軍長，當時還因此引起美國國會議員的關切，在這次調動裡，孫立人續任陸軍總司令一次。自此以後，軍事首長就建立兩任一換原則，不得久任原職。

有情報說，孫立人曾幾度到草山官邸附近「勘查地形」。這樣的書面情報先交到我的手中，我曾呈給蔣公，蔣公看了看，就問我：「他是什麼目的啊？」我沒回

答，因爲無從回覆。蔣公隨後就在報告上批示：「查明目的」。情報單位是有查這件事，但查了之後也沒發現什麼不安。

蔣公心裡是有些懷疑，不過後來孫立人的陸軍總司令任期到了卻沒有升任參謀總長，是否與此有關，仍很難說。然而他在出事之前的際遇，卻不是蔣公刻意的打壓。其實以他的言行，蔣公已是十分容忍，依然讓他擔負重任。他被調任參軍長，這個位子很重要，這也顯見蔣公是繼續重用孫立人的。

孫立人被指兵變出了事，這還是緯國告訴我的。以後，九人調查小組報告完成，是蔣公批了「不辦」，才由國防部對孫執行察考。自此以後餘波盪漾，有待日後澄清。

第二十四章注釋

①《中國時報》二〇〇一年十月二十九日六版：美國國家檔案及紀錄局公開之文件，一九五〇年一月三日美國駐台灣助理武官發給陸軍參謀本部情報署的電報，電文說：「孫立人通知我說，蔣介石現在已知道有關孫立人計畫發動兵變的傳說。他告訴蔣這項報導是共產黨製造的。他告訴蔣如果屬實，他怎麼會到處張揚。」該電報說蔣相信孫的說法。

②傑賽普大使偕代辦師樞安於一月十五日下午六時拜訪葉公超之談話紀錄，存於周氏民國三十九年日記。

③同注一：美國國家檔案及紀錄局（NARA）一九五〇年三月九日文件，美國駐台北總領事克倫茲（Krentz, Kenneth C.）寫給國務院政策規畫局局長保羅．尼茲（Nitze, Paul H.）、遠東事務副助卿莫成德（Merchant, Livihgstone T.）、遠東事務助卿魯斯克（Rusk, Dean）的密函。美國經濟合作總署（ECA）駐台主任克雷格（Craig, L. F.）返回華府述職，克倫茲說：「克雷格在台灣曾收到孫立人將軍的一項信息。我在台北當總領事的時候，克雷格是我的經濟官員，他不知道要見什麼人，就來問我。孫將軍向克雷格吐露，他和自由派團體相信，反動的國民黨政府正在糟蹋台灣並讓共產黨有機會占領。他和自由派團體將推翻政府以成立一個能夠反映人民意志的政府，掃除腐敗與無能，這個政府能夠保衛台灣。孫

立人說這項計畫的可能性相當大。孫想要知道政變後，美國是否會支持他們。與適當官員磋商後，克雷格被告知他可以口頭方式逐字向孫將軍轉達下列事項：一、我們不能對這項行動的可取性，表示任何意見；我們也不能對結果接受任何責任。二、我們將傾向於繼續協助任何健全的政府，既能夠反映台灣人民的意志，而又有能力抵抗共產主義的政府。」

④《顧維鈞回憶錄》第八分冊，頁六二至六九，中華書局出版。

⑤余伯泉當時是國防部連絡官，後來擔任國防大學教育長、中將副參謀總長、第一軍軍長等職，一九六三年晉任陸軍二級上將，又任總統府參軍長、三軍聯合大學校長等職。一九八二年於台北病逝，享年七十三歲。（國防部史政編譯局：《中國戰史大辭典——人物之部》

第二十五章

總統連任及接班

兩位蔣總統時代，民意機關一直不能改選，也是大陸淪陷的後遺症。台灣的地位乃至於政府要如何定位都是個難題，只好先維持原來國家體制架構，當然就問題重重。

第一任總統任期很快就到了。蔣公歷經驚濤駭浪，整個國家幾乎覆滅，如今繼續領導在台灣的中華民國仍非他莫屬。

然而要國大代表心甘情願地投票，卻也不是容易的事，一些國代以國大聯誼會名義相互聯繫，希望把國民大會改爲常設機構，以及提高待遇等等。我經常必須疏

通，或者警告少數幾位國代不要太過分，有時甚至得疾言厲色。蔣公更在確定成爲國民黨的總統參選人之後，曾經召集國大黨團幹事及小組長，嚴厲指摘國大代表的各種非分要求。

國大代表的爭議

有次跟蔣公同車返回陽明山官邸時，我提到外界爭議國大代表應不應該享受有如薪水般的待遇問題：「報告總統，外面對於國大代表的制度及薪水有些意見。」

「什麼意見呢？」他問。

「我們的民主是雙重制，第一層是立法院，第二層則是國民大會；有批評兩個機關都是常設機構，並不妥當。另外，更進一步的批評指出，由於國大代表照理說應非常設機構，也不應領薪水。」

蔣公笑起來：「你說得對。原來國民大會不是經常開會的，國父的意思也不是這樣子，『五五憲草』對這方面也有規定，原先是爲了選舉總統副總統的，但是現在大家都逃難到這裡，政府不給他們議事，不給待遇，那他們怎麼過活呢？」

蔣公很清楚如此的雙重民意機關設置是不對的，但是他沒有積極地設法改正。

祕書長洪蘭友向蔣公呈遞的報告①指出，國大麻煩固然多，尤其是各代表個人生活問題必將增加財政上的負擔，但國大爲最高民意機關，舉凡當前一切大計均可藉臨時會決定方針，使政府得在法律與事實之間的困難裡，獲得有力的依據；所以當前政府仍應繼續號召海內外國大代表來台。

這次國民大會，除了選舉總統、副總統之外，對於滯美不歸的李宗仁，也是重點任務。國民大會要怎麼數人頭才合法，頗費心思。

洪蘭友報告，以國大通過彈劾案的人數而言，依規定以出席代表三分之二的同意行之，即國民大會依法以一千五百二十三人以上人數開會，而以一千零十六人以上之同意通過彈劾案，較之通過罷免案所需，可減少五百零七人。如將各在台當選卻退讓以及提名而落選的一百七十四人，予以遞補或改移區域代表爲職業代表，則在台國代達到一千一百五十二人，再召集海外代表就可勉強達到法定人數了。

第二任正副總統選舉籌畫

一九五四年二月十五日，中國國民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臨時全體會議在陽明山召開，蔣公親臨主持。他在致詞中談到總統、副總統選舉的候選人問題時，以一九四八年的總統、副總統選舉失控爲例說，第一任總統選舉，他原打算提無黨籍的胡適出任總統，但是馬上就遭到桂系白崇禧的壓力，表示如果他不願擔任總統，那就由李宗仁來幹好了，他不得已只好出任。

蔣公接著說：「此次黨內同志有主張提本人爲總統參選人，如於本黨及國家有利，我就可以當仁不讓；但我以爲上屆的各種值得考慮之處，現在仍值顧慮，所以爲黨國計，我仍不擬擔任總統，如本黨提黨外參選人，則胡適先生甚爲相宜；如提黨內，則于右任先生爲宜。中央不可拘泥政黨政治使此總統參選人受其影響。

「本人絕不推卸對國家的責任，過去四年來我擔任總統，因行政院陳院長爲我的部下，所以能事事接受指導，而非在法律上總統有指揮行政之權；此事使我有違憲之嫌，這對我而言有如芒刺在背，難以自安。如果能夠的話，我擔任行政院長或軍事首長，使我能發揮所長爲黨國效力，即使擔任副總統也可以。希望諸位同志深切考慮。」②

不過，于右任隨後就發言表示擁護蔣公爲總統參選人，衆人也紛紛一致擁護蔣公參選，隨後臨時中常會投票，以全票決定由蔣公競選連任。

副總統人選方面，蔣公說：「副總統參選人的人選，我考慮須有下列條件：

一、忠黨愛國，服從黨的決策；二、負責盡職；三、任勞任怨，而能任怨尤爲重要，現在我擬提名陳誠同志爲副總統參選人，雖然每人均有其長處與缺點，我認爲陳誠同志此項工作最爲適宜，同時我昨天曾徵求諸位老同志的意見，他們均不願當，我也不敢選學問、資歷、年齡比我高的，作爲我的副總統！」

張群曾有意角逐副總統，他的資望及經驗都夠，但年紀明顯太大。在那段期間，有天張其昀祕書長告訴我，張群表示他決心只擔任黨務工作不作其他，所以總裁已說不考慮由張群出任副總統。在這種情況下，小他九歲的陳誠就成爲副總統候選人。

張群和陳誠之間有著瑜亮情節。因爲張群擔任過行政院長，陳誠亦然；所以日後在地位上就有些意氣之爭，陳誠並未支持張群出任一些職務，如在中日談判時出任全權代表及日後擔任首任駐日大使。

海外很擔心孔祥熙、宋子文及孫科成爲副總統，而透過管道堅決反對，但蔣公並沒有如他們所擔憂的讓親戚或老人出線。由於蔣公聲望極高，在國內沒有人出馬和他競爭，臨時常會討論這個問題時，谷正綱、崔書琴主張由黨外人士參加陪選，當時不少人反對這個提議，以後卻逐漸形成共識。

三月十二日晚上七點，蔣公在官邸約集中常委討論，決定邀請民社黨的徐傅霖、石志泉參加總統、副總統選舉，至於連署不夠的票數，由國民黨協助。次日，蔣公派谷副祕書長去接洽民社黨商妥。

二十二日，國民大會以壓倒性的一千五百零七票選出蔣公爲第二任總統，陪選的徐傅霖得到四十八票。隔了兩天，陳誠也順利當選副總統。蔣公及陳誠就職後，由俞鴻鈞出任行政院長。

八全大會增設副總裁

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劉自然事件引起群眾搗毀美國大使館後，這年十月十日國民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在陽明山革命實踐研究院開幕，八全大會的主要任務在於修正黨章，調整中央組織。會前，中央黨部祕書長張厲生試擬了中央組織改進意見，除了第八屆中央評議委員不規定名額、中央委員名額五十人、候補委員二十五人之外，中央組織做了若干調整如取消第四組及二、六組合併等。蔣公在草案上做了具體批示，但誰也沒想到，他提出了一個最重大的組織調整案，也就是增設副總裁，心目中的人選則是陳誠。

大會於十四日正式開議。十六日，蔣公於中午約集大會主席團及中央黨部的正副祕書長在陽明山官邸開會。主席團成員爲陳誠、張道藩、俞鴻鈞、谷正綱、周至柔、張其昀、蔣經國、黃少谷、黃朝琴、黃杰、阮賡唐、皮以書等人，等於所有黨政要員都到了。特別的是，蔣夫人也來參加這次會議。

蔣公首先詢問大會議事情形，旋即轉入正題。他說：「我意本黨黨章爲對外號召之重要文件，應簡化總章中的「總裁章」，對總裁之名稱可以研究改進。前已指示，應設副總裁一人輔助總裁處理黨務。我已年邁，雖精力仍健，但革命黨人必須存心時時可死而革命事業則不能一日中斷，我在時我當負責，副總裁可以輔助黨務不必另設職權。其人選可由總裁提出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不必用選舉辦法。當年總理於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時，明知他將不久於人世，常思指定繼承其領導革命之人選，但黨內以胡汪③資望爲高，而總理則認爲他們爲動搖份子，故始終未能實現其指定繼承人之志，乃致於總理逝世後黨內分崩離析，領導乏人，爲造成三十年來黨內之混亂局面。今思之益深痛切。故我今日乃有此一提案，請各位同志考慮。」④

蔣公語畢，眾人均感事出突然。如果要設副總裁，人選當然就是副總統陳誠了，近年來蔣公無形中已加重陳誠在黨政體系的責任，五二四事件後更爲明顯，所以我能體會他心中所思。他想的是中華民國大業如何延續，權位問題自可其次。他的心胸之偉大、對革命事業之忠誠，實在令人肅然起敬。

與會的主席團成員，除了陳誠發言說此時宜鞏固領導中心，似不宜設副總裁之外，其餘都默然贊同。

十八日，關於副總裁設置的總裁交議案提交八全大會討論，全文如下：

「八全大會以後，反共救國事業又進入新階段，一面繼續維護憲法，爲民主法治而努力，一面策進大陸革命，以達成反攻復國之任務，黨的工作備形艱辛，而責任亦益加重大。中正提議，本黨應設副總裁一人，並在黨章第五章中增設條文如下：『本黨設副總裁一人，輔助總裁處理黨務，其人選由總裁提名經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之。』」

蔣公說明：「此次全國代表大會是策畫完成反共抗俄的使命，此一使命之達成，必須發揚黨的革命精神，集中黨的人才，擴展黨的新生命。此在紀念週已經提及，現在最重要的是鞏固黨的基礎，然後才能擴展黨的新生命。如何鞏固黨，於余

個人言有一特殊責任，即余所以有此提案之動機。

「自總理逝世三十餘年來，歷史的教訓非常重要，黨經過無數糾紛挫折，以至於今日的八全大會，倘大家回想以往艱辛之歷史，當能體察這次大會之可貴。首先要知道當前的敵人之性質以及革命任務之重大，共匪為本黨革命史無前例的敵人，過去滿清軍閥甚至日本軍閥帝國主義，我們可以打倒，但現在共匪加蘇聯的敵人比他們都兇狠，就是將他們全加起來亦尚不足以相當。故今後革命事業將為十年、二十年的長期奮鬥，不是一紙決議、一個計畫可以完成，本次大會不能存僥倖勝敵之心，依照總理於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對國民革命成功之解釋，必須擊敗敵人而建國完成才能稱為革命成功，故各位同志必須體認此點，在此次大會中必須鞏固黨的基礎即加強組織，然後才能擴展黨的基礎以達成建國復國的任務。而組織的加強為黨章中的重要目的，余為總裁，之所以交議此案目的在此。

「總理當於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謂，革命之責任應由全黨黨員共同負責、奮鬥，不可依賴領袖個人，以勗勉全黨同志。余認為此語極為正確，總理知悉其將不久於世，故以托孤之精神將黨的責任交付於全黨同志，總理當年之心情蓋總理僅能將責任交全體黨員而不能交付某一位同志繼續其對黨的領導，但自總理去世後，黨

分崩離析，革命責任不能統一，領導失去重心，使共匪滲透本黨，此為黨沒有領袖所引起，總理亦嘗有此動機，但當時黨的內外環境使他無法完成其願望，此為過去之教訓。現在就當前革命之環境而言，革命的責任固為全黨黨員，但沒有領袖為不可，革命領袖仍是革命工作所必需者。余此舉為奠定今後革命工作的百年大計，加強組織，希望各位同志能採納諒解。」⑤

蔣公說完後，有個軍人代表起立反對，他認為指揮革命工作不能分，必須集中在一人身上，正如軍隊只能有一個指揮官一樣，另外有人附和他的意見。這時經國先生說話了。

經國先生發言支持他父親的決定：「自大陸失敗以迄今日反攻基礎初定，得以度過難關，也是本黨最團結的結果，總裁此一提案為促成團結，並以表示本黨的大度，為革命工作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我們要收復大陸，必須黨能更團結、更集中力量，才能達成這個任務！」

張其昀接著以歷史性的決定來形容蔣公的提案，讚揚是總裁的賢明，相信總裁必能選擇最能輔助他及領導革命的同志。八全大會隨即表決，三百三十五位代表中，以二百八十八票通過。

二十三日，蔣公提名陳誠為副總裁，大會以絕大多數贊成而通過。

傳賢不傳子

長久以來，外界一直認為蔣公有「家天下」的想法，所以遷台後就一直栽培經國先生，準備由兒子把政權接續下去。然而，從蔣公在五二四事件前後的舉措，以及他主動提出設置副總裁之職給陳誠，可見得他傳賢不傳子的無私心胸，以及維繫中華民國國祚的使命感。

陳誠是個君子，心直口快，他在當選副總統及副總裁又二度出任行政院長後，自己也期待能自蔣公手中接下領導國家的棒子。一九六〇年，蔣公第二個總統任期又將屆滿，在解決總統能夠連任幾次的憲政問題上，陳誠認為蔣公連任兩屆之後，應該換他繼任總統。

我記得有次中常會結束後，陳誠、黃少谷、張道藩及我四個人一起閒談。談著憲法對於總統連任問題的規定，當時臨時條款正在擬議。陳誠說：「根本不用修憲，他可以像毛澤東一樣，當黨總裁就好了嘛。」陳誠指的是蔣公，說到這，大家都笑了。

陳誠的意思很明顯——由自己出任總統，而蔣公則任黨總裁，繼續以黨領政，如此就不需要修憲。但蔣公繼續連任總統的動機很簡單，他認為陳誠雖然勤政，但還擔不起領導國家、光復大陸這個擔子。蔣公基於責任感，只好繼續領導國家；陳誠，應該是在他不起之後才承擔重任。

但是，陳誠卻把身體給累垮了。我們都不知道，他其實是靠著藥物支持而戮力從公的，等到他躺在床上起不來時，要減輕他在行政上的負擔已來不及了。

第二十五章注釋

①周氏錄於民國四十三年日記。

②同前注。

③胡漢民及汪兆銘。

④周氏錄於民國四十六年日記。

⑤同前注。

第二十六章

五二四事件

蔣公在國民黨八全大會中，把陳誠提升為副總裁，是有原因的。因為他顧慮經國先生尚不足以擔當領導國家的重任，一般認為這和五二四事件有關。

經國先生的民族情緒，是非觀念都很強。他也運用影響力，做了認為該給點教訓或者該伸張正義的事。不過五二四事件讓他了解到凡事都應有多層面考慮。

美國在世界各地都有駐軍，官兵出事時有所聞。二〇〇二年，南韓美軍因為車禍肇事撞死學生，但美軍軍事審判庭判決肇事美軍無罪，並且立即遣送離開韓境，結果惹起韓人的反美暴動。五二四事件，和發生在南韓的美軍車禍肇事審判案件頗

為類似。

美軍槍殺國人劉自然

一九五七年三月二十日，美軍顧問團上士雷諾在其陽明山住宅前槍殺國人劉自然。美軍是擁有外交豁免權的，也就是說，美國軍人在中華民國領土上犯罪，是由美國軍事法庭審理。這個案子很受台灣社會矚目，開庭前三天，美方知會行政院新聞局，邀請中外記者旁聽這場以陪審制審理的殺人案。

審判的那幾天，媒體在報導時就摻入了民族情懷，希望從此案的審判，看看中國人的生命價值是否等同於美國人，又要看看美國在經援軍援之外，能不能以公正的判決來贏得盟邦的人心。結果，八名選自美軍的陪審員聽審後，二十三日投票決定雷諾無罪，雷諾夫婦在當天下午就由美軍派機載往菲律賓。

依我國法律來看，雷諾連續開了兩槍打死劉自然，無論如何是有罪的，即使勉強說雷諾開槍是出於正常防衛，也應是防衛過當，美國軍事法庭的判決很難被國人接受，二十四日就成為各報的國內新聞頭條，並且批評審判不公。上午，劉自然的妻子奧特華熱淚縱橫地揹著抗議標語到美國大使館前抗議，民眾也愈聚愈多，下午

一點半，群眾衝進美國大使館及美國新聞處，搗毀門窗家具。台北市警察局派員警鎮壓並拘捕滋事者，引起群眾不滿，到了傍晚六點又衝進警察局，不僅多人受傷並且鬧出人命。這個時刻，整個情勢已然失控，衛戍部隊開進台北市，晚上七時起實施戒嚴，秩序才逐漸恢復。

我初步得知的消息是，有許多青年學生參加這次暴動，但各種跡象顯示並非預謀反美，到底雷諾獲判無罪也不過是先前一天的事，美國軍事法庭如果以殺人論罪，也不會出現這次暴動。

出事時，蔣公正在日月潭休息。次日，起初一切照常，立法院繼續為大法官終身職的問題討論司法院組織法，但會中也談了前一天的暴動。晚上六點半，中央委員會宴請全體監委，副總統陳誠、行政院長俞鴻鈞也都到了。俞鴻鈞當面告訴我，行政院為了這次暴動，已經決定總辭，辭呈也已遞呈總統，但對外尚未發布，請我保守祕密。

蔣公傍晚抵達台北，立刻在晚上八點召開高層會議，陳誠、俞鴻鈞、張其昀都從宴會中離開。從這三位首長被召，可以見得蔣公知道問題的嚴重性，想釐清究竟出了什麼事。陳誠是副總統，蔣公不在台北時，他的地位最高；俞鴻鈞是行政院

長，又提了總辭，與此事當然有直接關係；而張其昀身為教育部長也被召去，原因就是因為暴動中有不少青年學生。

美國大使館被搗毀的效應馬上顯現，美國那邊反應強烈。華府朝野對這次暴動表示震驚並予譴責，而我方則是由董顯光大使致歉，並願賠償一切損失。美方對這次事件極為重視，決定減少駐台官兵，那時美軍在台灣有八千人，先減少八百人，而美軍在海外其他基地，也將裁減。

二十六日，蔣公決定對行政院總辭表示慰留，但衛戍司令黃珍吾、憲兵司令劉煒以及警務處長樂幹都被免職。二十七日上午十點舉行陽明山紀念週，蔣公親自主持，他在會中宣讀「政治作戰要領」訓辭就離開了。與會黨政官員原盼蔣公對台北事件有所指示，但他沒有。

蔣公比為義和團事件

直到二十九日，蔣公才在總動員會報中談了五二四事件。他把這個事件比擬為義和團事件，由此可見他的痛心。蔣公說：「清朝由於昧於外情，放任義和團暴民仇外盲動，以致使得整個中國蒙受重大損失，而這次暴動因為青年昧於國際禮儀搗

毀了美國大使館，是教育上的大失敗！」他當場囑咐張其昀，應將這次教訓寫進教科書，教育下一代，不要再犯同樣的錯誤。

六月一日，蔣公在總統府的國父紀念月會發表內容沈痛的「告全國同胞書」。正如先前對高層官員的談話內容，他談到國父倡導國民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掃除國恥，而國恥之中，最可恥的就是「辛丑條約」，而辛丑條約就是因為義和團暴動，攻打外國使館、殘害使節和外僑所引起的。文章後段，他提到美國：

> 同胞們！要知道今日和我們站在一起的美國，不僅是一個此時患難與共的盟邦，而且是和我們有深厚傳統友誼的朋友。唯有這個朋友，在列強中從來沒有侵略我中國的寸土尺地。他更在辛丑前後，防止了列強瓜分中國的企圖，這是大家所應該切記不忘的。不過朋友之間相處，自然也會有不愉快的事，但是應當各取互相諒解的態度。我們固然希望朋友能諒解我們，同時我們更當先反求諸己，由我們先諒解朋友，才是我們中國人做人「盡其在我」和「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如果聽任感情橫決，不自約束，無論是出於愛國的動機，或是任何理由，其演變所及，反而會危害國家，遺禍民族，把無數同胞的生命和幸福，於有意或無意中陷於萬劫不復的境地！
>
> 在這次不幸事件中，負責維持治安的人員，事前既疏於防範，臨事又不能當機立斷，負責處置，甚至於群眾示威行動變質為暴動之時，仍然猶豫不決，任致蔓延，實堪痛心。除已由政府將當時治安首長明令撤職，以昭儆戒外，今後政府對於執行國策，保障中外人士生命財產的安全，維護法律秩序的尊嚴，自必責無旁貸，斷不寬假，其違犯法紀，當場就逮者，亦當依法辦理。惟經過這次的巨創深痛，無論政府與民間各方面，更應深切檢討，特別對於一般教育，尤其是國民教育方面，更當注重灌輸每一個人以做現代國民應有的國際社會常識，作為必要的教材。須知要有具備現代知識和訓練的國民，才能構成現代的國家，奠定我們立國建國的基礎。①

俞閣政治危機

立法院在六月十八日召開院會準備就五二四事件進行質詢，行政院也準備了相關的報告，然而院會裡有逼退俞鴻鈞的暗潮，我全力疏通立委請他們不要質詢這個事件，這些立委大都放棄發言。我本來以為過關了，然而接近中午時，包華國委員

突然提議將行政院的報告交付審查。事態有擴大之勢，下午我請立委黨部努力打消這個動議，最後終以院會出席人數不足法定人數而未做決定。我感到厭煩，對立法院的耐心已日益減少，不知何日才能解脫。

十九日是中常會，蔣公主持。會中聽取行政院對越南政府強迫華僑入籍引起撤僑問題的處理事宜後，接著由軍方報告五二四事件被捕人犯的審判情形。蔣公指示，此次事件為義和團暴亂以來的奇恥大辱，影響國家地位極大，中央應徹底檢討改進，作為全國人民的教訓。這話說完，他就退席了，內心裡似乎還是極為沈痛及憤怒。幾天後，軍事法庭把二十六名參與五二四事件的肇事者分別判處重刑。

我心裡想著，除了改革行政、更新人事，沒有別的法子了，所謂為政在人，雖有法制，若所用非人，也是難以成事的。唯唯諾諾之輩只能求得上悅，卻不能治事而使人悅服！五二四事件已凸顯這個問題，如無興革，則徒失威信於事無補了。

我繼續透過中央政策委員會疏通立法院，希望黨籍立委不要在立法院檢討五二四事件以免橫生枝節，但是包華國、楊覺天及楊寶琳等少數幾位委員恐怕還是無從掌握。

二十四日的中常會又開會討論五二四事件，蔣公並未出席。俞鴻鈞報告說，總

統指示，他不在台北時，遇事應請示副總統。我在當天的日記記載，感覺到蔣公對陳誠的倚重日深，並把最近一些有困難的行政問題如最近的財經機構調整案，也都交給陳誠辦理，頗類同艾森豪扶植尼克森，陳誠似有成為蔣公的接班人之勢。

這會是蔣公認為經國先生尚不足以擔當大任嗎？似乎不無可能。經國先生實際負責安全局，而安全局在五二四事件中脫離不了關係，事件發生後，他有整整兩個月的時間未曾活動。在蔣公於六月一日發布「五二四事件告全國同胞書」的同時，經國先生也在這一天眞除退除役官兵就業輔導委員會主任委員。他原先是退輔會副主任委員代理主委職，卻於此刻在職務上做了調整。

警備總部成立

這次嚴重事件發生後，蔣公看出台灣情治單位太多，形成多頭馬車而導致失控。他指示把台灣省保安司令、台灣省民防司令部、台北衛戍司令部、台灣防衛司令部合併成立台灣警備總司令部，隸屬國防部，執行戒嚴法，負責警備、衛戍、民防及保安四大任務。

五二四事件影響所及，也包括蔣公自己，他開始管些過去不大管的項案，如對

公務車輛集中管理以及修建圓山飯店前身的俱樂部等等，都親自督促。在一次總動員會議中，蔣公感慨地說：「有人以『三不管』戒余，如余果如此，則不知政府成何狀況！」

事件發生一個多月後，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在國際獅子會年會中發表美國的兩岸政策，會中重申支持中華民國政府，不考慮承認中共政權：

「此一政權在七年之中，已發動五次的對外戰爭或內戰——韓國、越南、西藏、菲律賓及馬來西亞，該政權本身曾與聯合國作戰，而被聯合國認爲是一個侵略者，該政權蔑視聯合國恢復韓國統一的決議，而且公開宣布使用武力爲其不變的目標——這樣一個政權，是否應將一個根據其憲章『負有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的基本責任』的機構中的一個擁有否決權的常任席次給予它呢？

「……在中國（按：指中華民國）如同在他處一樣，只是一個過渡階段，而不是一種永久的局面。我們爲我們自己、我們的盟友和中國的人民有需盡我全力以使此一過渡階段不得持久……期待有一天，那個時候，亞洲的那些現在尚是自由的人們將能保持自由，自由的人們能夠有信心地保持自由，中國人民與美國人民能夠繼

續保持他們悠久的友好合作歷史。」②

杜勒斯的這篇演說，蔣公很看重。他指示譯出之後空投大陸，以加強大陸反共人民的信心。

蔣公也指示中央正式舉行五二四事件檢討會，爲避免事態擴大，由陳誠約集全體常委及有關部會首長於七月二十六日在草山官邸舉行，從下午四點開始一直開到晚上九點半晚餐後結束。會中決議：

——衛戍責任應該統一，所以現行衛戍司令部、保安司令部、民防司令部、戒嚴司令部應予合併。

——憲警機構應分層負責，非主管機關不得違反規定對之做不負責任的指揮。

我這才知道事件發生當時，憲兵司令部曾向安全局請示，但安全局所屬官員答覆憲兵司令部說，攻擊美國大使館之事並非其主管責任，而示意憲兵單位不必干涉而造成錯誤。這個情況，與會委員都認爲不當。

晚餐時，葉公超對俞揆表達不滿，祕書長黃少谷以不願再到立法院備詢爲由打算請辭。嚴家淦說他已經數度請辭了，又說群眾攻擊美國大使館雖然是基於對美國

軍事審判的憤怒，但搗毀警察局則顯然是由於政府威信的低落。陳誠發言時也對行政院的表現不大滿意，又直指安全局等情治機關應予改革。

我可以感覺得到，俞內閣的政治前途已面臨危機。我坐在嚴家淦的旁邊，他告訴我，五二四事件時，葉公超就提議內閣總辭，但俞鴻鈞不太贊同。

不過當天稍晚，俞鴻鈞親口告訴我，已提總辭。這個事件影響層面之大，俞鴻鈞卻遇事優柔寡斷，實在很難應付艱難的局面。而陳誠抨擊安全局，等於指責經國先生也應為此事負責，因為安全局是他管的。

蔣經國受到指責

為求情治機構法制化，掛在總統府機要室名下的「資料組」早在兩年前改組為國家安全局，正式成為全國各情報治安單位的協調、督導機構，首任局長是鄭介民，副局長則是陳大慶，經國先生並未掛名，但實際上是由他以「國防會議副祕書長」的身分來負責。

八月四日晚上，經國先生邀請我和光潤便餐，這次五二四事件以來，我倆首次晤面。我們談了一些時事如修憲等問題，他又談到他所領導的安全局工作。他有些

輕描淡寫地說，很希望得到中央重要幹部的了解與支持。

我覺得，這才是他邀我吃飯的主要目的，由於暴動，安全局受到極大的批評，蔣公甚至把這次暴動視為義和團以來的國恥，就不知蔣公對他又是怎樣責罰，然而他沒有多講，我也就不問。以後，經國先生依然掌控情治安全單位，直到他出任行政院長為止。

五日上午，蔣公主持陽明山紀念週，他宣讀《對五二四事件之反省及警覺》小冊，剴切指示改進之處，內容較上次訓示時更為詳實切要。

經國先生恢復活動。八月二十三日，他參加了八全大會的黨章修訂會議，在這個會議之前，蔣公曾在中常會指示，修正黨章時應避免予外「黨天下」的指責，另外也要研究修改總裁制等。

經國先生參加黨章修訂會議那天，宋越倫自日本寄來一箱奉化水蜜桃，我分了一半給他。二十三日那天深夜十一點，我在他的邀請下，隨他到基隆搭乘大昭艦赴東引島游擊基地視察，還有兩位匈牙利反共義士隨行，次日七時抵達。此島有一支三千多人的游擊縱隊以及五百餘名漁民，學校一所。島上物資匱乏，居民衣衫襤褸極為窮困。經國先生訓話時充滿感情，我覺得他很能把握群眾心理，這是常人所不

及的。隨後兩天，我們搭船到馬祖視察，並在美籍顧問的陪同下，搭乘美軍快艇抵達高登島。部隊長告訴我們，共軍已在馬祖對面構築空軍機場，對馬祖防務影響極大。我們在二十五日深夜返抵基隆。

那幾年，經國先生交往的有俞國華、我，以及曾任蔣公座機駕駛的衣復恩。五二四事件以後，經國先生就極少在媒體上出現，外界以沈潛稱之，但是私底下我們還是往來密切。經國先生在我們當中年齡最大，也常由他帶頭，我們的話題，除了國內政事不大談之外，大多笑笑鬧鬧，或講講大陸局勢。

陳誠未病故之前，經國先生可以說是處於養望階段，過了好長一段隱身幕後的日子。

第二十六章注釋

①周氏錄於民國四十六年日記。

②同前注。

第二十七章 轉戰財經

中國國民黨八全大會改選中央委員，全體黨代表複選投票之下，我在三百四十票中，以二百四十五票當選，這是第六高票，僅次於陳誠、蔣經國、周至柔、谷正綱、俞鴻鈞。

這顯示我的黨務工作已漸得同志的認同了，對我自己而言，聲望也升高到空前，各界都覺得我必負重任，至少應是政務委員。然而很戲劇化地，我自蔣公身邊外放的第一個職務並非如此。

俞鴻鈞彈劾案

行政院長俞鴻鈞與監察院之間的衝突依然持續著①，在蔣公的眼裡，這屬於黨政關係協調問題，也就是我主管的事務。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監察院以俞鴻鈞違法失職而彈劾，彈劾理由包括俞鴻鈞「非法」兼任中央銀行總裁浪費公帑，總裁公館的飯菜金、醫藥費及一切開支悉數由央行供應，以及俞宅依往例使用公帑買木炭、開支煤氣費等；監院十一人小組準備繼續到央行查帳時卻遭拒絕，而被監院彈劾理由書直指「毀法亂紀，莫此爲甚」。

監察院打算赴央行調查俞鴻鈞身兼總裁支用央行公帑事件，蔣公最後只好出面協調。時屆歲暮，蔣公向中央黨部祕書長張厲生詢問本案，張厲生報告如果央行堅決拒絕監察院的調查，監察院臨時會就要以監察權不能行使爲由宣布休會。蔣公命張厲生轉達監察院于院長，講的話相當嚴厲：

「一、政府遷台後，國家經此大變，總統雖不負責任，但余對反共復國的責任余必負之，而依憲法，五院之間的問題，余應注意。

「二、復應請監察院于院長諒解者，對軍令之執行，余負有責任，而共匪之滲透伎倆無所不用其極，如監院只憑一紙控訴即往央行調查，影響軍心極大。中央銀行於大陸淪陷後，財產已完全喪失，余對僅有的銀行準備不能不予注意，如調查中央銀行，則以該行隸屬總統府，理應先知會總統。②」

隔了幾天，蔣公以總裁身分邀監察委員在中山堂光復廳午餐，並請全體評議委員及中央委員作陪。席間他談到大陸時期民意代表的狂妄態度，然後指出行政院與監察院之間的問題：「……國家行憲後，民意機關對政府人員之誣衊無所不至，凡有血性之人士何能忍受。去年九月，監察院糾正案余曾支持糾正案，指示行政院辦理；余對黨內同志均無偏袒，行政院到期不答覆，實爲不對，而後中央常會討論行政院長應否到監察院備詢時，余未在場，常會之處置，余迄未表示決定意見，余以爲本案爲二院之糾紛，應請總統解決，但二院均未採取行動，故未能出面主張。余恐二院意氣用事，更釀其他事件，故命令央行在二院糾紛尚未解決以前，應暫停調查，後監院因此提出彈劾，當尚有其他緣故。

「軍隊與央行均直屬總統，監院要調查，均應事先與總統有所接洽。監院有憲法規定之職權，但情理法均必須兼顧，吾人要相忍爲國。余常想，倘余在行政院立

場，余必不能忍受今日立監二院之侮辱，必憤而不理。此雖屬閒談，倘憲法之行使不慎，其糾紛所至實堪顧慮。此言雖由余以總裁地位而言，實亦可謂代表一般人所不敢言者。」③

蔣公是以民代囂張的氣勢有感而發，他顯然不認同監察院彈劾行政院長的作爲，他甚至認爲，監察院這麼做會動搖國本，讓中共有機可趁。

其中他也責難中央黨部，沒有做好兩院之間聯繫協調的工作，而這個工作正是當初把我調任副祕書長的目的。

二月五日，蔣公在中常會訓示：「余於八全大會時，曾對黨務之進步寄予甚大之期望，然今四個月來各項工作均無進步，漸感失望。昔時陳布雷之遺書曾對當年中央同志諷爲恬不知恥，『瓶之罄矣，維罍之恥』，『中朝大官老於事，詎肯感激徒媕婀』，此種局面即指無革命精神，徒事因循苟且而已。今日局勢又復如此，則反攻復國即無希望矣……。

「……黨員之不接受黨的領導，實中央領導無方，應徹底檢討，黨如沒有是非善惡必失敗，各種事情發生，黨必須嚴格注意處理，而事後復應加以研究改進，以建立黨的尊嚴及權威。例如監院委員同志之事，中央應有所措施，不能不了了之。

拖延時間即是等候失敗。立監二院黨員絕大多數同志均為忠實，僅少數人反黨而已，今後必加整頓，在組織上之缺點研究能有效之辦法。

「以前中央政治會議之組織，使立監二院能負責之同志加入，以加強政治領導，其他改進辦法亦應研究改進。今日缺點，方法不夠，態度不對。但應堅持原則立場……」④

他同時也提到對開除黨籍的黨員應該共棄之。又說，今日的黨務狀況，他實在感到無面目擔任黨的總裁。最後，他宣示作為一個革命黨的工作要領。

不過，蔣公在訓示中所提的中央政治會議，我認為這是疊床架屋，並不贊成。

面見蔣公進言

兩天後，蔣公在官邸書房召見，詢問他在中常會訓話後，中央黨部有沒有確實檢討。我回答，昨天下午工作會議裡，已責由中常會推宣小組專案研究外，對宣傳民運及組織部分，已從組織與人事管理方面著手研擬改進辦法。

我也提出我的看法：「關於宣傳方面，中央黃少谷、陶希聖、胡健中、馬星野等主管意見多不相合，實在是今日宣傳步調不能一致原因。至於黨政關係部分，對監察院彈劾一案，當時中常會對整個情況的估計似乎欠客觀，但近年來俞院長任內，行政上只說不做，致失去同志的信任亦為主要原因！」

我接著說：「中央政策委員會如須改組，然而前天總統訓示準備採取過去中央政治會議制度，這樣的話則有使黨的領導成為雙軌制的顧慮。黨應以主義、黨德來聯繫同志，而行政則須以法治為主體；如果考慮在現有體制之上再設置中政會，可能就顛倒了，請總統考慮這個問題。」

我這番報告，批評了俞閣，又反對中央政治會議的設置。蔣公對我的反對沒有特別表示什麼意見，至少當時我沒感到他的不悅。中央政治會議設置問題，他以後也沒有再提，我是把他這個構想擋下來了。

蔣公繼續詢問監察院的情形，並就昨天晚報報導監察院提出調查外匯弊端新聞，強調兩院糾紛未能解決之前，絕不能再讓監察院繼續做意氣之爭，這樣會影響整個政局。

我說，監院同志對總統上次責備多有感悟，我會查明晚報的報導內容究竟是怎麼回事。

蔣公說：「不必去監院同志那裡調查這事，我決心貫徹我在中常會的宣示。」

隨後蔣公又談到司法院所擬的大法官名單，部分人選也被晚報報導了。我說，大法官人選應以法官為最主要的候選人，現在看起來似乎有不少不甚合適的人選，實在值得注意。我又說，總統提出大法官候選人，在時機上似乎在處理俞案之前提出較適宜，因為俞案處理可能要相當時日。那個時候，俞鴻鈞已經請辭，蔣公雖然慰留，但是整個看來，這只是權宜之計，俞閣已經很難再撐下去。

但蔣公還是說，大法官必須緩提。他很不喜歡政府尚未宣布人選，外界就已先披露。他最後指示：「對我在中常會的訓話，應該妥慎研究辦理。以後你對黨的政策應該多負責任！」

然而，監察院當初提案彈劾俞鴻鈞的十一人小組，依然提了補充意見給公懲會，當時看來有如蔑視蔣公以總裁身分在中常會的提示。隔了沒多久，包括丘念台在內的四十二位監委聯名表態擁護總統，蔣公因此在十九日下午召見丘念台、侯天民、陳志明、陳達元、孫玉琳等五人，由我陪見。蔣公說，監察院此舉對黨而言有落井下石之嫌，他又對十一人小組遲不結案，很不滿意。

蔣公隨後指示參照美國胡佛主持的「行政部門組織委員會」，成立「行政改革委員會」，以就調整組織機關、調整各級機關權責、改善行政制度、簡化行政手續、簡約開支移緩就急等做通盤的研究與建議。委員九人，由王雲五為主任委員，其他八人是謝冠生、黃季陸、嚴家淦、周至柔、雷法章、馬紀壯、阮毅成，以及我。三月四日，監察院十一人小組終於結束，也停止調查。

轉戰財經單位

三月下旬，《民族晚報》突然報導了關於我的人事消息。晚報的標題是，「行政院祕書長傳將易人，周宏濤呼聲高」。這篇報導的內容是，行政院即將改組，未來的行政院祕書長將以政務委員兼任，而「側面探悉」，現任國民黨副祕書長周宏濤的呼聲最高，周氏如果出任行政院祕書長之後，將對黨政關係的加強有所貢獻，同時對於行政院與立監兩院聯繫，也將有所改善。

對於晚報的報導，我自己是毫無所悉，但我心裡清楚，這麼一報導，即使蔣公心裡真有此意，也會改變主意了。就在報導次日，已內定重新出掌財政部的嚴家淦約見我，徵求我擔任財政部政務次長的意願。對於他的邀請，我答應了，一則我對財政及經濟方面確有興趣；另外也頗思換個工作崗位，再說嚴家淦也實在是情意懇切。

早在一九五一年八月間，蔣公曾詢問我關於行政院辦理財政收支平衡的情形，我約略陳述後，他指示由張群、俞鴻鈞及我組成動員小組，加以原則性的研究；我從此開始涉獵財經方面的新知，也成爲我調到財政職務的遠因。我的新職，使得我終於正式離開蔣公身邊，十三年來，我在一位偉大的領袖旁共同經歷如此多的驚濤駭浪，不勝榮幸。

這個職務於二十七日發表後，外界頗感訝異。雖然我自己認爲以資歷、學識而論，也只能擔任次長，然而許多立法院友人認爲我原先是中央黨部副祕書長，做得頗爲出色，所以新職至少應是主管一個部會或擔任祕書長，如此看法與實際上的落差，連帶地使我自己也爲之沮喪。

引薦劉大中

在財政部政次四年裡，由於國防預算龐大，占全國總預算百分之六十，我推動成立國防特別捐，以因應部隊開支。値得一提的是，我於一九六〇年率同財政部財務行政考察團赴美作爲期三個月的考察時，遇見了康乃爾大學經濟系教授劉大中，他比我大兩歲，當時是少數從事計量經濟學研究的學者，劉氏與俞國華、徐柏園等

人均認識。我和他就經濟及稅制深入交換意見後，回國就向蔣公引薦。

以後，劉大中即成爲蔣公在國家財政規畫經營方面的智庫，以量入爲出的觀念引進國家總預算制平衡制度。在劉大中的規畫及參與之下，國家安全會議於一九六八年成立總資源供需小組，健全政府預算制度，使經濟穩定發展；那年三月他又擔任行政院賦稅改革委員會主任委員，蔣碩傑、顧應昌等學者專家以及我，都派爲委員，並調省政府的稅務局副局長金唯信爲專門委員、中央銀行的錢純爲執行祕書，委員會積極從事賦稅革新，奠定國家財政穩定發展的基礎。

就台灣當時的環境而言，此時省政府財政要比財政部更爲充實，原因在於四、五十年代台灣工業尚待發展，經濟命脈實際上還控制在省府手中。一九六二年，我自財政部政次調省政府財政廳長，上任才三個月，蔣公就透過總統府副祕書長黃伯度問我，要不要回到行政院。我先前已在財政部擔任政次三年了，要我回行政院，很有可能是要出任閣員，不過我那時的考慮是，調到省府才三個月，未免太快了，因此答覆希望在財政廳先做出些成績來。這麼一來，在省府一待就是七年，我的施政主要著眼於建立地方財政基礎，加強稽徵以求省及地方財政能夠達到預算平衡，於是成立稅務處整頓稅收，進而輔導縣市鄉鎭級也能夠自求平衡，以奠定地方良好

財政基礎。

籌資辦理九年國教

一九六七年，蔣公考慮辦理九年國民義務教育，財源要怎麼籌措成爲成敗的關鍵，蔣公任命俞國華爲財政部長，他過去只有中央信託局及中國銀行的金融資歷。俞國華雖是我的莫逆之交，他在財政方面資歷卻比我淺，蔣公惟恐我會不舒坦，有天把經國先生、俞國華及我找了去，當著我們三人的面說：「在我的心目裡，你們三個人是一樣的，你們彼此總要同心協力，一起爲國家做事才好。」蔣公如此說，讓我內心裡非常感動。

蔣公爲進一步提升國民素質，準備延長國民教育爲九年，但他擔心九年國教財源，問我的意見。把國民教育從六年延長到九年，以三年計需款二十八億五千多萬元，而當時全省歲出總預算才一百一十億元，這是筆很大的經費。我向他報告：「錢是依據施政優先次序做安排的，只要其他事緩做或少做就可以！」雖這麼說，我還是向蔣公肯定地表示，這是國家的重要施政，一定可以籌得出來，蔣公這才下定決心。

我隨後於一九六八年一月四日對外宣布，實施九年國民教育所需各項經費，決定暫由台銀公庫先行透支墊付；然後再自當年七月起調整田賦及營業稅率，專案儲集所增加的收入，用以支應九年國教之用。這項籌資方案，獲得行政院長嚴家淦及財政部長陳慶瑜的支持。

一九六八年秋天，九年國民教育全面展開，蔣公以我籌資有功，頒授四等景星勳章。

升任主計長，光潤辭世

那時，主計長張導民調任審計長，他的位子就出缺了。友人提醒我，在省政府待了這麼多年，應該重回中央工作，而張導民也希望我接任。我心想也對，於是去晉見蔣公，表達希望出任主計長的意願，蔣公連說：「應該應該！」行政院長嚴家淦雖因已另有人選而頗感爲難，仍於十二月任命我爲主計長。我總共當了九年半的主計長，就在公務繁重之際，光潤離我而去。

我到台灣之後就公務繁忙，忙到沒法子好好地照應家人及妻子。光潤於一九五二年生三女開明時正值國民黨七全會，我記得十月十二日傍晚六點，當天會議結束

後，我下山到醫院探視，這才知道她昨天做了剖腹生產，實在很心疼。三年後，她又生下四女開平，身子再受損一次。

光潤在牙科方面表現極佳，她求知求新，時時注重進修。在大陸時期，光潤一直想赴美留學，那時留學並不容易，必須經過推薦後，由外交部口試並敘明何時返國要如何服務。她那時若能深造，當然更能為社會服務。

我想到請蔣夫人幫這個忙。一九四八年一月，我草擬致夫人函，謄寫好就呈給夫人。蔣夫人囑咐將光潤的履歷表交給她看，我喜出望外，次日就把履歷表重繕送呈。蔣夫人找了勵志社總幹事黃仁霖來接洽，光潤順利地通過外交部口試，但是天不從人願，由於局勢迅速惡化，出國深造的期望也就成為泡影。

她的心願，直到一九五四年三月十二日才達成。那天清晨沒有驚動孩子們，一大早我就帶著她前往松山機場。許多親友前來送行，國防醫學院三十多個學生也到機場獻花。飛機準時於上午九點起飛，光潤把花束攜上飛機。我和她握別時，不禁熱淚盈眶，她終於一償心願。她先是赴美國俄亥俄大學深造，再赴日本東京的國立齒科大學專攻畸齒矯正技術。她在牙醫界是很有名氣的，曾為蔣公看過牙，後來也看經國先生夫婦的牙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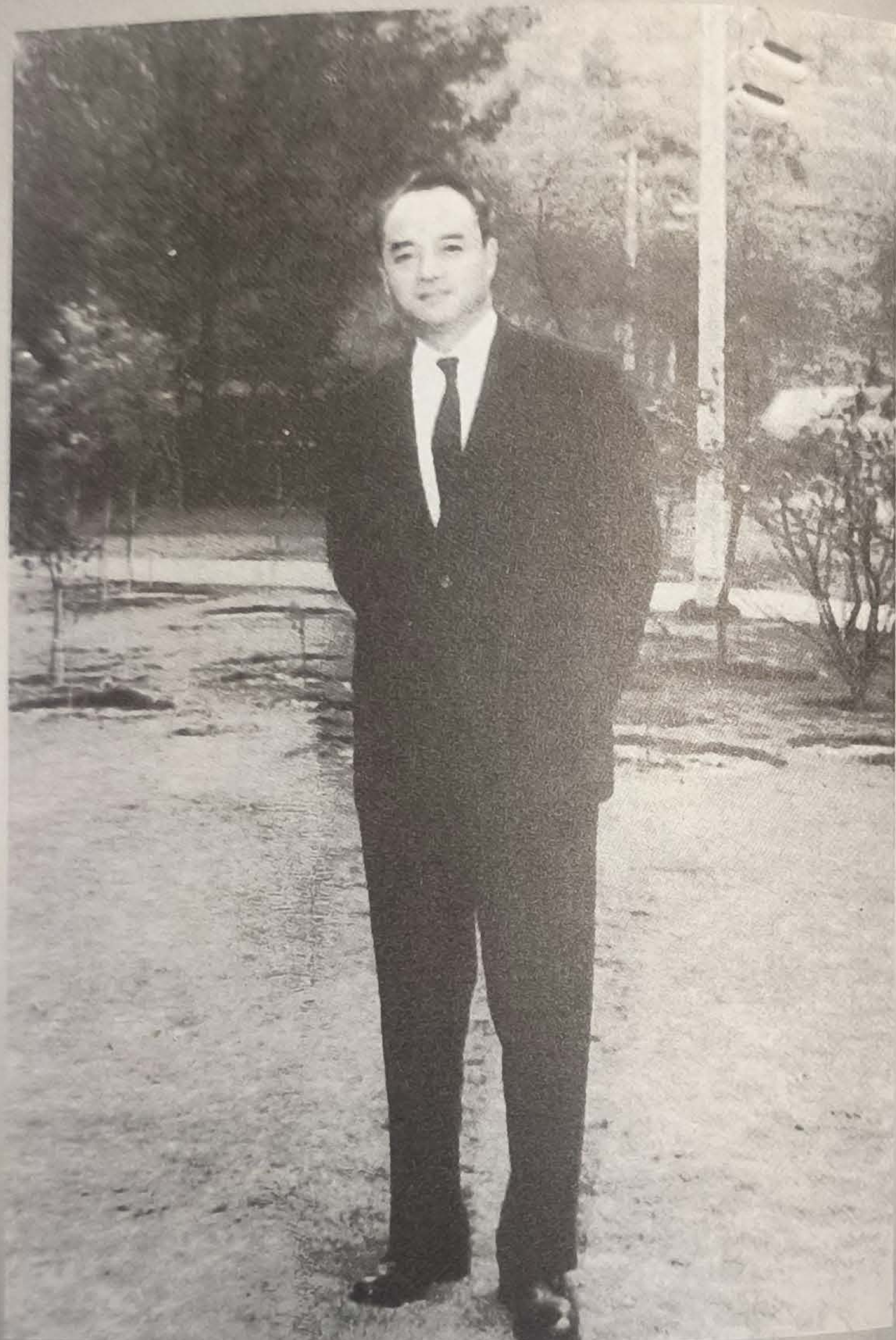
我回想光潤忠愛國家的這一生，來台之後她先是在國防醫學院任教，隨即在台北市開設牙醫診所執業，她主張全面檢查學童牙齒，以為防治之張本，終獲政府採行，造福國民健康匪淺。她宅心純厚，篤信基督，參加「婦聯會」、「世界道德重整會」及「國際崇她社」等團體，從事國民外交，只要有益於國事，無不積極參與。

然而她卻操勞病倒了。一九七二年八月，她心臟病發作，兼以腎臟衰弱，半年後離我而去。二十八年來，我們攜手度過烽火離亂、輾轉播遷的日子，卻在台灣安定之後病逝，令人悲痛不已。

一九七四年初，立法委員程烈介紹我認識了魏燕芝女士，她當時任職於美商銀行，我們於一九七五年六月結婚。我多次出任特使，喬（Jo，燕芝的別名）曾陪同我參加，如當今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登基大典、史瓦濟蘭國王恩史瓦第之成年加冕大典，以及若干邦交國家元首的就職慶典等等。東吳大學校長端木愷先生，曾在一個外交場合，當場誇獎她：「這位校友真是秀外慧中。」我的四個女兒都已成家，開紀是牙科醫生，開元從事教會事工，開明是開業會計師，開平是醫學院的免疫學教授，都各有所成。

第二十七章注釋

①俞鴻鈞因為以憲法理由拒絕接受監察委員的調查邀詢，而與監察院交惡。
②周氏錄於民國四十六年日記。
③同前注。
④同前注。



我在中興新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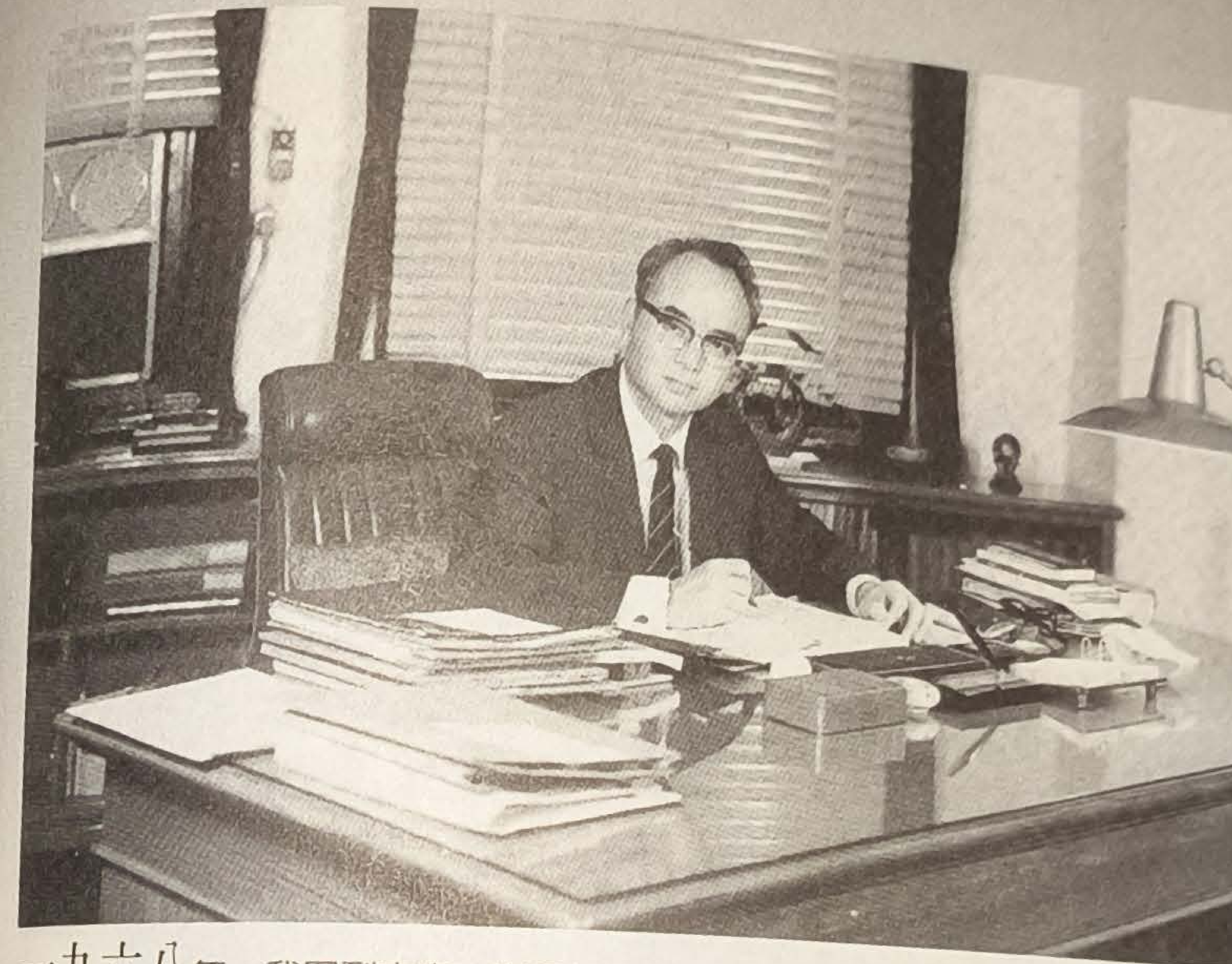
一九五八年，我（前排右四）出任財政部政務次長。此為任內與改進財務行政聯合委員會全體委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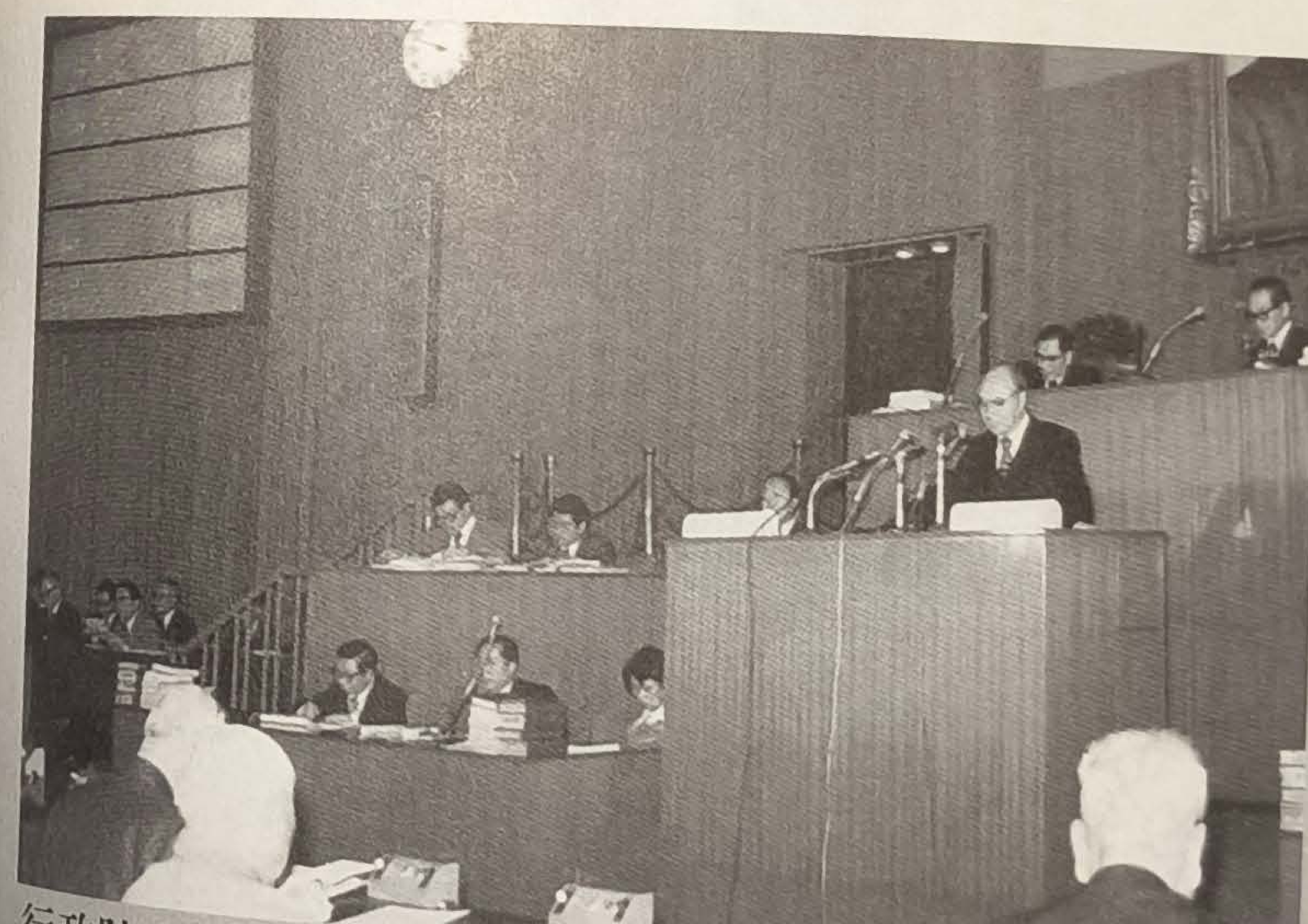
轉任省財政廳長期間，我（前排右一）與省府官員列席省議會備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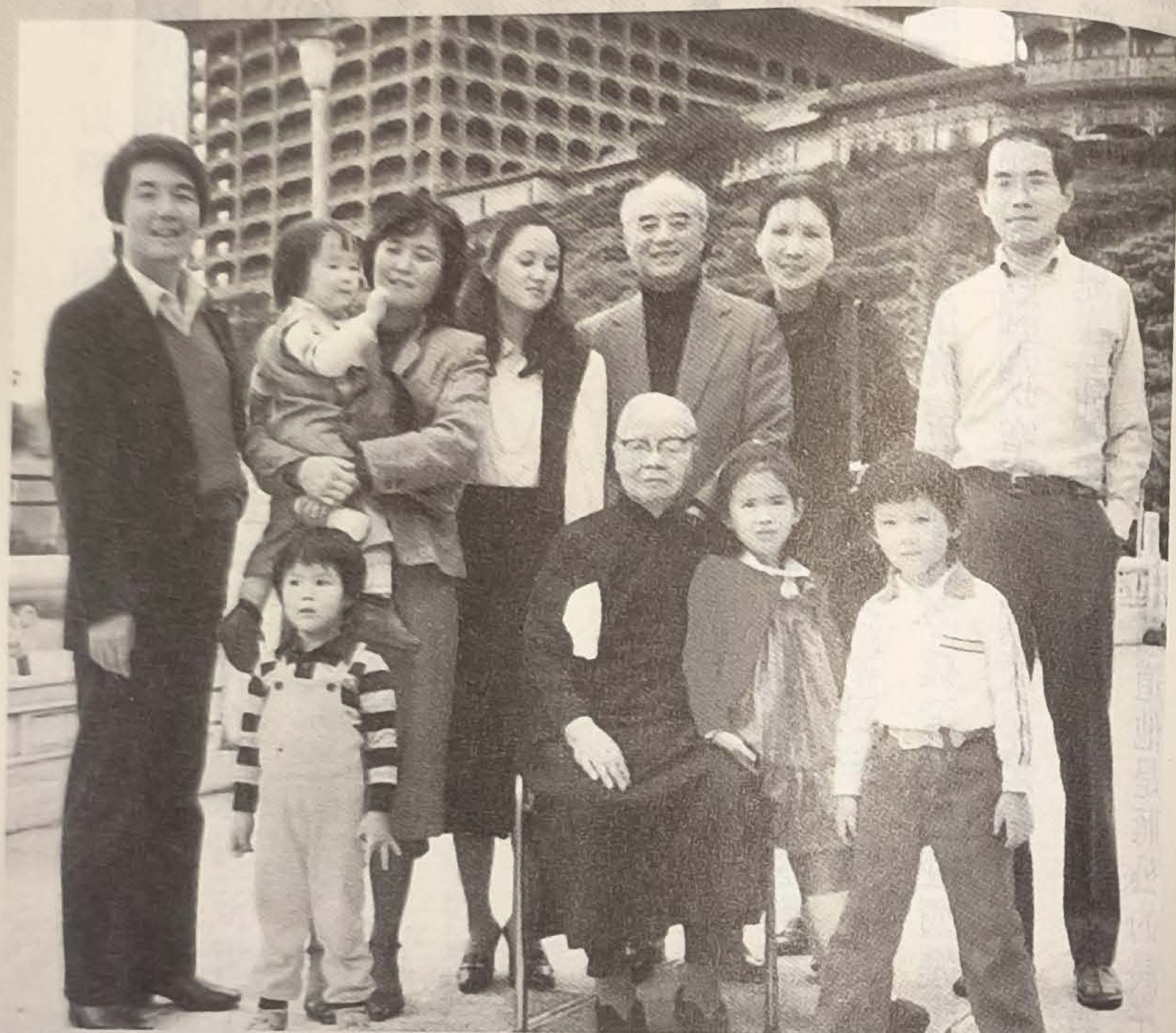
經國先生任行政院長時與全體部會首長，我在最後排左三。



一九六八年，我回到中央，出任行政院主計長。



行政院主計長任內，赴立法院報告。



喬（後排右二）秀外慧中，與我結縭至今近三十年。圖為一九七九年，與母親（前坐者）、兒孫們於圓山大飯店前。



光潤與我攜手走過戰亂，苦盡甘來之際她竟病逝。圖為一九六〇年光潤訪歐，我與四個孩子在松山機場送行。

第二十八章

經緯兄弟

經國先生及他的弟弟緯國，和我都有很深的淵源。緯國是我稚齡時的同齡玩伴，日後也往來密切；而經國先生則是長期與我患難與共，乃至於以後成爲我的長官。

抗戰期間，我初到侍從室工作沒多久，就和經國先生見了面。有天他從贛南到重慶來，走進我和俞國華狹窄的辦公室，客氣地打了招呼就坐在旁邊的沙發上聊天，我稱呼他「經國兄」。他比我大七歲，初見面時才三十出頭，我們的友誼從那時候開始，沒有經過特別的介紹，我知道他是蔣公的長子，他也知道我爲什麼坐在

俞國華對面，我們就這麼很自然地認識了。

經國先生對奉化家鄉的人與事知道得很清楚，所以他知道我的家庭背景，包括我祖父與蔣公的關係。那時，他不過問公事，聊天時會講些外間的趣聞。他寫給蔣公的信，加封後由我轉呈，有時也會加寫短箋給我。我們熟了之後，他曾親口告訴我，當年他曾被共產黨份子王明脅迫簽字反對父親，實在是出於無奈。

抗戰期間，經國先生和緯國之間，不論在親情或職務上看來很親暱友愛。起初我的感覺是，蔣公喜歡的是緯國，而我也跟緯國較接近，經國先生那幾年則一直在江西省贛縣，只能偶爾搭車回到重慶一趟。但久了以後，我和經國先生的關係反而要比緯國近得多，因爲他經常主動過來招呼一番，送個土產等等，我看不到之處他會指導；緯國就不會這樣，我這位幼稚園、大學的同學很率性，沒什麼心機，找你吃飯就是去吃頓飯，不會有其他目的。經國先生在用錢上比較大方，他會經常請吃飯或邀約到哪邊去遊覽。

事實上，緯國和我的個性也不大一樣，他有些玩世不恭，而我的個性比較老成持重，這恐怕和家境有關，我讀東吳大學時家境並不寬裕，而緯國則常在週末時到上海去跳舞。以後，隨著職務及工作加重，經緯兄弟在我整個人生裡的份量就慢慢

分出輕重。

我對經國先生最初的感覺是沈著穩健，但也感受到他的另一層面。他的長處之一是識人比緯國精明得多——他會注意你，分析你各方面的關係，這也是他在蘇聯的心得。中國人待人往往保守而被動；但蘇聯人就不一樣了，喜歡多管閒事，跟你一交往，就想進一步知道你的背景，沒多久就弄清楚你的出身、家庭，甚至整個家族。經國先生在蘇聯待久了，也是如此。

血緣矛盾

蔣公是很講感情的，對部屬如此，對於經緯二兒更是如此。還有另一位蔣公視如己出的，就是他唯一的外甥竺培風①，平時蔣公是很嚴肅的，唯有培風或緯國來，才會輕鬆自在地談話。不幸在抗戰結束後，竺培風卻於一九四八年初，自西安駕機飛赴徐州途中失事身亡，蔣公極爲傷心。

培風之喪卻牽出經緯兄弟之間的矛盾。有天午後，緯國到我的辦公室來，他心裡有事，想跟我聊聊，他談的是他的哥哥。緯國說：「我覺得哥哥想把我排斥在蔣家門外。培風葬禮時，哥哥沒有要靜宜②參加；而前些日子哥哥修毛氏墓碑，卻沒

把我的名字刻上去！」

我聽了不免爲他們兄弟倆擔心，心裡也覺得經國先生處理失當了，他以血緣關係，不把緯國當弟弟看待。其實，早在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還都南京時，我就得知緯國的身世，那也是經國先生告訴我的。蔣公常常會在傍晚時分吃些點心，有次經國先生上樓陪父親吃點心，下來後繞到侍從室這邊坐坐，突然神色自若地脫口而出：「緯國是戴季陶的兒子！」

我聽了一怔，但不怎麼相信，因爲經國先生講這話時很輕鬆，我以爲他在開玩笑。但以後我又從旁人口中聽到這事，我才知道是有這麼回事。但也有人認爲緯國眞的可能是蔣公的兒子，和蔣公私交很深的吳忠信就這麼跟我說：「你看緯國和委員長那麼像，也有可能眞是委員長親生的。」他所持的理由是，當年在日本求學時代，住在一塊的中國留學生私生活相當活潑開放，蔣公、戴季陶都和生下緯國的日本護士熟識。只不過，同情中國革命的日本人士山田純三郎，日後把緯國抱到中國來，並明白表示緯國是戴季陶所出。

國共戰爭爆發後，在徐蚌會戰失利、國家風雨飄搖之際，經緯兄弟之間的血緣矛盾繼續發酵。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底，緯國從上海打電話給我，他在電話裡說，他

打算爲家譜問題回溪口家鄉一趟，以確定自己被列在家譜裡。以後我得知那是因爲經國在修家譜時沒有把他列入，所以他才想返鄉一趟。在這個節骨眼，國家局勢如此，他也應該有自己的任務啊！我就以朋友之義告訴他，現在戰局如此緊張，應該以國事爲重，不要走這麼一趟，他才勉強答應了。

前幾年緯國去世後，馬上傳出他生前曾講經國先生亦非蔣公親生的，緯國所持的消息來源是養育緯國的姚夫人；但我倒一點也不懷疑經國先生與蔣公之間的血緣關係。中華民國建國前後，中日之間交通往來相當方便，蔣公雖然在日本，但他也常回來，毛氏那時陪伴蔣母在上海，生了兒子是很自然的。

而在溪口老家，蔣家族人排斥不是親生的緯國，同情毛夫人，把蔣夫人視作姨太太，至於經國先生的血緣就沒人懷疑。

歷練與培植

蔣公對兩個兒子都給予了相當的學習及歷練機會。

對日抗戰結束後，一九四八年蔣公當選總統，就打算正式派工作給經國先生做。五月六日，經國先生到我的辦公室來告訴我，父親要他出掌黨的組織部。我認

爲現階段不妥，因爲組織部人事複雜，阻力相當大，不如他自己原先的構想，由谷正綱調組織部、他調社會部爲宜。經國先生也提到，蔣夫人曾經轉達父親的詢問，問他是否願意出掌台政。但我和他都認爲，現在不宜離開中央，這是爲蔣公考慮，他在他父親身邊可以起相當大的作用。

次日晚上，侍衛長石祖德約了經國先生、衣復恩、沈昌煥和我，在大集成酒樓便餐。飯後經國先生談了他的新動向——父親的意思令他主持甘肅省政，理由是他與諸馬處得很好。我回答：「中央方面現在實在需要你做上下連絡，而且甘肅各方面都落後，目前又不是建設西北之時，這個職務實在不宜。」他不反對我的看法，卻也不願違背父命。我回到辦公室，愈想愈覺此事重要，於是連夜擬妥簽呈，闡述經國先生不宜派甘肅的種種理由，文末並建議經國先生宜出掌社會部。我一直寫到次日凌晨一時才完成，簽呈究竟有沒有效不得而知，不過經國先生後來也沒有被派到甘肅。

七月底，蔣公夫婦赴莫干山避暑時，俞鴻鈞、翁文灝、王世杰前來晉見，蔣公指示由經國先生出任上海警備副司令，以後他即成爲上海經濟管制督導員，對整頓已病況嚴重的經濟問題做最後出擊，只可惜他失敗了，而且敗得很慘。

經國先生和我往來最密切的時段，還是在於一九四九年一月蔣公下野，直到次年三月一日在台灣復行視事，那段日子我們工作、生活都在一起，也因爲國家面臨嚴厲的局勢，更發展出一種患難與共的感情。

過去在大陸時期，家庭分散；來台之後有段時期和經國先生往來很頻繁，我的家裡有什麼事情都同經國先生商量，而經國先生家裡有什麼事如孝文讀書問題等，也找我商量。一直到我接主計長之後，才因工作關係而疏遠了。

來台之初，經緯兄弟都受到外界一些負面的批評。對緯國的批評是其夫人石靜宜藉特殊身分經商，以及左右有貪污問題等等，相當令我擔憂。而經國先生則在於他以蘇聯經驗來整肅政府內外，他掌管情治，執行父親嚴防共產勢力入侵復與基地的任務，受到國內外不少批評。

那時，我覺得經國先生猜忌心很重，有時甚至會令我沮喪，我把這樣的心情告訴董顯光，希望他有機會勸勸經國先生。

有天我把外界對經國先生的批評向蔣公婉爲陳述，卻感受到蔣公的不悅，蔣公雖然沒有說些什麼，接下來兩天對我的態度似乎都不甚自然，我很不安，但也只好自問忠誠、絕無私意了。

經國先生與情治機構

經國先生在蔣公的指示下，來台之後就親自監督情治機構，他在我的機要室之下另設人數達一百五十人的資料組。資料組聽起來是個層級不高且靜態的單位，但實際上是所有情治機關的頂頭上司，後來資料組就改組爲國家安全局。

那個年代，爲了防堵共產黨的滲透，保密局等情治單位查察極嚴，還有破案獎金的規定；共黨組織固然破獲不少，但也有冤錯假案出現。而經國先生因爲主持情治工作，事實上揹負了頗爲沈重的壓力。他主持的資料組、保密局及保安司令部等特務機關，是基於他過去在蘇聯時期的經驗進行組織的；他領導的這些情治機關，主要目標在於防止共黨的滲透，這個目標大致是達到了，許多共黨組織被破獲，然而有些案子卻是有問題的。

一九五五年有個案子可以爲例。陳誠在星期一中常會時，當著蔣公的面痛斥特務的濫權，說有個工廠受到特務的勒索後，廠長因爲不堪壓力竟然自盡。陳誠說，這些人遊手好閒、無事生非，專以檢舉及揭發他人隱私爲能事，常常誣陷一些較有錢的工商界人士，實在可惡。

事後蔣公可能斥責了經國先生，他覺得受到父親誤會，因此很灰心，到我這裡傾吐心中的難過。我勸他應以國事爲重，不計毀譽。

有些沒有配合政策的幹部，也被以觸犯刑事罪而入獄。例如省議會副議長林頂立，曾經是保密局台灣站站長，以後步入政界，他未得黨部同意堅持繼續競選連任副議長，結果因農林公司的麵粉案被依違反糧食管理治罪條例獲罪入獄。我曾爲此問過經國先生，他回答，他沒見過林頂立，但是以吳國楨、孫立人自大傲物而終至招禍來看，林頂立原來身爲特工，實在不宜競選。經國先生並且透露，總裁也曾飭令保密局長毛人鳳勸告過林頂立。

一九五〇年代，經國先生主持總政治部以來，頗受到來自外國的批評，認爲他在施行白色恐怖，而保安司令部也同遭攻擊，被指是實施警察國家的樞紐。海外對經國先生的批評不斷，指責他建立了特務國家；而美國方面則對部隊裡設置政工部極爲不滿。然而政治部實際上也有其功能，在經國先生出任政治部主任之下，部隊士氣確有提升，這對國家貢獻是非常大的。

經國先生對蔣公的孝順是無庸置疑的，但他對人對事也有自己的想法及作法，所以他對蔣公的領導及指示也非全然服膺。來台前後那幾年，他偶爾也會就蔣公的

一些施政對我這麼說：「父親這麼做不對！」

他嫉惡如仇的個性，使得他強勢運用情治單位做了不少事，但也爲他帶來了教訓以及莫須有的冤枉，吳國楨事件就把他牽扯進去。

第二十八章注釋

① 竺培風是銀行家竺芝珊的兒子，母親蔣瑞蓮是蔣公的胞妹。他與蔣緯國同齡，出事時年僅三十二歲。

② 石靜宜是蔣緯國的元配，來台後病故。

第二十九章 蔣夫人

在蔣公身邊這麼多年，和蔣夫人往來的機會很多，蔣夫人對中華民國的貢獻是無可置疑的，我對她很崇敬。她對我及我家的愛護協助也不少，光潤要出國讀書的事，只是其一。

蔣夫人接受美式教育，擁有了西方的價值觀，和蔣公結婚之後，蔣公也就受到她的影響，吸收了許多西方觀念，包括民主、自由、平等及女權等觀念，連西式用餐禮儀都不在話下，蔣公曾在餐桌上指點過一些不懂得用餐規矩的首長。另方面，她流暢的英文及敏捷的應對，也在外交上幫了蔣公不少忙。

蔣夫人的愛國心很強。抗戰初起時，曾有美國友人建議她到美國去，但她婉拒了，她寧願與苦難的國家共患難。然而，她後來還是因爲治病赴美，並安排了巡迴全美的活動。一九四三年我初到官邸，蔣夫人正在美國訪問，那次赴美行十分轟動，爲中國的國際形象開了一扇窗，也是她在國際間聲望最高之時。她回國沒多久，就在沒有正式介紹的情況下，認識了我。

蔣夫人喜歡下象棋，我擔任蔣公機要職務沒多久，就常有機會被她找去下棋。不過她喜歡下險棋，所以有時會吃虧，她又好勝，很多次看著下不贏，中途就抽身走掉了，因爲她不喜歡輸棋。不過因爲她喜歡下棋的興趣，我又忝爲她的棋伴，就在她五十歲壽辰時，託人到蘇州訂製一副手製象棋作爲壽禮。這副棋送來了，雕工精緻，我回官邸上班就把棋送給她。蔣夫人很高興，以英文問：「這是給我的禮物嗎？」就欣然收下。另外，她也喜歡玩橋牌，我常是她的牌搭子。

抗戰勝利之後，好日子沒有過多久。一九四八年，蔣公夫婦從莫干山回到上海，住在東平路蔣夫人的房子。那是她父親留給她的房子，後面有八畝大的花園，四周種樹及竹，布置十分幽靜，但只停留了一晚，次日晚上蔣公夫婦就回到南京，從此未再看到這棟華宅。蔣夫人隨後赴美求援，在美國一待就是一年多，直到大陸

淪陷才回到台灣來。

蔣夫人在來台初期成立了中華婦女反共抗俄聯合會，同時在中央黨部成立婦工會，這兩會組織架構及工作內容全是我幫她出的主意，以致後來有天我與蔣公夫婦在一塊時，蔣公就打趣說：「宏濤是妳的參謀長！」蔣夫人笑著回答：「是啊。」日後，婦女運動及工作成爲她在台灣的工作重心之一。

蔣夫人也依然在外交上出了不少力。一九五〇年代她曾數度訪美，與美國政要晤面，但由於國勢的關係，她的影響力已大不如前。

一九五二年，她因風濕之故，臉、頸、背都浮腫起來，只好赴檀香山小住兩個月。她返國後，六月間我到陽明山官邸向蔣夫人請示覆克拉克海軍上將函的內容，她恰好在作畫，我看了她的畫，對於她進步之速，欽佩之至。夫人對蔣公這些日子來的健康及睡眠都很關懷，笑著對我說：「侍奉一個丈夫，比撫育一打小孩子還要難呢。」可見蔣公與夫人感情之篤。

蔣公一直沒有原諒張學良，認爲由於他的莽撞，使得剿共爲之中輟，埋下日後大陸淪陷的種子。然而蔣夫人卻因爲在西安事變與張學良之間的諒解，而一直保護著他。

愛國更愛家

蔣夫人與孔宋家族之間的關係，以及她對孔宋家族的維護，較受到外界的批評。但孔宋終究是她的親人，這連蔣公都沒法子改變她的心意。

孔宋一家在美時，擁有我國外交護照，這是因爲蔣夫人的關係。有次蔣夫人把孔令傑的外交護照交給我，囑我協助換取新照，我內心覺得不安，但沒有顯露在臉上，辭出後就交人送到機要室，派陳宗熙持護照到外交部接洽，外交部當然也只有核發。

遷台之後，蔣公決心改造及鞏固黨組織，把意志不堅、向心力不夠、明顯已有二心的黨員，自黨內排除。孔祥熙及宋子文滯美不歸，使得國民中央黨部建議取消他倆中央委員資格，並經蔣公同意，但也被蔣夫人擋了下來。

一九五三年國民黨七全會後，黨內整頓工作繼續進行。在中央委員黨籍總檢查中，蔣公指示始終未歸的中央委員，應予開除黨籍，這份名單經一組簽報過來，以孔祥熙、宋子文爲首，總共有十三人，我轉呈官邸並經蔣公核定。不料次日我就接到蔣夫人的指示，令我即刻到官邸。

蔣夫人詢問黨籍總檢查之事，何以孔祥熙及宋子文會被列入撤銷黨籍的名單之內？她說，如此做是抹煞孔、宋過去對黨國的功勳，也恰好等於中了共產黨的挑撥離間之計，對黨而言不單不智，也對孔宋兩人不公平。

蔣夫人講到這裡就激動起來：「當年西安事變，我不是為丈夫而奮鬥，而是為國家的前途計算啊！今日又到公平奮鬥之時了！」

我只能回答，此事並未做最後決定，即使中常會通過，仍須俟總裁核准才能辦理，請夫人容我再回黨部商議。

離開官邸後，蔣公在下午五點召見我，我把夫人對開除孔宋黨籍一事的反應向他報告，蔣公命令我以後不要把尚未決定之事告知夫人，以免增加她的憂心。我默然點頭退出，其實蔣公已經核准此案了，現在除非蔣公再做決定，否則就無法更動，我為此心裡難安。

次日，張其昀及第一組主任唐縱①向蔣公請示中央委員撤銷黨籍案。蔣公質疑，立法委員及其他身分的中央委員為何不辦？經過討論，張其昀建議，暫緩發出撤銷黨籍通知。蔣公隨後召見我，詢問經國是否也是中央檢查小組成員？可見蔣夫人懷疑把孔宋兩人列入除名名單，可能和經國先生有關。

我回答沒有。蔣公隨即指示，把這個情況告訴夫人，並把海外中委撤銷黨籍已經緩辦一併告知。

傍晚，蔣公再度召見。我先請示本案是否應更改前議？我認為夫人的指責亦屬合理，所以此次撤銷黨籍案，並不是當時整肅案的理由。蔣公指示，孔宋兩人功過尚未定論，海外黨員中另有類似者，類同辦理，不可以受中共宣傳影響，可以發給黨證。

我隨即把蔣公的指示，轉達張其昀及唐縱。經國先生後來到我的辦公室，談到中央委員撤銷黨籍案時，我說總裁改變原來批示，對黨部而言就更好做事，要不然接下來的臨時中常會也可以提出，擬分為緩發或不發兩類，而孔、宋先列緩發，以後再行處理。

經國先生說，這事應儘速決定，不宜拖延。我請他向蔣公請示，半個小時後他把手諭帶了回來，蔣公的手諭是這麼寫的：「張祕書長，凡中央委員已經歸隊與登記者，如無附匪及不法言行者，准予補發新黨證可也。」②孔、宋的黨籍至此確定。

孔祥熙在大陸淪陷前一年就赴美定居。他在一九四八年辭中國銀行董事長，卻

繼續花中銀紐約分行的錢，繼任的中銀董事長徐柏園後來向蔣公報告，蔣公指示由中銀在職權範圍內處理此事，這筆花費才告停止，孔、徐之間因此交惡。

據我所知，孔祥熙及宋子文並沒有把國家的錢放在自己口袋裡，但是孔宋可議之處在於亦官亦商，藉著爲官便利來經商大賺其錢，這種情形就連孔祥熙自己都坦然直言，且不認爲有何不妥。另方面，孔家在經商時各種手段盡出，包括在國家危難之際囤積居奇，藉機大發國難財。

孔、宋的許多行爲，不論在當時或現在的標準看來都是不應該的，經國先生就強烈地反對。蔣夫人被指包庇，因而受到抨擊，但那是她的至親，她精神上的倚賴；她自己無後，就把孔令侃、孔令儀、孔令傑、孔令偉視如己出。現在她年紀大了，由孔令儀在紐約照料著她。

蔣夫人與經國先生

蔣夫人和經國先生之間感情並不很好，一方面是她嫁給蔣公時，經國先生的年齡已經大了；另方面蔣夫人和經國先生之間也有衝突，特別是經國先生於一九四八年到上海整頓金融秩序，查辦孔令侃的揚子公司，由於蔣夫人的關係，使得整頓工作無法繼續下去，從此他們各自心裡有了疙瘩，一直延續到來台之後，所以彼此之間很冷淡。這也難怪一遇到孔宋之事，蔣夫人就懷疑和經國先生有關，但夫人的修養很好，經國先生的修養也不錯，見面時還是客客氣氣、有說有笑，一直維持表面關係。

蔣公知道夫人與經國先生之間的關係並不和諧。他設法化解，臨終前一、兩年時還把蔣夫人及經國先生拉在一塊當面囑咐：「我希望你們彼此之間感情要好，我就放心了。」夫人及經國先生都點了頭，我感覺到，這番話使得經國先生在蔣公逝世後，始終以母親來看待蔣夫人。

蔣公及夫人的公私用錢，都是從總統府公費股開支，公費股股長是由會計長蔣孝佐兼任。在蔣公主政時期，由於公務員的薪水實在不高，要加薪還得由立法院通過，所以蔣公的公費開支還包括總統府同仁津貼等，由於數額很大，有次還造成入不敷出的窘境，必須向行政院要錢，陳誠知道後，立即撥交兩千萬元支應，以後這筆錢就算在蔣公的公費裡。

不過，蔣公用錢是很省的，因爲他的生活很簡樸。他不僅自己不求物質的享受，也不喜歡總統府鋪張浪費。我記得一九五二年時，有天蔣公交下一月分特別費

報表，認爲用錢太浪費，不足爲廉能政府之示範，以後他令我應從嚴審查總統府經費，以避免浪費。而蔣公逢年過節對部屬的獎勵是不會少的，他自備一本小冊子，記載給過誰多少獎金，以免重複。

相較於蔣公，蔣夫人用錢就較爽朗。她經常犒賞幾位得到重用的幹部，我們在薪水微薄的時代，她一給就是三千元，我直到出任主計長之後，這樣的犒賞才停止。長期以來，外界傳言我是「蔣家的帳房」，其實這樣的說法完全不正確，我管的是國家公費，蔣公家裡的任何開支用度我都沒有過問。

財政部長人事風波

蔣夫人後來對我的仕途也有個關鍵性的影響，那是在我出任主計長三年多之後。

一九七二年三月二十一日，蔣公當選第五任總統，並於五月二十日就職。就職之前，經國先生內定出任行政院長，由於我在財政方面表現不錯，經國先生和蔣公商量好，準備由我來出任財政部長，我奉命隨經國先生召到日月潭，我倆在途中做了這方面的人事商討及安排，一個意外狀況卻出現了。

經國先生的堂侄蔣孝佐，時任總統府會計長，以後告訴我整個狀況。他說，孔令侃返回台灣找上蔣夫人，希望在經國先生的內閣插上一腳——他想當財政部長。

孔令侃在財政方面確實有他的能力，他在美國政界也有若干人脈，蔣夫人認爲孔令侃是不錯的人選，把這事向蔣公說了。

蔣公很爲難，因爲從政治角度考慮，他堅決認爲孔家不宜在此時再出任政府要職，這會影響我國形象。蔣公與夫人發生爭執，後來就有個折衷的作法：既不用孔令侃，也不用自己的人選——周宏濤，因爲我曾是蔣公的祕書，就歸作他的人馬。因此，我期望在財經方面一展抱負的機會，又擦身而過，以後出任財政部長的是李國鼎，我仍是政務委員兼主計長；旋又因行政院祕書長馬紀壯也要求兼政務委員，結果我們都只任本職而不兼政務委員。

蔣孝佐說，這件事對總統夫婦影響不小，蔣公爲此事與夫人鬧得不愉快，就搬到陽明山竹子湖去住了好一段時間，結果就因當地氣候不好而生病，他的身體開始轉壞，終至一病不起。那兩年，整個國際局勢對中華民國極爲不利，日本與中共「關係正常化」之前，我國已在前一年退出聯合國。雖然蔣孝佐對蔣公的健康有這樣的觀察，但也有人認爲是因其時日本宣布與中共「關係正常化」，並與中華民國

斷交，蔣公大受打擊，健康因此受到影響。

蔣公辭世

蔣公在世的最後幾年，我沒有機會見他，因爲他病得嚴重，不能接見客人。但蔣公卻時時在病場上記得我這個老部下，逢年過節就問經國先生：「你有沒有見到宏濤？他好嗎？」經國先生當然回答有，宏濤很好。然後回過頭來就把蔣公的關懷之意告訴我。

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蔣公於凌晨逝世。我上午在家裡收聽廣播時才知道他已離我們而去，那時大雨滂沱。我感到哀傷，起身走到他的像前，鞠了躬，默思長久追隨他以來所親歷的種種，以及雍容莊嚴的音容。在中華民國最關鍵的日子裡，我曾與他共度寒暖、榮辱與共，見證他以無畏的意志力克服橫逆，如今他辭世了，而生前念念不忘的國家光復，成爲遙不可及的遺志。

蔣公走了，經國先生主導的十大建設正在進行。嚴家淦宣誓就任總統，卻寧可把治國責任交給行政院長扛下。經國先生在領導及治國上已然成熟，他不再是年輕時率眞的個性，決策上已能爲各方信服。

第二十九章注釋

①唐縱在大陸時期曾任警察總署署長、國安部保安局長；後來曾任省府祕書長、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祕書長、駐韓大使等職。一九八一年於台北病故，年七十七歲。（傳記文學，劉紹唐主編：《民國人物小傳》）

②周氏錄於民國四十二年日記。

第三十章

經國時代

經國先生領導國家，實際上在蔣公尚未逝世之前就開始了。

陳誠在世時，是繼蔣公之後的國家領導人不二人選；陳誠病故後，蔣公這才栽培經國先生，讓他從國防部副部長職務開始接觸政務，走上接手執政之路。而經國先生也不負所望，在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主任委員任內領導闢建中部橫貫公路，逐漸厚植領導能力及聲望，他任職國防部長後再任行政院副院長，而在蔣公病弱之時接掌行政院。

那時，經國先生在政府及人民間的聲望，已比當時的副總統嚴家淦要高得多，

也擁有實權。蔣公逝世後，嚴家淦繼任總統，但實際主政的，依然是經國先生。他繼續維持蔣公執政時期的財經陣容，我也是其中一員，在這段時間裡，我力求國家預算平衡，以保證物價穩定，讓經濟能在穩定中求成長。

長久以來，經國先生和俞國華及我一向以鄉誼論交，俞國華的生日和我只隔一天，我先命後，經國先生因此總在我的生日時，以老大哥身分爲我們慶生，起初常常邀來一桌客人，後來隨著他的責任日漸繁重，請客的規模也逐漸減小，先是縮小爲我和光潤，以及俞國華夫婦，在行政院長任內就只請俞國華和我，其間衣復恩夫婦也是常客，直到他出任總統，他的一般交際應酬都減少許多，對俞國華和我這樣的「慣例」才停止。

經國先生和我們在私誼方面逐漸疏遠了，這一方面是國家重擔造成的，另方面是他似乎有因我和他的同鄉關係擔心受外間批評，其實這是他猜疑的個性使然。他晚年時由於位崇忌重又乾綱獨斷，這種個性難以延攬人才，政府因而出現人才短缺的現象，而他只信任少數近身幹部，以致施政有草率、靡費僨事等情況出現，卻還怪我們一輩未曾扶植有以致之。

在經國先生執政之初不是這樣的。財經建設方面他以推行十項建設爲政策，成

立了五人小組執行規畫及掌控財源，五人小組分別是央行總裁俞國華、財政部長李國鼎、行政院祕書長費驊、經濟部長孫運璿，以及身爲主計長的我。這方面，他是量才量德、充分授權，讓五人小組放手做事。

當時，正逢第一次石油危機，在收入減少、支出卻不能少的情況下，我們推行了十大建設，從一九七五年起至一九七九年止，五年之間共需資金一千九百零四億餘元，爲六十四年度（一九七五年）中央總歲出七百四十八億元的二點五倍，必須對預算嚴謹控制及調節，方能成事。在謹慎調度之下，終於創造了七〇年代的台灣經濟奇蹟。台灣經濟上了軌道，經國先生把注意力轉到政治方面，台灣逐漸走上改革開放。

經國先生於一九七八年出任總統後，我改任行政院政務委員，專責審查財經等案。次年，我奉行政院長孫運璿指示，開始策畫與建台北世界貿易中心，世貿中心工程複雜而巨大，一直到經國先生逝世前一年才落成，翌年正式啓用。

力行小組

那個時候，我還有一項特殊的任務，就是兼任「力行小組」召集人。一九六五

年九月間，蔣公考慮以貿易方式展開對大陸地區經濟作戰，於是由行政院組成「經濟作戰策畫小組」來處理這方面任務，由於這個小組在兩岸經貿上具有機密性及敏感性，所以以力行小組名義運作。首任召集人由當時外匯貿易審查委員會主任委員徐柏園兼任，三年後改由中央銀行總裁俞國華接手兼任，他主管的時間相當長，直到一九八二年才由我以行政院政務委員身分兼任召集人。

力行小組設委員十四至十七人，由國防、財政、經濟、交通四部，僑委會、經建會、中央銀行、國家安全局、中央信託局等機關首長及行政院祕書長，以及有關專家擔任小組委員，並指定行政院政務委員爲召集人，經濟部長爲副召集人。小組的任務主要是：

一、以國家安全爲前提，穩固台灣的經濟基礎。

二、加強對外貿易之開拓與培養。

三、防制中共對我經濟統戰。

四、發展海外華僑地區貿易，並爭取僑胞向心。

力行小組在我國對共產集團經貿政策之下，做了不少事。包括制定與共黨國家交往的相關重要規章、大陸貨物鑑定及取締、與共產國家船舶往來之管理、海外無

邦交地區貿易拓展，以及東歐共產國家問題等。那個時候，只要涉及兩岸商務甚至是要前往東歐的國人，都得經由力行小組審查通過。

然而，力行小組的任務不僅於此，還另外選擇籌設了幾家民營公司，以港台貿易方式央請民間投資人士負責，實質經營與大陸經貿業務。但是，我接手後才發現這幾家公司長期以來逐年虧損累累。

以後由於八〇年代對大陸政策已有重大轉變，准許民間實施間接貿易，也展開文化學術等多方交流，我於是在一九八八年簽報行政院，建議結束力行小組工作，經行政院核准備查後，清理力行小組的財務，最後把剩餘款四億九千餘萬元繳解國庫。

圓山飯店與孔二小姐

我也在七〇年代到八〇年代之間，奉蔣夫人之命出任圓山飯店董事長。

圓山飯店於五〇年代由蔣公指示成立的動機，爲的是要接待外賓、提供在台國際人士之所需，沒有考慮到營利問題，身爲創辦人的蔣夫人也從未想要藉此謀利。

然而在發揮接待外賓功能及對外營業後，就有盈餘，有了收入就衍生稅賦問

題。一九六一年，我在省府財政廳長任內仔細思考後，向蔣夫人建議成立財團法人，若以公益性質經營就可以符合圓山飯店的成立目的，既無營利事業所得稅的負擔，也可以有較多財源從事國際外交活動等事務。

蔣夫人贊成我的建議，於是著手籌設「財團法人台灣省敦睦聯誼會」，而財團法人團體需要發起人，她親自挑選了五位發起人，分別是尹仲容、黃仁霖、董顯光、俞國華、我。

蔣夫人挑的這五位發起人各有其背景考量，當時的尹仲容是台灣銀行董事長，圓山飯店的資金就是借自台銀；俞國華是中央信託局局長，與政府財務及投資息息相關；黃仁霖是勵志社總幹事，名義上管的是圓山飯店的經營；至於董顯光，則是外交與國際事務的考量，圓山飯店主要目的也在於此；我則是省府財政廳長，負責與省方的聯繫業務的處理。

五位被點名的發起人，個個都是拿薪水的，不是企業家。然而蔣夫人向來在用錢出錢方面都沒有什麼概念，因此每個發起人就在她的指示下以捐助名義各出資了十萬元，大家匯繳給尹先生辦理財團登記，以後這五十萬元就成爲財團法人敦睦聯誼會的基金了。

財團法人台灣敦睦聯誼會固然解決了一些財務問題，但最大的缺點是整個制度的設計並不完備，規畫過於簡單，沒有長遠的打算，例如自然人總會離世的，而章程卻沒說明要怎麼延續下去，導致後來敦睦聯誼會的組織章程必須一修再修。

五位捐助人召開敦睦聯誼會董事會，由尹仲容出任董事長，無論董事長或董事都是無給職，而且最初二十年也無法實際參與經營，眞正管事的是人稱「孔二小姐」的孔祥熙次女孔令偉。她與蔣夫人關係密切，深受夫人信賴，等於代表蔣夫人管理圓山。圓山大飯店設有經理一人；但裡面上下都稱孔令偉爲「總經理」，也聽從她的指示，這「總經理」並非指圓山大飯店的職務，而是因爲孔令偉是香港揚子公司的總經理。實務上，蔣夫人確實是需要有人出來協助，大家也就默認孔二小姐在圓山的地位。

至於成立「圓山大飯店管理委員會」，由歷任省主席兼主任委員，則另有原因。這是因爲一九六三年，美國一家著名雜誌報導圓山飯店是蔣夫人的私人產業，那時是黃杰當省主席。蔣夫人很不高興，她說，圓山飯店怎麼會是她的？是省政府的！於是指示成立管理委員會，由省主席兼任主任委員，然而歷任省主席只是名義上的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而已。

由於當時圓山大飯店的營運盈餘，扣除維護及設備費用之後以維持平衡爲原則，台灣省政府於是在一九六八年核定，以當時使用的金龍、翠鳳、麒麟三廳，中西廚房、員工餐廳、游泳池等爲範圍，由省府收購爲省有財產，並由台銀以各年度超額盈餘爲財源，每年編列預算辦理，收購的全部金額就是圓山飯店六千多萬元的貸款本金與利息；圓山飯店的房舍則歸省府所有。

五位法人發起人裡，尹仲容及董顯光最早辭世。一九七五年蔣公逝世後，蔣夫人指示以辜振甫及陳勉修兩人遞補；另方面，敦睦聯誼會也因爲屬下圓山飯店的業務發展迅速，使得最初的組織章程已不符實際所需，做了部分條款修訂，並且把成立之初的基金五十萬元變更登記爲兩億元。辦理變更登記之後的第一屆董事會，就由我來出任董事長。

那個時候，圓山雖有巨額盈餘，但絕對沒有流進何人口袋，蔣夫人固然不曾動用圓山的錢，孔二小姐也不會。蔣夫人用錢，通常來自紐約孔家，孔二小姐是管道，由於孔家上一輩頗富裕，孔二小姐只要夫人有需求如捐款之類，她就從紐約調款過來，這一方面是相當慷慨。

然而孔二小姐的問題是把圓山大飯店視爲私人產業般，以最刻板古舊方式管

理，長久下來影響深遠。她監管飯店的經營時，從上到下，大小事情都管，有如管家一般；由於她能夠直達層峰，又很強勢，使得圓山飯店的大小主管成了唯唯諾諾之輩，形同只執行她的指示。我雖是董事長，但她一直以電話遙控業務，我也就沒有能介入經營。其實蔣夫人原先在管理委員會成立之後，確實有意把圓山大飯店交給省府經營，因孔二小姐不肯放手，也就作罷。

孔二小姐在美國遙控業務那幾年，圓山飯店的管控出現漏洞。經理及副理之間不和，造成主管多存觀望態度，嚴重影響了業務；又人謀不臧，集體舞弊的問題也十分嚴重，以中正機場餐廳爲例，一年下來就虧損一千餘萬元。此外更出現貪瀆事件，出納主任徐華昌於一九八一年九月在任內病故，經過飯店經理清點，從大批私人往來支票裡發現他於生前侵占公款。

經國先生很關切，就問我，圓山飯店有沒有這回事？我回答，有。經國先生就了解了，他沒再說什麼，但我知道他要我管管事，就以董事長身分處理圓山飯店的問題，孔二小姐也就暫時罷手。

我著重內部管理，派俞國興爲總會計以加強稽核，並整修房舍擴展業務，圓山飯店成立餐飲部，將餐廳廚房全部納入管理，組織因此健全，士氣也就高昂。在那

幾年，國際景氣不錯，圓山大飯店累積巨額利潤，由於現金部位迅速累積，我決定將所有貸款全部還清，以減少利息支出。另方面，我也致力圓山飯店的合法化，這要感謝省主席邱創煥擔任圓山飯店管理委員會主委時的鼎力協助。台北本店、高雄分店及台北圓山聯誼會的土地在當年都是奉准撥用，但多年來沒有辦理合法憑據以及依規定做法定手續，所有的問題經發現後，都設法解決了。

我擔任董事長時，圓山飯店總共累積了三十多億元盈餘，全部置於敦睦聯誼會名下；不過，我及其他董事始終未支領任何報酬。

一九八八年一月，經國先生突然逝世。孔二小姐不到一個星期就自美返台，強勢接管了圓山大飯店，她當著圓山主管的面撕掉我經營時制定的人事制度等規章，並且立即要總會計俞國興離職，所有過去幾年來讓圓山極上軌道的經營方式一概取消，回復往年舊制。孔二小姐曾經仔細查俞國興留下來的帳，帳目清清楚楚，沒任何問題。我眼見如此，於當年六月辭董事長職。

圓山董事會改組，在孔二小姐向蔣夫人報告下，由熊丸接任董事長，由於大環境也已變動，圓山飯店從此開始走下坡，不僅營運轉差，也出現員工抗爭等種種引起社會矚目的事件，後來熊丸自己還因涉及貪瀆被司法機關偵辦。

李登輝的意外人生

我在經國先生總統任內，一直是行政院政務委員。經國先生的副總統起初是謝東閔，他在選擇李登輝先生出任副總統時曾偶然問過我的意見。他說，他考慮的是李登輝年輕、學歷為農經博士，又是虔誠的基督徒。我對李登輝並無不贊成，但認為從宗教背景來考慮人選並不適當，因為如有宗教狂熱可能會走偏鋒，我甚至提到伊朗的柯梅尼。但是，經國先生還是用了李登輝做他的第二任副手。

經國先生確實曾考慮過由誰接棒掌政問題，當時他的構想是行政院長孫運璿，孫運璿不論形象、聲望都很好，卻中風了，經國先生從此沒有機會再做安排。其實，他那時不認為自己的生命會如此突然結束，所以整個國家領導的布局並沒完成。以後李登輝先生執政十年，社會上不少人批評他對中華民國歷史文化缺少認識，這對國民黨、對他自己都是個災難，有人甚至認為因此把國民黨的執政斷送了。

我想起李先生仍是副總統時與我論交的幾個親身經歷。

緯國的兒子蔣孝剛結婚，我和喬被安排和李登輝先生同桌。那時正逢基督教長

老教會訴求台獨引起各界矚目，喬因座位安排在副總統旁邊，在閒談中，她就問他：「副總統，長老會這麼堅持台獨意識型態，您也是長老會教友，您覺得他們這樣做對嗎？」李先生回答：「因為他們有被殖民的心結，所以對事情的處理比較容易這樣。」

李先生的高爾夫球打得很好，我那時也是不錯，因此我們每個月都會有次球敘。有天我們帶著太太在大屯高爾夫球場打球後一起用餐，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主任委員閻振興也在座。由於閻振興擔任過成大、台大校長，李先生因而意氣風發地談到大學歷史教育。他說：「其實，我們的大學歷史教育應該更務實些，學生不必讀中國歷史，讀近代史就可以了。」

很明顯地，他的「台灣本土化」思維，那時就已浮現，只是我沒想到以後會對國家影響那麼大。我當時沒講些什麼，但回家後我和喬談了談，認為這樣的想法是不對的，中國五千年累積下來的歷史文化，深植在中華民族裡，社會以此建構，倫常賴以維繫，怎能放棄？而他是副總統，在這方面更應有所持守。

隔了幾天，我就送他幾本書，包括錢穆的《國史大綱》以及林明德的《日本史》等，我想這些書可以讓他了解我中華民族的根本，至於《日本史》則可說明中日兩

個民族雖非同文同種，但日本文化也源自中國。隔了幾天，李先生就回張條子，上面寫著：「周先生，我深知你意！」

李先生在經國先生生前，並沒有準備以後要接下領導棒子。有次也是在球場上，他感慨地對我說：「哎，將來我不知道會到哪裡去！」

我回答：「你可以更上一層樓！」

他聽了連連擺手：「我現在不敢想！」

我的感覺是，在經國先生生前，李先生和總統的關係不是很密切，他不知道經國先生對他未來的安排是什麼。

我也相信，經國先生在選擇副總統時，不會預見後來李先生會因自己的去世而接掌政權，進而以台灣分離意識領導國家遙指台獨的地步。如果他看出李先生在思考的根本上，就是去中國化的想法，相信他可能會設法說服他的這位台籍副總統。另方面，經國先生的生活是如此的簡樸，痛恨高層官員奢侈甚至貪瀆，他如果見得李先生以後和財團走得這麼近，又如此不忌諱地獲取財富，我想他在天之靈也會後悔的。

經國先生生前最後一、兩年，雖然因身體緣故一如蔣公不能再約晤我，但是我知道他經常和蔣公一樣常在病榻上問起我，而他對我的關切，也會要俞國華轉達給我，常令我感念不已。

第三十一章 蔣公與我

一九九八年九月，我又回到那看來曾經是極佳的人生起點。當航機飛臨南京時，從橢圓形的窗口往下望，和五十年前倉皇離去時比起來，南京城已經是完全不同了。

年輕時因爲職務關係，搭機的機會較多，所以對南京的整個外貌熟悉得很。這城依然一望無際，如今不同的是高樓大廈處處聳立。半世紀了，進步是應該的，我不禁浩嘆。

幾十年前，經過八年艱苦的抗戰，政府終於還都於此，我曾在總統府裡有個辦

公室。我曾經準備定居在此，買了地，房子尚未蓋，就倉促離去。

這一趟，我帶著喬、女兒女婿及孫輩一大家子回到大陸，回到蔣公半輩子想回來卻終未能如願的南京。多承南京台辦對我們的禮遇，航機才落地，就熱切地過來打招呼，剎那間讓我有賓至如歸的感覺。台辦帶著我們一行從貴賓室離開機場，住進東南大學（即前中央大學）的招待所。

南京市內處處古蹟，國民政府也是一處。國民政府建築是明清時代的王府，陳舊的外表依稀可見宏偉的規模，中共如今規畫成紀念館，但眼前是由一個文化單位進駐辦公。接待員領我們入內，國父孫中山先生的辦公室仍在，蔣公的總統辦公室也保留下來了，而我以前辦公的祕書室則沒了，隔間已被拆除，現在是一個大辦公室，可容納許多人坐在裡面工作。

這麼多年了。我得靠著旁人的指引才能尋得那幾處舊地，但找到之後，片段的回憶又霎時湧上心頭，令我黯然。

我彷彿看見抗戰勝利後還都南京，一九四六年初走進這棟宏偉建築時的歡欣鼓舞，一下子又是四九年初倉皇離去時的混亂。我想到先總統蔣公，想到他念念不忘的光復大陸使命，淚水不禁奪眶而出。

追隨蔣公那麼多年，共患難的點點滴滴一直深深埋藏在回憶深處。我記得他在韓戰以前，中華民國最絕望之時毅然復行視事，聽到他慷慨講述革命志節的重要，以及以身殉國的決心。我也記得來台幾年後，陪甫返國述職的俞國華到高雄晉見蔣公，那時他是派往國際貨幣基金會的副代表。那天中午，我和俞國華一起到一家停泊在港口旁的水上飯店用餐，突然發現這水上飯店竟然就是一九四九年蔣公率領我們航行於舟山群島之間的江靜輪，卻已在此除役，成爲水上飯店了。我回想到那段艱難的日子，一時之間百感交集。

司徒雷登的評語

蔣公是堅決反共的，從他在一九二〇年代參與國事以來就不斷與共產黨周旋，對共產主義知之甚深，也深受其害。丟掉大陸之後，蔣公對共產黨的滲透、群眾運動與對世界擴張的野心，所感受到的苦楚更是刻骨銘心。

大陸淪陷後，蔣公爲攻破共產主義思想，花了很多時間研究辯證法，希望做透徹理解後駁斥其理論，從根本打擊共產主義精神，進而振奮我方士氣。然而一般幹部很難理解這種理論，而蔣公那時年歲已高，卻全神貫注鑽研不息，我在他的身邊

看到他爲國努力的精神，欽佩之餘也極爲不忍。他的人生觀，就是以中華民國爲志業，沒有任何循私的想法。

前美國大使司徒雷登在一九四九年蔣公下野時堅決支持李宗仁，以後又試圖和占領南京的中共接洽承認事宜，然而他返回美國後，曾經這麼評價蔣公：

「……他是一個具有堅強意志和不屈勇氣的人。但正如我們所常見到的一樣，他的短處完全是由於他最優的品格之過度。要對他做任何斷語，我們必須想到他的舊文化傳統和背景；以及他老是在一種隨時可以失去一切的情形下負起絕對繁重的責任。我們記住了這一點，不再單是用東方專制政治的歷史來衡量他，而且將他與現代獨裁者相比較，那麼，蔣介石氏的行事與爲人是那樣的克己，是值得我們欽佩的。

「縱使蔣氏所採取的某些政治措施，依照現代美國或歐洲的標準來看，有點似乎不當，我對他的道德人格，始終毫無疑問。我深信他已經照著他認爲對他國家最爲有利的辦法去忠實地做了。要他把他個人的利益和中國的利益清楚分開，那是不很容易的。但他絕對沒有傳統官僚所特有的金錢主義、貪贓枉法、懶惰因循、畏首

畏尾的不良習氣。他的偉大人格，在官員們中間，眞可以稱爲傑出的、例外的。」①

司徒雷登對蔣公人格上的評語很是精闢。我是蔣公的同鄉，以二十六歲之齡到侍從室追隨蔣公工作，可以印證司徒大使前述之言。

司徒雷登提及日本侵略時也指出，一九二〇至三〇年代，正當蔣公努力地統一全國，日本向大陸擴張的陰影籠罩著他，但他當時對這件事似乎完全置之不理，他是否出於同情日本軍閥，或者只把注意力完全放在初生的共產黨叛亂，而無暇注意來自日本的威脅？司徒雷登說：「不是的，他看出，中國必須先有政治的和軍事的準備，他很明智地抑制自己，以免招致日本的進攻，並可能給日軍以充分的進攻理由。」

蔣公確實如此，他以無比堅毅的氣度，能夠放眼整個大局，不冒進，而尋求對中國最有利的時機爲所當爲。如此的領袖風範，值得作爲當前台灣國家領導人面對中共政權諸般挑釁打壓的借鏡，不要意氣用事，不逞口舌之快。

蔣公到台灣之後，最費心的除了黨改造之外，就是撰寫《蘇俄在中國》。他利用公餘時間花了好大心血寫這本書，書裡主要是對外敘述蘇聯侵略我國的史實，同時也對內說明政府爲何會失敗。蔣公直到臨終前，都認爲中共應會垮掉，而蘇聯則不會。他所持的理由是，中共在統治大陸期間犯的錯誤實在太多了，從土地改革、大躍進，乃至於文化大革命等，所以會垮。

如導師如嚴父

一九六九年，我到高雄最後一次晉見蔣公。他問我：「有什麼事情要報告嗎？」

我回答：「下年度的總預算。」

我把總預算大致說明之後，蔣公說：「現在政府很穩定，很好啊。你要重視公教人員的待遇，因爲政府很辛苦，他們也很辛苦。還要重視經濟發展！」我點頭稱是。

那時文化大革命依然持續，大陸情勢並不穩定。他又充滿信心地說：「國家的形勢一定會好轉！」

這是我最後一次和蔣公見面。後來蔣公的健康日差，經國先生沒多久就通知，任何人必須得到他的同意，否則不得去打擾蔣公。

有好長一段時間，蔣公把幾位年輕部屬留在身邊任用並且親自指導，我是其中之一。他很看重我們，在大陸變色、政府遷台後那幾年，他在許多政策及人事上問問我們的意見，往往就採納了。在他的身邊，我增長了見識，培養了自信心，也對自己起了絕對性的影響，我服公職、待人處事的態度，甚至個性，都受到蔣公的潛移默化。

蔣公在我當中央黨部副祕書長時，就問過我，未來想往哪邊發展。我當時接觸了不少財經方面的議題，平日也有鑽研，於是講了財經。以後，他也安排了我的財經公職生涯。

對我而言，蔣公不僅是位國家領袖，一位直屬長官，更是位長輩。我感覺，他如導師如嚴父。他那麼器重我們，我自己卻沒有重視自己以圖回報，只想要達成所交付的任務，沒有展現更大的企圖心，做得更多更好；只想守分，沒想更遠。

時代的巨人

中國經歷幾千年的帝制之後，國民政府初創，在內憂外患中，蔣公展現了他的領袖氣質，雖然戰亂頻仍、饑饉貧困始終如影隨行，蔣公以他堅強的意志、不屈不

撓的勇氣，努力帶領中國人度過難關。他曾統一了全中國，領導同胞抵抗外侮，廢除了不平等條約，但是他自己卻幾乎不曾享受過承平的日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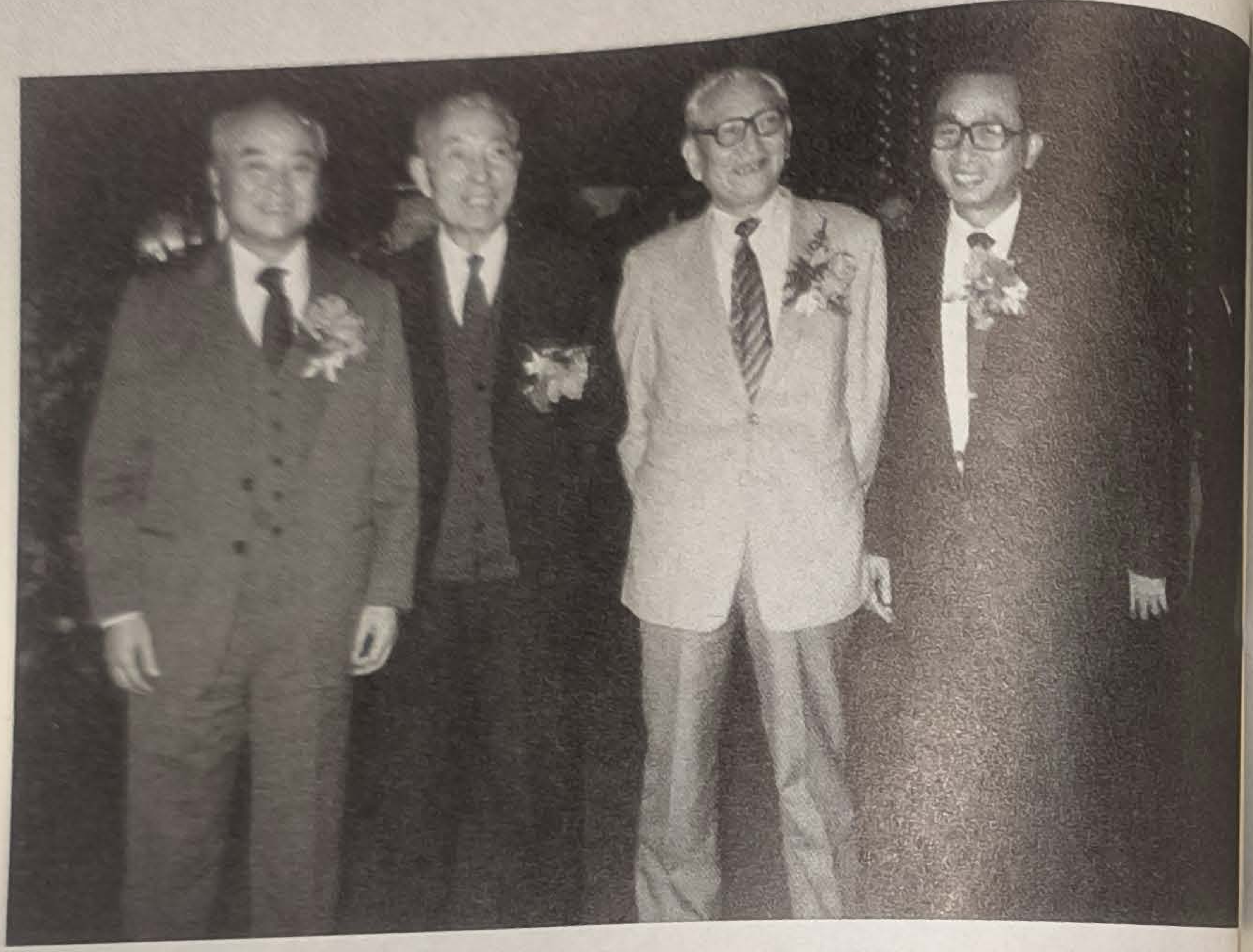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世事丕變，他承受到超乎常人的艱辛，最後仍失去了大陸江山。到台灣後，他心繫大陸山河的思緒從未稍減，但他專心治理這個只有浙江省三分之一大的島嶼，在這裡與中華民國共存亡。他用心地愛這裡的山水人物，台灣不單是他反攻大陸的基地，也成功地逐一實現國父的三民主義模範省的理想。

我追隨蔣公多年，深深了解他的心志，他是位自奉簡樸、正直無私的偉大軍人及領袖。蔣公生前對國家方向的規畫及領導十分明確，並常以「慎謀能斷」、「處變不驚，莊敬自強」來惕勵國人。他明斷共產主義悖離人性，必被唾棄，可惜他未及親見，今日共產制度已快速地瓦解。

如今中華民國在台灣謹慎努力地走著，雖然步履坎坷，但是依據中國數千年來分分合合歷史的印證，所謂「江山代有才人出」，中華民族的福祉依然是可以期待的。而蔣公在歷史的長河裡，永遠是歷久而彌著的一代偉人。

第三十一章注釋

①《司徒雷登回憶錄》，頁二九一至二九三，新象書店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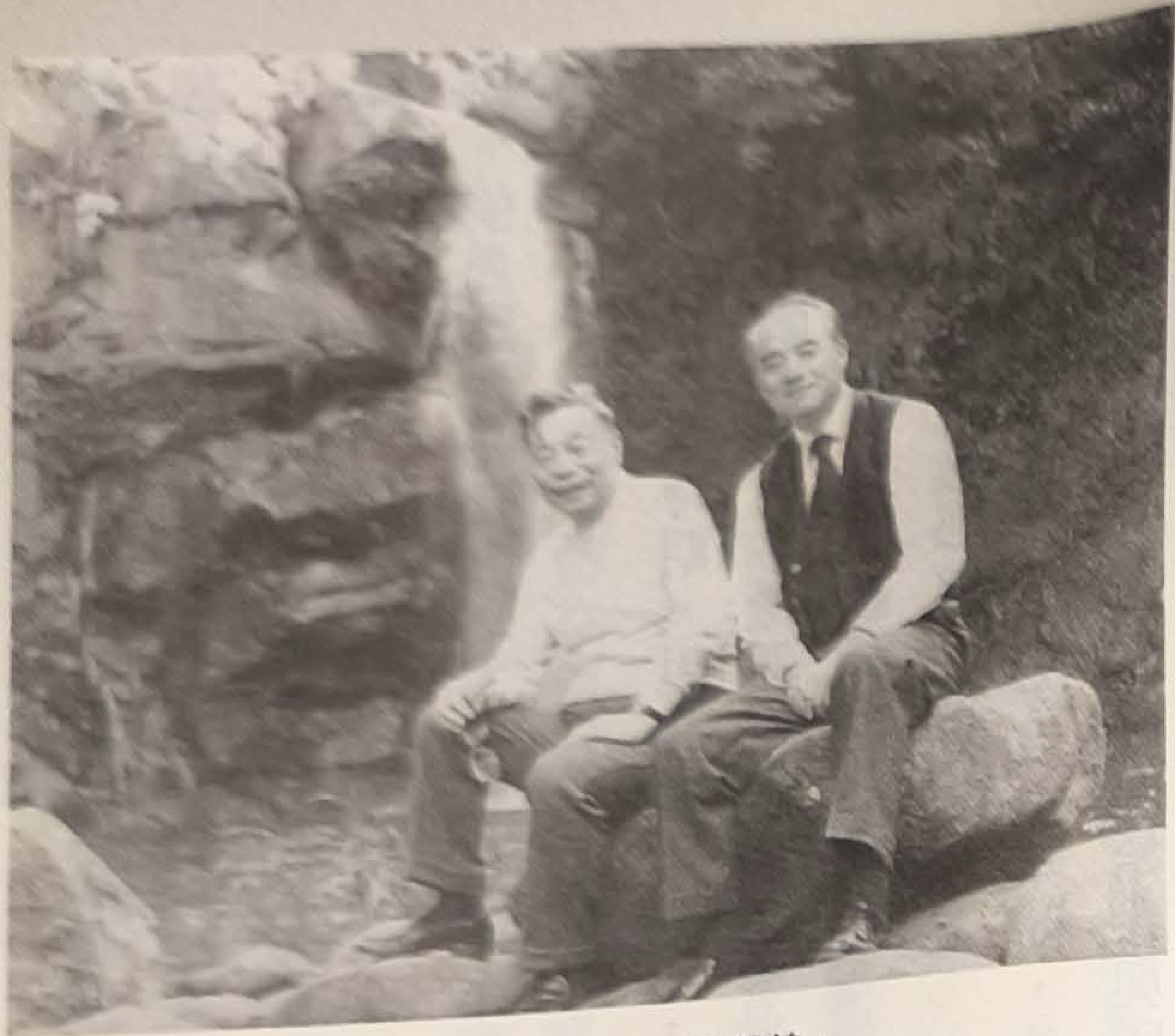
財經首長共聚一堂。圖為一九八八年，（左起）我、李國鼎、趙耀東、郭南宏。



一九八〇年，我（右二）獲行政院聘為世貿中心策畫推行小組召集人。五年後，世貿中心展覽大樓落成，我陪同時任行政院長的俞國華（左三）等人參觀。



世貿展覽大樓委託外貿協會經營，我（右三）應邀參加簽約儀式並為契約證明人。



經國先生（左）與我認識得早，曾患難與共。



緯國（前排左二）與我（後排左一）從小一起長大，他常向我傾吐心事。圖為一九八七年，與辜振甫（前排右一）等同庚會友人在緯國寓所。



蔣夫人（中）對中華民國的貢獻不容置疑。圖為一九八六年我與妻子喬，至其紐約寓所拜望。

後記

汪士淳

早在我大學時期，因為家住台中，我就在教會認識了當時負笈來台中，在中興大學就讀的周開平。開平和我全家都很熟，我父母待之如女兒，她後來結婚，先生趙光夏也是教會青年團契的契友。有這麼一層信仰因緣，促成了二十五年後，我有幸參與周宏濤先生回憶錄的撰寫。

開平是周伯伯的么女。六十年前，他年僅二十七歲，是蔣委員長身邊最年輕的幕僚。其後，他才三十出頭就開始參與國政，長達四十年。這麼多年來，外界給了他一個特殊的標籤——官邸派；而他則是保持一貫的持重謹言，很少對外談他過去特殊而輝煌的經歷。大致而言，政界僅知道他曾長期追隨蔣中正總統，並且深得信賴。

如今周伯伯已不問政事，深居簡出。但他心裡有個想法，應該把過去深埋心中、從未對外透露的經歷發表出來，好讓這一輩知道他曾經追隨老總統所走過的那段艱辛歲月，也讓當前社會了解，台灣所以能有今天，正是前人種樹的成果，要不是蔣中正時代全力穩住台灣，現在的經濟奇蹟乃至於種種兩岸關係爭議，根本不存。

在每次的訪談裡，周伯伯很真摯、深刻地敘述著種種往事，特別是影響他一生的蔣總統。他沒打算掩飾些什麼，但談起一生敬重的老總統，有時會感慨萬千。我則是逐漸地了解他的個性，除了謹慎心細之外，直言無隱，正是老總統欣賞、重用他之處。

周伯伯自進入侍從室之後就開始寫的日記，成為喚回記憶裡各種細節的有力佐證。從他記載日記的方式、內容裡，我可以見得他在各階段中的心境、角色及任務轉換。

抗戰時期進入侍從室的最初幾年，他的日記大致寫的是和自己有關的事，對於眼前的機要大事多半不記；以後國共戰事失利，中華民國進入危急存亡時刻，他身為蔣中正身邊最接近的秘書，必須把各種機密公文隨身帶著以備查考，因此日記不

僅是日記，也成爲他記載各項重要公文、情報、談話紀錄及剪報的檔案夾。

大陸淪陷前後，從一九四八年至一九五三年間，是周伯伯日記內容最爲豐富詳實的歲月。其後他的職務逐漸轉變，出任重要黨政職務，日記不再出現文件，而是記載自己在黨政上的工作情形及見聞。

從日記裡可以看出，周伯伯和蔣家關係極爲密切；更重要的是，他在中華民國關鍵的十幾年間追隨在蔣中正總統的身邊，從而目擊中華民國如何失去大陸、又在蔣中正的領導之下，穩定了台灣局勢，終至把台灣保住，維繫住國家命脈。而周伯伯的口述，更讓我能夠身歷其境，了解蔣中正執政時的心路歷程。

周伯伯的公職生涯經歷非常豐富，也牽涉許多人與事，爲求易解，在他的同意下，我對部分讀者可能陌生的情節或人事予以注解說明，並做了仔細查證，務求減少因年代久遠而造成的疏誤。

去年間，周伯伯的書房不幸失火，他民國五十年後的日記以及許多照片等珍貴資料泰半損毀，所幸中國國民黨黨史館及文傳會副主委樓文淵先生的協助，提供了館藏照片，使這本回憶錄更能鮮活地展現在讀者眼前；另方面，民國五十年前的日記因已先移置我家而得以保全。

雖然周伯伯的日記損毀不少，但大致而言不影響回憶錄的架構及撰寫。周伯伯在八十歲大壽時，他的朋友、部屬及晚輩就已經出版了紀念文集，內容著眼於他在財經方面的成就；因此準備寫這本回憶錄時，重心原本就擺在他未曾講述過的前半段公職生涯，特別是追隨蔣中正總統的那段艱苦歲月。

他眞實地見證中華民國最大變局，其間對人與事或有些許負面敘述，但那是因爲曾如此地發生過，他完全忠於他的判斷及記憶、忠於他的日記記載，基於爲歷史做見證的考量。

四年來，我每星期一次地往返台北縣新店市花園新城，在靜謐而滿眼綠意的宅第裡，與這位溫厚的長者促膝長談，聽他述說兩蔣時代的親身經歷，深感榮幸。

二〇〇三年九月十五日

附錄

附錄一

台灣如何面對戰後的貧窮與不安

——所謂台灣經濟經驗的故事與檢討（一九四五至一九七七年）

周宏濤

本年（一九九五年）一月間接加拿大溫哥華市卑詩大學（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校長司塔朗威（David Strangway）的來信，謂大學評議會，以台灣經濟成就非凡可爲世楷模，以本人在政府多年所擔任之任務與貢獻表示欽敬，經審查通過頒贈榮譽法學博士學位等語，並訂將在五月間舉行之春季畢業典禮中頒授，盼屆時參加並致辭。查卑詩大學爲該國在西岸之著名大學，爲北美十二名校之一，歷史悠久，造就各界人才甚多，卓著聲譽，乃欣然予以接受，並於五月三十日前往該校參加春季畢業典禮領受並致辭。當時撰就本篇，旋以篇幅冗長，不克在畢業典禮中全部演講，乃更作提要，然而，本篇講稿所述爲多年來自各種資料中所摘者，頗

有回顧之價值，用予刊出，以誌國人當年辛勤耕耘之果實。

一、前言

貴校歷史悠久，作育英才甚多，是世界著名學府之一。今天我能在這裡參加這所著名學府本年春季畢業典禮，並接受頒給我的一個榮譽學位，備感榮幸與高興，也想藉此機會向各位貴賓以及商學院畢業生祝賀你們的成就，貴校以培育與造就社會各方面領袖人才著名，這項報導見諸《麥克倫報》（*Mclean*）的評論，甚是難能可貴。我今天向各位演講也就是對未來各界的領袖人才講話，備感興奮。一個好的領袖要會解決困難，所以今天特別向大家報告一個台灣經濟發展歷程的故事，希望能引起大家的興趣。因爲這個發展歷程在一九四五至七七年間，在這造型之期間，無論關於政策的制定和執行，我都曾參與並盡了我一份極爲微薄的責任。而且在這種時間內正是台灣處境最艱難，所做的工作正是爲台灣日後發展與繁榮奠定鞏固的基礎。

近年來在我旅行國外時，常受到一些外國朋友多次類似的詢問，台灣是缺乏天然資源的島嶼，人口劇增密度甚高，在對外關係和國防上都曾遭遇到嚴重困難，財

政負擔沈重，如何能在這種環境下，於短短的數十年之內，使經濟由落後而現代，由貧窮而富裕，今且已擠入新興工業國家之列，民主政治也在此期間建立初基。不容諱言，我們與諸工業國家相去仍遠，但是這個成就是難能可貴的。當我們回想起以往三十餘年所經歷歲月，確是艱苦備嘗的。但大家都有多難興邦的精神勇氣鼓舞著，才造成這個奇蹟。

二、實施貨幣改革抑制通貨膨脹

台灣原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因日本侵略中國，清廷戰敗，遂於一八九五年被踞為殖民地。台灣為一海島，總面積僅三萬六千平方公里，因地處亞熱帶，氣候溫暖，雨水充沛，農業環境良好，日本遂以「工業日本，農業台灣」之經濟政策統治台灣。迨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台灣始歸還我國，設置為省，推行三民主義，以民有民治民享為宗旨的民主政治。大戰後，人民財產、生產設備及公共設施均慘遭破壞，瘡痍滿目，百業蕭條。其時中國共產黨擴大內亂，戰禍蔓延至大陸各省，人民紛紛渡台逃避戰禍。一九四九年中央政府也遷來台灣，集中人力物力及許多菁英人士，捍衛台灣，建設台灣。然因人口爆增，物資奇缺，物價一日數

漲，通貨膨脹已達極嚴重階段，台幣幾已喪失幣信。首要之務，莫急於貨幣改革，穩定物價，安定民心，社會秩序方可恢復，政府乃立即採取下列各項措施：

⑴以十足準備發行新幣：命名為新台幣，於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五日公布新台幣改革方案，以黃金十足準備，限額發行。新台幣以一元比四萬元之比率收回舊幣。對外則採行與美金的固定匯率。

另組織「新台幣發行準備監理委員會」切實監督發行，發揮健全之貨幣功能。

⑵整頓財政收支：推行中央、省、縣、鄉等四級政府體制，畫分各級政府收入財源，且各級政府收支統由銀行公庫部集中收付，並嚴格要求勵行節約，各級政府之預算務求達到收支平衡。

⑶辦理黃金保值儲蓄存款及優利儲存款，獎勵國民儲蓄，充裕國內投資財源。

⑷發行愛國公債及愛國獎券藉以收縮通貨，並裕庫收。

⑸加強引導銀行融資，用於發展生產，促進貿易，加速經濟發展。

貨幣改革實施後之次年，物價隨即顯著穩定下來，躉售物價年平均上漲率自三位數降為二位數而一位數。至一九五四年，年平均上漲率降為百分之二，有利於各業生產之正常進行，主要農工生產逐漸恢復戰前最高水準，人民生活必需品不虞匱

之，嚴重的通貨膨脹終被抑止，經濟顯現快速成長局面。

三、實施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政策

台灣光復初期，台灣農家人口約占總人口百分之七十，且因承襲日治時代採墾戶制度，土地集中在少數人之手，致有百分之七十的農家皆為佃農或半佃農。佃租又高達全年正產物百分之五十至七十。佃農生活困苦，加以中共在大陸各地煽動貧富階級鬥爭，號召農民翻身，沒收土地，此類消息逐漸傳入台灣，台灣本地的共黨也乘機蠢動，造成社會不安。政府乃毅然實施土地改革，推行耕者有其田政策，建立優良的土地制度。其實施步驟如下：

(1)實施「三七五減租」政策：一九四九年一月開始推行，規定佃租不得高於正產物收穫量的千分之三七五，並取消押租金及其他一切不合理的負擔。由於改革手段溫和，獲地主及佃農的踴躍合作，不及半年簽訂三七五減租契約的耕地面積已達全部佃耕地面積的百分之五五。其後繼續推行，直至全面按新定租率簽訂新約為止。

(2)低價出售公地給佃農：政府因接收自日據政府產業，擁有大量公地，除保留

必要者外，於一九五一年六月開始出售公有耕地給佃農，其地價定為等於該耕地正產品全年收穫量之二點五倍，分十年償還，計出售之耕地，約占全部佃耕地面積百分之三十。

(3)推行耕者有其田政策：政府於一九五三年進一步頒布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規定私人擁有耕地，只能保留水田三公頃或旱田六公頃，超額部分統由政府收購，照原價轉售佃農。收購主要財源有三：一、政府出售公地所得之全部價款。二、為出售公營事業台泥、工礦、紙業、農林等四大公司全部股權。三、為發行糧食債券分十年償還地主。所謂糧食券，係按收購地時之地價折成實物（米）數量分十年還清。地主收到的糧食債券也可在市場上拋售，以獲得資金投資於工業，台灣民營工業亦藉此逐漸興起。佃農自政府手中購得耕地，也可以糧食券折價償還政府，分十年還清。因此，政府亦可自農民償還的糧食債券轉償地主，這一措施使絕大部分（百分之八十）佃農都變為自耕農，佃農與地主對立情結不復存在，並大大提高農民增產意願，農村欣欣向榮。

(4)實施農地重畫：嗣為更增進農地耕作效率，於一九六二年起推行農地重畫，廢除不必要之田埂，增加耕地面積，化不整齊之田坵為整齊，以利運輸、灌溉、施

肥、收割及機耕等作業，提高耕作效率。

四、推行中程經濟發展計畫引導全國資源達到最有效的利用

戰後因生產設備受嚴重破壞，生產萎縮，加以大量難民自大陸湧入，物資奇缺，如何使有限之資源達到最有效的利用，以裕民生，極為重要。故於一九四九年即成立「生產管理委員會」，優先修復電力供應及交通運輸各項設施，有效運用美援，發展肥料與紡織等輕工業，以及調節國內重要物資供需，藉以安定民生。至一九五三年擴大為「行政院經濟安定委員會」，現改為「經濟建設委員會」，推行一期又一期之中程經濟發展計畫，委員會名稱雖然迭有改變，其主要任務則不變，在有計畫之引導下，全國資源獲得合理的運用，經濟成長乃能一期比一期為高，奠定了台灣今日的繁榮基礎，其所採行的主要策略分述如次：

(1)確定穩定（物價）與成長（經濟）並重的政策目標，二者不可兼得時，則以穩定為先。大凡高成長必然帶來高物價，而高物價又必阻礙經濟之持續成長，二者必須相互兼顧，高成長才能持續進行。

(2)確定以農業培養工業及以工業改善農業之政策，其時台灣工業基礎尚甚薄

弱，惟農業資源和人力資源則甚豐富。故在開發初期，係先盡力開發農業資源，促進農業增產，除供內需以安定民生外，則儘量發展糖、米、食鹽等外銷，賺取外匯，以購買肥料與機器設備及原料之輸入，培養工業發展的基礎，然後再以工業方法改善農業經營，使農業工業化。

(3)工業發展策略則定為：

①優先發展能源工業及交通（通訊）運輸等基本建設，創造優良的投資環境。

②發展勞力密集及替代進口的工業，藉以創造國民高就業機會並節省外匯支出。

③制定獎勵儲蓄投資及技術合作等條例，吸引僑外資金和技術的輸入，充裕國內投資財源及技術升級。

(4)設置加工出口區，發展勞力密集工業產品生產與外銷，然後創建科學區，獎勵高科技產品輸出，促進以市場為導向的自由經濟，使台灣能為國際經濟提供更大貢獻。

在上述政策指導原則下，各期發展重點及其成就則為：

第一期中程發展計畫（一九五三至五六年）：著重開發農業加工等工業爲重點，四年的建設成果，農業增產百分之二五，工業增產百分之五五，物價年平均上漲率爲百分之九，年平均經濟成長率則爲百分之八點一。

第二期中程發展計畫（一九五七至六〇年）：農業以興建防洪灌溉工程、開發山坡地及海埔新生地，藉以擴大耕地面積爲重點，工業則以發展電力、紡織及農產加工業爲重點，並加強交通運輸建設以爲配合，四年建設成果，年平均經濟成長率爲百分之七，物價上升率爲百分之八，輸出年平均成長率爲百分之二一。

第三期中程計畫（一九六一至六四年）：農業以推行機耕，發展遠洋漁業爲重點，工業則開發電力、發展紡織、塑膠、資訊器材等外銷工業爲目標，在此期間輸出大幅成長，工業品占輸出總值百分之五〇點五，首次超過農產品（主要爲糖米）的輸出。年平均經濟成長率升爲百分之九，物價上升率爲百分之六。

第四期中程計畫（一九六五至六八年）：調整農業結構，鼓勵稻農轉作其他高經濟價值之作物，設置加工出口區，擴大勞動密集工業產品輸出。實施結果重工業產值比例升占百分之五二，首次超過輕工業產品。年平均經濟成長率達百分之十，物價上升率爲百分之三點八，輸出成長率達百分之一六點四。

第五期中程計畫（一九六九至七二年）：加強推動農業機械化，放出農村勞力轉入工業，並加強發展電子、石化及光學等工業產品輸出爲目標。廢除工業保護，提升對外競爭能力，計畫實施結果，年平均經濟成長率達百分之十一點六，物價上升率爲百分之一點七，輸出成長率爲百分之四十。

第六期中程計畫（一九七三至七六年）：本期適逢第一次石油危機，發生國際性嚴重的通貨膨脹，國際需求萎縮，一切建設均以穩定物價、擴大國內需求，緩和景氣衰退爲目標。政府因而擴大公共投資，闢建新機場、新港埠、高速公路、核能電廠，加速發展重化工業及造船等投資。故能於一九七五年二月物價開始回穩，四月景氣開始復甦，爲世界各國景氣最先復甦國家，四年平均經濟成長率爲百分八，物價上升，爲百分之一點五，輸出成長百分之二九。

經過前述六期中程經濟建設之後，經濟長期高速成長，二十四年平均成長率高達百分之九。物價方面除在石油危機期間曾有較劇烈波動外，其他各年上漲率多在百分之二至百分之四之間變動，經濟發展基礎至此漸告穩固。至一九七七年GNP按美金計算已達二十七億元，在世界各國中居於第四十位，輸出能力強，輸出值占GNP比率爲百分之四九。國民儲蓄能力雄厚，自一九七六年起均超過國內投資所

需財源，成爲資本出超國之一。所得分配甚爲均等，按五等分位計算，最高所得層的所得僅等於最低所得層的四點二倍，成爲一個均富國家。

五、對台灣經濟發展經驗的檢討

台灣經濟發展的成功，檢討其發展的過程，有下列內在與外在因素分述如次：

◎關於內在因素：

(1)有堅定有力的政府和正確的政策，受人民一致擁護，政策得以貫徹實施。

光復初期，政府即積極準備與推行地方自治，以及土地改革、貨幣改革，消滅貧富對立於無形，加以地方和諧，政令得以貫徹實施。此外，政府集中軍力守台灣，握有近海的局部相對優勢，後又有美國第七艦隊協防台灣海峽，共創台灣內部極爲安定的政治環境，使人民得以專心與貧窮奮鬥，發展其經濟。

(2)結集各方菁英份子及大量的青壯勞動力，同心協力貫徹計畫目標。

大陸各省優秀之士、軍民同胞，爲厭棄共產清算鬥爭的暴政，先後追隨政府來台，除捍衛台灣，軍人於其退役後，經輔導投入生產行列，成爲一股強大耐勞的青

壯勞動力。

(3)公營事業發揮重大貢獻。

公營事業就一般而言經營效率較低，但在台灣卻發揮階段性的特殊貢獻。光復前，人民在殖民地政策之下，只鼓勵台灣人民經營農業，而鼓勵日本人經營工業。以致光復後，政府接受自日人所經營事業，因民間缺乏專才，故由政府接收改爲公營事業，其顯著效益有下述各點：

①使原有事業迅速恢復生產。

②爲國儲備人才。

③配合政策調節物資供需、穩定物價發揮重大功能：當時公營事業產值龐大，約占國內生產毛額的百分之二二，重要物資大多經公營事業產銷，可依政策方向調節供需，穩定物價。

④提高資源運用效率：在物資缺乏情況下，便於集中運用從事於國家基本建設，尤其對美援的運用更具效率，乃能與被美國評爲運用美援最具效率的國家以色列並列。

⑤爲民營事業訓練企業專才：台灣的公營事業經政府整頓，經營基礎穩固

後，凡認爲轉爲民營更具效率者，即配合土地改革政策之實施，移轉民營，人才亦紛紛轉入民營企業，奠定民營企業發展的基礎。

⑥促成所得分配趨向均等，貧富差距縮小：大凡經濟發展初期，資本利用集中，故隨經濟之發展，貧富差距擴大，迨工資高漲之後，貧富差距始漸縮短，台灣在經濟發展初期，政府及公營事業占投資之大宗，所獲利益歸公，而不歸個人，故能成就所得分配均等。

(4)善用國內資源逐步推動經濟發展。

台灣多山（占三分之二），地下資源也貧乏，人口密度高，但因處於亞熱帶，氣候溫暖，雨水豐沛，四面環海，勞動力供給彈性大，宜於發展農漁業及勞力密集工業，故在發展策略上，以開發農業資源，增進農產輸出，獲利作爲發展工業之財源，工業方面則優先發展勞力密集工業，創造國民充分就業環境，迨工資和人民教育水準已高，則轉爲發展資本與技術密集之工業，使工業發展不致發生瓶頸。

(5)獎勵僑外投資及技術合作，以利國外資金與技術的輸入，藉以充裕國內投資財源及產業升級。①

◎關於外在因素：

(1)美國的軍經援助。

在第一、二期中程經建計畫期間，美援資金在國內投資財源上占百分之四十以上，居極重要地位，嗣又派第七艦隊協防台灣海峽，使台灣內部有一個極爲安定的政治和投資環境。

(2)適逢國際需求大增時期，利於台灣擴大輸出。

戰後各國承大破壞之後，物資不足，大家都忙於恢復生產以供內需，國際市場開放，需求強大，使台灣能有蓬勃發展生產、擴大輸出的機會。

(3)台灣在地理上有海峽爲屏障，而中共亦累年遭遇內外困難，台海得以平靜，使台灣有安定環境從事建設。

各國戰後獲得成功的國家都各有其特殊的內在與外在因素，但最重要者爲人才的運用。如德日二國的復興皆較其他國家爲速，即因原分散海外各地的人才被遣返回國，人才集中，藉其智慧協助政府推動各項建設。至於台灣也是因有衆多菁英之士和青壯勞動力隨同中央政府撤退來台協助建設，乃能有今日的成就。

六、展望未來

總結前述的報告，可以知道台灣經濟的發展過程，是經過人民長期的艱苦奮鬥的結果，也是大家都可以做到的。現在台灣經濟的發展策略，仍係依據以往的基礎，繼續實施中程型的計畫經濟，將各種發展計畫懸作標的。近年來，更著重於市場導向的自由經濟，政府指導性的經建計畫則勢將逐漸爲自由經濟所取代。國民經濟長期持續高速成長之後，雖與已工業化國家相去仍遠，但人民物質生活已較之前富裕，然而文化建設水準未能與經濟水準同步提升，致精神生活層面發生欠缺的現象，將成爲台灣另一嚴重的挑戰。這是今後經濟開發國家所應記取的課題。

台灣是一個島嶼型的經濟，依賴貿易的成長很大，幾乎是它整個GDP的一半。我們與貴國（加拿大）的貿易以美元計算，自一九七三年的一億九千八百萬到一九九三年增加到二十六億五千五百萬，增加了十二點四倍。以一九九三年爲例，自我國進口值美金一億五千萬，向我國出口值一億一千一百萬。歷年以來雙方各有盈虧，是互濟的。台灣現爲貴國第七位供應國、第九位出口市場。台灣與太平洋沿岸國家的貿易近年亦漸頻繁，貿易爲促進國際經濟發展的一環，惟有共榮才能共

存，並促進東西文化的交流。加拿大爲世界七大工業國家之一，執經濟之牛耳，我們希望將北美經濟圈擴大包括太平洋沿岸各國，互通有無，擯除政治因素，則不但是美洲亞洲之幸，亦全世界和平與繁榮之所繫也。

謝謝各位！

附錄注釋

①美國哈佛大學講座教授杭亭頓（Huntington, Samuel），在所著*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一書中，舉例指出一九六〇年代土改政策的成功有賴當時的菁英政治及政府的努力。

附錄二

周宏濤大事記

西元（民國）	個人重要記事	國內外大事（西元）
一九一六年（五年）	●農曆十二月十四日生於浙江奉化	●袁世凱帝制失敗卒，黎元洪就任總統；段祺瑞政府成立 (1916) ●俄國紅色革命 (1917) ●張勳復辟失敗 (1917) ●黎元洪去職，馮國璋做總統，段祺瑞組閣；北京政府對德、奧宣戰 (1917) ●廣州軍政府成立，護國運動開始 (1917) ●護國運動失敗；徐世昌當總統 (1918)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 (1919) ●五四運動 (1919) ●陳獨秀在上海成立第一個共產主義小組 (1920) ●北洋軍閥內戰 (1920)
一九二一年（十年）	●就讀顯承初小及高小	●中國共產黨在上海成立 (1921) ●孫中山就任廣州非常大總統 (1921)
一九二二年（十一年）	●父親病逝	●直奉軍閥戰爭 (1922) ●史達林任俄共總書記，成立蘇聯 (1922) ●曹錕賄選成功，護法結束 (1923) ●黃埔陸軍官校成立，蔣中正擔任校長 (1924) ●第二次直奉戰爭 (1924) ●孫中山北上商討國是，病逝北京 (1925) ●國民政府在廣州成立，建立國民革命軍 (1925)
一九二六年（十五年）	●就讀奉化初級中學	●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 (1926)
一九二七年（十六年）	●蔣公和宋美齡在上海結婚後回奉化祭祖，初見蔣公夫婦	●國共分裂 (1927)
一九二八年（十七年）	●轉學寧波四明中學	●北伐完成，南北統一 (1928) ●國軍編遣會議 (1929) ●中原大戰 (1930) ●東北九一八事件 (1931) ●日本在東北建滿州國 (1932)
一九三四年（二十三年）	●考上蘇州東吳大學生物系後轉政經系，嗣因抗日，轉學到湖北省的武漢大學政治系	
一九三五年（二十四年）	●參與抗日學潮	

西元（民國）	個人重要記事	國內外大事（西元）
一九三六年（二十五年）	●欲參加中共在延安興辦的「中國抗日軍政大學」未果	●西安事變 (1936) ●七七蘆溝橋事件，中日戰爭爆發，國府遷都重慶 (1937)
一九三九年（二十八年）	●畢業於武漢大學政治系 ●祖父周駿彥病逝 ●擔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後方勤務部祕書處科員 ●全國公務員高等文官考試普通科及格	●歐戰爆發 (1939) ●汪精衛在南京成立偽政府 (1940) ●珍珠港事變，太平洋戰爭開始 (1941)
一九四三年（三十二年）	●面見蔣公，調入侍從室第四組任組員	●開羅宣言 (1943)
一九四四年（三十三年）	●奉命接下侍從祕書工作	●蔣中正號召全國青年從軍抗日，提出「一寸河山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口號 (1944)
一九四五年（三十四年）	●與朱光潤結婚	●日本投降，二次大戰結束 (1945) ●雅爾達會議祕密召開 (1945) ●重慶會談，國共簽訂「雙十協定」(1945) ●杜魯門就任美國總統 (1945) ●馬歇爾來華調處 (1945)

一九四六年（三十五年）	●擔任國民大會祕書處簡任祕書	●波茨坦宣言 (1945) ●政治協商會議召開 (1946) ●國民政府還都南京 (1946) ●國共內戰爆發 (1946) ●國民政府公布「中華民國憲法」(1947) ●馬歇爾調停失敗返美 (1947)
一九四八年（三十七年）	●長女開紀出生	●施行「動員勘亂臨時條款」(1948) ●第一屆行憲國民大會開幕 (1948) ●蔣中正、李宗仁當選第一任中華民國正副總統 (1948) ●幣制改革，發行金圓券、銀元券 (1948) ●遼審戰役、徐蚌會戰、平津戰役相繼展開 (1948)
一九四九年（三十八年）	●隨蔣公下野赴溪口、上海、重慶、成都、台灣	●蔣中正宣布引退，副總統李宗仁代行職權 (1949) ●台灣戒嚴，三七五減租，發行新台幣 (1949) ●美國發表《對華關係白皮書》(1949) ●國共和談破裂，解放軍渡長江 (1949) ●中共在北平宣布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 (1949) ●古寧頭大戰，中共侵台失敗 (1949) ●年底，國民政府正式遷台 (1949)

西元（民國）	個人重要記事	國內外大事（西元）
一九五〇年（三十九年）	●次女開元出生 ●擔任總統府簡任秘書 ●擔任總統府機要室主任	●英國、印度承認中共，中英、中印斷交 (1950) ●蔣中正在台北復行視事 (1950) ●海南島與舟山列島撤守 (1950) ●韓戰爆發 (1950) ●第七艦隊巡防台灣海峽 (1950) ●麥克阿瑟訪台 (1950) ●毛邦初案 (1951) ●美國軍援開始 (1951) ●中美簽訂共同防衛協定 (1951) ●美軍顧問團抵台 (1951)
一九五二年（四十一年）	●擔任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副秘書長 ●三女開明出生	●國民黨召開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 (1952) ●中日簽訂和平條約 (1952) ●台灣實施耕者有其田及四年經建計畫 (1953) ●艾森豪任美國總統 (1953) ●史達林卒 (1953) ●蔣中正、陳誠當選第二任正副總統 (1954) ●中美簽訂共同防禦條約 (1954) ●越戰爆發 (1954)
一九五六年（四十五年）	●四女開平出生	●大陳島撤守，中共攻占一江山 (1955) ●孫立人事件 (1955)

西元（民國）	個人重要記事	國內外大事（西元）
一九五七年（四十六年）	●擔任國民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 ●擔任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 ●續任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副秘書長	●五二四事件（即劉自然事件）(1957)
一九五八年（四十七年）	●擔任財政部政務次長	●八二三砲戰 (1958)
一九六〇年（四十九年）	●擔任財政部與行政院合設之「改進財務行政聯合委員會」委員 ●擔任國庫制度委員會委員兼召集人	●蔣中正、陳誠當選第三任正副總統 (1960) ●《自由中國》停刊，雷震被捕 (1960)
一九六二年（五十一年）	●擔任台灣省政府委員兼財政廳廳長	●法國承認中共，中法斷交 (1964) ●美國介入越戰 (1965) ●蔣中正、嚴家淦當選第四任正副總統 (1966) ●文化大革命開始 (1966)
一九六八年（五十七年）	●擔任台灣省土地開發保證基金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 ●擔任行政院賦稅改革委員會委員 ●因辦理九年國教，獲頒四	●台灣實施九年國民義務教育 (1968) ●季辛吉訪中國大陸 (1971) ●中共加入聯合國，中華民國宣布退出 (1971) ●蔣中正、嚴家淦當選第五任正副總統 (1972) ●尼克森訪中國大陸，發表上海公報 (1972)

西元（民國）	個人重要記事	國內外大事（西元）
	等景星勳章 ●擔任台灣省政府經建委員會委員 ●擔任行政院主計處主計長	●蔣經國任行政院長 (1972) ●日本宣布與中共外交正常化，廢中日和平條約，中日斷交 (1972)
一九七三年（六十二年）	●光潤病逝	●美軍撤退越南 (1973) ●台灣十大建設動工 (1973)
一九七五年（六十四年）	●擔任中正紀念堂籌建委員 ●與魏燕芝結婚	●四月五日蔣中正逝世，嚴家淦繼任總統 (1975)
一九七七年（六十六年）	●擔任行政院中美經濟社會發展基金管理委員會委員 ●擔任行政院開發基金管理委員會委員 ●擔任行政院經建會委員	●周恩來、朱德、毛澤東相繼去世，四人幫被捕，文化大革命結束。鄧小平掌權 (1976)
一九七八年（六十七年）	●擔任行政院政務委員 ●續任行政院經建會委員 ●因擔任政府財政主計等職，獲頒二等景星勳章	●蔣經國、謝東閔當選第六任正副總統 (1978) ●美國宣布隔年與中共關係正常化，中美斷交 (1978) ●美國國會通過台灣關係法 (1979) ●高雄美麗島事件 (1979)
一九八〇年（六十九年）	●行政院聘為世貿中心策畫推行小組召集人	
一九八三年（七十二年）	●母親病逝	
一九八四年（七十三年）	●續任行政院政務委員 ●續任行政院經建會委員	●蔣經國、李登輝當選第七任正副總統 (1984) ●民進黨成立 (1986) ●解嚴，實施國安法 (1987) ●開放大陸探親 (1987) ●元月十三日蔣經國逝世，李登輝繼任總統 (1988) ●六四天安門事件 (1989)
一九九〇年（七十九年）	●受聘任總統府國策顧問	●李登輝、李元簇當選第八任正副總統 (1990) ●蘇聯解體，冷戰結束 (1991) ●中韓斷交 (1992)
一九九五年（八十四年）	●獲加拿大英屬卑詩大學頒授榮譽法學博士學位	●台灣首度民選總統，李登輝、連戰當選第九任正副總統 (1996) ●鄧小平去世，江澤民上台 (1997) ●香港回歸 (1997) ●台灣首度政黨輪替，民進黨籍候選人陳水扁、呂秀蓮當選第十任正副總統 (2000)

西元（民國）	個人重要記事	國內外大事（西元）
二〇〇三年（九十二年）	●出版個人回憶錄（天下文化出版）	●江澤民交棒，胡錦濤上台（2003）

附錄三

本書重要人名中文索引

（橫排列表，每頁均由左至右、從上至下依次排列）

◎二劃
丁一權／243
丁名楠／94
丁憲薰／364

◎三劃
于右任／117, 150, 414
于斌／73, 346
山田純三郎／304, 462

◎四劃
尹仲容／486-488
井口貞夫／290
孔令侃／54, 475, 478
孔令偉／475, 487
孔令傑／324, 472, 475
孔令儀／168, 475
孔祥熙／26, 72, 168, 205, 207, 319, 415, 472-475, 487
巴德森（Patterson, Han Robert）／330
毛人鳳／86, 95, 100, 385-386, 396-397, 467
毛邦初／213, 313-318, 321-332, 334-335, 342, 398
毛澤東／33, 97, 101, 185-186, 421
王大任／380
王文成／176, 305
王世杰（字雪艇）／36, 53, 55, 127, 133, 139, 141, 178-179, 206-207, 219-220, 222-224, 226, 234-235, 240-241, 245, 247, 253, 257, 278, 284-286, 292, 299, 303, 307, 309, 320-323, 325-326, 337-339, 342, 344, 346, 359-360, 364, 381-383, 389-390, 392-396, 407, 464
王守競／332, 334
王叔銘／113-114, 217
王明／460
王陵基／124, 158, 163
王雲五／53, 444
王鍾／389
王寵惠（字亮疇）／202, 285, 326, 339, 342, 344, 382
王纘緒／124

◎五劃
丘念台／443
包華國／428-429
司徒雷登（Stuart, John Leighton）／53, 55, 136, 142-144, 241, 497-499, 503
史迪威（Stilwell, Joseph Warren）／20, 25-26, 43, 255
史特拉／226
史密斯／246
史崔特梅爾（Stratemeyer, George E.）／226
史達林（Stalin, Joseph）／34-36
史樞波（Struble, Arthur）／220, 226
尼克森／377, 430
尼赫魯（Nehru, Jawaharial）／167

布來德雷／274
甘介侯／199, 205, 208, 212, 330-332
白吉爾（Badger, Oscar）／53, 79, 122, 145-146
白崇禧／25-26, 47, 56, 85, 92-93, 99-100, 102, 116-117, 121-122, 125-127, 141, 149, 151-154, 158-159, 196-200, 205, 209, 211, 414
白德華／142-144, 168
白鴻亮／306-307
皮以書／417
皮宗敢／140, 143, 322, 324, 328, 333-334
皮爾遜／325
石志泉／416
石祖德／464
石靜宜／465, 468
石覺／184

◎六劃
任顯群／299-300, 388-389, 394, 398-399
吉田茂／291
向惟萱／315, 317, 319, 323, 327, 329, 333-334
向傳義／158-159
成舍我／378
朱世明／90, 140, 176-178, 267-269, 271, 273
朱光煥／37
朱家驊／110, 117, 159, 198-200
朱鴻南／45
江一平／359
艾奇遜（Acheson, D.G.）／139, 142, 145-146, 166, 170-171, 173, 182, 267, 278-279
艾森豪（Eisenhower, D.D.）／235, 258-259, 261-262, 430
衣復恩／100, 102, 435, 464, 482
西村熊雄／286

◎七劃
何世禮／217, 221-228, 239, 243, 245-246, 276, 287, 291, 293
何應欽／33, 97, 100, 106, 110, 113, 117, 150, 168, 186, 251, 287, 304, 356
余伯泉／307, 407, 410
余程萬／160
余漢謀／120, 159
克倫茲（Krentz, Kenneth C.）／409
克萊克（Clerek）／256
克雷格（Craig, L. F.）／409-410
吳石／254
吳延環／359
吳忠信（字禮卿）／84, 86, 111, 117, 127, 152-154, 163, 186, 382, 462
吳國楨／140, 146-147, 170-171, 175, 181, 197, 235-236, 238, 241, 285, 297, 302, 308, 346-347, 375, 382-383, 385, 387-401, 406, 467-468
吳嵩慶／318
吳稚暉／247
吳鐵城／86, 101-102, 117, 119, 272
吳麟生／36
宋子文／36, 41, 119, 415, 472-473, 475
宋子良／315-317
宋希濂／85, 105, 154
宋美齡（蔣夫人）／7-8, 17, 26, 49, 55, 58, 71-77, 88-91, 103, 133, 168-170, 180-181, 205, 231, 236-237, 253, 315-318, 320, 382, 394, 417, 449, 463-464, 469-473, 475-478, 485-490
宋越倫／131, 304, 434
李大爲／133
李友邦／375, 386
李文範／110, 128
李奇威（Ridgway, Matthew B.）／

247-248
李宗仁（字德鄰）／47, 84-86, 93, 93-97, 99-102, 106-107, 110, 112-113, 115-121, 125-128, 137, 139, 152-155, 158, 160, 173, 177-178, 195-213, 329-332, 337, 356, 366, 396, 398, 413-414, 498
李宗黃／362
李承晚／215-216, 223
李品仙（字鶴齡）／196, 203-204, 209, 214
李海（Leahy, William E.）／330-332
李國鼎／478, 483
李培基／80-81
李惟果／60, 324, 328
李登輝／491
李漢魂／121, 155, 199, 330
李蒸均／100
李彌／160, 253-256, 367
杜聿明／61, 80, 89, 106
杜威（Dewey, John）／74
杜勒斯（Dulles, John Foster）／235, 246, 258, 260, 262, 279-280, 285-286, 289, 291, 405-406, 431-432
杜魯門（Truman, Harry）／35, 42-43, 61-62, 73-76, 139-140, 143, 146, 166-168, 170, 172, 208-210, 212, 217-218, 222, 224, 229, 234, 236, 242, 247, 258, 274, 276, 278, 332,
沈昌煥／20, 40, 52, 74, 91, 130-131, 133, 140, 181, 197, 201, 226, 235-237, 245, 247, 261-262, 290, 307, 325
沈錡／258, 371
汪精衛（汪兆銘）／42, 78, 294, 422
谷正鼎／380
谷正綱／13, 126, 207, 358-359, 376, 415, 417, 437, 464
貝祖詒／41
阮毅成／444
阮賡唐／417

◎八劃

亞爾門（Almond, Edward M.）／226
周以德（Judd, Walter）／318-319, 321, 325, 399
周至柔／184, 186, 216, 222, 225, 227-228, 235, 250, 302-303, 306-307, 309, 313-318, 320-327, 334, 404, 407, 417, 437
周恩來／12, 33
周菊村／48
周碞／96, 107
周福成／50
周鳴湘／324-325
周駿彥／5, 14
季里諾（Quirino, Elpidio）／170
居正（字覺生）／99, 107, 110-111, 117-118, 186, 198
岡村寧次／304-305
杭立武／229
林挺生／375
林崇鏞／109, 114
林彪／49, 60, 243, 250
林頂立／467
林森／152
林蔚／95, 104, 150, 163, 250, 364
武誓彭／380
河田烈／293, 295
竺芝珊／468
竺培風／461, 468
邵力子／100
邵元冲／52
邵華／359
邵毓麟／216, 243-244
邱吉爾（Churchill, Winston）／34
邱昌渭／121, 152-153, 178, 202, 207
邱創煥／490

金唯信／446
長島準／291

◎九劃

侯天民／443
侯騰／226
保羅・尼茲（Nitze, Paul H.）／409
俞大維／80, 102, 320, 330, 333-334
俞國華／14-15, 18-19, 314, 324, 327-328, 334, 374, 435, 445, 447, 459-460, 482-484, 486, 494, 497
俞國興／489-490
俞濟時／60, 76, 78, 84, 96, 130, 180-181, 304-305, 364-365, 367, 371-372
俞鴻鈞／53, 126, 261, 367, 378, 387, 390, 395, 416-417, 425, 428-429, 433, 437-438, 443, 445, 451, 464
柯克（Cooke, Charles）／184, 216, 220, 226, 250, 315, 319
查良鑑／327-328
段焯／380
段澐／121
洪蘭友／116, 139140, 153, 198, 200, 202, 207, 397, 413
胡佛／443
胡邦憲／94
胡宗南／124, 156, 165-166, 183, 254
胡健中／441
胡漢民／422
胡適／61, 133, 136, 334, 337-339, 342-347, 377, 396, 414

◎十劃

韋永成／85, 105
倪文亞／375
唐君鉑／74
唐振堯／11
唐縱／473-474, 480
夏功權／84, 91, 133, 181, 327
夏威／85, 105
奚爾斯（Theis）／256
孫玉琳／443
孫立人／121, 141, 145-146, 150, 176, 226, 255, 272, 385, 399, 401-409, 467
孫科／47, 53, 60-61, 78, 86, 119, 415
孫義宣／27, 37, 371-372
孫運璿／483, 491
席波（Sebald）／293
師樞安（Strong, Robert C.）／171, 173-176, 182, 188, 203-204, 217, 219, 221, 229, 274-275, 402-403, 409
徐永昌／102, 107, 123
徐柏園／319, 389, 397, 445, 475, 484
徐振鐸／11
徐康良／126
徐堪／126
徐華昌／489
徐傅霖／416
徐煥昇／321
時昭瀛／325
根木博／306
桂永清／104, 119, 226, 308, 315, 407
桂宗堯／203
浦薛鳳／393
秦德純／123
翁文灝／53, 55, 59-60, 356, 464
袁守謙／325, 371
馬丁（Martin, Joseph Jr.）／246
馬步芳／124, 128
馬星野／441
馬紀壯／444, 478
馬乘風／378-379, 383
馬歇爾（Marshall, George C.）／42-43, 55, 72-75, 77, 140, 144, 229, 236-237, 240-242
馬鴻逵／124, 128

陳濟棠／110, 183
陳繼恩／168
陶百川／196
陶希聖／84, 111, 124, 197, 201, 206-207, 325, 367, 370, 377, 441
陶德曼／78
麥克阿瑟／222, 239, 248
麥克唐納（Macdonald, J. J.）／142, 145
麥克魯／251-252

◎十二劃

傅作義／50, 60, 92
傅涇波／53, 143
傅啓學／376
傅斯年／74
傑賽普（Jessup, Philip S.）／139, 170-173, 176, 402, 409
富田直亮／306-307
彭孟緝／306, 308-309, 345, 397
彭德／386
曾虛白／291
曾澤生／50, 63
游建文／72, 169
游彌堅／386
湯恩伯／94, 96, 104, 114, 127, 129, 149, 174, 176-177, 305
登努萬／144
程天放／376
程烈／450
程潛／138, 337, 379
童冠賢／80, 355, 358-360, 368
費驊／483
賀國光／183
辜振甫／488
黃仁霖／224, 449, 486
黃少谷／95, 120-121, 124, 126, 140, 155-156, 168-170, 178, 185, 197, 201, 207, 261, 284-285, 290, 302, 307, 325-327, 345, 358, 370, 377, 389-392, 394, 397, 417, 421, 432, 441
黃光銳／321, 336
黃旭初／78, 81, 121, 155
黃百韜／56, 63
馮治安／56, 63
黃伯度／446
黃季陸／444
黃杰／417, 487
黃珍吾／426
黃國書／363
黃強／380
黃啓漢／101
黃紹竑／99-100, 107
黃朝琴／386, 417
黃華／136
黃雄盛／168
黃維／60-61, 64
黃聯登／386
黃鎮球／226

◎十三劃

奧特華／424
楊森／80, 123
楊肇嘉／375, 390, 400
楊寶琳／429
楊覺天／429
葉公超／139-140, 171-172, 198-199, 203, 217, 221-222, 235, 253, 258, 261, 268, 277-281, 284-292, 295, 302-303, 309, 323, 325, 346, 402-403, 409, 432-433
董顯光／73, 133, 140, 233, 235-237, 239, 241-242, 246-247, 290, 324-325, 328, 426, 465, 486, 488
裘愛（Joy, Charles Turner）／226
詹森（Johnson, Louis）／240
鄒魯（字海濱）／52, 125

◎十一劃

崔書琴／370, 415
康澤／48
張平群／202
張光濤／359
張廷楨／133
張其昀／344, 370-371, 373, 376-377, 382, 415, 417, 420, 425-427, 473-474
張季鸞／21
張岳軍／388
張治中（字文白）／79, 86, 96-97, 100-101, 111, 185-186
張炎元／396-397
張發奎／211
張軫／85, 89, 105
張群／85-86, 100, 117, 123-127, 140, 151-153, 157, 159-161, 186, 200, 207, 219, 235, 238, 247, 261, 284-288, 290-293, 302, 356, 364, 378, 382, 389-391, 393, 415, 445
張道藩／396-397, 417, 421
張寧生／22
張厲生／50, 53, 378, 416, 438
張學良／471
張導民／448
張曉峰／343
曹士澂／306
曹聖芬／20, 84, 91, 96, 126, 131, 181, 197
梅農（Menon, Krishna）／167
理察．魯斯克／405
莫成德（Merchant, Livihgstone）／409
莊士敦（Johnston, C.S.）／252-253
許丙／176
許靜芝／382
郭廷亮／401
郭悔吾／317
郭寄嶠／226, 250
郭德潔／212
郭懺／150, 163
陳大慶／433
陳之邁／328
陳方（字芷町）／18, 84
陳布雷／14-15, 18, 20, 52, 56-59, 440
陳立夫／79, 95, 117, 119, 121, 127, 159, 200, 207, 355-363, 368
陳希曾／130-131
陳志明／443
陳良／131, 147
陳宗熙／371-372, 472
陳尚文／400
陳岱礎／173-175, 188, 203-204, 221
陳明仁／138, 147
陳果夫／6, 13, 362, 368
陳勉修／488
陳炯明／201
陳英士／130
陳納德（Chennault, Claire L.）／17, 141, 253, 320, 381
陳雪屏／376
陳博生／359
陳舜耕／103, 133
陳誠／33, 79, 88-89, 136, 146, 150, 155, 163, 180-182, 184, 186, 215, 219-220, 225, 235, 242, 247, 250, 261, 268, 278, 284-285, 287-291, 295, 302, 305-307, 311, 323, 346, 358-361, 367, 375, 377, 382, 386-389, 391-396, 415-418, 421-423, 425, 430, 432-433, 435, 437, 466, 476, 481
陳達元／443
陳漢平／300
陳肇英／362
陳儀／84, 94-96, 176
陳慶瑜／448

雷法章／444
雷德福（Radford, Arthur）／258
雷震／345
雷諾／424-425

◎十四劃
廖耀湘／55, 63
熊丸／84, 490
熊克武／164
端木傑／152
端木愷／382, 450
翟石／143-144
蒲立德（Bullitt, William C.）／60, 63
赫爾利（Hurley, Patrick）／26, 33
趙光宸／397
趙守志／379
趙恆惕／78

◎十五劃
劉士毅／304
劉大中／445-446
劉文輝／124, 159, 161, 164
劉安祺／123
劉汝明／379
劉自然／416, 424
劉攻芸／93-94, 106, 109
劉健群／81, 358-359, 363
劉斐／101-102, 107
劉煒／426
摩利爾（Merrill）／255-258
樂幹／426
潘衍興／380
蔣方良／37, 103-104
蔣永福／366
蔣君章／57
蔣孝文／36, 103, 465
蔣孝佐／476, 478
蔣孝剛／491
蔣孝章／103
蔣廷黻／233, 277, 279, 322
蔣堯祥／133-134
蔣渭川／176, 386
蔣華秀／105
蔣瑞蓮／468
蔣經國／18-19, 35-38, 52-54, 60, 80, 83-84, 86, 88-89, 91, 96-97, 99, 103-104, 114, 122, 125, 129-130, 151, 156, 160-161, 170, 178, 187, 201, 238, 253-254, 264, 304, 306, 308, 314, 320-321, 364-365367, 370-371, 373, 395, 417, 420-421, 423, 430, 433-435, 437, 447, 449, 459-467, 473-479, 481-483, 489-491, 493, 500
蔣碩傑／446
蔣緯國／8, 14-15, 19, 114, 130, 134-135, 408, 459-463, 465, 468, 491
蔣錫侯／105
蔡孝乾／386
蔡孟堅／306
蔡斯（Chase, William C.）／252, 254-255, 306, 308-309, 407
衛立煌／49-50
鄭介民／101, 142-145, 153, 252, 433
鄭天錫／167, 188
鄭彥棻／116, 119, 151-152, 198, 202, 212, 358-360
鄧錫侯／159, 164
魯斯克（Rusk, David Dean）／241, 245, 404-406, 409
魯道源／124

◎十六劃
冀朝鼎／109
盧漢／125, 159-161, 164
穆懿爾（Moyer, Raymond T.）／300-301
蕭自誠／325, 345
蕭毅肅／127, 226

諾蘭（Knowland, William F.）／197, 315, 317-318
賴伊（Lie, Trygve）／222
錢大鈞／18, 29, 31
錢純／446
閻伯川／48-49
閻振興／492
閻錫山／86, 88, 99, 110, 117-120, 125, 127, 151, 153, 158, 160, 169, 181, 197, 200
霍夫曼（Hoffman, Paul G）／61, 76-77
龍佐良／305
龍雲／25-26
龍潭匯／160

◎十七劃
戴戎光／99
戴笠／39-40
薛岳／120, 183
襄作人／246
謝東閔／491
謝冠生／382, 397, 444
鍾華德／308-309

◎十八劃
魏勃（Webb, James）／142-144
魏勞柏／223
魏景蒙／292
魏德邁（Wedemeyer, Albert Coady）／26, 132, 136, 143
藍欽（Rankin, Karl）／229, 253, 258, 284, 288, 302-303, 325-327

◎十九劃
羅友倫／406
羅申（Roschin, N.Y.）／97
羅列／183
羅勃遜／262
羅家倫／167, 376
羅斯福（Roosevelt, F.D.）／21, 23-24, 26, 34-35, 73, 162
羅維特（Lovett, Robert A.）／77
羅廣文／154-155, 163
譚紹華／328
寵安富／11

◎二十劃以上
嚴家淦／302-303, 387, 389, 393, 397, 432-433, 444, 448, 479, 481-482
顧正秋／398
顧祝同／102, 115, 126-127, 161
顧毓瑞／334
顧維鈞／55, 77, 145-146, 199, 209, 242, 245, 274, 279, 285-287, 315, 319, 324, 326, 333, 399, 405-406, 410
顧應昌／446
龔德柏／378, 379, 383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蔣公與我：見證中華民國關鍵變局／周宏濤口述；
汪士淳撰寫. -- 第一版. -- 台北市：天下遠見，
2003〔民92〕
面； 公分. ——（社會人文；192）

ISBN 986-417-194-1（平裝）

1. 周宏濤—傳記 2. 中國—歷史—民國（1912-）

782.886 92016750

典藏天下文化叢書的5種方法

1. 網路訂購

歡迎全球讀者上網訂購，最快速、方便、安全的選擇

天下文化書坊 www.bookzone.com.tw

2. 請至鄰近各大書局選購

3. 團體訂購，另享優惠

請洽讀者服務專線(02)2662-0012或(02)2517-3688分機904

單次訂購超過新台幣一萬元，台北市享有專人送書服務。

4. 加入天下遠見讀書俱樂部

■ 到專屬網站 rs.bookzone.com.tw 登錄「會員邀請書」

■ 到郵局劃撥 帳號：19581543 戶名：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請在劃撥單通訊處註明會員身分證字號、姓名、電話和地址）

5. 親至天下遠見文化事業群專屬書店「93巷・人文空間」選購

地址：台北市松江路93巷2號1樓 電話：(02)2509-5085

蔣公與我

見證中華民國關鍵變局

作　者／周宏濤　口述　汪士淳　撰寫
責任編輯／詹小玫、王玉蘭（特約）
封面設計・美術編輯／沈月蓮（特約）
封面照片提供／周宏濤、黨史會
作者照片提供／汪士淳
全書照片提供／周宏濤、黨史會

出版者／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創辦人／高希均、王力行
天下遠見文化事業群　總裁／高希均
發行人／事業群總編輯／王力行
天下文化編輯部總監／林榮崧
版權部經理／張茂芸
法律顧問／理律法律事務所陳長文律師、太穎國際法律事務所謝穎青律師
社　址／台北市104松江路93巷1號二樓
讀者服務專線／（02）2662-0012
傳　眞／（02）2662-0007；2662-0009
電子信箱／cwpc@cwgv.com.tw
直接郵撥帳號／1326703-6號　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電腦排版／立全電腦印前排版有限公司
製版廠／立全電腦印前排版有限公司
印刷廠／崇寶彩藝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裝訂廠／台興裝訂廠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2517號
總經銷／大和圖書書報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2）2981-8089
出版日期／2003年9月30日第一版
2003年10月20日第一版第2次印行
定價／500元
ISBN：986-417-194-1
書號：GB192
BOOK zone 天下文化書坊 http://www.bookzone.com.tw

※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本公司調換。
※ 本書僅代表作者言論，不代表本社立場。

天下文化　與您一起推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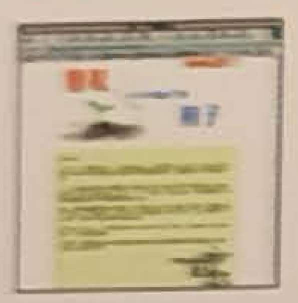
讀一流書・做一流人・建一流社會

題字：名書法家　董陽孜女士



讀書

從這裡開始



參加天下遠見讀書俱樂部

讓學習成為一種自我承諾

啓動終身的讀書計畫

網址：rs.bookzone.com.tw



進入天下文化書坊

提供最完整的好書資訊

豐富您的閱讀世界

網址：www.bookzone.com.tw



來到93巷人文空間

讓書香伴著濃郁咖啡與一片陽光

醞釀您的沈思心境

台北市松江路93巷2號1樓

服務專線：(02)2509-5085

■「讀書」二字摘自董陽孜書法作品

ARY

5 2003

OF TORONTO

「在中華民國最動盪的時期，就是政府遷台前後，我正好在蔣公身邊工作，追隨他走過那段國家幾乎淪亡的日子，並親眼目睹台灣如何逃過中共血洗的威脅，以及台灣如何篳路藍縷地走向繁榮。

我深深感受到應爲歷史留下見證，希望藉著親身的經歷，讓國人更能了解蔣公的行誼和爲人。」

——周宏濤

周宏濤，在中華民國最關鍵變局時刻（1943-1958），追隨元首蔣中正左右，是深得信賴的機要祕書；來台後，歷任財政部政務次長、台灣省財政廳長、行政院主計長、圓山大飯店董事長等要職。

他親眼見證了蔣中正的起落，從對日抗戰勝利的高峰，到敗退至台灣的低谷；從開羅會議與歐美列強的平起平坐，到各國離棄、爭取美援的忍辱負重。蔣中正的榮耀與苦楚、堅毅與軟弱，他無不點滴在心。

因職務之係，周宏濤也獲得第一夫人宋美齡的信任，從而了解她與蔣經國的母子互動、孔宋家族在宋美齡心中的份量及其錯綜複雜的政經關係。另外，他也與經國、緯國兄弟結為好友，體認兩兄弟間的矛盾情結與不同性格，對於兩人有真實的觀察與評價。

歲月滔滔，昔人已遠，蔣中正及蔣家的功過，自有歷史做出公正評價。而本書是周宏濤的親身經歷，見證中國近代史上諸多重大事件，如重慶會談、大陸政權易手、麥帥密訪、對日和約、毛邦初案、五二四事件等等，值得一讀。

N 986-417-194-1〔782〕
00500
9789864171941
書號：GB192　定價500元
CWPG 天下遠見文化事業群　天下文化
www.bookzone.com.tw

EAST-ASIAN LIB. -U. OF T.
3 1761 06009164 2